责任编辑：曹国福
封面设计：林　荫

ISBN 988-98584-7-9
9 789889 858476

ISBN-10: 988-98584-7-9
ISBN-13:978-988-98584-7-6

定　价：40.00 元

革命历史与领袖不容歪曲和否定

陈守礼　著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革命历史与领袖不容歪曲和否定

——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有关词条的删改

陈守礼　著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陈守礼，男，1925 年生于江苏省通州市。1940 年加入新四军第一师第三纵队参加抗日战争。1941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东进后开辟、创建南通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期，转入地方参加开辟新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转入军队，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靖江八圩港等战斗和太湖剿匪。后任松江军分区党委会秘书、步兵第 86 师司令部秘书、江苏省军区政治部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助理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哲学班学习结业。1958 年又从军队转入地方工作，长期在大专院校和地、市级党校做理论教研工作。副教授。离休干部，享受地、市级待遇。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员、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会员。

曾发表过《列宁和反映论问题》、《必须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不能动摇我们立国的经济基础——公有制》和《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等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论文数十篇，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复印；另有一文《〈交锋〉(书)隐瞒了什么？》为 1998 年《中国政工年鉴》收录。

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之十

革命历史与领袖不容歪曲和否定

——评1999年版《辞海》对有关词条的删改

陈守礼　著

CUP
中联社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
编　委　会

顾　问:邓力群　袁宝华　李尔重
袁　木　林默涵　贺敬之
魏　巍　朱子奇　丁振海
郑怀义　徐非光　马蓥伯
郑伯农

主　任:佘　飘

编　委:陈志昂　何火任　杨桂欣
胡　澄　江上月　梁惠民

胡锦涛同志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引自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几点说明

一、本书引证、评析《辞海》的词条共493个，其编号为（一）至（四九三）。每个词条均注明1979年版的页码与1999年版的页码，以便作对比或比照。

二、凡是删节的词条所指出的页码，是可对比的页码，因为新、旧词条皆在，“可对比”；凡是被取消的词条，指出的页码是“可比照”的页码，因为1999年版在这相应的页码上本该有此词条，经过比照可知已被取消了。

三、凡所引证《辞海》的页码，均系1979年版和1999年版《辞海》缩印本的页码。

四、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凡是被《辞海》1999年版编者删除的文字或取消的词条的全文均加横线标明。读者一见加了横线的文字，便知这是1999年版编者特意取消、删节的内容。

前　言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股历史翻案风，否定革命历史及其领袖。这是同“全盘西化”、“与国际接轨”的思潮分不开的。

实际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是从未有过一份文件提到我国要“与国际接轨”的；相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党报是批评“与国际接轨”的观点和主张的，是一贯反对敌对势力对我实行“分化”、“西化”的。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轨？我国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与西方世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是必要的，是我们主张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搞所谓“接轨”，那就只能意味着取消我们自己的轨道，即否定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就必然要翻历史的案、否定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及其历史以至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历史。这种错误思潮和主张是迎合西方反共势力对我实行“分化”、“西化”，是违背我国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是违背我们国家的宪法和我们党的党纲党章的，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绝对

不能允许的。

这里有一个大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缔造的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历史和现实，这个基本原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这也是鼓吹“与国际接轨”论者既无法否定又绕不过的一个大前提。

第一，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建立到 1949 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历史是充分肯定的。它写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 792、793、794 页）

第二，这个《决议》对 1949 年建国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充分肯定的。它写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

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上书第794、795页）

第三，在1995年5月2日，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所作《今后15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若干原则问题》这篇重要的政策性《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在文件中不要使用国内外经济体制接轨这一用词，因为所谓接轨，实际上是指改变我国的轨道，把它接到西方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去。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制度不一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说，要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同时指出：“意识形态问题，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更谈不上“接轨”了。（见《学习 研究 参考》杂志1996年第7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联合编辑出版）由此可见，在“经济体制”等方面，也不能“改变我国的轨道”去与西方世界“接轨”，更何况“意识形态”。这是个原则问题，而且是基本原则。

第四，由于有些人不断掀起“与国际接轨”这股错误思潮，我们的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在2003年9月1日《答记者问》中又一次明确答道：“在涉及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建设和基本生活方式等问题上，我们是不能随意使用‘与国际接轨’一词的。”在贸易领域中，适宜使用“国际通行做法”、“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国际标准”等提法，因为“‘与国际接轨’不是一个规范的术语”。同时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同样不存在‘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也不宜使用‘与国际接轨’的提法。”这就说得非常明确具体了。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去“与国际接轨”，那就等于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就等于否定中国共产党

及其历史以至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历史。这是绝对错误和不能允许的。

以上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是党中央一再重申和肯定的。2003 年 12 月 26 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总书记强调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人民日报》2003 年 12 月 27 日）

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再次肯定和强调："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再次重申和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思想伟大的历史贡献。

1979 年版《辞海》，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关怀、支持下开始修订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辞海》。它在其《前言》中说："1962 年出《辞海·试行本》十六分册，1965 年 4 月出《辞海·未定稿》。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所强加于《辞海·未定稿》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被推倒了。"它是在正常情况之下，先以"试行本"形式、后又以"未定

稿”形式试版，在向各方面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历20多年时间的编写，才于1979年正式出版的。它所编写的内容是符合客观事实、符合我国宪法、符合党中央的精神的。当然，《辞海》为了不断完善、充实，精益求精，纠正个别、少数难免产生的差错，修订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原词条符合史实，观点正确，修订者却违背史实，系统地大面积地推倒和否定原写的正确词条或正确内容，我们就理应根据客观事实和1979年版原词条的正确表述加以指出，并要求纠正。因为写进《辞海》，或从《辞海》中取消、删除，都应该是有理、有据和严肃认真的。

1989年版和1999年版《辞海》的修订，恰恰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与国际接轨”的思潮泛滥期间，一些编者难免受到这股错误思潮的影响，背离上述党中央的《决议》和党中央一再重申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违背史实，违背我们国家的宪法和我们党的党纲党章，搞所谓意识形态“与国际接轨”。对于这一点，实际上《辞海》主编也已公开承认，这就是：当1999年版《辞海》修订版出版受到读者的批评、谴责时，《辞海》主编发表《公开信》进行辩解，这信刊登在《百年潮》杂志2000年第6期上。这《公开信》说，他们修改词条是依据胡乔木写给中央的《意见信》（见《文献与研究》杂志1987年第2期）的“意见办理”的；又说胡乔木的《意见信》是谈中美“合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部辞书问题的；并说在中美“合编”这部辞书时，对【毛泽东】词条怎么写发生了“争论”，美方对写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词语不同意，表示“不接受”，经“争论”，美方不肯让步，假如“再争则无法达成协议”，为了“达成协议”，中方接受了“美方的修改意见”，就一步到位地把【毛泽东】这个词条中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词语删除掉了；（见中美合编的辞书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 5 卷第 740 页）还说胡乔木的《意见信》说，如不取消这些词语，就“难以保持与各主要国家的同类辞书具有同等的客观性、稳定性”。还提到按“美方的修改意见”，“依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的写法写人物词条。

《辞海》主编的《公开信》在引证了以上《胡信》的“意见”、“美方的修改意见”以及“依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的写法，作为修改词条的依据后说：“此后《辞海》等辞书均按此意见办理。”由此看来，举出这些“依据”和“理由”，并表示“按此意见办理”，岂不是明明白白地承认了《辞海》确实是在搞意识形态“与国际接轨”吗？更有说服力的是事实的证明：1999 版《辞海》在《前言》中也承认：“1992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与东华书局合作，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辞海》（1989 年版）。”应该指出：“台湾地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是同西方世界一致的。“台湾地区”的统治者准许公开“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辞海》（1989 年版）”不是没有条件的，这条件正是在于 1989 年版已经按“美方的修改意见”、“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的写法改写了词条。在改写的词条中已经否定、贬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否定、贬低了马克思、列宁等人；相反，改写了蒋介石等国民党的党政军人物词条，均为之恢复了“名誉”；还相应地改写了一些有关政治、历史事件的词条。

《辞海》是怎样具体“按此意见办理”来规范、修改众多词条，把美方“不接受”的内容作了删改的呢？现在人们已清楚地看到，它是采取了“不宣而战”、“渐进式”的办法，分三步走的。这就是：第一步是通过 1989 年修订版出版的机会，用删改或取消词条的办法来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当时人们只注意到编者在【毛泽东】词条中删除原词条用“伟

大的”这个词来评价毛泽东，即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实际上，编者不只是删除“伟大的”一个词，而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5个关键性的重要词条以及与之有关联的数以百计的词条内容都作了删除或将整个词条取消，以满足美方“不接受”这些革命内容的要求。第二步是通过1999年修订版出版的机会，仍用删改、取消词条的办法来进一步否定、贬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当时人们只注意到编者在【毛泽东】词条中删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编者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5个关键性词条，以及与之有关联的数以百计的词条的内容，又都作了进一步删除或将整个词条取消，以进一步满足美方“不接受”革命内容的要求。这是《辞海》在搞意识形态“与国际接轨”的行动中，已经走了的两步，事实俱在，白纸黑字明摆着。既然《公开信》宣称“此后均按此意见办理”，那么，“此后”的第三步也会再走，即等到2009年出版修订版时，再来更进一步删除或取消《辞海》中属于美方“不接受”的革命内容。这是逻辑的必然。

然而，毛泽东确实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确实是“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早已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公认。如果要想改变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评价，那就涉及我们党的党纲、党章和国家的宪法，这是要经全党和全国人民讨论后，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作出决定的。《辞海》怎能把《胡信》的“意见”和“美方的修改意见”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之上呢？因此，我们认为《辞海》主编的《公开信》举出的“与国际接轨”的“依据”和“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

堂堂的主权国家，编写本国《辞海》的词条，竟然要以美方的“接受”或“不接受”为取舍的标准，这是将我国置于何等地位？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1999年版《辞海》对有关词条的错误删改。所谓“有关”词条，是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关”的词条，与社会科学“有关”的词条。在这些方面也不是所有“有关”的词条，而是我们已发现有问题的“有关”词条，重点是“有关”贬低、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和贡献的部分，“有关”贬低、否定马恩列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历史和贡献的部分。我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对比法，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应尊重事实，让事实来说话。不仅经过删改重写的词条应与原写的词条作对比，更重要的是原写和重写的词条都应与事实作对比，这才能看出哪些词条写得符合事实、观点正确。

我们认为指出这些有关词条删改中的错误，是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因为《辞海》是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不同于一般报刊的文章，也不同于出版社出版的一般书籍。《辞海》是供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疑难问题时查对、验证的，人们往往会以它为准绳的。因此，在对有关词条的取消、增设、删改中的错误，其产生的误导作用和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而且其危害是严重和长期的。为了对党对人民负责，笔者花了近8年时间，核对了中美合编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和《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三个版本中删改、取消和增加、重写的数以千百计的词条，发现1999年版《辞海》为了“与国际接轨”违背史实、颠倒是非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现将已经发现有错误问题的近500个词条分为20个专题，指出和评析其错误。由于涉及范围很广，而笔者是个耄耋之年的新四军老兵，水平、能力、精力都有限，因此，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批

评有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评析还是初步的，在专题的编排上和一些提法上难免会有不准确和疏漏之处。恳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真理是不怕辩论的，真理是不辩不明越辩越明的。我们敢于提出批评，同样也欢迎《辞海》编者的反批评。我们更希望所有真正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和共产党员都义不容辞地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讲话！事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重要上层建筑的生死存亡，事关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我们不应让少数人继续把持和垄断话语权。我们要维护党和人民的合法权利。我们要坚持真理！这是历史的召唤！

2007年12月

目　录

一、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
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否定 ················ 1
二、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首创“以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
胜利……新的革命道路”的否定 ························ 29
三、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的建党、建军
思想路线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的否定 ············ 42
四、评 1999 年版《辞海》对“遵义会议”及其历史意
义的贬低、否定和为党史上的历次错误路线翻案 ········ 56
五、评 1999 年版《辞海》对“延安整风运动”等
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及其作用和意义的否定 ·············· 74
六、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中的思想路线战略策略及其中流
砥柱作用的贬低和否定 ································ 91
七、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进行解放战争的思想路线战略策略及其胜利
的否定,对蒋介石“剿共”、“戡乱”的肯定 ·············· 130

八、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和中国
共产党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正确决策
及其伟大成就的贬低和否定 …………………………… 147
九、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关于抗
美援朝的正确决策和这场战争胜利的
贬低与否定 ……………………………………………… 159
十、评 1999 年版《辞海》对 1949 年开始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否定 ……………… 178
十一、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重视
农民、农村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建
设的思想路线及其实践的否定 ……………………… 199
十二、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和中国共
产党肯定的中国新文化的代表鲁迅、郭沫
若的贬低和对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否定 ………… 223
十三、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和中国
共产党倡导、培育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基
本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否定 ……………… 245
十四、评 1999 年版《辞海》对马恩列斯和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否定 …………………………………… 272
十五、评 1999 年版《辞海》为新老修正主义翻案 ………… 327
十六、评 1999 年版《辞海》为帝国主义侵略者
和我国投降派翻案 ……………………………………… 366
十七、评 1999 年版《辞海》为蒋介石翻案 ………………… 423
十八、评 1999 年版《辞海》为胡适翻案 …………………… 467
十九、评 1999 年版《辞海》对“胡适思想批判”的否定 … 483
二十、毛泽东的伟大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 520

后　　语 ………………………………………………………… 547

一、评1999年版《辞海》对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否定

现在，我们首先来看1999年版《辞海》编者是怎样通过对原词条进行删改、取消和重写，来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逐步拆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轨道”，走向“与国际接轨”的。

1999年版《辞海》编者首先是从总的方面下手，对原【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5个关键性词条动手术，把前三个关键性词条中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重要内容删除，把后两个关键性词条整个取消。同时把与这5个关键性词条内容有关的一系列词条作相应的删改或整个词条取消，以此来具体地否定或贬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否定或贬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请看编者是怎样通过下列“三种手法”的交替使用和混合使用，对如下第一至第一六个词条删除或取消的：

第一种手法是公然否定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公然否定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及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路线。

（一）删改【毛泽东】这个关键性词条。公然否定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99年版《辞海》编者将原【毛泽东】这个关键性词条删除如下18项重要内容：

1. 删除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 删除毛泽东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3. 删除毛泽东帮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4. 删除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

5. 删除毛泽东“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

6. 删除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7. 删除“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8. 删除“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时间，就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并从1947年7月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

9. 删除毛泽东指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10. 删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方针”。

11. 删除毛泽东在第一届政协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2. 删除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发动广大群众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胜利完成了抗美援朝运动”。

13. 删除毛泽东在“1958 年，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4. 删除毛泽东在“1962 年，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15. 删除“1963 年领导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6. 删除毛泽东在 “1971 年领导全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

17. 删除“在半个多世纪中，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又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毛泽东都写下了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结集为《毛泽东选集》，已出版 5 卷”。

18. 删除“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为中国人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赢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5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59 页）

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发表在《毛选》第 1~5 卷中的文章，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英明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光辉记录，是永远的丰碑。1979 年版编者本来已把这 5 卷中的 48 篇文献编为 48 个词条写进了《辞海》。这些词条所反映的史实，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想知道和查阅的典故。然而，经笔者核实，1999 年版编者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取

消这 48 个词条中的 19 个重要词条,还把其余的 29 个词条的重要内容或删除或淡化（其中有的词条 70%以上的内容被删除，近乎取消）。这难道不是大规模地全面地搞“非毛化”吗？本书将在下列有关专题中对这种无理的取消和删改进行评析。

有人说：“删除不一定等于否定，不能简单地与否定划等号。”笔者认为是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但是联系编者对几乎所有有关词条系统性地作相应的删除或取消，并联系史实作具体分析,就能证明这种“删除”是否属于否定。1999 年版编者否定毛泽东正是对所有有关词条作了违背史实的系统性的取消或删除。如果说还有些地方没有删除完,那也是准备下一步继续删除的。这些问题,本书将结合以下有关专题进行评析。

在 1999 年版《辞海》刚刚出版时,即引起众多的批评和谴责。人们强烈反对编者狂妄否定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年《辞海》编辑部有关人员曾诡辩说,删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 8 个字并非否定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因为《辞海》的“篇幅有限”;后又说什么他们是肯定“毛泽东思想”的。现在,再看编者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条。

（二）删改【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性词条。编者将原词条 80%以上的内容删除,近乎推倒重写。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原“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性词条如下 16 项内容：

1. 删除“在半个多世纪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反复斗争的实践经验的结晶。”

1999 年版编者删除以上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的核心内涵后,改写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同党内的右倾倾向……左倾倾向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粗看也写到“逐渐形成”,但“逐渐形成”的具体内容是毛泽东“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反复斗争的实

践经验的结晶”这个明确具体的、核心的内容没有了，变成了仅仅与党内的“左、右倾向”有过“斗争”。这违背史实。

2. 删除毛泽东思想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

原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作为“基本观点”而突出地写了的。被删掉后重写的词条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是贯串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基本方面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时，把“实事求是”这个“基本观点”和“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并列，这就没有突出它是贯串于一切方面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实事求是”不仅贯串在群众工作中表现为“群众路线”，贯串在“外交工作”方面表现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它还要贯串到其它各个方面。“理论联系实际”既是“基本观点”又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毛泽东最重视的，竟然删除了。

3. 删除毛泽东思想关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分析，正确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和转变等问题。”

这是在具体贬低、否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以及革命的转变等问题。本书在下面第十专题中联系相关的21个词条的删改作具体评析。

4. 删除毛泽东思想关于“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战略思想，开创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道路。”

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否定毛泽东开创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道路。本书将在下面的第二专题中，联系相关的16个词条被删改、取消作具体评析。

5. 删除“制订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6. 删除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思想。

这是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人民军队思想的贬低和否定。本书将在下面第三专题中联系相关的15个词条被删改和取消作具体评析。

7. 删除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等等"的思想。

这是否定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方面的思想。本书将在下面第六专题中联系相关的33个词条的取消和被删改作具体评析。

8. 删除毛泽东思想"关于工农联盟,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

这是否定毛泽东关于重视农民和农业方面的思想。本书将在下面第十一专题中联系相关的29个词条的被删改和取消作具体评析。

9. 删除毛泽东思想 "关于文艺为工农兵及其干部服务等等,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本书将在下面第十二专题中联系相关的10个词条被删改作具体评析。

10. 删除"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地制订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1. 删除"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方面的思想。

这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本书将在第十个专题中联系相关的21个词条被删改作具体评析。

12. 删除"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的思想。

这是否定毛泽东关于重视农民、农业改造和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方针方面的思想。

本书将在下面第十一专题中联系相关的29个词条被删改

作具体评析。

13. 删除毛泽东思想“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本书将在下面第十二专题中联系相关的 10 个词条被删改作具体评析。

14. 删除了毛泽东“关于反帝反修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规定了当代国际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为建立、巩固和扩大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这是公然否定反帝、反修。当年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者反帝、反修是客观存在；而且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面临反帝、反修的历史重任。关于编者为新老修正主义翻案，为帝国主义翻案，本书将在下面第十五、十六专题中分别联系 39 个和 85 个相关的词条被删改作具体评析。

15. 删除毛泽东思想“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也是明显贬低和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16. 删除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战斗争取胜利的伟大旗帜。”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5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61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违背史实，在数以百计的词条中，对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了同样的删除。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同时也大面积地删改“中国共产党”词条。

（三）删改【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被删内容近 70%。

欲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亦必否定中国共产党，因为中

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伟大、光荣、正确是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分不开的。1999 年版编者出于“非毛化”的需要，在大面积地删除“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两个词条的主要内容后，随之对“中国共产党”这个词条作相应的删除和否定。

在这里，我们首先评析该词条被 1999 年版编者删除的两大重要内容：

1. 删除“中国共产党”原词条开头第一段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2. 删除“中国共产党”原词条结尾的一段结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1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06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中国共产党”这个原词条的近 70%的内容，本书在下面将结合各个专题加以评析。在这里，我们首先着重评析编者对以上两大主要内容的删除。

编者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句话删除后，在重写的词条中改写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唯独不提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

应该指出：这样改写是错误的。坚持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在国际共运史上始终是个重要原则问题。不论出现什么新情况、新策略，都是不能动摇党的阶级性质的。恩格斯认为策略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限……否则就要长期丧失其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马恩全集》第 37 卷第 322~323 页）

为了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能变，列宁与普列汉诺夫是作过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的。列宁在《关于党纲的历史》一文中指出：“我始终坚持在谈到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一词代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一词”。（《列宁全集》第8卷第218页）列宁说得对，“无产阶级”这个词是社会科学的规范词语。这是不能用任何别的词语代替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政党之所以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因为她具有无产阶级的这个阶级性。至于讲“先锋队”，那是说明党员与无产阶级的一般成员之间的区别，党员的政治觉悟与革命性应高于无产阶级的一般成员，所以说它是阶级的先锋队。它不是说明党的阶级性质的。

关于“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有基本的和非基本的。这是首先要分清的。我们常说要“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那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基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同非基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有区别的。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的基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不能更改的，是不能用别的提法“代替”的。“基础”是个比喻，一座大厦在强固的基础上已建立起来，可以一层再一层地建上去并不需要更改其基础。正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基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强调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就是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有高举不能更改的，也不能用非基本的指导思想与之并列，甚至取而代之的。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了完成党和国家不同的历史任务，也需要有某些具体指导思想，但它不能取代基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可是，现在有些人却往往忘记了这个“要始终高举的旗

帜”，即基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然而，1999年版编者不是“忘记”，而是故意将它“删除”，是否定它。

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及其实践和成功，所以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这是我们应该永远高举的旗帜。

更应该指出：1999年版编者否定中国共产党是 “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阶级性质，绝非偶然，这不仅仅是词语问题，这是个立场问题。编者的立场是根本不承认古今中外的任何 “政党”、“国家”“政权” 具有阶级性，这是从编者在删改【阶级性】等许多词条中表现出来的。编者把“国家”和“政党”均从【阶级性】这个词条中剔除，以表明即使在阶级社会里，“国家”和“政党”也是从来都不具有“阶级性”的；编者删改国家【政权】这个词条时，也把它的“阶级性”删除。（详见本书第十五个专题的评析）

还应指出：编者之所以删除“无产阶级”这个词，是由于“美方‘不接受’‘无产阶级’这个词”，删除是为了满足美方的要求，与美方的立场取得一致。

（四）取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

1979年版原词条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39年冬和其他同志合写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本文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指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及其主要矛盾，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整个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认清两者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两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422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19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取消这个词条实在令人震惊！你们不是很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吗？这篇著作确实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集体创作，而且是阐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革命理论的极重要的文献，竟然也要加以取消！编者在重写的【毛泽东思想】词条中不是写到“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总结”吗？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篇最基本最重要的“经验总结”，竟被干脆取消！这岂不是又证明重写的词条写“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总结”是一句空话、是一句骗人的假话吗？

人们不能不考虑：这仅仅是取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个词条、一篇文章呢，还是意味着要在事实上取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大家知道，在苏联、东欧剧变后，有些国家反共势力上台，已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取消了其存在的“资格”。最近我国也冒出了一个新“西山会议派”，他们也狂言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取消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的共产党人难道还没有到警醒和回答这个挑衅的时候吗？

1999 年版编者在上述 4 个词条中，公然删除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份，删除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删除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阶级性质，并取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个词条，都不是偶然的。这都是

为了"非毛化"，首先是否定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进而把这个党内所有领导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身份都取消。显然，欲以此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此来否定中国革命。

（五）取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关键性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指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方针。一个国家必须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和斗争，才能摆脱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获得国家的独立。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以后，还必须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有计划地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闭关自守，排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毛泽东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技术革新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文件》第 36 页）（可对照《辞海》1979 年版第 822 页与 1999 年版第 991 页）

（六）在【大生产运动】这个词条中，1999 年版编者也把"自力更生"删除。（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635 页与 1999 年版第 771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竟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反映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关键性词条取消了。联系编者把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个词条中的"自力更生"也删除；再联系编者在【王进喜】这个词条中也把他"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删除，（见下文【王进喜】词条）看来编者是有意否定这个方针。其实，"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这个方针，是我们党一贯的指导思想。从哲学基本原理来看，这是体现和贯彻内因起决定作用的原则，这是无论干革命或建设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实践已证明中国共产党从农村包围城市开始，直至1949年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以及建国后几十年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原则下取得的。正是由于执行这个方针的结果，取得了政治独立、经济独立，才创造出了后来进行改革开放的前提。

中共中央在《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专门有一节充分肯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835页）

邓小平也多次重申：“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邓选》第2卷第363页）

可是，1999年版编者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取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的同时，把党始终坚持的这个基本方针、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基础也取消。按编者的观点，难道必须把我们的指导思想改为“依靠外援为主，自力为辅”的方针吗？让我国在政治上当附庸国在经济上当殖民地？社会上也确有持此主张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

关于这个方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个词条亦被编者所取消）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内外反动派。蒋介石同我们相反，他完全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的方针的基本点。”（《毛选》第

4 卷第 1132 页）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难道不是实践证明了这个方针的正确吗？

由此可见，1999 年版编者取消和否定这个基本的方针，不仅是针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是反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

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深思：以上 5 个关键性词条的被删或被取消意味着什么？

1999 年版《辞海》编者还把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份也一概删除、取消。这又是有力的旁证。例如：

（七）在【周恩来】词条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删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01 页与 1999 年版第 243 页）

（八）在【刘少奇】词条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删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4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867 页）

（九）1979 年版《辞海》中没有邓小平的词条，但是，1999 年版第 591 页上把邓小平写进《辞海》时，在【邓小平】这个词条 1800 多字的详细述评中，也没有只字提到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邓小平自己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邓选》第 3 卷第 173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是搞的一个"非毛化""非共化"大动作。由于否定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比如对有关的词条也相应地作取消和删改：

（一〇）删改【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 1929 年 12 月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写的决议案的第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在建党建军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了红军

党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强调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的”重要性。决议还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规定“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这一著作使红军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为肃清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指明了方向。（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86 页与 1999 年版第 347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的是两大主要的核心内容：

1. 题为《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但是，纠正的主要办法是“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却被删除了，实际是否定了。

2. “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句话虽暂时未删，但具体内容全部删除。党领导军队的前提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怎样贯彻这个领导的做法全删除了，实际也是否定了。本书将在第三专题中，以编者对 15 个词条的或取消或删改为根据，证明编者是否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的。

（一一）删改【反对本本主义】词条。

把“当时有些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共产党员，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压制正确意见”删除；还把“只有经过实际调查，才能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对调查方法作了详细的说明”等重要内容都删除了。（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67 页与 1999 年版第 324 页）

（一二）删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词条。

1999 年版编者把原词条所写《讲话》的重要内容删除了许多，在此先指出删除《讲话》“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艺问题的历史文献”这句话，这就表明编者不承认这是“历史文献”。（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62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2 页）关于文

艺问题将在第十二专题中再评。

（一三）取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词条。

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57年1月18日和27日所作。编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分析了我国社会各阶级和党内的政治思想动向，论述了少数人闹事的问题，指出：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观点，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讲话论述了农业和工业的辩证关系，强调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篇讲话的重要理论观点，在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62页与1999年版第192页）

（一四）取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词条。

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所作。编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讲话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讲话接着就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知识分

子的改造、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整风、片面性、“放”还是“收”，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讲话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讲话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62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2 页）

被删改的词条，不胜枚举。细想这些被删除的话，被取消的词条的内容，恰恰证明毛泽东是对的，证明编者不承认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错了，编者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错了。编者对众多词条的取消或删改，我们将结合下面的各个专题评析。

以上是 1999 年版《辞海》编者采用的第一种手法，即公然否定的手法。

第二种手法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

这是西方资产阶级和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名著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在他们逝世后，有人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偶像……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作的这种修改是一致的。”（《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373 页）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非毛化”精英，他们继承“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的衣钵，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辞海》1999 年版编者把“毛泽东思想”原词条 16 项内容删除后重写的词条,是否属于这一类情况?

(一五)重写【毛泽东思想】词条。

1999 年版重写的全文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出理论概括而形成的科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前期,在同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倾向,特别是同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左”的倾向作斗争中,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王稼祥在 1943 年 7 月 8 日《解放日报》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来的。1945 年 5 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认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基本方面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完整

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在历史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参见【毛泽东】。（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5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61 页）

应该指出：对于 1999 年版编者重写的这样一个【毛泽东思想】词条，初看、粗看，都是看不出它在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但是，稍加思索，就会想到：首先编者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因为“毛泽东思想”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可是，编者是否定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再联系大量的事实来看，编者虽写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这句话从表面上看，抽象地看，孤立地看，似乎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当触及这些具体“方面”时，在数以百计的词条中，编者把这“多方面的内容”几乎全部删除或者整个词条都取消和否定了。哪里还有什么被具体肯定的“多方面”的内容呢？我们已发现 1999 年版编者对数以百计的词条的删改和取消，证明编者对待“毛泽东思想”正是用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的手法，从实质上加以否定。比如：编者重写的“毛泽东思想”词条说“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为什么却把我们党的基本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词条取消、并相应地在有关词条中也删除这个“方针”？又比如对“毛泽东思想”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这个重要“方面的内容”，编者不仅在【毛泽东思想】词条中，而且相应地在所有有关词条中均加以删除。显然是作了否定。（详见本书第二专题的评析）又比如编者在全国所有的著名劳模、英雄人物的词条中，把表述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话完全彻底删除光了。这岂不是把“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思

想”变成了既不能“学习”也不能“运用”的一种摆设吗？这都证明：编者表面上说“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是抽象的、是空的；而对这些“方面的内容”的取消和否定是具体的，是实的。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的手法，在无数个词条的删改和取消中暴露无遗，本书在下面各个专题中将一一指出。

第三种手法是尽量突出地写马列主义政党或领袖的失误加以渲染；同时给反面人物普遍开脱罪责恢复“名誉”。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1999年版《辞海》编者重写的【毛泽东】词条。

（一六）重写【毛泽东】词条。

1999年版重写的全文是：毛泽东（1893.12.26~1976.9.9）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冲（今属韶山市）人。1914~1918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早期即开始革命活动，接受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办《湘江评论》，建立新民学会和俄罗斯研究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国共产党湘区（包括江西安源）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1923年6月，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初，参与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活动，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为党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同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到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12月和1927年3月，先后发

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和依靠农民同盟军进行革命斗争的主张，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1927 年 8 月 7 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与朱德、陈毅率领的一部分部队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从 1928 年开始，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揭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1930 年 5 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5 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初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原则以及独立自主的政治原则。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建立，被选为主席。1933 年 1 月，被补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领导下，红军从 1930 年 11 月到 1933 年 3 月，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被迫于 1934 年 10 月开始长征。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随后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标志着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1935 年 10 月，长征取得胜利，到达陕北。同年 12 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

论、路线和政策。1936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担任这一职务直至逝世。1937年7、8月，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等著作，批判速胜论和悲观论两种错误思想，为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1938年11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讲话，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1942年，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以后在历届中央委员会上都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直至逝世。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针对蒋介石阴谋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的形势，毛泽东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1945年8月28日，与周恩来等赴重庆谈判。1946年夏，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号召和率领全国人民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1949年3月，主持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全国胜利以后民主革命要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主持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到 1952 年，领导全党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1952 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规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年 12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1956 年 4 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957 年 2 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正当党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1958 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 年，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由于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量，再加上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在 1966 年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他负有主要责任。但他在晚年仍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在 1974 年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因病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编为《毛泽东选集》。参见"毛泽东思想"。（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5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59 页）

1999年版编者在重写的【毛泽东】词条中，对原【毛泽东】词条中被删的18项内容，没有再写，并在有关词条中把与这18项内容一致的话也相应地删除或把整个词条取消。再联系史实，证明18项内容的删改或取消，确实是属于否定。我们在本书以下有关专题中将作具体评析。

在这重写的【毛泽东】词条中，编者增写内容，主要是写编者认定的毛泽东的失误、错误。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否认毛泽东也有某些具体的失误或错误。但他即使有失误或错误，却是能及时发现和纠正的。他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从未犯过背离这个立场性质的错误。

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即编者对历史人物的词条的写法为什么大不一样？我们查阅该《辞海》编者所写的许多古今中外的正、反面历史人物的词条，没有发现写这些历史人物的词条中写他们的具体错误。惟有在【毛泽东】这个词条中，写他"骄傲"、"主观主义"、"个人专断"、"他和其他领导同志轻率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地批判彭德怀"、"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对阶级形势错误的估量"、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编者写了他的8个"错误"。相反，例如对反动历史人物【蒋介石】这个词条，主要只写蒋介石的学历、经历、曾任职务、显赫官衔，写蒋介石的官衔达到20多项。但是把他10多项罪行和劣迹几乎都删除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01页与1999年版第732页）关于【何应钦】词条，编者只写他的学历、经历和显赫官衔，把这个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的亲日派代表人物，写成毫无错误或缺点的完人。

另有些先生在高兴之余，还写文章与《辞海》呼应，说什么辞书上写人物的官衔体现荣誉、政绩，是属于肯定性质的。编者对历史人物如此大不一样的写法，究竟要在读者中产生什么效果？

1999年版编者对以上这16个词条的删改，就使用了三种手法。我们将在本书下面十多个专题中，就数以百计的词条被删改或取消，指出其无非是把这三种手法交替使用或混合使用，来达到篡改或歪曲历史事实的目的。

现在，我们必须着重指出：1999年版《辞海》在【毛泽东】词条中，删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公然否定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毛泽东的身份，是历史对毛泽东的定位和最根本最重要的评价，也是评价毛泽东一生作为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删除这句话，是对毛泽东最根本的否定和诋毁，也是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否定和诋毁。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毛泽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哪里谈得上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呢？连"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也难成立了。这样否定毛泽东也就势必否定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果然，在【中国共产党】这个词条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被删除掉，最能表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路线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两个关键性词条都被取消。

1999年版《辞海》的这个动作，是"反毛"、搞"非毛化"的一个严重步骤。当时"反毛"势力就起来响应和欢呼说："新《辞海》大胆对毛泽东作了新评价"，"表达了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认识"。"新"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说是："为毛泽东摘掉'马列帽'"。（见《中国合作新报》1999年10月28日文章）一句话："摘掉'马列帽'"就是否定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包括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及其缔造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可是，“反毛”、“非毛化”势力高兴得太早了。当年全国的许多读者和理论工作者，许多信仰和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老干部，许多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的正义人士等，见此情况都极为愤慨，并纷纷起来批评和谴责 1999 年版《辞海》公然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批评和谴责 1999 年版《辞海》是违背事实，违背《宪法》，违背党纲党章，违背党的《决议》，诋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许多同志向党中央，向中纪委写信，要求追究 1999 年版《辞海》的违纪、犯法行为。党政有关方面也出来追查和严肃批评 1999 年版《辞海》的错误，指出它对“重要的……条目释文”，“没有按制度规定的程序报新闻出版署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擅自印制新版《辞海》”，并“责令出版社进行检查”，“已装订成册的停止发货……进行修改并重新印制，以消除不良影响。”（栾保俊文：《关于新版〈辞海〉的新情况》，《天人古今》杂志 2000 年世纪之春专号第 13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也于 2000 年 3 月 15 日以图管字（2000）第 125 号复函答复上海社科院有关老干部的信说：“已对上海辞书出版社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的做法提出严肃批评……要求重新印刷该书，进行说明，消除影响。”（见高为学著《“不逾矩”论集》一书第 408 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 年 7 月出版）

当时，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人也作了检讨，承诺“决心及时修订改正”。（见《解放日报》2000 年 2 月 8 日第 2 版）

结果又如何呢？上海辞书出版社在 2000 年 7 月重印了 5 万册《辞海》缩印本，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 7 人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头衔，承认了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身份。但关于《辞海》为什么出来改正这个极为严重的大错误，未作只字说明，更未谈消除影响，对原来已装订好的大量有此严重错误的 1999 年版《辞海》，不但没有

“停止发货”，相反地加速发货，打折扣推销。这充分表现了他们没有认真检讨和改错的诚意。

现在，我们必须指出否定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反动性和危害性。

第一，这一否定的严重性。这个否定不是孤立的。因为否定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就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等于说“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意味着毛泽东所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否定和污蔑，对无数革命先烈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否定和污蔑。这种否定如果得逞，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就将失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这也是涉及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问题，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这一否定的反动性。可以说 1999 年版编者的观点已超过了堪称世界反共“冠军”的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曾任美国国家最高安全顾问。他费尽心机写了一本所谓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大失败》的书，攻击全世界的共产党，也竭尽全力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但是，尽管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恨得要命，仍不敢否定全世界革命人民公认的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书中写道：“事实证明，自从三十年代中期长征以来，一直由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组织上，都占有了极大的优势。这位新的领袖不仅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是革命理论领域里的创新者。他创造性地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的具体实际结合了起来。”（见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大失败》第 182 页，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出版）虽然，布热津斯基否

定、攻击毛泽东也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对于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铁的事实，他还不否定，也不敢否定。

第三，这一否定的危害性。在精神领域里，这一否定的破坏作用相当于向中国和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和共产党人头上丢下一颗巨型核炸弹。这是当年西德的《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社论中总结出的一条“经验”中说了的，他们认为有一种最厉害的反共“武器”。关于这个反共“武器”，这篇社论是这样描述的：“要呼应苏共对于自己领袖人物的攻击，由此否定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类钻心的问题，在有些情况下，是比几十亿吨原子弹弹头更强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武器’。”（转引自《当代思潮》1996 年第 1 期第 5 页）这就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利用共产党内的人，让这些人来攻击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党的“领袖人物”。这就是反共势力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让苏共攻击苏共，当然也让中国的《辞海》来攻击中共，效果才会更好、更大，并认为懂得运用这种“武器”来反共，其效果要比“几十亿吨原子弹弹头”的作用更大。这是反共势力的险恶用心和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毒辣“手段”。中国人怎能允许中国的《辞海》为西方反共势力提供这样的“反共武器”?!

总之，否定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小问题。这绝不是几个词条，几句话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几个领导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份的重新肯定的问题。这是涉及怎样评价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及其历史的大问题。

二、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首创“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新的革命道路”的否定

1999 年版编者在重写的【毛泽东思想】词条中写“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我们说这是一句抽象的空话、假话，实际上，“多方面”的毛泽东思想都是被否定的。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毛泽东思想极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新的革命道路”是怎样被全面否定的。我们已发现 1999 年版编者是通过对众多词条的删改或取消，从抽象原则到具体事实，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否定这一条“新的革命道路”的。这是对如下第一七至第三二这 16 个词条的删改和取消，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

先看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从原则上、理论上对这条“革命道路”的否定：

（一七）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1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06 页）

（一八）在【毛泽东】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毛泽东“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5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59 页）

（一九）在【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战略思想，开创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道路。”（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5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61 页）

1999 年版编者在以上这三个关键性词条中，都一概删除“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这岂不是公然从原则上、理论上、实践上全面否定这条“革命道路”吗？下边还有更多重要词条的取消或把相关内容删除是有力的证明。

（二〇）取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 1928 年 10 月 5 日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时往往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而发生悲观情绪。毛泽东根据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规律，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指出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

长期集聚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42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24 页）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正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回答“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革命道路”是可行的、正确的。1999 年版编者取消这个词条，难道不是明显地具体否定在我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唯一可行的一条 “正确道路”吗？

（二一）取消【井冈山的斗争】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 1928 年 11 月 25 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报告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揭露了“左”倾盲动主义给革命根据地造成的危害，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描述了在 1924 年至 1927 年革命失败后革命的退却如何在农村变成革命的新进攻，解决了当时革命斗争中所发现的各种具体问题，批评了有些同志在实际政策上所犯的过左的错误。报告强调了党的领导对于红军建设的重要性，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29 页与 1999 年版第 34 页）

1999 年版编者取消这个词条的用意很明显，因为这个词条反映了“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红色政权”和“红军”都是可行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一著作中，就是根据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经验强调“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毛选》第 1 卷第 81 页）同时又强调“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就是靠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取消这个词条既是又一次具体否定“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又是具体否定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1999 年版编者还进一步不承认“红色政权”的“性质”和

成就，又删改一个词条：

（二二）删改【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二次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建立的中央政权机关。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 63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通过了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劳动法和婚姻法等。这个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19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23 页）

这个词条说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仅是武装力量的建设去“包围”，包括政权建设去“包围”。然而，1999 年版编者删除这个政权的“性质”和成就，难道不是对这个“红色政权”的贬低和否定？

（二三）删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创立的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罗霄山脉中段。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区，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建立和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团结改造地方武装，发展革命力量，打退了国民党军阀几次进攻，建立工农兵政府，领导农民分配土地，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中组织的农军到达井冈山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同年 6 月，在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

我追”的军事原则指导下，红四军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3个全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等县各一部分，同时，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留下的一部分红军继续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以后通称湘赣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9页与1999年版第34页）

应该指出：党史告诉我们，在“毛泽东创立的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带动下，确实很快出现了赣南、闽西、湘鄂边、洪湖、陕甘边等二十多个革命根据地。1999年版编者凭什么否定“毛泽东创立的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删除、否定这一点，是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否定。编者还进而删除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再次否定毛泽东在井冈山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吗？

（二四）在重写的【毛泽东】词条中，1999年版编者写进了从【毛泽东思想】词条中删除后移位过来的一段不完整的话：“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战略思想”。（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54页与1999年版第1759页）

1999年版编者在【毛泽东】词条中写进这段话是不完整和别有用心的：

1. 编者为什么要把这段话是从【毛泽东思想】词条中移位到【毛泽东】词条中来？说编者是别有用心，就在于编者把“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段话从【毛泽东思想】词条中移位到【毛泽东】词条中，无非是表明“以农村包围城市……”不能包括在

"毛泽东思想"之内,而只是"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中的一个"战略思想"。

2. 说编者是别有用心,还在于编者将这段话移位时只写到"……战略思想"为止,把紧接着的一句关键性的话:"开创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道路"删除掉了。然而,明摆着的事实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已走了的、并且实践证明是走对了的一条"革命道路",怎么能写成仅仅是一个"战略思想"呢?

1999年版编者否定"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同看不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分不开的,在这个问题上,编者错误的立场、观点还表现为对下列词条的取消和删改:

(二五)取消【青年运动的方向】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众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的讲演。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讲演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骨干、性质、目的和经验教训,着重指出,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指出工农是革命的主力军,青年是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因此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并强调,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相结合,是区别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青年的唯一标准。(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989页与1999年版第2393页)

1999年版编者竟然取消这个词条,这是否定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骨干……工农是革命的主力军"等重要问题的科学论述。这篇著作的重要意义,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重申和强调的。

（见《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831页）毛泽东肯定“工农是革命的主力军”。这也是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阶级基础。毛泽东正是在这篇著作中重申和强调：“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且说：“这是唯一的标准”。1999年版编者为什么偏偏要取消这个词条？这是在原则上、理论上否定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之一。

（二六）删改【农民阶级】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阶级。在封建社会中，是同地主阶级相对抗的基本阶级。农民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农民不断进行的反抗爆发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从封建社会末期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农民阶级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分化为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其中富农是农村资产阶级，雇农是农村无产阶级，贫农是农村半无产阶级，中农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广大贫农和中农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同贫农和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74页与1999年版第459页）

1999年版编者在“农民阶级”这一个词条中，不仅仅删除了农民阶级“是同地主阶级相对抗的基本阶级”、“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还删除农民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同贫农和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为什么要把这些史实和马列主义观点都删除？

1999年版编者还在涉及农民阶级、农民革命的其他众多词条中，也删除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和无产阶级应该和能够领导农民阶级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取得革命胜利时转变为

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请看对下列词条的删改：

（二七）删改【农民战争】词条。

1999年版编者把在封建社会里，“这种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句话删除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74页与1999年版第459页）

这也是编者否定农民战争、农民阶级的反压迫斗争对历史发展有推动作用。

（二八）删改【太平天国革命】词条。

1. 不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删除“革命”这个概念，把词条名称改为【太平天国运动】。

2. 删除太平天国“革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证明在资本主义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勾结起来的情况下农民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这就把农民的“顽强反抗精神”这个事实和“农民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这个马列主义观点删除、否定了。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42页与1999年版第780页）

（二九）删改【洪秀全】词条。

1999年版编者作了如下删除：摘掉洪秀全“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革命”帽子，改写为“太平天国领袖”。

1999年版《辞海》编者还在其他所有“太平天国革命领袖”词条中，把“革命”二字和涉及农民革命的“革命”这个概念一概删除，改用“起义”这个概念。显然，这是取消洪秀全和农民阶级的“革命”资格。（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926页与1999年版第1103页）

对以上这两个词条和有关词条的删改，表明1999年版编者

不承认农民阶级有“革命”的资格，以及无产阶级能够和应该领导农民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这个马列主义原理。1999 年版编者抱着这种观点，也就势必要否定毛泽东重视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否定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了。

（三〇）删改【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不要把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当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应当是工农民主专政”。因为上述理论观点来自列宁，1999 年版编者表明自己不同意这观点，也就把列宁这篇著作中关于“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重要理论观点删除掉。（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8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16 页）

对上述这个词条作这样的删除，也是明显否定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无产阶级应该和能够领导农民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这几个词条的删改和取消，已充分表明了编者的立场、观点。这些都是否定农民、农民阶级有“革命”的资格，否定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阶级革命”的资格的证据。这么多证据恐怕不能说是“孤证”了。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证明 1999 年版编者公然从原则上、理论上否定毛泽东重视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否定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新的革命道路”吗？

由于 1999 年版编者否定农民阶级有“革命”资格，否定毛泽东首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正确，于是，编者认为陈独秀、王明反对毛泽东重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也不能算作错误，就在陈、王两个人的词条中也删去了他们这方面的

错误。

（三一）在【陈独秀】这个词条中，相应地删除陈独秀“放弃对于农民……的领导权”。（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431页与1999年版第532页）

（三二）在【王明路线】这个词条中，相应地删除王明“竭力反对毛泽东的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在农村积聚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城市的正确道路。”（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00页与1999年版第1451页）

综观1999年版编者对以上16个词条的删改或取消，显然是从原则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对毛泽东首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贬低和否定。毛泽东的这条“道路”，也确实是西方世界所害怕和“不接受”的。

1999年版编者在重写的【毛泽东思想】词条中，曾写到毛泽东“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以上事实证明这是“抽象肯定”，是空话，甚至是一句假话。因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样一个空前的“独创性的理论”，竟然也被编者加以全面的删除、否定。

请问1999年版编者：你们能说明这么多的删除和取消不等于否定吗？如果这些不属于赤裸裸的否定又算什么？你们有没有在《辞海》的任何一个词条中真正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则到具体肯定过“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难道“道路”这两个字，也因“篇幅有限”而被删除的吗？

我们认为1999年版编者对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的否定，实在非同小可，这是“釜底抽薪”的做法。因为毛泽东开创的“革命道路”开局第一步就被否定了，那末，第二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第三步进行反“围剿”，后又进行二万五千里路的长征、进行八年抗日战争、进行三年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全中国，毛泽东是始终坚持无产

阶级领导农民阶级把这条革命道路走到底的，岂不是整个“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都该被完全否定了吗？

其实，毛泽东开创的这条革命道路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客观历史事实是：最初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没有经验，开始搞武装斗争，大多数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次又一次地在大城市发动起义，但都遭到挫折。只有毛泽东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把秋收起义部队带到井冈山，在农村搞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才符合中国国情。而且他认为要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就必须动员农民阶级参加革命，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果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带头之下，中国很快就出现了赣南、闽南、闽西、湘鄂边、洪湖、陕甘、陕北等二十多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且都是像毛泽东那样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不断巩固、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直到解放全中国。这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1999 年版编者凭什么要加以否定？

实际上，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创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道路”，是运用辩证法的光辉范例，是值得永远载入史册的伟大贡献。因为它不但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以前，始终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这主要应从两大方面来理解：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理论，但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相结合。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身在欧洲，处在英、法、德、意、比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圈内，这些国家的具体实际和特点是他们相互之间，交通发达，互相支持很方便。正是根据这个情况，所以马、恩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国中取胜，必须在多个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胜。可是，列宁对帝国主义作了深入的研究，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

衡的规律,并研究了当时俄国的情况,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少数国家甚至一个国家首先胜利的结论。于是,列宁发动革命,果然取得了胜利。毛泽东研究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存在军阀割据状况,城乡之间发展也很不平衡,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受压迫很深,有革命的传统和要求。于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情况,决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走"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果然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这就给人一个启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具体实际和特点,为什么不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和特点结合起来呢?

第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革命",这是个普遍的规律。可是,反动统治者一般都拥有强大的武装和全套的国家机器,该从哪里去突破呢?这就要找出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列宁又分析了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于是在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因为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弄得自顾不暇之时,革命就在国力相对薄弱的俄国这个"薄弱环节"进行突破,取得了成功。毛泽东也是找到了中国反动统治存在军阀割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对广阔的贫困山区,反动统治更是鞭长莫及。这些地方的农民特别贫困,也就特别想摆脱贫困和要求革命。井冈山本来就有反动武装一再"剿灭"不了的王佐、袁文才两股农民起义武装力量的存在,可以设想,如建立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武装,岂不更能立于不败之地吗?!于是,毛泽东把革命队伍拉到井冈山去谋发展。实践已证明了他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试问:无论过去和现在,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又有哪一国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没有自身的"薄弱环

节”？这正说明了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既有普遍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尤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无产阶级为求得革命的胜利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与毛泽东走相反道路的人也有。当年的陈独秀就是没有认真研究中国的实际并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之相结合，而认为马列主义对当时的中国用不上。于是,他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的主张。（见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他不承认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该实现自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能够而且应该去领导农民阶级,并使取得胜利的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始终认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而“依靠农村攻取城市”是“错误路线”。(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第598页,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

中国革命的实践已证明了毛泽东是正确的。在帝国主义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要想在自己国家建立独立强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已不可能，因为首先帝国主义就不容许,它要保持你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对这个问题,包括我国著名理论家胡绳在内，中国的很多理论工作者都曾经取得过共识。可是,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后,出现“非毛化”和反毛的思潮,在这股思潮的影响和压力之下,有不少人信仰动摇,又背离了这个正确观点,实际上,他们是又回到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陈独秀观点上去了。在这个问题上,1999年版《辞海》编者否定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实质上就是否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重新肯定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三、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路线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的否定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便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民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党的性质和军队的性质密不可分。毛泽东的建党和建军思想也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因此,1999 年版《辞海》编者欲否定毛泽东及其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亦势必否定这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现举出 1999 年版编者对如下第三三至第四七这 15 个词条的删改或取消为例,加以评析。

(三三)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1999 年版编者删除以下两大内容:

1. 删除"1937 年 8 月,党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相继武装了广大的人民,在敌后开展了强大而又普遍的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根

据地”。

2. 删除毛泽东“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1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06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的上述内容正是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和我们党强调的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对于“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当时毛泽东就是明确主张不受国民党的制约，并拒绝国民党派员到八路军任职的。1937 年 11 月，毛泽东明确地说：“我们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还说：“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见 1991 年版《毛选》第 2 卷第 393、380 页）

毛泽东强调要由“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来“绝对领导军队”。

在上述【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被 1999 年版编者删除的，难道不是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的最重要的概括和精髓吗？

（三四）在【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性词条中，1999 年版编者把“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加以删除。（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5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61 页）

难道说在“毛泽东思想”中不包括“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吗？我们也注意到“人民军队”、“人民战争”这两

个词条还是保留的，但是，这不等于有"理由"在【毛泽东思想】词条中删除"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思想"。这难道又是因为《辞海》篇幅所限吗？

（三五）删改【三湾改编】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领导部队进行了改编，取消了原来三个团的番号，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改编为第一团；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各级均设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改编后，在军队内部实行了民主制度，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废除了烦琐礼节，实行经济公开，取消了雇佣制度，建立了崭新的官兵关系。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组织上奠定了新型革命军队的基础。（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2页与1999年版第26页）

应该指出："毛泽东思想"认为不是马列主义的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军队，便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三湾改编"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军史上最早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从此，中国有了一个"人民的军队"。1999年版编者把这些内容删除，显然是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原则，是否定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的思想理论。

（三六）删改【中国工农革命军】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于1927年9月9日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领导农民、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秋收起义，成立了第一支工农革命军。随后，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在江西永新的三湾村进行了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

组织，连以上各级均设党代表，把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实现了官兵平等。这样，就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基础。到达井冈山地区后，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 年秋到 1928 年春，在南昌、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州、广东东部等地起义后保留下来的部队，都称工农革命军。1928 年 5 月以后，各地工农革命军陆续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18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11 页）

（三七）在上述被取消的【井冈山的斗争】词条中，取消和否定的也不仅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同时也取消和否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9 页与 1999 年版第 34 页）

1999 年版编者在以上两个词条中均删除、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

（三八）取消【古田会议】词条。

1979 年版第 121 页全文是：1929 年 12 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为总结南昌起义以来建党建军的经验而召开的。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指出应该首先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倾向，组织上必须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决议还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规定红军的任务除了打仗之外，还要做政治工作和正确处理军民和官兵的关系等等。会议规定了正确的建军路线，使红军成为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 年版编者在取消上述词条后改写如下：

（三九）重写的【古田会议】词条。

把词条的外延缩小改为【古田会议决议】。1999 年版全文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毛泽东起草。1929 年 12 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因会址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故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第一部分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决议确立的军队建设根本原则和制度, 解决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奠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基础,是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21 页与 1999 年版第 145 页)

古田会议《决议》是集中反映在建党、建军方面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珍贵文献,尽管那时还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提法。对比一下上述这两个词条就可看出,重写的词条只抽象地写"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但是关键性的问题是必须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两个最好的武器来"纠正错误思想",而这个"武器"却被删除掉了,联系上文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也被删除,这难道不是对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这个"方面"的具体否定吗? 重写的词条抽象地写"《决议》确立的军队建设根本原则和制度",但是根本原则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却被删除掉了。这是 1999 年版编者又一次在词条中删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还有,"古田会议会址" 有重要纪念的价值,1999 年版编者是用改变词条名称的手法,不写"古田会议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为了达到贬低古田会议的目的。

(四〇)删改【三年游击战争】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由于有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坚

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和无比顽强的斗争精神，紧紧地依靠群众，采取了公开与隐蔽、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策略，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因而不断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革命旗帜……使这些游击区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4页与1999年版第167页）

编者在词条中删除的这一整段话，不仅仅是抹杀“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将士们的功绩，更主要的是在“抽象肯定”的幌子之下“具体否定”了人民战争。因为我军在长达3年时间中，在8省共14个游击区中，在“数十倍优势兵力”的敌军“围剿”之下，都能依靠群众坚持斗争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正是说明了我军进行的是人民战争！

（四一）删改【八路军】词条。

对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删除“改编后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深入敌后同共产党的当地组织一起，发动和武装广大群众，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改写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一句话。（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72页与1999年版第330页）

（四二）删改【新四军】词条。

对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删除“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同共产党的当地组织一起，发动群众，组织与扩大人民武装……”改写为“改编后……随即开赴皖中、苏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84页与1999年版第1797页）

不难看出：对党绝对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这两个词条，所删除的都是毛泽东建党、建军学说的精髓：

1. 删除“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

2. 删除“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3. 删除“发动群众,组织与扩大人民武装”。

这三个重要内容都是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核心问题。国民党军队执行国民党的战略方针(即毛泽东批评的单纯由军队与政府进行的片面抗战和消极防御),国民党也扩军和发展武装,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去“发动、组织群众”,不会去“扩大人民武装”。1999 年版编者删除我军的这三项,难道不是否定或淡化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我军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吗?

(四三)删改【中国人民解放军】词条。

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删除了。(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18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11 页)

1999 年版编者应该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或总书记统率),这句话正是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删除这句话,可以说是 1999 年版编者又一次在词条中删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

请问 1999 年版编者:你们一而再再而三……进行删除,你们在哪一个词条中还保留“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下面再看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军事原则的删除、淡化、抽象化:

(四四)删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的是:

1. 毛泽东“说明了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规律”。

2. 毛泽东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指导方针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作战原则”。

3. 删除“为了取得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指出:‘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

是更重要的学习'。这部著作充满着唯物辩证法思想,它不仅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而且阐明了有关政治策略和思想方法方面的许多问题。"(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23页与1999年版第1720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的以上这些,都是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极重要的思想、理论、原则和经验,也确实是毛泽东的重大贡献,编者加以删除后,只用"制定了一系列作战原则"一句话一笔带过。这难道不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四五)删改【十大军事原则】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于1947年12月25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军事原则。即"①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③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保守或夺取之。④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人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⑤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⑥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接连打几仗)的作风。⑦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

城市。⑧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⑨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⑩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143~1144页）（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7页与1999年版第139页）

1999年版编者还是采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或淡化的办法来删改。比如：

1.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这个原则讲了，但也不是不要“夺取城市”而是指出“需要反复多次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保守或夺取城市”，这却被删除掉了。这就使人不知怎样具体掌握和去“夺取城市”了。

2. “集中优势兵力”这个原则讲了，但关键内容恰恰在于这个“优势”的具体内涵是要集中“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人之兵力”这却被删除掉了。人们就无法捉摸这个“优势”的具体含义了。

3. “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这个原则是讲了，但是把“在特殊情况下”，力求全歼该怎样具体实施的基本办法却全部删除掉了。人们仍不知这个“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的具体办法是什么。

4. 删除“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这也是十大军事原则中具体的重要指导思想。

5. 虽然讲到了“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这个原则，但把“（即在短期内接连打几仗）”删除掉了。这样，“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是“在短期内”还是“在较长期内”就没有具体时间限制，难以捉摸了。

这“十大军事原则”都是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宝贵经验。对全世界的人民都有现实指导意义。本应突出地写，但 1999 年版编者也尽量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或淡化的“办法”作了处理。从表面上看也承认有十大军事原则，但把很多重要的具体内容却删除了。

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是着重在思想上建党和整党，即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党；建军思想也是首先重视思想政治上建军和整军。可是继承古田会议以来的毛泽东建军整军思想的如下两个词条，却被 1999 年版编者取消：

（四六）取消【新式整军运动】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1947 年冬到 1948 年春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整军运动。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同时也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对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489 页与 1999 年版第 1803 页）

经查对，编者在“三查三整”词条中附带写到“新式整军运动”。但是，删除“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同时也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对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把这个已被实践证明效果显著、意义重大的宝贵经验取消掉了。【新式整军运动】这个体现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特色和经验的极为重要的词条竟被取消，这是毫无道理的。军事家彭德怀也曾在《彭德怀自述》中，以其亲身体验高度评价“新式整军运动”这一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条，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就难以取胜。

（四七）取消【诉苦运动】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阶级教育的一种形式。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曾广泛运用。通过控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使部队认清敌人，仇恨敌人，万众一心，英勇杀敌。这一运动，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和战斗力，对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起了重大作用。"（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385 页与 1999 年版第 474 页）

必须指出：取消"新式整军运动""诉苦运动"这两个词条，是根本性的错误。因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大创造。一位美国学者把它称之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过的政治手段'。"（见《人民日报》2007 年 9 月 17 日《永远的丰碑》）。编者竟然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一大创造"即"精神优势"。精神因素是能转化为物质因素、物质力量的，士气对于军队是极为重要的。显然，取消上述两个词条和删除掉"狼牙山五壮士"等词条，实质上是取消革命的人民军队的优势的问题。革命军队的上述传统作法和精神优势，不但作为历史事实不可取消，作为在政治思想上建军、整军、加强指战员的战斗精神的方法也不可取消。随着形势的发展，战争的具体形式可因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仗总是要靠人打的，人总要有个精神，军队的战斗力是离不了政治思想和士气的。因此，人民军队固有的精神优势，在政治思想上建军、整军是不能变的。这也是"人的因素第一"的原则的必然要求。

综观 1999 年版编者对以上 15 个词条的删改或取消，足以证明编者是在有意否定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整军思想和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否定必须提高军队自身的思想政治觉悟，必须去"武装广大群众"的思想。这些都是既体现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又体现军队的人民军队性质、无产阶级军队性质的。

毛泽东的 “建军整军思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和“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思想，永远是人民争取解放的法宝，在全人类获得解放之前是绝对不会过时的。这是压迫阶级、剥削阶级所最害怕的，当然也是他们最“不接受”的。他们以及站在他们同一立场上的人都是唯心论者，他们看不到和不承认这个能使人民必胜的“法宝”，动辄用一两件新式武器来吓唬人民，企图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实际上，人类社会自从出现阶级与国家以来，几千年的历史已证明，反动统治阶级的任何新式武器都未能救反动统治的命。难道被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的真理，到了今天就不灵了吗？难道“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和“人的因素第一的原则”竟会过时吗？

邓小平说：“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邓选》第 2 卷第 77、78 页）

必须指出：邓小平说“要有充分的信心”，是已经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而且还在不断地被证明着。美国西点军校的某军事家就说，若比高科技，任何国家都比不过美国，但是我们就怕遇到“上甘岭战役”中那种以“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的军队。亲自运用高科技手段指挥侵越战争的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错了，我们大错特错了……我们没有认识到，在斗志旺盛的人民运动面前，现代化高科技军事装备和军队的作用是有限的……上帝没有给我们权力，把每一个国家都改造成像我们一样，或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转引自《光明日报》1995 年 5 月 2 日第 3 版）美国空军军事学院战略学教授雷科德说：“伊拉克的局势，我根本看不到一丝曙光……看不到出路。我们走过这条路，这就是战争越南化政策。”美国

资深战略家、国家安全局前局长、著名退役将军奥多姆说：伊拉克的“局势比越南严峻得多……真是一场悲剧”。（英国《卫报》2004年9月16日悉尼·布卢门撒尔文章：《比越南严重得多》）最近，美国的战争研究者维克托·戴维斯又发表文章，他也认为“战争的实质没有变。最富有、最先进的民主国家并不总是能够战胜弱小的敌人。”（《洛杉矶时报》2005年10月20日）是的，压迫阶级可找到新办法来对付被压迫阶级，难道被压迫阶级就不能找到新办法来回答吗？不但强者未必总是能战胜弱者，任何反动阶级、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都逃脱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

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帝国主义者一直在用核武器、新式武器吓人，以军事高科技优势在世界各地进行战争。但是，无论在朝鲜3年、越南14年、在伊拉克从第一次海湾战争至今已超过14年……人们都还没有看到有被核武器、新式武器吓倒了的人民，也没有看到军事高科技征服了“斗志旺盛的人民运动”。相反，侵略者是自陷泥沼，不但被侵略国的人民在反抗，还受到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

反对“党绝对领导军队的原则”和“人民军队”的人，说什么共产党不应直接领导军队，军队应该“国家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为了实现“西化”而一再鼓吹的主张。然而，他们忘掉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绝对领导军队的原则，正是体现我们的党和国家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政党的一个根本区别。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军事”工作与其他工作，只是在整个党的、无产阶级的事业中的分工不同而已。

为了回答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一再鼓吹的“军队国家化”和1999年版《辞海》编者们企图否定“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的原则”，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在2007年8月6日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再次重申：“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根本原则和永远不变的军魂。”这是“人民军队”与一般的军队的根本区别。

四、评 1999 年版《辞海》对“遵义会议”及其历史意义的贬低、否定和为党史上的历次错误路线翻案

“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伟大胜利。经过这次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和路线的正确性得到全党的认同和拥护。虽然当时还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在实际上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可是，这又被 1999 年版编者加以否定或贬低。

1999 年版编者通过删改和取消如下第四八至第六〇这 13 个词条，对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和重大意义作了歪曲、贬低和否定，并为党史上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翻案。编者不承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不承认在“1931 年到 1934 年执行了（王明的）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承认王明路线“排挤了毛泽东特别是排挤了他对红军的领导”；不承认王明在抗日时期“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甚至对我们党在“解放后建立的

遵义纪念馆”这个事实也删除、不予承认。这可核对下列词条：

（四八）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遵义会议解决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党内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3页与1999年版第1706页）

（四九）在【毛泽东】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和“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54页与1999年版第1759页）

这是不顾历史事实，想否定毛泽东代表正确路线，并正确地处理和克服了错误路线。想表明中国共产党党内从未有过路线分歧和斗争，抹杀路线是非。

上述两个词条的观点也就为下面十多个词条的删改定了调子：

（五〇）删改【遵义会议】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的主要内容有：

1. 删除“在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中央红军没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于1934年10月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红军在敌人前堵后追中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重大损失。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中央政治局举行了这次会议。”

这是否定这次会议为何而召开及其对于挽救党和红军的重要意义。

2. 在“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这句话中，“‘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删除，改写为“‘左’倾冒险主义。”

这就否定了王明的错误是“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实

际上,方向路线是客观存在的,哪有只走路不问方向和目的地的事呢？回避方向路线问题，哪里还谈得上接受什么历史的教训呢?

3. 删除“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改写为“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编者改写为“新的党中央”是不准确、不符合事实的,因为遵义会议不是党代表大会,没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哪来“新的党中央”呢?

4. 删除“解放后建有遵义纪念馆。遵义会议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06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286 页）

必须指出: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上述 4 点,是贬低和否定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

这是无视历史事实。早在几十年前,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就已根据事实指出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转引自 1991 年版《毛选》第 3 卷第 969 页）（笔者认为写“中央的新的领导”是对的。）

1999 年版编者删除上述 4 点,也违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根据事实重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 790 页）

1999 年版编者删除上述 4 点是完全错误的。众所周知,大量的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威信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李维汉说:“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

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搞起来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李维汉同志的回忆录问世已经是1986年了，他不是搞个人崇拜的人。

1999年版编者不但在上述词条中删除4点，为了否定毛泽东的正确和为王明翻案，还修改以下4个词条：

（五一）删改【王明】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的主要内容：

1. 把“从1931年到1934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删除并改为“通过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

2. 把抗日战争时期王明“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使革命力量又受到严重损失”删除并改写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

编者删除以上两点，都是否认王明的路线错误。

3. 删除“后投靠苏联”这句话。其实，原词条写王明“后投靠苏联”是实事求是写的，因为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王明就投靠和配合苏修，敌视和大写攻击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编者改写他“后留居苏联”。是无视事实，视敌为友。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94页与1999年版第1442页）

（五二）删改【王明路线】词条。

原词条53行文字被删掉28行，过半数。1999年版编者删改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原【王明路线】的词条名称，被改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这样改写表明：1999年版编者认为不存在什么“王明路线”，王明只是犯过一次“‘左’倾冒险主义”的具体错误。

2. 删除“排挤了毛泽东，特别排挤了他对红军的领导”。

3. 删除“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上”。

4. 删除王明路线 “对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5. 删除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

6. 删除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

7. 删除王明 “竭力反对毛泽东的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在农村聚集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在删除上述7点重要内容之后，只剩下一处提到“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试问：既然承认“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怎么又否认王明对抗正确路线的“路线”是错误路线呢?这就说不通了。

8. 在删除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后，又把“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使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遭到严重的损失。”也删除。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00页与1999年版第1451页）

必须指出：强行为王明的“错误路线”翻案是翻不了的。因为这都是有大量铁的事实为证的。王明的“错误路线”，曾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左右”，给全党的血的教训是深刻难忘的。1931~1934年，王明这条路线是他指定的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具体执行的，博古同志本人经过多年的反思后，终于认识到这确实是一条错误路线。最近，博古的儿子秦铁同志答记者问时说：“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一定要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才会

承认。'七大'前夕,他对自己所犯的路线错误做了深刻的反省和检讨,获得了大家的掌声,并当选为中央委员"。(见《中国老年》杂志2006年第3期第14页)由此可见,当年执行王明错误路线的总负责人博古,经多年深思,也已认识到了这是一条"错误路线"。博古勇于主动承认这条"错误路线",后来也没有要求翻案。

看来,唯有反毛、搞"非毛化"的人物别有用心,为了否定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才要为一切错误路线翻案,以达到取消"路线"是非的目的。

(五三)删改【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1938年10月底至11月初在延安举行。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对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决定撤消中共中央长江局和王明的长江局书记职务。会议决定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批判了那种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23页与1999年版第1713页)

显然,1999年版《辞海》编者至今仍然固执地认为应该"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至今仍然支持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至今仍然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执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所以才要把上述词条中的这一段话删除。

(五四)取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反对我党在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毛泽东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阐明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以便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报告对扩大和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扩大党内民主、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在论述干部政策时，报告说明了培养、识别、使用、爱护干部的问题，并从我国历史上存在的有关选拔、任用干部的两条对立的路线作了概括，指出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在论述学习问题时，报告说明了党要能够负起一系列伟大的历史任务，首先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毛泽东所作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的号召，在党内引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42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23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取消这个重要的词条，就进一步说明编者对“六届六中全会”的否定，把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经全会批准的重要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也取消了。编者的这种错误立场观点，还贯穿在对一系列相关词条的删改中。

然而，党史书上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和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完全肯定的，说它：“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165 页）

党在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特别再次肯定《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著作，是毛泽东“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著作。（见《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

832页）

（五五）删改【《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词条。

1. 删除 “指出了一个了解情况，研究问题的正确方法”；“指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向社会作周密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2. 删除“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对群众抱满腔的热忱，才能做好调查工作”。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76页与1999年版第462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上述这些反映“毛泽东思想”的精辟内容删掉后，改写成一句空洞抽象的话：“进行社会调查应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其实，删除掉的这些正是毛泽东在总结战胜王明错误路线教训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与王明教条主义的“态度和方法”相反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却被1999年版编者删除，改写为该用“正确态度和方法”。这位编者就像一个根本不懂医道的医生，只要病人应去买能治好病的“药”吃，自己也不知能治好病的是什么“药”，不知应开什么“药方”，但对毛泽东已开出了的能治好病的“药方”却排斥不用。

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四八～五五这8个词条的删改或取消，显然是否定、贬低遵义会议，为王明摘掉错误路线的帽子。否定正确路线的基础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周密的调查研究。” 和相信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不仅为王明、项英的错误路线一起翻案，而且势必为党的历史上的所有错误路线翻案。这也势必继续否定客观历史事实，否定党的许多重要文献。请看下边两个被删改的词条：

（五六）在【新四军】这个词条中，把“由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删除、否定。（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84页与1999年版第1797页）

这个删除是为王明、项英一起翻案。

（五七）删改【项英】原词条。

1999 年版编者把原词条写的项英的根本错误是“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使新四军遭到重大损失”这句话删除，改写为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措置失当，对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510 页与 1999 年版第 626 页）

这是 1999 年版编者为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把新四军遭受“失败”的根本原因改写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以此来否定党中央政治局《决定》中作的结论：新四军的“失败”是“项英机会主义的失败”。

必须指出：为项英翻案是一个典型的特别严重的翻案。这在实际上，也是同时为王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陈毅曾总结性地说项英执行的是“从形式到内容最完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显然，如果项英的这个错误路线也能翻案，那么，在党的整个历史上所有的“从形式到内容”够不上项英那样“完备”的错误路线，岂不是更应翻案了吗？由于项英当年在皖南掌控党政军大权，他独断独行，连续三年固执地“不愿执行”、拒绝执行中央正确的方针路线，并顽固地执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才招致皖南的失败。因此，绝对不应为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实质上，这不仅意味着为党史上的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翻案，更严重的错误还在于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是“反毛”势力为反毛而施展的极其毒辣的一着。如果这一翻案得逞，那就等于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在同外部敌人和内部的陈独秀、王明、项英等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形

成和成熟起来的。所以,毛泽东的一系列“不朽著作”正是这些斗争的记录。如果这个案都翻掉了,那末,这些“记录”岂不也要作废了？请看邓小平、陈云、胡乔木是怎么说的。

邓小平说,我们党“战胜了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写下了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邓小平又说:“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邓选》第2卷第115、292页)显然,如果为王明、项英翻案得逞,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在延安整风前后写下的“一系列不朽著作”,“为我们党奠定的思想理论基础”也就要被全部否定了。这才是为王明、项英翻案者的险恶用心所在！善良的人们不可不察啊!

再看胡乔木、陈云是怎么说的。

胡乔木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整个抗战中,是毛主席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地位。……陈云同志说,毛主席写‘佳电’写了一夜,反复推敲，到天亮……仅仅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文电），就有三百多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主席某些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29、118、11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北京)

“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四军遭到“围歼”,就是由于项英持续三年之久在皖南固执地贯彻王明路线，才导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得逞,使新四军九千多革命同志不幸遭到“围歼”的。毛泽东与项英坚持的这条王明错误路线作斗争,在“皖南事变”前后写下了数以百计的文电。不但胡乔木和陈云敬佩和高度评价,邓小平也说:“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而且党中央在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说,这些文电是毛泽东“以独创

性的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见《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 826 页）正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理论，为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以至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显然，如果为王明、项英翻案得逞，岂不是要动摇和否定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五八）在【陈独秀】词条中，1999 年版编者也把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被撤销总书记的职务，仍坚持错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删除。（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431 页与 1999 年版第 532 页）

1999 年版编者为了“反毛”、“非毛化”，为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为王明、项英、陈独秀翻案，这不仅证明编者违背客观历史事实和用心险恶，也证明编者已不顾任何是非了。于是，更进一步干脆地为叛徒张国焘也翻案，为张国焘摘掉“叛徒”帽子。请看编者删改的如下两个词条：

（五九）删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否定的主要内容：

1.原词条写的“由于毛泽东所采取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斗争，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这句话中的“由于毛泽东所采取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被删除、否定了。

2. 把“张拒不悔改，于 1938 年春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从事反革命活动”删除、否定了。

3. 把“将叛徒张国焘开除出党”这句话删除了。为张国焘摘掉了“叛徒”帽子。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09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319 页）

关于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处分”，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的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

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见《毛选》第2版第2卷第531页1991年北京）请问编者：凭什么翻这个案？

（六〇）在【张国焘】这个词条中，1999年版第1316页也不写“由于毛泽东所采取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而1979年版《辞海》出版时，由于张国焘逃亡在加拿大还没有死，《辞海》是不把尚活着的没有盖棺论定者写进《辞海》的，所以无【张国焘】这个词条可对比）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上述词条的删改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删掉“毛泽东所采取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这句话，说明编者不承认毛泽东采取的党内斗争方针是正确的，编者还否定张国焘分裂党是属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性质，否定他是叛徒，为张国焘全面翻案。实际上，张国焘分裂党、反党，首先是针对毛泽东的，因为张国焘另立伪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毛泽东列为“撤消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通缉”对象中的第一名的。当时毛泽东确实堪称为党的马列主义路线的代表，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条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非“左”即右。正是由于毛泽东采取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才避免了红军之间打内战，才促使张国焘取消了伪中央，一度回归到正确路线方面。怎么可以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抹杀毛泽东采取的正确方针呢？张国焘后又投降国民党，在军统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任所长”，成了最典型的叛徒。（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97页）

1999年版编者竟给张国焘摘掉“叛徒”帽子，这岂不是编者认为共产党员即使投降国民党当了特务也不算叛徒吗？编者心目中还有起码的是非吗？

综观1999年版编者对上述这13个词条的删改和取消，表明编者是在否定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把党的路线转移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也是在否定遵义会议之前

有与正确路线对抗的错误路线的存在。这是根本性的历史大翻案。如果这种翻案能够成立,那就等于取消掉了“路线”是非之分,等于说在党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共产党人也从来没有信徒与叛徒之别。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和愤慨!

其实,在党内的所谓路线,无非是党内有人提出某种实现党的纲领目标的主要意见或主张,被全党接受了,去实行了,那就是路线。而意见或主张有正确与错误之别,有符合马列主义或不符合马列主义之分。在党内有提出正确主张的人,也必有提出不正确主张的人。这是正常的。问题只是在于哪个“主张”、哪个“路线”占主导地位或统治地位。如果少数人利用权力把不正确的“主张”强加于全党,或强制大家接受,这就是错误“路线”了。因此,只有及时否定某些人的错误“主张”,不使之成为在全党推行的“主张”或“路线”,不让这些“主张”或“路线”占统治地位,将它克服于萌芽状态。但是,我们怎能闭起双眼,不承认或不允许有任何“主张”和“路线”矛盾的出现和存在呢?

为了达到给历次错误路线翻案的目的,竟然不惜否认客观事实和有正确或不正确的“路线”的区分,这个错误是会给党带来不堪设想的恶果的。坚持错误路线是会像项英那样使皖南新四军受到几乎全军覆没的。在这里,特别应该记取项英的教训,因为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最具有典型性,可以也应该写一部几十万字的书,来作为路线问题的教材,使人们从多方面来认清什么是错误路线及其必然会带来血的教训。

第一,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得最充分最完备,别处是无法找到这种典型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间不长,当时,党处在幼年阶段,缺乏经验,也少有人帮助劝说陈独秀及时纠正路线错误;抗日时期王明本人在中共长江局范围内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是时间较短,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时

批判、纠正了，王明领导的中共长江局也被及时撤消了；但是，在中央着手进而解决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的问题之时，项英拒绝执行中央的正确方针路线，继续执行王明路线。由于项英党政军大权在握，搞独立王国，中央不能不审慎对待，多次发出指示和进行规劝，而项英一再拒绝中央指示，并曾经三次以“辞职”来要挟中央。中央曾派周恩来去找项英面谈、做项英的工作。然而项英在长达 3 年的时间内，在皖南始终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后，导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得逞，使九千余人的新四军遭到“围歼”，除少数人突围之外，几乎是全军覆没。这才是王明路线的完整的典型的体现。这不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罕见的血的教训。

项英自己最后也认识到了，他沉痛地流着眼泪说：“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我要向中央作检查，请求处分，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见陈枫编著《皖南事变本末》第 141~142 页，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出版）这个“不管指责我什么主义，我都接受”，就包括指责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他也是“接受”的。可惜，未能等到项英向中央作检讨，最后正式承认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时，他即遭叛徒刘厚总杀害了。但是，应该说项英是在实际上承认了路线错误的。

关于项英的错误，是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权威人士的论断、史料之众多也是罕见的。

周恩来说：“王明这种退让政策的结果……后来在华中弄出来一个‘皖南事变’，这就是没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要时刻提防人家反对我们”，（《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19 页）又说“项英没有执行中央……的方针”。（转引自《周恩来传》第 470 页，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陈毅军长是与项英共同战斗时间最长最了解项英的，他说：

“项英的错误一直发展成为内容和形式极其完备的右倾机会主义……最后造成皖南惨败……是党内坚持错误路线最好的殷鉴。”(《新四军在皖南》第396页)陈毅还说项英的错误路线“犯了3年之久”。(在“七大”会议上的发言)那时期在中央工作的胡乔木也说:“长期以来,项英对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07页)

刘少奇是“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的,他说项英“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发展到了和中央对抗”。(《1941年5月刘少奇在干部会议上的总结》见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40至62页)刘少奇说项英不仅是“没有执行中央的方针”,而且是“和中央对抗”的。

当年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说:“东南局书记项英,在领导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坚持错误路线的结果……九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见《星火燎原》(六)《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斗争》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

当年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说:“项英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结果是发生‘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第314页,童志强编,1990年出版)

1981年在全国普遍平反冤假错案时,当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黄克诚(原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即在中纪委会议上的《报告》中严正地重申:“项英等不执行毛主席指示……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见《解放军报》1981年4月10日)中纪委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但没有给项英平反。这意味着什么?难道周恩来、陈毅、刘少奇、邓子恢、粟裕、黄克诚等等最有发言资格者,都冤枉项英?

“项英不执行毛主席指示”不但是事实,也符合逻辑的必然性。在长征前,项英就是坚决贯彻王明路线排斥毛泽东的,他对

李德着重交代说："毛泽东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的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回忆录《共产国际代表》第87、86页）长征期间，当陈毅获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时表示很高兴，项英却对陈毅说："现在是非未定"。（《光明日报》1992年6月6日丹淮文）这表明他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持保留态度的，长期不服气的。时任皖南的新四军《抗敌报》国际版编辑洪雪村回忆说："项英经常跟我谈，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以来，13个领导，黄河以北占12个，江南就是我一个项英。毛泽东算什么，他们有12个政治局委员，就管那么一点点，我一个政治局委员管这么一大片。"（见《"皖南事变"赤石暴动回忆与研究》第43~44页，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编，福州海风出版社1995年出版）可见在长征之前到遵义会议，直到延安时期，项英从来就没有把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放在眼里，他又怎么会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方针路线呢?

上述这些党的高级干部，新四军的高中级干部，大多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过项英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带来的危害和不幸。这类回忆录、文章多得无法统计。现在，那些为项英翻案者，恰恰证明他们的极端无理和无知。我们要重复说一遍：难道周恩来、陈毅等等一大批高干、将领都会冤枉项英？给项英制造"冤案"？难道《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中大量批判项英错误路线的文字和论据都错了？无数新四军高中级将领的回忆录、文章、报告都错了吗？你们当中有谁能比以上这些权威人士更有发言权？可以亮出你们的身份，拿出你们的论据来嘛！当然，我们也承认项英也是为党为革命作过有益的工作，有过贡献，但是，功归功，过归过，功是不可用来抵销他的路线错误的。

第二，为项英翻案，实质上就是为王明、陈独秀路线翻案，就是抹杀路线是非，就是贬低、否定遵义会议，就是贬低、否定从遵

义会议到延安这段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是贬低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这股翻案思潮至今尚未消退，直到2006年，还有人写文章否认项英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见《北京日报》2006年5月8日）该文章举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项英】条目的写法为依据。我们认为虽然这个条目的写法是经领导人“同意”的，但仔细推敲一下是站不住脚的。个别领导人的“同意”能改变延安时期党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吗？能改变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这显然是不能够的，因为这不符合党规党法，也违背历史事实。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项英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呢？《中国大百科全书》写【项英】条目否认项英的路线错误的写法是错的，应予纠正。事实上中央已经在纠正了：

1. 正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之后，中央在1991年向社会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3卷，1991年出版）这《决定》是延安时期的党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其中指出：皖南的失败“乃项袁一贯的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请问：谁能够、谁有权推翻这个《决定》作的“结论”？党中央从来没有否定这个《决定》或重做新的《决定》，相反，是重新公布这个《决定》。

2. 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再一次重申和肯定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见《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830页）这个《总结》明确指出在“这次反共高潮”中，皖南遭到的“失败”，是“项英机会主义的失败”。

3. 1991年党中央又决定重新出版《毛选》第2版，这又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重版的《毛选》不但仍断定“项英机会主义的失败”，还在另一篇文章（即：“五四指示”）

的“题解”中又明确指出:项英“不愿执行”中央的方针。(均见1991年版《毛选》第2卷第782页和第753页)

以上这三项党中央公布的《决定》、《决议》和文献,岂不是明显地纠正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项英】条目的错误吗?

根据以上1991年公布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这个《决定》的结论的正确,以及1991年重版《毛选》的文章与另一篇文章“题解”又一次重申和肯定关于项英错误的这个“结论”,人们完全有理由断定项英“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使新四军遭到重大损失”显然是错了,项英不仅是“没有坚决执行”而且是“不愿执行”、“对抗中央”的方针。1999年版《辞海》编者的这一删除,既违背了事实,又违背了中央的《决定》、《决议》与重版《毛选》历史文献中的定论。

1999年版《辞海》这种无理的翻案,也是同社会上的一股翻案思潮相呼应的,有些人就是要迫不及待地、不顾一切地、全面彻底地否定毛泽东。于是就颠倒是非,想给凡是被毛泽东批评、处理过的人都进行无理翻案,为党史上的历次错误路线翻案。想以此来证明“党内无路线是非”,彼此彼此,达到否定毛泽东正确的革命路线的目的。这样的翻案只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批判和制止!

五、评1999年版《辞海》对“延安整风运动”等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及其作用和意义的否定

1999年版编者在重写的“毛泽东思想”词条中，写“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那么，搞政治思想运动、整风整党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党在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充分肯定“延安整风运动”的，《决议》说“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791页）邓小平也一再充分肯定：“延安整风……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以后还要进行整风，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邓选》第2卷第382、381页）

可是，1999年版编者竟然从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否定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和毛泽东的建党思想。请看编者怎样删改和取消如下第六一至第七四这14个词条：（可对比《辞海》

1979年版第1454页与1999年版第1760页）

1999年版编者否定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巨大的成效和伟大意义。

（六一）删改【延安整风运动】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中国共产党整顿党内作风的运动，也是全党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由于战争紧张与形势迅速变化，对于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还来不及作彻底的清算；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又增加了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他们还缺乏思想改造；因此，党内还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情况。针对这个情况，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毛泽东又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运动。运动的宗旨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团结的目的。采取的方法是：精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文件，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析自己思想中和工作中正确的成分和错误的成分，找出发生错误的原因，定出改正的方法。党的高级干部还着重对于党的历史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了研究和讨论。这次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并帮助大量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脱离原来的立场转入无产阶级的立场，全党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后，中国共产党曾进行了多次整风运动，并把它推广

到党外，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党内外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经常的重要的方法，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良好方法。（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498 页与 1999 年版第 613 页）

在这里，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怎样否定“延安整风运动”：

1. 删除我们党已“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是开展“整风运动”的前提条件。编者不承认这个前提，亦即是不承认在整风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为了更好地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上面来才开展这次整风运动的。

2. 改写的词条承认“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却删除他们“还缺乏思想改造”，承认党内“‘左’的思想倾向影响并没有肃清”却删除“党内还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情况”。这就把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明确的针对性模糊甚至否定了。

3. 删除“运动的宗旨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团结的目的”。编者却把本来很明确的宗旨、目的，改写为抽象的一句话：“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并把“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个前提和达到目的的手段“经过批评和斗争”取消、否定掉了。

4. 删除运动“采取的方法是：……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定出改进的方法”。这就把“延安整风运动”的“方法”又否定掉了。

5. 删除“这次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改写为抽象的一句话：“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又把“延安整风运动”具体的主要成绩和历史对这次运动的重要评价淡化了。

6. 删除应该通过“经常的整风运动这个重要方法”，“对党内外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就把“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经验这一个坚持的优良传统否定了。

删除了以上6点核心内容，这就把“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宗旨、基本精神、基本方法、基本目的、基本成效，以及“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和优良传统必须保持和发扬等全否定或淡化了。

（六二）删改【改造我们的学习】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报告从思想上总结了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存在于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着重论述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是一种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号召全党树立和发扬“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学风。要从革命实践的需要出发，“有的放矢”，“实事求是”，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篇报告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之一。（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080页与1999年版第1306页）

毛泽东这个《报告》的灵魂是要求“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可是，编者删除的正是党内应该解决的“路线的分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不谈这两项内容，这就把“实事求是”的“事”，“有的放矢”的“的”，都取消了。显然，如果让1999年版《辞海》编者来领导运动，那就只能说空话，“无的放矢”，走过场了。

（六三）删改【整顿党的作风】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的演说。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毛

泽东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其中又以反对主观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树立和发扬理论和实际统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革命学风为中心。毛泽东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在整风运动中，根据当时的情况，党着重反对了教条主义，同时，也批判了经验主义。演说对理论和实际联系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观念。同时，分析了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性，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号召：“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并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处理党内思想问题的方针。这篇演说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之一。（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368 页与 1999 年版第 1652 页）

必须指出：以上两个词条中被 1999 年版编者删除和否定的内容，都是“整顿党的作风”的“中心”问题，重点问题，是整风要达到的目标和目的。这又是 1999 年版编者对革命学说、革命经验采取“阉割其革命内容，磨灭其革命锋芒”的“手法”的两个典型实例。

（六四）删改【反对党八股】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 1942 年 2 月 8 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编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讲演揭露了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剖析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毛泽东指出，党八股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一样，“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篇讲演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之一。（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67 页与 1999 年版第 323 页）

1999 年版编者删除的是这个词条的核心内涵：

1. 删除“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的具体内容。

这么一删，连“八大罪状”是指哪些“罪状”都不知道，又怎能教育人不犯这“八大罪状”的错误呢？

2. 删除“毛泽东指出，党八股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一样，‘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

这是编者删除和不承认这三者 “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的东西。这又是编者为了模糊是非，不愿旗帜鲜明地“提倡该提倡的，反对该反对的”。如果这“三风”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又为什么要反对这“三风”，而大力进行整风呢？

（六五）删改【主观主义】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①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作风。主要特点是：单凭主观想象，忽视客观实际。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主观主义者或者单凭热情，以感想代替政策；或者头脑僵化，思想落后于形势。他们不从实际出发，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听不进群众的意见，主观盲目地决定问题和处理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必然失败。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两者共同之点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它们都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②主观唯心主义的别称。（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20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453 页）

1999 年版编者删除的内容：

1. 删除单凭主观想象，忽视客观实际。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主观主义者或者单凭热情，以感想代替政策；或者头脑僵化，思想落后于形势。这就把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取消了。

2. 删除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听不进群众的意见，主观盲目地决定问题和处理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必然失败。这就把主观主义产生的原因和危害取消了。

3. 它们都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总之，经这样的删除，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主观主义产生的原因和必会带来失败的后果，以及它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性质都模糊了。

（六六）删改【宗派主义】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一种表现，与个人主义分不开。主要表现为：向党闹独立性，用人唯亲，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划圈圈，搞派性，进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存在这种倾向，对内产生排内性，妨碍党的统一和团结；对外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011 页与 1999 年版第 1221 页）

1999 年版编者又是删除这个词条的核心内涵：一是否认宗派主义"闹独立性，用人唯亲"都是"个人主义"性质的东西；二是否认其对党和国家的"妨碍"即危害。

（六七）取消【惩办主义】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左" 倾机会主义组织路线的一种表现。即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滥用组织手段。其结果只能是损害同志，削弱革命力量，破坏党的团结。（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596 页和 1999 年版第 1935 页）

1999 年版编者取消"惩办主义"这个词条也是服务于否定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因为坚持错误路线者惯于搞惩办主义，相反，毛泽东是反对惩办主义，强调教育的作用的。编者取消这个词条意在否定毛泽东一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反对惩办主义的正确主张。

（六八）删改【人民内部矛盾】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同“敌我矛盾”相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之一。一般来说，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页）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同上书第365页）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这样的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可以相互转化。（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07页与1999年版第375页）

应该指出：上述词条中被1999年版所删除的内容都是“人

民内部矛盾”的核心内涵。删除和取消了对阶级矛盾的分析，取消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取消了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还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可谈呢？

（六九）取消【批评和自我批评】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为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增强党的团结、人民内部的团结，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因而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后来，党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为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671页与1999年版第812页）

（七〇）取消【团结—批评—团结】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就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763页与1999年版第918页）

对上述“批评和自我批评”和“团结—批评—团结”两个词条的取消（并且还相应地在其他词条中也删除这内容），最能证明编者否定“整风运动”“思想改造运动”的彻底性。

综观1999年版编者对以上这些词条的取消和删改，实质上是从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否定一切解决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思想运动。因为编者这样的删改，明摆着的就是不要“分清是非”，不要分清问题的“性质”，不要“批评”，也不要“自我批评”，更不要“斗争”，也不要“团结的愿望”，也不要在

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这样的删改，都是针对毛泽东首创的“整风运动”这个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都是“阉割其革命内容，磨灭其革命锋芒”的做法。特别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这两个词条的取消，就像某些反动精英鼓噪的“告别革命”一样地表示“告别整风”了。其实，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整风运动”实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如果不搞“整风运动”何以整党？不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积极的思想斗争的党，怎能不走向腐败和灭亡？

主张否定和取消一切政治思想运动的先生，也就是主张对错误的政治观点、思想、作风和行为，实行所谓“宽容、宽松、宽厚”的“三宽”态度，实际上就是加以纵容。而这种纵容的后果必然导致是非不分，纪律松弛，道德沦丧，腐败猖獗，物质污染和精神污染的双泛滥，到那时即使想管也“管不住”了。古人云：“心似平原放马，易放难收”。为什么要反对打“防疫针”或把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呢？为什么大家都怀念和盛赞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党风、社会风气好呢？难道不是由于思想政治运动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吗？实际上，坏风气都是由我们党的某些干部带头搞起来的。古人云“治国就是治吏”。就现在而言，治国首要的就是在于治好那批党员干部。这批人的“风”正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岂有不正之理？毛泽东就是无私心，自身正，他也就敢于“正”人，敢于搞“整风运动”。那些不敢、不愿搞“整风运动”的人，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不敢”、“不愿”？（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将在下文第八专题中重点评述）

（七一）删改【反右派斗争】词条。

1979 年版第 267 页的全文是：“<u>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次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u>。1957 年 4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

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利用这次整风的时机，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部署了对右派的反击，于同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1957年10月，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1978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同志作了实事求是的改正。”

以上1979年版写的这个词条，是在党作出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之前，写得不够全面和准确。《决议》正确地写道："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见《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805页）然而，1999年版编者无视党中央的这个《决议》，重写的词条不但没有根据党的这个《决议》全面和准确地写好这个词条，相反，进一步违背党的《决议》，请看如下重写的词条：

（七二）重写的【反右派斗争】词条。

1999年版第323页的全文是：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大鸣大放”中，出现了一些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的言论。6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反击，在全国范围内，主要在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中进行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末基本结束。这一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批判与划定了数十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78年9月，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被错划的右派改正过来，到1981年底基本复查改正完毕。（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67页与1999年版第323页）

请看1999年版编者重写的这个词条删除、否定的是什么？

1. 删除、否定原词条写的反右派斗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次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

斗争”。

2. 删除、否定“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利用这次整风时机，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岂不是完全无视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严肃指出的：“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805页）重写的词条不写《决议》指出右派“放肆地发动进攻”和“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仅仅写“出现了一些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即所谓说了一些错话）。这就从总体上否定了反右派的必要性和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编者竟然不顾邓小平一再根据事实指出的：“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见《邓选》第2卷第243、277、294、380、390页和第3卷第197、234、253页）

（七三）删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词条的主要部分。

1979年版的全文是：也叫“四清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城乡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1962年冬到1963年初，全国各地城乡先后开展了这一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和政策，对于一切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采取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1964年底，毛泽东又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1966年“文化大

革命”开始。

（七四）重写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词条。

1999 年版的全文是:亦叫“四清运动”。1963 年到 1966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这一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在指导思想上犯有“左”的错误,因而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当成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继而又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8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16 页）

毛泽东确实非常重视这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亲自主持制定前《十条》,1963 年 9 月,他说:“我们搞‘十条’,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实际上是国内反修正主义。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戏剧、电影、艺术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见邸延生著《“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 295 页新华出版社 2006 年 1 月出版）“四清运动” 是经中央反复讨论通过的。改写的词条说“在指导思想上犯有‘左’的错误……继而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编者是着重写“四清运动”的所谓“错误”,并归结为毛泽东的“左”。对“四清运动”正面作用仅仅用一句话一笔带过:“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方面起了一定作用”。特别应指出由于编者“非毛化”心切,还在重写的【毛泽东】词条中把毛泽东“1963 年领导了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删除掉了。

综观 1999 年版编者对以上 15 个词条删改和取消说明了什么呢?“非毛化”思潮的一大表现就是否定一切思想政治运动。为了否定一切思想政治运动,合乎逻辑地就要从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否定一切思想政治运动是说不出什么“理由”

的。因为本来就没有理由可言。有人说搞了思想政治运动就不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了。其实这个“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在过去的战争环境中,是“一切为了前线”,集中精力搞战争,但是,也没有因为搞思想政治运动而影响完成战争任务,相反,经运动统一了思想,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大有利于战争的取胜。“延安整风运动” 正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的一个光辉典范。其实,无论进行战争或建设,思想政治运动都是可进行的,这个传统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才对。

“延安整风运动” 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分清是非, 把党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上来。要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到手,把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解决好,是离不开从实际出发,对照原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可是,有些人不愿放弃自己错误的立场、观点和世界观,他们把搞运动说成影响工作,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说成是个人失去了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把改造思想说成是“非己”,把“非己”说成是把自己变成领袖思想的盲目追随者,或违心的被迫的追随者。在领袖逝世后,他们就来了个反扑,把“非己”变为“非领袖”、“非毛”。有位先生甚至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马克思主义知识越来越低”。他们把自己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叫做“回归自我”。这种谬论显然是否定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 是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来统一全党的思想,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以争取抗日战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在这里,让我们用邓小平的一段正确论述来批评 1999 年版编者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否定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思想,邓小平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

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邓选》第2卷第44页）这段话说得多好啊！可是，1999年版编者在很多词条中删除、否定的正是思想政治运动、毛泽东建党、建军学说的精髓。

在这里，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思想政治运动的问题。

何谓运动？这是指发动广大群众参与的群体性行动，如抗日救亡运动、大参军运动、大生产运动、土改运动和三反运动、整风运动等等，这只有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政党才能够这样搞运动。剥削阶级的政党是不能也不会这么做的。为什么？因为前者同人民群众利益是一致的，后者同人民群众利益是对立的。比如国民党军队也要扩军，但它就不可能搞参军运动，只能“抓壮丁”；国民党到了台湾后也搞“土改”，但它只能用行政手段，也不能搞群众运动。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它才能搞群众运动，才能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和经得起批评。剥削阶级的政党则不敢提倡也经不起群众的批评。所以，敢不敢搞思想政治运动，其实是一个政党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试金石。

因为马列主义政党是完全彻底为民服务的，所以能依靠人民群众搞革命运动、生产运动，搞思想政治运动等等。这是发动人民群众，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现“两个彻底决裂”的必由之路。假如不搞、不敢搞、不能搞例如整风运动等思想政治运动，这就证明自己已经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了。

谁也不能否认，几千年来的历史，人类就是在不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中走过来的。改造客观世界主要

是指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从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直到今天的信息科技的高度发达，人类大大改变了客观物质世界的面貌。改造主观世界主要是指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随着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应发展和进步。比如现今人的观念也应考虑社会群体的利益，不能老是坚持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私心越来越膨胀而无止境，逼得被压迫者走投无路只好去当“人肉炸弹”。连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也有文章指出：恐怖的根源在于贫富两极分化。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应该提倡在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重视自觉地改造人类的主观世界。这就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变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毛选》第5卷第407页）既然人人都要改造思想，这就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了。

怎么改造人类的思想呢？众所周知，唯有“私”字是万恶之源，那就应该宣传、动员大家一起来消灭这个“私”字，和创造条件来有步骤地为消灭私有制，为实行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两个彻底决裂”而努力。当然，这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但这个目标是丝毫不能模糊的。怎么样去实行呢？

马克思说“辩证法的本质就是革命的、批判的”。又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去消灭。人民应当用物质力量去打倒反动的剥削阶级。同时也要消灭人们传统的私有观念（包括自身的）。这就离不开革命和搞政治思想运动。搞政治革命、搞政治思想运动和发展生产力都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具体行动。毛泽东既重视武装人民推翻反动统治，又重视思想政治运动，也重视发展经济。这正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至于政治思想运动会产生偏差、

失误或错误，这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任何工作包括打仗都是无法做到十全十美或百战百胜的。应该力求避免产生错误，难免产生了错误，随时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克服。但绝不能因噎废食。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科学地指出："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题产生的。""实际上，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恩全集》第3卷第40、48页）

显然，共产党人是革命者，改变"现存状况"便是共产党人的革命的、现实的行动，或者叫做"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

这说得多么的明确！可以问问在1921年以来入党的老同志，一辈子不就是信仰这一点，就是这样干，就是这样而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的吗？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1991年版《毛选》第2卷第686页）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说"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邓选》第2卷第367页）又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有这个"精神支柱"。（《邓选》第3卷第110、137页）现在，是否情况变了，这个"精神支柱"也"过时"了呢？邓小平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邓选》第3卷第144页）

六、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思想路线战略策略及其中流砥柱作用的贬低和否定

1999 年版《辞海》编者重写的【毛泽东思想】词条一方面抽象肯定“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可是，却又具体贬低、否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所起的决定性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中，正确和深刻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

然而，1999 年版《辞海》编者的观点却是相反，竟然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贬

低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这表现为对以下第七五至第一〇七这33个重要词条,11个被取消,22个被删除主要内容:

（七五）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的重要内容:

1. 删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2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2. 删除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经过与国民党政府的协议,中国红军及其在南方各省所留下的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华北和华中前线抗战。1937年8月,党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相继武装了广大的人民,在敌后开展了强大而又普遍的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危险,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号召和领导全国人民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同时,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随后又击退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至1942年,是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党进行了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同时发动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而战胜了困难,壮大了人民力量。"

3. 删除在1945年4月,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同年8月,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大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歼灭了大量敌人,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相配合,迫使日本帝国主

义无条件投降。”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3页与1999年版第1706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中国共产党”这个词条中，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领导作用全部删除，在删除之后只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一句话一笔带过。

这岂不是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这场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联系编者对表述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33个重要词条，11个词条被取消，22个词条的核心内涵删除的情况来看，显然是严重贬低、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与贡献。实在令人震惊和愤慨。

（七六）删改【瓦窑堡会议】词条。

删除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的主要内容有：

1. 删除“决议强调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2. 删除这次会议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关门主义错误观点，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361页与1999年版第1644页）

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对于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特别是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领导作用，都极其重要。都是影响到党和抗日的命运的。却被1999年版

《辞海》编者删除、否定。

（七七）取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报告深刻地分析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中国内部阶级关系与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新变化，充分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着重地指出了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报告分析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批判了党内长期来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对革命的急性病，同时，又唤起党内注意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从而保证了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报告还对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及其各项政策，作了很多重要规定。这一著作对当时我党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作了完整的分析，并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383页与1999年版第471页）

《人民日报》2006年12月16日在《永远的丰碑》中对这次会议作了正确的表述："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的"《决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党的策略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可是，1999年版《辞海》编者不但删除"瓦窑堡会议"的核

心内容，还取消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基本精神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个词条，显然是否定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制定的，经“瓦窑堡会议”作了《决议》的，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七八）删改【洛川会议】词条。

删除如下重要内容：

1. 删除“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明明是“毛泽东的提议”，却被删除，这岂不是否定毛泽东的贡献吗？

2. 删除洛川会议通过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作为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反对蒋介石的两面政策的指针”。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932 页与 1999 年版第 1111 页）

这岂不是赤裸裸地否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有资格、有理由、有必要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来领导抗日战争？请问编者：难道共产党无权代表人民领导抗日？难道共产党从“九·一八”开始即领导人民抗日和“八年抗战”不是事实吗？

（七九）删改【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会议“批判了那种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2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13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会议“批判了那种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这一段话，表明时至今日，编者仍支持右倾思想观点，仍认为“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

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不是“错误思想”、不应该“批判”。

（八〇）取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反对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毛泽东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阐明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以便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报告对扩大和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扩大党内民主、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在论述干部政策时，报告说明了培养、识别、使用、爱护干部的问题，并从我国历史上存在的有关选拔、任用干部的两条对立的路线作了概括，指出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在论述学习问题时，报告说明了党要能够负起一系列伟大的历史任务，首先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毛泽东所作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号召，在党内引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424页与1999年版第1723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为了给王明在抗日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在删改【六届六中全会】词条后，又取消了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全会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报告的词条，这个错误我们在以上评析第53、54这两个词条的删改时，已指出编者是违背党先后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作的正确论述的。这里不重复。

但是，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这是关系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命运

的大问题。毛泽东在回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时曾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转引自2006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永远的丰碑》)

因为从上述“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直至“六届六中全会”以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正是毛泽东关于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路线、战略策略的确立时期和克服王明的错误路线的关键时期。确实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党的命运和抗日战争的命运。后来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壮大,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同这个思想路线的正确指导分不开的。

1999年版《辞海》编者否定“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精神和全会批准的毛泽东作的《报告》,这是对我们党在抗日时期的路线、战略策略和许多重要的原则、观点和思想理论的否定,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中流砥柱作用的否定,这也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否定。

(八一)删改【战争与战略问题】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对于党在战争和战略上的方针,也采取了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为了克服党内这种机会主义,使全党更明确地了解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首要地位,并动员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毛泽东从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方面着重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强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重申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说明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

枪指挥党”，并号召全党注意研究军事问题。（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352 页与 1999 年版第 1634 页）

（八二）删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词条。

删除毛泽东 “指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和“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677 页与 1999 年版第 819 页）

显然，1999 年版编者对上述两个关于“战略”的词条所删除的是核心内容：

1. 删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是明显地为王明翻案和否定“独立自主”原则。

2. 删除“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首要地位。”

3. 删除毛泽东“指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和“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在以上这几个词条中，删除共产党“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及其领导的军队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删除共产党及其军队“组织发动和武装广大群众”，为的是否定“全民抗战”和人民战争的思想理论与实践；删除、否定“战争和战略问题的首要地位”；删除“批判了那种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错误思想”，是认为应该把抗日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等等。这进一步证明 1999 年版编者是为了“贬共”、“褒蒋”而违背事实，颠倒是非，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错误地看待与评价抗日战争的。

（八三）删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的内容：

1.删除“不久爆发了‘一二·九’运动，革命形势重新走向高

潮”。

2. 删除毛泽东“从政治上”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3. 删除“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周恩来的努力下”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4. 在“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这句话中删除“毛泽东提出的”。

5. 删除“在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同时,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6. 删除掉了“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77页与1999年版第819页)

实际上,以上被1999年版编者删除的这6点,都是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的、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突出贡献。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体现在它提出和始终维护、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试问:不“打退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同时在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能保住统一战线不破裂吗?不搞“三三制”政权能建立和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吗?能坚持抗战直至胜利吗?这些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得以维持,得以发展的关键,也是毛泽东的突出贡献。

(八四)在【八路军】这个词条中,删除、否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深入敌后,同共产党的当地组织一起,发动和武装广大群众,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改写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一笔带过。(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72页与1999年版第330页)

(八五)在【新四军】这个词条中,删除、否定改编为新四军后,“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深入敌

后，同共产党的当地组织一起，发动和武装广大群众”，改写为“随即开赴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84页与1999年版第1797页）

应该指出：对上述两个词条的删节，是否定“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特色和本质。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两支军队不仅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在抗战中壮大了自身，还“发动和武装广大群众”抗日，对抗日战争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遵循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发动和武装广大群众”是“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特色和本质，却遭到删除。

（八六）删改【论持久战】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讲演用抗战十个月来的经验，驳斥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鼓吹的“亡国论”、“速胜论”等有害论调，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矛盾的特点，深刻地指出，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些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特点决定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又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而必须进行持久战。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答复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具体地规定了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工作和战略战术等一系列原则，强调了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以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阐发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83页与1999年版第471页）

1999年版编者删除的都是核心内容：

1. 删除“抗战以来十个月的经验”这就把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个前提删掉了。

2. 把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蒋介石、王明为代表所鼓吹的“亡国论”、“速胜论”等有害论调这个针对性删除掉了。

3. 删除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些”；这就把得出“持久战”这个科学论断的四项根据删掉了。

4. 把 “答复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这个重要评价删掉了。

这也是明显的贬低、否定《论持久战》这部杰出的光辉著作的重大历史意义的。

（八七）取消【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 1937 年 11 月 12 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提纲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强调指出共产党的全面抗战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的原则分歧，说明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毛泽东号召，在党内要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揭露了“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毛泽东重新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还剖析了统一战线营垒里的阶级关系，制定了扩大与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孤立右翼集团的策略方针。（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73 页与 1999 年版第 207 页）

1999 年版编者取消这个词条，主要是取消、否定两大问题：

1. 抗日战争的路线问题。毛泽东及时英明地指出在抗日战争问题上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国民党坚持的单纯由“政府和军队”进行的“片面抗战”路线，这是一条必败的错误路线。从“七七”到太原失守只有三个多月，国民党的陆军已损失

四分之一，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另一条路线是共产党主张和坚持的“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全面抗战。”亦即：全民抗战、人民战争路线。这才是保证抗日必胜的路线。（见1991年版《毛选》第2卷第238页）抗日战争胜利的实践已证明毛泽东主张和坚持的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2.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重新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然而，1999年版编者不承认共产党有权领导抗日。

这是无理否定毛泽东始终抓紧解决和坚持的关于“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无理否定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权和领导作用。

（八八）取消【论政策】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40年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在执行政策上存在着“左”的和右的倾向，强调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实行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指出对不同的阶级关系应作具体分析和严格区分。必须“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并提出，“对于国内各个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对敌斗争的策略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文中还根据统一战线中的各种策略原则，规定了关于政权组织、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382页与1999年版第470页）

上述词条反映在抗日战争中争夺“领导权”斗争的策略、原则、政策等问题。1999年版编者不承认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也就取消了这个词条。

（八九）删改【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43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这个决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对领导工作的基本方法作了精辟的说明。决定中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还须注意“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决定深刻批判了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号召全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反对并克服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86页与1999年版第348页）

（九〇）取消【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1941年和1942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指出，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并号召解放区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以便克服财政和经济的困难。报告着重批判了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批判了不注意动员、帮助人民

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方针不仅指导解放区军民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而且也是我党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677页与1999年版第819页）

上述两个词条是介绍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既重视培养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又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这是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开始注意领导方法和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这些好方法和好传统，竟然也被1999年版编者所删除、否定。

（九一）取消【狼牙山五壮士】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抗日战争中英勇战斗创立壮烈事迹的八路军五战士。1941年9月25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在狼牙山阻击日本侵略军3500余人的进攻，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打击敌人，并掩护数万群众、地方机关安全转移，苦战一天毙敌90余人，但敌人继续猛攻，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迷惑敌人，班长马宝玉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等5人，发扬了高度自我牺牲精神，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绝路。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宁死不屈，砸坏枪支，跳下悬崖。这壮举，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为表彰这一英雄事迹，在狼牙山上建立了纪念塔。（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823页与1999年版第992页）

（九二）删改【赵一曼】词条。

1999年版编者对我国著名抗日女英雄的词条删除了以下内容：

1. 删除她“领导当地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

2. 删除她不幸受伤被捕后，“在狱中英勇顽强，坚贞不屈”。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944页与1999年版第2340页）

1999年版编者取消【狼牙山五壮士】词条和删改【赵一曼】词条，实质是取消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狼牙山五壮士”和赵一曼这种精神，还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在今天，我们面对以上被1999年版编者取消和删改的词条，只要再来读一遍，都会感到它们都极为重要。任何承认历史事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没有这些词条所反映的内容和精神，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毛泽东在抗战之初即为党和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路线，提供了抗日的理论、战略和策略，又宣传、组织人民，得到以“狼牙山五壮士”与赵一曼为代表的共产党员、战士、人民的拥护和起模范作用，才保证了抗日战争从胜利走向最后胜利。这些人和事真正都是永远的历史丰碑。删除、取消和想否定它的人，只能暴露了他们自己的立场、观点的错误。

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抗日战争的理论、战略策略和方针路线这样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吗？如果没有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正确方针，我们能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吗？如果没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我们能坚持抗日战争到最后胜利吗？如果没有以“狼牙山五壮士”和赵一曼为代表的千千万万英勇反侵略的共产党员、战士和爱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伟大的号召，能坚持抗日战争到最后胜利吗？1999年版编者为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却要取消、删改和否定以上这些关系到我们全党全军全民族的重要词条的核心内容，真是太荒唐了！

请问1999年版编者：你们否定毛泽东到底要肯定谁？你们否定具有英勇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狼牙山五壮士”和赵一曼这样的人民英雄，你们想颂扬谁？

（九三）删改【《共产党人》发刊词】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39年10月4日为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写的发刊词。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文章主要对1921年以来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经验作了总结，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正确地理解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关于统一战线，文章着重说明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批判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关于武装斗争，文章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关于党的建设，着重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问题，指出只有善于做到这一点，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关于三个法宝的相互关系，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40页与1999年版第1499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的都是关键性的内容：

我们说《辞海》编者重写的“毛泽东思想”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现在看编者对这个词条的删改，又是一个证明。重写的词条写“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似乎是肯定毛泽东思想的，然而，编者却删除毛泽东这篇文章“主要对1921年以来党领导民主革命以来的经验作了总结”，并删除这个“总结”中“关于统

一战线……关于武装斗争……关于党的建设等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等”内容。虽然，我们也注意到编者没有取消【三大法宝】这个词条，但在这个词条中也是把“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丰富经验”的话删除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0页与1999年版第23页）

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如果你们是真心肯定“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为什么要把毛泽东上面这篇既正确又深刻的“总结”的主要内容，加以删除呢？这难道不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九四）删改【学习和时局】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为了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彻底清算过去错误路线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1942年到1944年间，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进行了讨论。本文就是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讲演总结了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代表中央政治局对高级干部在党史学习中提出的重要问题作了结论，指出研究党的历史和任何问题都必须作具体分析，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讲演总结了我党领导抗日战争7年间的工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规定了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任务。为了夺取新的胜利，毛泽东号召“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27页与1999年版第1361页）

上述词条被1999年版编者删除的内容：

1. 删除“讲演总结了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代表中

央政治局对高级干部在党史学习中提出的重要问题作了结论”。

2. 删除“讲演总结了我党领导抗日战争 7 年间的工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规定了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任务”。

3. 删除“毛泽东号召‘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删除的以上 3 点，其重要性都是不容争辩的，这显然是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及其对指导抗日战争的贡献。

（九五）取消【三次反共高潮】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抗日战争期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为准备投降日本，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曾在 1939 年至 1943 年间，先后掀起三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高潮。第一次发生于 1939 年 12 月到 1940 年 3 月；第二次发生于 1940 年 10 月到 1941 年 3 月；第三次发生于 1943 年 3 月到 10 月。这三次反共高潮，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下，被击退和制止。（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24 页与 1999 年版第 27 页）

（九六）取消【第一次反共高潮】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1938 年 10 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广州、武汉后，加紧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为准备投降日本，加紧反对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为此秘密颁布了许多反共文件，制造了“平江惨案”和“确山惨案”等事件，并于 1939 年 12 月到 1940 年 3 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栒邑（今旬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县；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1940 年 2、3 月间，国民党军石友三、朱怀冰等部又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决自卫

的原则，给进犯者以有力的回击，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领导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作了坚决斗争，击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881页与1999年版第2268页）

（九七）取消【第二次反共高潮】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1940年10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名义，强令在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拒绝这种无理要求，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同时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答应将在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不按中共中央指示的路线前进，却同国民党顾祝同商定新四军的北上路线。1941年1月7日，北移的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八万余人的伏击。新四军英勇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千余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负伤被俘，项英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接着，蒋介石又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进攻在华中、华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中国共产党严厉驳斥了蒋介石的反动命令，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整并扩大了新四军的主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还击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下，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在1941年3月，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881页与1999年版第2268页）

（九八）取消【第三次反共高潮】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1943年，国民党反动派为打击人民抗

日力量，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是年3月，蒋介石抛出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6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指使特务假冒群众团体，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7月，调集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闪击延安。在国民党操纵的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通过了反共的决议案。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并动员解放区军民积极准备保卫边区，全国人民也纷纷反对，形成了广泛的抗议运动，至10月，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882页与1999年版第2268页）

（九九）删改【中国之命运】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1943年3月由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反共小册子。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诬蔑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暗示要以武力解决共产党。它的出版是为蒋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3页与1999年版第1706页）

1999年版编者把这个词条中的“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删除掉了。这是为国民党顽固派辩护，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是准备像在“皖南事变”中对付新四军那样消灭陕甘宁边区和中国共产党的。

实际上，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虽然新四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由于毛泽东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不同蒋介石彻底决裂，而是在政治上坚决揭露反共势力的阴谋，使蒋在政治上遭到失败。同时，共产党又重建了新四军。反共势力当然是不消灭共产党不会甘心的，那时远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不仅去纽约演说，支持消灭新四军，而且还写了《关于国民党国际宣传工作的意见》上书蒋介石说：“边区一词有何法律依据？”他要求国民党在国际宣传中不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

性”。（见《胡适全集》第22卷第636页）可见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迫不及待地想消灭边区和中共的。

同年，更由胡适的得意门徒陶希圣执笔，为蒋介石写了《中国之命运》发表，该书竭力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正巧又逢第三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国民党顽固派就大肆鼓噪，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同时，国民党已经“调集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闪击延安。”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沙勒教授写道：“摩根索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援助重庆的主要倡导者，这种援助一方面在于抑制日本在其它地方的扩张，同时为了支撑中国的亲美反共政权。”（见《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75页，郭济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出版）同时在蒋介石派宋子文赴美多次向美提出要求后，美国财长摩根索终于建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支持建立一支美国驻华秘密航空队”。（同上书第66页）于是，在1941年9月成立由陈纳德领导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后来又称“飞虎队”）当时蒋介石就说陈纳德的“美国飞机可以用来镇压共产党”。（同上书第74页）本来成立这个航空队的宗旨之一就是“支撑中国的亲美反共政权。”陈纳德是与蒋介石、宋子文同样的坚决反共的人物，曾准备助蒋轰炸延安。后来，因当时担任同盟国中国战区的司令史迪威将军是主张团结中国共产党一起抗日的，在他得知“国民党即将进攻共产党人，并可能利用陈纳德的飞机”时，他“很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警告陈纳德不要袭击延安。”（同上书第138页）这才使轰炸延安的阴谋未能得逞。

1999年版编者有什么根据说国民党不存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问题呢？显然，删除、否定第一、二、三“三次反共高潮”，既是为蒋介石开脱，隐瞒其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又是否定毛泽东在打退“三次反共高潮”中挽救了抗战大局的巨大贡献

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1999 年版编者取消和删改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 “反共高潮” 有关的以上 5 个词条，都是在既袒护国民党又同时贬损共产党。在此必须指出：对于蒋介石来说，发动“三次反共高潮” 固然都是他一生之中反共的重大阴谋和行动，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挫败蒋介石的这三次阴谋和行动，是在共产党成长壮大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1999 年版编者所删除、否定的“三次反共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有详实的记述和评价。（见该书第 175~190 页）1979 年版尊重事实，对此也很重视，所以，是用了一条“总述” 和三条“分述” 共 4 个词条近 2000 字来作介绍的。

这三次反共高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遇到的三次大危机。如果不打退蒋介石发动的这“三次反共高潮”，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就会遭到破坏，抗日战争就难以坚持下去直至胜利。所以，毛泽东采取了英明的斗争策略，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既挫败其阴谋又不与之全面彻底破裂。维护了抗战大局，赢得了人心，进而壮大和发展了人民革命的力量。特别是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对促使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形成有着特别巨大的意义。

1999 年版编者取消“三次反共高潮” 的 4 个词条和删改一个词条，这证明编者是有意否定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段重要历史。否定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事实俱在，这是否定不了的。请看当年蒋介石关于决心消灭共产党说的真话，他说“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也心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愿望是至死也不变的”。（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34 页）再看毛泽东的话，这一段历史真相就更清楚了，毛泽东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

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全国规模的内战，仅仅由于我们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1991 年版《毛选》第 4 卷第 1123 页）

1999 年版编者删除、否定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险恶用心还在于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正是在八年抗战的实践中，在对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导方面，对内在打退“三次反共高潮”的策略指导方面，思想、理论和战略策略得到大发展，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一个空前辉煌的阶段。我们今天重读一下这些被取消和删改的词条联系毛泽东的有关文电，深感毛泽东的这些功绩才真正是永远的历史丰碑！

1999 年版编者否定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仅取消、删改以上“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的 5 个词条，而且还删除其在下列 4 个词条中的表现：

（一〇〇）删改【博山惨案】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之一。1939 年 4 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挥秦启荣部队袭击博山（今属淄博市）太和地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八路军团政治部主任鲍潭及营长吕乙亭等 400 余人。（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2 页）

（一〇一）删改【深县惨案】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行之一。1939 年，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不断进攻八路军，6 月，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 400 余人。（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969 页与 1999 年版第 1156 页）

（一〇二）删改【平江惨案】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之一。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这一惨案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延安各界人士曾举行集会并通电全国强烈抗议。（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44页与1999年版第53页）

（一〇三）删改【确山惨案】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也叫“竹沟事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之一。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特务和部队1800余人，围攻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惨杀抗日受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家属200余人。（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642页与1999年版第1988页）

1999年版编者在“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词条中，都删除、否定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国民党军队不断地杀害成百上千的中共抗日部队的官兵，这是直接间接地帮助日本侵略军。“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和制造这些“惨案”，难道不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严重“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铁证？怎容抵赖和抹煞！编者把它删除、否定，是不讲是非，包庇国民党反动派和对革命烈士的污蔑。

（一〇四）取消【东方慕尼黑】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也叫“远东慕尼黑”。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和日本多次密谈，阴谋以牺牲中国来求得相互妥协。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本加紧对蒋介石诱降，英国驻华大使馆曾积极进行牵线活动。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揭露和反对，阴谋未能得逞。这种出

卖中国的阴谋,和 1938 年英法通过慕尼黑会议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妥协的勾当一样,故称"东方慕尼黑"。(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51 页与 1999 年版第 61 页)

毛泽东在 1941 年 5 月为中共中央写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党内《指示》。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始终做到及时揭破国内外敌人破坏我抗战的阴谋,这个《指示》及时"揭破"帝国主义的"阴谋",调动舆论的力量,终于使帝国主义者不敢为所欲为。所谓"东方慕尼黑"阴谋与美帝国主义有关。在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前四年中,美国为了本国资本家获取利润,把大量战略物资卖给日本。到 1941 年 2 月至 11 月期间,美国同样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一步同日本勾搭、做交易,阴谋牺牲中国,美日两方背着中国进行过 50 轮谈判。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以日本提出的《日美谅解案》为基础,即"美国总统承认下列条件,并在日本政府做出保障(证)后,美国总统将据以向中华民国提出和平劝告:中国独立。根据日华间所应成立之协定,日本军队自中国撤退……蒋政权与汪政权合并……承认满州国。""当蒋政权承诺美国总统之劝告时,日本国政府应与新统一之中国政府或其构成分子,立即直接开始和平交涉。"(转引自张宏志著:《独树一帜·十五个第一》第 115 页,香港银河出版社 2005 年 7 月出版)后因日本未能完全满足美国的要求和利益,以及舆论的反对才终未达成协议。但是,美国曾欲牺牲中国是事实。这就是所谓"东方慕尼黑"阴谋。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毛泽东在揭露这个阴谋方面是一个贡献,当然也是抹杀不了的。

1999 年版编者取消上述词条,是既为帝国主义掩盖了侵略本性,又抹杀了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英明和贡献。

(一〇五)删改【冈村宁次】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冈村宁次(1884~1966)日本战犯。日本东京人。1925 年至 1927 年,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

1928 年，任日军步兵联队长，是“济南惨案”的主凶。1932 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日军侵占上海的战争。1933 年，代表日本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7 年至 1945 年，历任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中国实行极其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在 1945 年 8 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争罪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曾充当蒋介石的秘密顾问，为蒋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1949 年 1 月，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释放回国。1950 年，又被蒋介石聘为台湾的“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1966 年，死于日本。（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95 页与 1999 年版第 235 页）

1999 年版编者删除上述词条的内容：

1. 冈村宁次是日本侵华的派遣军总司令，搞“三光政策”的元凶，首要战犯之一，竟然被摘掉“日本战犯”的帽子。

2. 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难道还不极其残酷吗？编者竟把“极其残酷”四个字删除了，用心何在？

3. 把他“为蒋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改写为“帮助国民党打内战”一句空洞的话。

冈村宁次，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告诉我或何（应钦）总司令’……在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见《蒋介石评传》下册第 697 页，〈美〉汪荣祖〈台〉李敖合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这证明国民党不但在“七七”抗战前是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七七”抗战时是暗中对日谋求妥协，“七七”抗战后还是对日一副投降派媚骨。

1999年版编者给冈村宁次这个侵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摘掉“日本战犯”的帽子。这是不承认始终坚决对日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对这个战犯的正确定性。删除了人民要求惩办日本战犯的权利。

（一〇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词条中，删除有关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在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中的作用。

1999年版编者对“在敌人后方建立了有一亿人口以上的抗日根据地，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90%以上的伪军，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力。八年中，进行了大小战斗1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并使自己发展到120万人，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作了删除、修改。（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8页与1999年版第1711页）

1999年版编者把这个词条中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90%以上”的伪军，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力”删除，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所起了的“决定性”作用删除，改写为起了“重要作用”。这显然是否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已“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力”并对抗日的胜利起“决定性”作用，亦即中流砥柱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看【抗日战争】这个词条是怎样被1999年版《辞海》编者作了错误的删改和歪曲的：

（一〇七）删改【抗日战争】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1937~1945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早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时中国共产党就号召人民武装抗日，并且领导或协助一部分东北爱国军队组成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游击战争。蒋介石却坚持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运动进行镇压和破坏，这就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日本在占领东北后

又逐步侵入华北，1937年7月7日，向北平（今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8月13日，又在上海发动进攻，两地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从此开始了全国抗日战争。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三万人左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8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9月22日，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10月间，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决定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抗击日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了广泛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迫使日本侵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后停止前进，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时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批判和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此后，日本侵略者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国民党政府在被迫实行抗战后，政治上一贯限制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抗日活动，反对发动群众，军事上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于1938年底公开投降日本，随后，在沦陷区成立傀儡政权，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蒋介石则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从1939年到1943年，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战胜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精兵简政，克

服困难，抗击了大部分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发展和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并从1942年起，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这一切就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和精神的条件。1944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他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危机，打通大陆交通——平汉（今京广线北段）、粤汉（今京广线南段）线，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进攻，国民党军一触即溃，从河南一直溃退到贵州。这时全国人民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运动形成了高潮。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001页）这次大会决定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正确方针，从1944年起，八路军、新四军转入局部反攻。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次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举行了投降的签字仪式，9月3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抗日军队共作战十二万五千多次。毙、伤、俘及投诚的日军共计五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二人，毙、伤、俘及反正的伪军共计一百一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五人。在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发展到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军队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兵二百二十多万人，解放区人口扩大到一亿三千万，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75页与1999年版第817页）

首先，写【抗日战争】这个词条，应明确是站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的立场上写，还是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写。我们认为当然应站在能正确反映抗日战争真实面貌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写。然而，1999年版编者却是错误地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上，违背历史事实来删改【抗日战争】原词条的。

对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应作具体分析的。作为国民党右翼统治集团，以汪精卫为代表的那一部分，在抗战初期就投降了日本，并组织伪军帮助日军攻击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武装；国民党的另一部分以蒋介石为代表，虽然还在抗日营垒里，这是“西安事变”、共产党和人民逼蒋抗日的结果。它对抗日战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是代表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国人民的全民抗日战争的。这要通过事实表现作具体分析。

事实上，对抗日战争起中流砥柱作用的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2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主张抗日。随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人去东三省组织游击队抗日。（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14页）在“七·七”事变次日，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同上书第146页）中国共产党是在敌后抗战，没有外援，靠缴获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解放了的大片国土正是国民党政府丢失给日本侵略军的，在这片国土上的同胞达一亿三千多万人。共产党不但有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战略、策略的思想指导，而且有不断扩大的抗日队伍，包括正规兵团八路军、新四军，及地方兵团、基干民兵、普通民兵和抗日群众。还有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同胞和华侨也是支持共产党抗日的，这是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是直接领导了亿万人民的“全民抗战”，成了抗日的中流砥柱。可是，1999年版编者不是正确地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尊重历史事实来写【抗日战争】这个词条：

1. 1999年版编者在“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革命’战争”这句话中删除、否定“领导下”和“革命”这两个关键词，在【中国共产党】这个词条中，把中国共产党1922年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删除、否定。我们认为肯定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性质是个原则问题。这里的“领导”当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领导，是指“实质上”的领导。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立场上看，反帝抗日，形式上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战争，实质上是阶级矛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

2. 由于1999年版编者否定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之，编者也就删除、否定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一部分东北爱国军队组成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游击战争”；删除、否定蒋介石“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运动进行镇压和破坏，这就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还删除、否定蒋介石在“政治上一贯限制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抗日活动，反对发动群众抗日”。

3. 因之，1999年版编者也就不承认共产党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内容，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形式，对全国抗日进行的政治领导（这是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都拥护支持的）进而删除、否定共产党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9月22日，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这样，编者就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这个政治内容和形式都删除、否定掉了。

4.因之，1999年版编者也就不承认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进而删除、否定“这时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批判和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

线”和“此后，日本侵略者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5.因之，1999年版编者删除、否定“国民党从1939年到1943年，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战胜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精兵简政，克服困难，抗击了大部分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

这些删除，显然都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否定。

6. 1999年版编者否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意在肯定国民党起“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国民党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已降日并组织伪军助日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于是，编者又删除、否定这部分国民党投降派“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同时，针对国民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者，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和当时他们在日军进攻面前是“一触即溃，从河南一直溃退到贵州。这时全国人民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运动形成了高潮”这些史实也被1999年版编者全部加以删除、否定。这都是编者为了美化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而抹杀的历史事实。

7. 1999年版编者为了进一步否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又删除、否定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起，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这一切就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和精神的条件。

8. 1999年版编者还删除“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决定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正确方针，从1944年起，八路军、新四军转入局部反攻”。同时又删除“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共作战十二万五千多次……解放区人口扩大到一亿三千万”的事实。

1999年版编者在上述【中国共产党】词条中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全部事迹删除后，只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一句话一笔带过；接着取消和删改共产党领导抗日的30多个词条；再在【抗日战争】这个词条中把共产党领导抗日的8大主要事迹删除，这岂不是明目张胆地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对抗日战争起的“决定性”的“中流砥柱”作用吗？改写的词条只写共产党领导的军民起了“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用。这是严重违背事实的。真实的历史是：从“九·一八”到抗日战争胜利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虽然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在一个时期也进行过抗战，有过一定贡献。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这14年中始终坚决抗日，发动、组织、领导了亿万军民实行全民抗战，从日本侵略军手里收复了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大片国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才使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

以上这33个重要词条，可以说是些直接间接地相当充分地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全过程的大事。1999年版《辞海》编者竟然取消其中11个重要词条，并删除22个重要词条的重要内容，是为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上歪曲“抗日战争”历史铺平道路。综观以上这33个词条，极其充分地反映出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实际斗争及其结果。可以说不研究这33个词条相关的历史事实就无法正确认识中国的抗日战争。因为它反映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作用、指导思想和策略，对反

共顽固派斗争的指导思想和策略，对国内外阴谋破坏我抗日战争者的及时揭露与斗争的指导思想和策略；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党统一党内思想团结对敌的方针，反映了我们党建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政策等等。这些都是与毛泽东思想的体现和运用密切相关，如果离开了这些就只能是空谈毛泽东思想了。1999 年版编者取消其中的 11 个重要的词条，还删改了其中的 22 个重要词条的主要内容，不但抹杀了共产党的重大贡献，而且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作辩护，为日本侵略者、战犯作辩护。比如：编者在删除、否定前两次"反共高潮"后，又把蒋介石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的《中国之命运》这个词条作删改，否认它是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为消灭边区和共产党作舆论准备的。这既否定蒋介石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的罪行，又否定毛泽东正是在打退这三次反共高潮中，使全民族抗战局面得以维持，使党的抗日革命力量得以发展，也使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辉煌阶段的史实。

1999 年版编者取消和改写了有关"抗日战争"的 33 个重要词条。这显然是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上改写抗日战争的历史，这是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巨大贡献的严重贬低和否定。我们必须弄清楚这 33 个词条所反映的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我们应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客观历史事实。中共所以能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由于"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

何谓"中流砥柱"的作用？"中流砥柱"是毛泽东总结我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在抗战中起的作用所作的一个比喻，毛泽东说：

“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见 1991 年版《毛选》第 3 卷第 804 页）这是有事实为根据的，毛泽东在对抗日战争作的阶段性总结中有说明：“从一九四一年至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是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我党又要担负抗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时间，日本军阀没有举行过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只有几次较大的战役行动（浙赣、长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归，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只担负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军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军。”（同上书第 944 页）1979 年版《辞海》第 1418 页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词条写得是对的，抗击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日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力……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 “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来说就是“中流砥柱”的作用。从“九·一八”日军侵华直到 1941 年，国民党十多年未敢向日本“宣战”，在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有“五年半时间”是在“观战”。可是，1999 年版《辞海》编者却把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开始 14 年始终领导军民坚决抗日、对抗日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句评价的话删除、否定，改写为起了“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抗战”的“作用”。（第 817 页）这就把“几百万国民党军队”说成了抗日的“主体”、主要力量，把共产党及其直接领导的一亿多军民的强大抗日力量，说成仅仅是对这“几百万国民党军队”起了“配合”、“支援”作用的次要力量。这就等于明确否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对抗日战争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中流砥柱的作用”了。这才是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抗日战争问题上“褒蒋”、“贬共”的基本的思想观点。

在毛泽东逝世后，社会上出现的“反毛”、“非毛化”思潮

中，关于评价抗日战争问题上的“褒蒋”、“贬共”舆论，在1999年版《辞海》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1999年版《辞海》编者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导，正确的思想、路线及其伟大贡献，也是同社会上这股思潮相呼应的。有些先生就是不顾以上33个词条所反映的有关历史事实，不作具体分析，片面突出或夸大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对抗日起的作用，把它说成是主要的，相反，把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军民所起的作用说成是次要的。我们应指出在评价抗日战争问题上出现的这股“褒蒋”“贬共”思潮是错误的。

诚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这一部分国民党官员和军队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降日官员和降日军队是不同的，这要作具体分析。蒋介石虽然是在共产党、爱国人民和“西安事变”压力之下被逼抗日，我们也是不应否认其所起的作用的。在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对抗日战争是作过贡献的。也有过不少爱国将领如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人的英勇牺牲。国民党上层人士如蔡廷锴、张治中等也是爱国抗日的。特别是中下级人士军官中爱国抗日者也不少。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国民党右翼及其控制的政府和军队，对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日本侵华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直到1941年已达10年多，国民党仍未下决心正式对日宣战，在八年抗战期间日军侵占武汉后，蒋介石“观战五年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后，国民党政府才跟着对日宣战。在先前这十多年中一直与日本侵略者暗中谈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企图对日妥协投降后联日反共，只因日方条件苛刻才未达成妥协投降。现存台湾“国史馆”中的档案材料有《中日两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和《协定要点》等文件，就是1940年8月经蒋介石亲自修改的文件。这是国民党消极抗战，暗中谋求与

日本妥协停止抗日战争的铁证。（转引自《新华文摘》2004 年第 15 期第 52~56 页）这是国民党并未真心坚决抗日的证据。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抗日的人民，始终是真心坚决抗日，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性”的即“中流砥柱”作用的基本力量。

在谁对抗日战争起了“决定性”即“中流砥柱”作用的问题上，坚持错误立场者有一个简单的逻辑，他们认为国民党有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抗日；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起初只有几万军队，后来才发展到一百多万人，只是在敌后战场打游击。因此，抗日战争当然是以正面战场的正规军为主。其实，中日战争，不仅是军队与军队之战，它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和动员武装人民等各个方面的“较量”；军队也不仅是数量，还包括精神因素战略策略指导思想和正确指挥等问题，特别重要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中日战争既是军力、经济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意志和精神的较量”。共产党有正确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共产党始终主张的是“全民抗战”，全民动员、全民组织起来抗日的，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基干民兵、普通民兵、军民相结合，到后来就发展到一亿多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一亿多军民一起抗日，使得一百多万日本侵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到处被动挨打而不能自拔。这岂是消极被动抗战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能相比？这一点绝不是共产党自夸的。请看，一位美国学者说：“图书馆里的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游击战的权威的书本压弯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的辉煌的游击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苦恼不堪。十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转引自《毛泽东兵法十三篇》第 6 页，漓江出版社）另有一位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

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日本侵略军的一个高级指挥官说：“中共，八路军对日本军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任何条令都未写过，也从未体验过的特殊战争。”“他们惯于在夜间和山地进行远距离机动作战，因而日军常常处于内线被包围的境地。”“日军在千百次围剿作战中基本上没给中共军队以重大打击。与此相反，在围剿中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例却不胜枚举。”曾任日军大本营中校参谋的山崎重三郎，在战争结束后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他认为这种游击战“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以上均转引自 2005 年 9 月 2 日第 4 版《人民日报》文章）这极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理论的正确性和威力。比比看，几百万国民党军队，没有正确战略指导思想，缺少英明的指挥员，不但不动员全民抗日，而且与人民对立和镇压人民抗日运动，虽然也打了仗，牺牲了一百多位爱国的将领和很多的士兵，战绩却有限；但是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军队有几十万，降将也有五十多，降日后组成一百万以上伪军，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帮凶，这些就只能是国民党军队对抗日战争的负“战绩”了。国民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这一派，不仅始终与日本侵略者秘密谈判，过分依赖美英，而美英为了其自身利益也与日方几十次秘密谈判，计划压蒋介石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合并，也是因为日方的条件苛刻才终未达成交易。试问：这样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能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和中流砥柱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真如“褒蒋”、“贬共”者，以及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们所言，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

国民党及其几百万正规军起了“决定性”即“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么,这几百万经历八年抗日战争锻炼提高了战斗力的国民党军队,后来发展到八百万,应属数量、质量更高了。它要消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只起“配合”、“支援”正面战场作用的一百多万共产党军队,应当是“易如反掌”了。可是,实践却作了相反的证明:国民党发动内战只经过三年,由四百万发展到八百万的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竟一败涂地,败得是那么的惨!请问:它对八年抗日战争起“决定性作用”即“中流砥柱”作用的威力到哪里去了?谎言岂非不攻自破了吗?

七、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解放战争的思想路线战略策略及其胜利的否定，对蒋介石“剿共”、“戡乱”的肯定

1999 年版编者用同样的手法，通过对如下第一〇八至第一二四这 17 个词条的取消、删改和增添，否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及其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和伟大胜利；相反地却肯定蒋介石的“剿共”、“戡乱”。

（一〇八）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在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内战的阴谋，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1945 年 8 月，党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到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于 10 月 10 日达成协议。但不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协议，并从 1946 年 7 月起，依仗其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党领导人民解放军以自卫战争来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战争的第

一年表现为国民党军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战争的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了进攻；战争的第三年，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1949年3月，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在全国胜利以后，民主革命战争要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同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3页与1999年版第1706页）

1999年版编者在删除以上有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的全部内容后，只写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3年多的解放战争，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一句话一笔带过，对解放战争的具体情况一句话也未写。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一〇九）在【毛泽东】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时间，就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并从1947年7月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54页与1999年版第1759页）

以上两个词条的删除内容是一致的。这都是抹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客观历史事实和是非，为的是最后肯定蒋介石的反共“戡乱”，为蒋翻案。

（一一〇）取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讲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指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

党，则要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为此，讲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要有充分的准备，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677 页与 1999 年版第 819 页）

必须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是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及时作出科学分析，并为党和人民制定了正确斗争的方针、路线、战略和策略的一个重要文献。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范例。可以说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后来革命战争的胜利。取消这个词条是明目张胆否定毛泽东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确思想路线和实践。这样否定历史势必导致为蒋介石翻案。

（一一一）删改【重庆谈判】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篡夺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对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中国人民、世界民主舆论的反对以及蒋介石对内战尚需时间准备，蒋一面伪装和平，于 1945 年 8 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并揭露美蒋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教育广大人民，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于 8 月 28 日从延安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同时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警惕。谈判进行了 43 天，于 10 月 10 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蒋介石表面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

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但是，在解放区的政权和军队等根本问题上，蒋介石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和“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妄图在“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致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留重庆继续谈判。《双十协定》公布后不久，蒋介石便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这次谈判击破了美蒋反动派污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揭露了他们的假和平阴谋，并使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积极参加了反对美蒋的革命斗争。（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86页与1999年版第105页）

1999年版编者在上述词条中删除的都是核心内涵：

1. 删除“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篡夺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对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2. 删除“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中国人民、世界民主舆论的反对以及蒋介石对内战尚需时间准备，蒋一面伪装和平，……一面积极准备内战”。

3. 删除“并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和“同时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警惕”。

4. 删除“蒋介石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和‘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妄图在‘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5. 删除“这次谈判击破了美蒋反动派污蔑共产党不要和

平、不要团结的谣言，揭露了他们的假和平阴谋，并使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积极参加了反对美蒋的革命斗争”。

6. 本来“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这是国共两党之间对等的“和平谈判”。这句话被删掉后改写为：“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这表明编者是站在蒋介石“政府”的立场上讲话的，所以要把国共两党对等的“和平谈判”改写为：蒋介石代表“政府”，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这就非两党之间对等的“和平谈判”）。

（一一二）删改【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词条。

1.删除这个会议是“国民党在它发动全国内战还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同意举行”的。

2.删除对这个会议达成的协议“蒋介石一方面承认这些协议，企图利用它们来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积极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不久就撕毁了全部协议。”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19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15 页）

1999 年版编者把上述三个词条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取消是否定毛泽东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和提出的方针路线和思想。编者又删改【重庆谈判】词条的六大内容，还删除【中国政治协商会议】词条的两大内容。这都是抹杀铁的历史事实或站在国民党立场改写，抹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一一三）删改【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写于 1958 年 12 月 1

日。1977 年 9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从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观点出发，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因为它们是纸老虎,所以在战略上要藐视它们;因为它们又是真老虎,所以在战术上要重视它们。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人们必须将藐视敌人和乐观主义放在心目中的首位,然后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具体分析矛盾,掌握客观规律,运用来解决问题。（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86 页与 1999 年版第 348 页）

1999 年版编者删除掉的,正是运用这个观点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内容。这是编者对这个著名论点采用了“阉割它的革命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的又一个实例。众所周知,毛泽东这个论点最初是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这正如《毛选》题解中所说：“在这篇谈话里,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这个论点,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1991 年版《毛选》第 4 卷第 1191 页）我们经历过解放战争的人都有亲身体会,当时这句名言对千百万人民的鼓舞真是大极了，这个观点很快转化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始终认为精通马列主义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也在于理解它、运用它。在 1958 年《世界知识》第 20 期刊载《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时,毛泽东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写信说：“这篇文章可以转载。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大问题,永远有许多人老是不得解决。……不妨予以转载,并予广播。建议重新译成三四国外文出小册子。中文也可以出小册子。”（《毛泽东书信集》第 551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然而，1999年版编者所删除和否定的恰恰就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即如何“理解它、运用它”。最近，有个运用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实例，这就是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的言行。2005年11月4日至5日，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阿根廷的马德普拉塔举行。查韦斯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他讲道：“前天，美国的一份刊物报道说，五角大楼披露，美国正计划入侵委内瑞拉。我要说这是绝对真实的，因为这正是美帝国主义绝望的信号。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所以，我们不用怕它，我们的人民会战胜它的。”（见《环球人物》杂志第6期记者刘宏对查韦斯的专访）。毛泽东担心“许多人老是不得解决”，查韦斯已“解决”了，卡斯特罗也早已“解决”了。可悲的是有些共产党员已忘记了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或者再也没有勇气说这句名言了。

（一一四）删改【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负责干部。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分析了形势，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蒋介石的20年反动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报告总结了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这次会议为党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范围的胜利作好了准备。（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20页与1999年版第1715页）

应该指出，1999年版编者删除的正是实践已证明是正确的革命理论。

1. 删除“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蒋介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观察中国的历史所得出的关于“历史转折点”的英明结论，这很重要。而且确实曾起了大大增强人民胜利信心的作用。把转折点的具体内涵加以删除、否定是抹杀真理和史实。

2. 删除“会议讨论和通过了的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历史实践已证明“这个报告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是英明和正确的。1999年版编者为什么要把它删除、否定？

（一一五）删改【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报告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转入进攻后的国内形势，进一步地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各方面的主要经验，对于党在转入进攻以后需要解决的作战方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经济政策、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刻的说明。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方针：“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所有这些，都为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665页与1999年版第2014页）

应该指出：1999年版编者作这样的删除也是在作具体的否定：

1.“十大军事原则”的产生有一个前提,就是毛泽东“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这个“长期作战”是包括第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在内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删除这个前提,就贬低了它的意义。

2.只写《报告》“制定的土地改革的方针”,但对这个“方针”的具体内容全部删光,这岂不是等于具体否定了这个“方针”吗?

3.否定《报告》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报告》的重大意义主要在被删除的这段话中,即:《报告》制定了关于“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所有这些,都为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党中央在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还重申和特别强调了这个《报告》的重大意义。(《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826页)

(一一六)取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48年4月1日所作。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讲话全面的总结了土改和整党中反右和反“左”的经验,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科学地概括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还科学地概括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强调在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时必须牢记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62页与1999年版第192页)

显然,上述这两个词条,是毛泽东为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支持解放战争,及时为党和革命人民制定的正确思想路线、方

针、政策和策略。如果没有这些，就不会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也就不会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1999年版编者删除和取消的恰恰都是核心内容。这是否定"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否定"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这个毛泽东概括出来的"总路线"的词条也被取消），否定毛泽东领导解放战争的思想路线和伟大贡献。《人民日报》2007年9月29日在《永远的丰碑》中写道："土改取得胜利是按这个《讲话》提出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办的结果……毛主席说'有了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可是，编者的态度是取消这个丰碑。

（一一七）删改【辽沈战役】词条。

删掉"但东北野战军主要负责人林彪一再拖延，拒不执行。东北野战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纠正了林彪的右倾错误以后……"（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035页与1999年版第1251页）

（一一八）删改【平津战役】词条。

删除"……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灭。但东北野战军主要负责人林彪拒不执行。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纠正了林彪的右倾错误以后……"（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45页与1999年版第54页）

（一一九）删改【淮海战役】词条。

1999年版改写和删除的内容：

1. 把"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广大人民支持下，发起淮海战役"删掉后，改写为"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领导下，发起淮海战役。"

2. 删除"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部队进行二十天的战场休整"。

3. 删除"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最后解决了

杜聿明集团。

4. 删除“至此，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处在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从此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96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151 页）

经这样删改后，在这个著名的“淮海战役”中，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名字与作用都不见了。试问：总前委是谁领导下的总前委？大家知道，关于“三大战役”，在《毛选》中只选刊了毛泽东写的三份电报，实际上，毛泽东直接指挥了“三大战役”，“毛泽东共写了二百份电报，战役进行最紧张时，一夜连续写过八份，有的长达二千字。”（转引自《中华魂》杂志 2005 年第 11 期第 56 页）1999 年版编者竟在参加过三大战役的将士还健在的今天，就把“三大战役”写成与毛泽东无关，撒谎的胆子也太大了！

（一二〇）删改【渡江战役】词条。

1.删除“解放军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长江南北广大人民支援下”发起渡江战役。

2.在删除、否定上述事实后，改写为：“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和地方武装共一百万人，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为总前委领导下发起渡江战役。”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979 页与 1999 年版第 1167 页）

这样的删改，就否定了“解放军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长江南北广大人民”在“渡江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读者只能见到邓小平等人的地位和作用了。

1999 年版编者对以上 13 个词条的取消和删改，无可辩驳

地证明了他们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与革命人民对三年解放战争的巨大贡献的否定。这是为改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以及进而为蒋介石翻案铺平道路。再看下列几个词条的删、改、增和被取消：

（一二一）删改【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也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945~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美帝国主义直接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但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依靠暂时的军事优势，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战危机十分严重。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作了充分准备，但为最后挽救和平并教育人民，仍然努力寻求避免内战、实行和平团结的道路，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表示了对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蒋介石由于立即发动全国内战还有许多困难，便一面伪装和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一面在美帝积极帮助下加紧内战部署。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方针，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于8月28日，与周恩来等赴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10月10日，公布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国民党并没有停止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解放区军民经过严重斗争，消灭了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了停战协定。各党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严格地履行这些协定和决议，国民党反动派却在完成其军事部署后，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于1946年6月

底、7月初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这时，中国共产党已在政治上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就领导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方针，经过8个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全面进攻的计划，而于1947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放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也逐步高涨，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处于全民包围之中。解放战争的第一年，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军120万人。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以主力一部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同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彻底实行了土地改革。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又开展了整党和在军队中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全党、全军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这些，就为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极为迅速，不仅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而且连续攻克了大批国民党“重点设防”的城市。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地区。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党对取得全国胜利以及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政策。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签订和平协定，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和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横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许多大城市和广大地区先后解放。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军八百零七万

多人，取得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882页与1999年版第1714页）

1999年版编者真是改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了，把词条名称改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把原词条的核心内容，均加以删除：

1. 删除战争的"反帝"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即把"为推翻美帝国主义直接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战争"，这句话中的"美帝国主义直接支持的"删除掉了；谁支持蒋介石，这是铁的事实，1999年版编者为什么要否认、抹杀？

2. 把"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方针，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这一大段话删除。这岂不是公然抹杀国民党反动派与共产党斗争的是非真相。

3. 把"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了停战协定"和"中国共产党严格地履行这些协定和决议"这两句删除掉。（同时在【中国共产党】词条中把"蒋介石撕毁协定"删除。这就为蒋推卸了发动内战的责任）这是进一步抹杀是非，并为反共势力污蔑共产党没有"严格地履行这些协定和决议"提供借口。

4. 把"领导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删除掉，这又是抹杀是非，为国民党发动内战开脱责任。难道是解放区军民首先发动内战进攻国民党的吗？事实上，解放区军民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第一年确实是进行的"自卫战争"。后来转入反攻，这是正常的。

5. 把"在解放区彻底实行了土地改革"删掉；难道不应该为了发动农民起来自卫而进行土地改革？

6. 把"中国共产党内又开展了整党和在军队中进行了新式

整军运动……为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删除掉。难道不应该为夺取全国胜利准备条件?

7. 删除掉“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是又一次表明 1999 年版编者不同意在 1949 年即转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必须指出:1999 年版编者删除以上这些内容，再一次证明编者不承认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正当、必要及其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同时,也不承认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1999 年版编者进而为蒋介石翻案,增写和取消下列三个词条的内容:

(一二二)在【胡适】这个词条中,编者别有用心地、正面地增写了“胡适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以此表明蒋介石的“剿共”、“戡乱”是根据国民大会通过的《戡乱条例》办的,国民大会是代表民意的,蒋介石是依法行事,没有错误,更无罪行。(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0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822 页)

同时请读者注意,1989 年版《辞海》第 1699 页就已这样增写“胡适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

(一二三)取消【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简称《戡乱条例》)词条。

1979 年版原词条全文是:中国国民党政府为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于 1947 年 12 月 25 日颁布的反动法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大举反攻时,国民党为维护其即将彻底崩溃的反动政权,以‘戡乱’为名,加紧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凡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革命人民,都被

认为‘危害国家’,受到血腥镇压。”(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352页与1999年版第1634页)

同时请读者注意,1989年版《辞海》第1524页上就已把“反动法规”的“反动”二字取消,亦即已承认是国民党政府的法规。

1999年版《辞海》编者比1989年版更进一步,干脆取消原来1979年版编者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立场上写的这个词条。这是1999年版编者既承认《戡乱条例》是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法规,就彻底取消共产党和人民说它是“反动法规”的权利了。

1999年版编者在取消、否定上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根据客观历史事实正确解释《戡乱条例》这个“反动法规”的词条后,为了给蒋介石进行反共“戡乱”的《戡乱条例》作注解,还特别增添了一个新词条如下:

(一二四)增添【戡乱】词条。

1999年版的全文是:“【戡乱】平定叛乱。《隋书·音乐志下》:‘成功戡乱,顺时经国。’亦作‘龛乱’。”(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352页与1989年版第1524页与1999年版第1634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新增的这个词条,是用来为“胡适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和蒋介石进行“戡乱”作解释用的。1979年版原来没有这个词条。

这样,1999年版编者一是误导读者以为蒋介石的“剿共”是“合法”地执行“胡适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的由“国民大会”通过的《戡乱条例》;二是误导读者把“戡乱”理解为“平定叛乱”;三是误导读者把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视为“乱党”、“乱民”,应给予“勘乱”。(1999年版编者为蒋介石全面翻案,本书将在第十七专题评述)

综观以上17个词条,有13个词条的主要内容被删改,两

个词条被取消，一个【胡适】词条增写新内容，另外增添了【戡乱】一个新词条，这说明 1999 年版编者是站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在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战争”后，又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编者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歪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否定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后的时局的正确分析和所确定的正确方针，否定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正确立场和态度，以及直到新中国建立前采取的各项正确政策。并且还否定新中国的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编者还增写《戡乱条例》是经国民党的“国民大会”通过的；同时，取消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立场上写的正确解释《戡乱条例》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法规”的原词条，换上一个可为国民党的《戡乱条例》辩护的新词条：【戡乱】。这岂不是明目张胆地肯定蒋介石发动内战是属于“戡乱”了吗？编者的立场、观点昭然若揭！

八、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正确决策及其伟大成就的贬低和否定

1999 年版编者用同样的手法,对反映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删改、否定或贬低的。这具体表现为删改和取消下列第一二五至第一三五这 11 个词条,否定、贬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正确决策和伟大成就。

(一二五)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开始。党领导全国人民用三年时间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 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五大运动的胜利。”(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1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06 页)

(一二六)在【毛泽东】这个关键性词条中,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一句响亮的

让所有中国人扬眉吐气精神振奋的话被无情地删除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54页与1999年版第1759页）

请问1999年版编者：你对新中国的诞生是一种什么感情？

1999年版编者对以上两个关键性词条重要内容的删除、否定，为对下列许多词条的进一步删改、进行具体的否定，定下了调子。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已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英明地提出了党的正确方针路线和基本政策。1999年版编者对此就作了删改、否定：

（一二七）删改【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举行。出席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报告指明了全国解放以后国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在报告里，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批评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左”、右倾的观点，并且确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有较高的速度，同时号召全党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报告是夺取全国胜利和准备革命转变的伟大纲领。会议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23页与1999

年版第1713页）

必须指出：1999年版编者删除、否定的是这个《报告》的核心内容：

1. 删除对“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分析和应采取“强化”国家政权的政策。

2. 删除《报告》指出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批评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左’、右倾的观点”。

3. 删除“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攻击”。

这两个“必须警惕”是要求做到两个“务必”的前提，正因为毛泽东英明预见到会产生“骄傲自满”、会遇到“糖衣炮弹”攻击，才有针对性地提出两个“必须警惕”和两个“务必”。取消了这两个“必须警惕”，两个“务必”岂不成了无的放矢的一般套话？

4. 删除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夺取全国胜利和准备革命转变的伟大纲领”。

5. 删除“会议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1999年版编者删除以上5点，这就否定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所体现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精神。使人既看不到和不承认国内外的“矛盾”的存在，又不承认“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和必须“批评‘左’、右倾的观点”，又忽视“必须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岂不是以为革命胜利，就万事大吉了？完全忘记了毛泽东的告诫：“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两个“必须警惕”和两个“务必”的告诫，具有极为准确的预见性，这是在思想政治上注射的“防疫针”，这不仅是建国初期的及时雨，而且直到今天仍然不失为至理名言，永远闪烁着不灭的光芒。

（一二八）取消【土地改革总路线】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业生产，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总路线。1948年，毛泽东把这条总路线概括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1968年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8~1209页）（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514页与1999年版第631页）

这里又反映出1999年版编者"非毛化"的倾向性，"土地改革总路线"明明是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出，1999年版编者却把【土地改革总路线】连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词条一概取消。然而，这条路线毕竟是正确的，也是不能抹杀的，于是，编者还是不得不把"土地改革总路线"写进了【土地改革运动】的词条之中，不过不写是毛泽东所提出的了。相反的例子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明是党中央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经多次讨论后所提出，编者却在改写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词条中写成是毛泽东个人所"首次提出"（因为编者认定这条总路线是错误的，为了把责任推给毛泽东就写成是毛泽东个人提出的，详见下文）这都是1999年版编者为了"非毛化"的需要，违背客观事实而删除和改写的。

（一二九）删改【镇压反革命运动】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改之处：

1. 删除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特务、恶霸及其它反革命分子，仍然不甘心灭亡"。

2. 删除掉"消灭了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的力量"。

3. 把原写的"到1952年取得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大胜利"及其具体表现删除掉，改写为"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基本结束”。编者不愿意正面肯定镇反运动的“重大胜利”，而改为“结束”，这是否对镇压反革命运动表示存疑?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724页与1999年版第2081页）

（一三○）取消【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毛泽东1950年6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由于解放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长期摧残，我国建国初期，财政经济状况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着重指出：解放以后，我国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报告全面规划了创造这三个条件的八项工作。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献。”（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89页与1999年版第108页）

必须指出：1999年版编者取消这个词条，显然是明目张胆否定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新中国在经济恢复时期的正确方针和重大成绩。但是，客观事实却已证明毛泽东这个《报告》不仅是个“纲领性文献”，而且在新中国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中是胜利实现了的。到1952年底，我国新区的土改基本完成，有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物价保持稳定；财政收入增长近2倍；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34.8%；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15.3%；公路通车里程增长57%……这都是同贯彻执行上述《报告》制定的正确方针分不开的。（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84、294、279页）

（一三一）删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的内容是：

1. 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

2. 删除“1953年起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

3. 删除“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

4. 删除“1958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5. 删除“工、农、交通及科学文化事业等都有迅速发展”。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7页与1999年版第1711页）

1999年版编者在删除以上5项具体内容后，写了一句：“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应该不应该进行？取得的成绩，只字不提。这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又一个典型实例。如果不是抽象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要把以上这5项具体内容全部删除、否定？

这是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在建国初期，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路线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否定。

（一三二）取消【增产节约】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即“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方针。增产和节约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高速度地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高速度地增加生产的资金，必须依靠内部积累。因此，在增加生产的同时，必须厉行节约，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以便较快地积累资金，促使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党就在各项工作中贯彻这一方针，克服了当时的财政困难，有力地支持了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本此方针提倡勤

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企业、事业。（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549 页与 1999 年版第 673 页）

增产节约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方针"，也被取消和否定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特别是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能不首先抓生产、抓节约？直到今天党和国家不是还在号召"建立节约型社会"吗？我们党和国家何时否定过这个方针？编者为了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竟丧失了起码的理智。联系社会上的鼓励超前消费和浪费之风，这种否定增产节约观点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不但影响到消费品的不节约使用，更影响到资源、能源的大量浪费。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根据什么要取消和否定"增产节约"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方针"呢？

（一三三）取消【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在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3 月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些重要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针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一些党员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情况，指示要求在党政军内部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犯，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同时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三反''五反'的斗争，是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大较量。"（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285 页与 1999 年版第 347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取消这一个词条，是不承认有进行"三反""五反"的必要性。想否定毛泽东所写的反映了一段重要历史事实和重要经验教训的文献。有些人在事前无视毛泽东

要求必须做到两个“警惕”和两个“务必”，在不少干部被“糖衣炮弹”击中打倒后，还不承认既成事实，不承认“三反”“五反”的必要性，而要取消这个词条。但是，却取消不了历史事实。这只能说明有些人不敢面对目前一些干部腐败的现实，不敢面对一些不法企业家施放“五毒”的现实，不敢面对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预见和有力措施。

我们只要认真读一下这个词条，就可想见当年一部分干部的腐败，正是由于他们没有重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忠告。后来出了问题，才不得不进行“三反”。这个“三反”正是毛泽东狠抓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落实。面对今天的腐败现象，重读毛泽东这篇著作，更加显示其英明的预见性和对今天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说：“三反”是“全党一件大事……人们需要来一次全党大清理”，“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预料到的这种情况，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要把“三反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地发动广大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才能解决问题。”（《毛选》第5卷第53~54页）可是，现在呢，不但不敢“发动广大群众”进行“三反”，而且党内和社会上有一股思潮：对历史上的这次“三反”“五反”斗争运动还要加以否定。有些人就是心里有鬼，才怕运动，即使是有领导有控制的运动也怕。1999年版编者岂不就是代表这股思潮来取消这个词条的吗？

（一三四）取消【“三反”“五反”运动】词条。

1979年版第23页的全文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领导工人阶级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性的一面；又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性的另一面，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发展，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

贪欲越来越强烈，消极性一面也就愈益恶性发展。为了谋取暴利，不法资本家采用腐蚀和贿赂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偷漏国家税收、盗窃国家资财、在国家定货中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活动。资产阶级的这种不法行为，对抗美援朝、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1951 年底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大量违法的严重事实。1952 年初，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党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它市民，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查出了一批“五毒”俱全的不法资本家。在运动中，政府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对违法的资本主义工商户的处理规定了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基本原则。在认真查证核对，弄清真伪轻重的原则下，分别作出处理。“三反”“五反”运动于 1952 年夏先后胜利结束。这一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党在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反”“五反”运动是作了肯定的（见《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 798 页）

（一三五）重写的【“三反”“五反”运动】词条。

1999 年版第 27 页重写的全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开展的政治运动。“三反” 运动是 1951 年 12 月起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五反”运动是 1952 年 1 月起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到 1952 年 10 月“三反”“五反”运

动结束。

在这个重写的词条中，只剩下几个空洞的抽象名词。把这场运动的具体内容、阶级性质、革命意义、取得的成就和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等等都取消抹杀掉了。实际上取消了原来反映了真实历史的【“三反”“五反”运动】这个词条。基本上否定了“三反”“五反”运动。现在，这个否定的严重后果大家已感受到了。

在此必须指出：为什么在我国几乎人人都夸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党风、社会风气良好呢？显然，这是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英明预见与教导，和“三反”、“五反”的运动教育分不开的。尽管任何运动像任何事物一样，都不会十全十美，而会有缺点和偏差。但是“三反”“五反”运动教育和挽救了一代干部，树立了50年代的良好党风和社会风气，功不可没。邓小平说：“现在是什么形势？我们自从实行改革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已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了。（《邓选》第2卷第402页）后来，邓小平又说要“下决心抓……要奋斗至少十年，才能恢复到50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邓选》第3卷第153页）可是，1999年版编者却至今还要否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取消两个“务必”，否定“三反”“五反”运动对全党全民的教育作用。那就否定了正气，否定了是非，那就为一切腐败、倒行逆施开了绿灯。看看今天的“腐败”、“说假话” 已成了我们党和国家生存的两大威胁的这个严峻事实，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问题还在于有人否定过去搞过的一切思想政治运动，反对再搞任何思想政治运动。还有人在造否定“三反”运动的舆论。有人写文章说：“‘三反’是建国后在机关内部搞的第一个政治运动……人民大学校医院院长×××被打成了‘老虎’……送进

了监狱……经长期调查，找不出任何贪污行为，只好又给放了。”我们认为这样个别的事例是有的,但是该文作者由此就得出结论说:“搞运动后患无穷”，“一个最大的恶果就是破坏了同志间的信任关系”。(《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第 52 页)这样以偏概全就大错特错了。应该看到误伤的人是少数,而且是可以纠正的,受到挽救和教育的是绝大多数。难道出了一点偏差就应该因噎废食?还有一种为腐败辩解的舆论在流行,说什么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是免不了的,把经济搞上去的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腐败阶段。照此说来,难道反腐败是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影响到把经济搞上去了?这种舆论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制止。可是,如果因腐败使党和国家都亡了,或变了质,这个经济又是为谁搞上去了呢?

邓小平讲到了改革开放后 “干部队伍被腐蚀已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了,邓小平没有讲现在的一些“企业家”、“老板”们在用金钱、美女拉拢勾结腐蚀干部方面是否也不能与“那个时候相比”。“那个时候”私营企业老板腐蚀干部的情况也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在“那个时候”，“揭露出不法资本家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种种罪行,他们利用金钱、美女腐蚀、收买、拉拢国家干部,像上海大资本家王康年,先后向 25 个机关的 65 名干部行贿一万多元;武汉、上海、北京、天津、济南、沈阳等地的奸商趁抗美援朝需要大批军需用品之机,用腐烂的棉花做成含有大量化脓菌、破伤风菌的‘急救包’,用坏牛肉做成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成饼干,用坏鸡蛋做成蛋粉,高价卖给志愿军,牟取暴利,造成一些战士致残、致病,甚至断送了生命;私营工商业户不仅普遍偷税漏税,而且在承建国家工程、完成加工定货任务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在治淮工程中,承包商竟置工程质量于不顾,用旧料充新料,次料充好料,赚取不义之财。更有甚者,上

海、广州、重庆等地的不法资本家还成立了各种秘密组织，重庆私营钢铁业奸商组织的‘星期四聚餐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收买国营企业人员，垄断政府加工定货，有组织地盗窃国家资财，这一非法组织的成员，发展到四五十个工厂企业，建立了 9 个专业性非法组织；他们还采取‘拉过去’、‘派进来’的办法窃取国家经济情报，有些资本家甚至在某些经济部门建立了有一二百人的坐探网。”（见《新中国国史教育干部读本》上册第 36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写，长春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在“那个时候”，不法资本家们施放“五毒”的行为，曾经构成对党和国家的严重威胁，是被“五反”运动打退、解决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有没有不法的“老板”（包括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他们会不会再施放“五毒”，构成对党和国家的威胁呢？这也是回避不了的问题。应作调查研究，应有对策。仅靠公检法行吗？他们也会收买、腐蚀公检法干部。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弃置不用？

综观对以上 10 个词条的取消和删改，1999 年版编者不仅是对毛泽东个人贡献和毛泽东思想的否定，也是对党和国家建国初期正确思想路线和诸多工作方针、政策、成就的否定。特别应该指出：新中国最初 3 年，是百废待举，又遇到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美帝还操纵联合国对我实行全面“禁运”、“封锁”。我们取得了镇反运动的胜利，“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和抗美援朝的胜利（这将在下面第九专题评述）。同时，大力恢复经济文化建设。50 年代我们还培育和树立了最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我们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在建国初期使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取得这么大的成绩，这些都是震惊世界的客观历史事实！1999 年版编者们却视而不见。

九、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和这场战争胜利的贬低与否定

1999 年版编者用同样的手法，通过取消或删改如下第一三六至第一五八这 23 个词条的办法，来贬低和否定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以及这场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和伟大胜利。

（一三六）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掉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三年时间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五大运动的胜利”。

（一三七）在【毛泽东】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胜利完成抗美援朝运动”。（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5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59 页）

（一三八）在【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反帝”这个内容。（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5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61 页）

以上三个词条定了否定抗美援朝的调子，下列许多词条就在这个调子下被删改。

（一三九）删改【三八线】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1945年8月，美、苏两国首脑商定以朝鲜国土上北纬38度线作为美、苏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临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这条线通称“三八线”。1950年6月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发动侵朝战争，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中、朝边境进犯，朝、中人民并肩战斗，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在“三八线”附近沿临时军事分界线两侧各二公里建立了非军事区。（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7页与1999年版第20页）

必须指出：1999年版编者把“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发动侵朝战争”的这句话删除，这就否定了原来对所谓“联合国军”和战争“侵略”性质的认定，因为否认它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那就等于承认它是“联合国军”；同时否认一方进行的是“侵朝”战争，也就等于同时否定了另一方进行的抗美援朝是“反侵略”战争。

（一四〇）删改【抗美援朝运动】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着，又把第七舰队派往中国台湾。9月15日，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并不顾中国人民一再警告，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轰炸中国安东（今丹东）等地。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开赴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11月4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在全国范围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并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于是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掀起。全国人民广泛开展支援志愿军的活动，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成千上万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到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在国内，人民纷纷推行爱国公

约，捐献飞机大炮，慰问志愿军和志愿军家属，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支援前线战斗。在朝中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1953 年 7 月 27 日，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中人民军队取得抗美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也胜利结束。（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676 页与 1999 年版第 819 页）

（一四一）改写为【抗美援朝战争】词条。

在 1999 年版第 819 页上，编者把上述【抗美援朝运动】的一般性的内容合并到【抗美援朝战争】词条中。

但必须指出：原词条加了横线的那部分是写明战争的起因、性质和胜负的文字，已被 1999 年版编者删除了。这就把抗美援朝是怎样产生的，朝中方面的“一再警告”和正义立场都抹杀掉了，把正义一方的“胜利”也抹杀掉了。

（一四二）改写【抗美援朝五次战役】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在第 819 页上把这一词条分开来写成 5 个词条，再加夏季反击战役，夏秋季防御战役共写了 7 个词条。这比 1979 年版写得更充分了，这是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些光荣业绩，确实应该充分写出来永载史册。

可是，关于抗美援朝有两点是不能模糊的：

1. “这场战争完全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战争”，是我们进行的“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1999 年版编者对这点删掉后没有再写；相反，有为对方开脱“进攻”和“侵略”之嫌，这就是编者把“1950 年 6 月 25 日，美帝国主义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改写为“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编者还把“五次战役”中原写的“为反击美国侵略军及其帮凶军而连续进行五次战役”这句话中的“美国侵略军”这个词也删除掉了，改写为“反击联合国军”。这样一改“进攻”和“反击侵略”这两个词都没有了。

2. 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点也是不能模糊的。本来对方是要武力占领和统一北朝鲜，目的没有达到，显然是个失败；我方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既达到了"抗美援朝"的目的，又达到了"保家卫国"的目的，且把美帝侵略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怎么不是伟大胜利呢？（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77页与1999年版第819页）

以上这两点，在所有的有关抗美援朝词条中都没有写明，这是错误的。

（一四三）删改【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词条。

在1979年版全文是：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争取祖国统一和独立的战争，1950年6月25日，战争正式爆发。27日，美国正式参战并以武力霸占中国领土台湾。7月7日，美国盗用联合国旗帜，组织由美国军官指挥的所谓联合国军。朝鲜人民军奋起反击，至8月中旬，把美伪军驱至釜山一隅。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悍然北犯，并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拯救和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朝中部队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于1951年7月接受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美国先后发动多次攻势，并进行细菌战，均被朝中人民彻底粉碎。1953年5月，朝中人民军队发动强大夏季攻势，取得胜利，迫使美国于同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保障了朝中两国的安全和和平建设，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帝斗争。

（一四四）改写的【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词条。

1999年版将上述词条的名称改写为【朝鲜战争】。其全文是：亦称"朝鲜祖国解放战争"。初为朝鲜半岛南北方间的战争，后因美国武装干涉，扩大为国际间的局部战争。1950年6月25

日，战争爆发。27日，美国派兵介入并武力封锁台湾海峡。7月7日，美国借联合国名义，组织“联合国军”正式参战。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攻势迅猛，至9月初，把美军和南朝鲜军驱至釜山一隅。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逆转。10月1日起，美军、南朝鲜军悍然北犯，并轰炸中国东北，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赴朝参战。中、朝军队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于1951年7月接受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美国先后发动多次攻势，并进行细菌战，均被粉碎。1953年5月，中、朝军队发动夏季攻势，取得胜利，迫使美国于同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994页与1999年版第2399页的【朝鲜战争】词条）

必须指出：1999年版编者既删除掉原词条写的“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又把“朝鲜人民军奋起反击”改写为“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攻势迅猛……把美军和南朝鲜军驱至釜山一隅”。这岂非暗示这场战争是由“北方”所发动？同时，也把“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删掉了。

在此，必须特别指出：联系1999年版编者在上文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词条时，也是删除和否定“中国共产党严格地履行停战协定”和“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同时在【中国共产党】词条中删除“蒋介石撕毁协定”。这岂不是污蔑共产党没“履行停战协定”，为蒋介石推卸发动内战的责任？现在编者改写【朝鲜战争】词条时，又是这样把北朝鲜在“战争初期奋起反击”改写为北朝鲜在“战争初期攻势迅猛”，这是为美、李推卸发动战争的责任。事实上，蒋介石急于“统一”中国而发动内战；而李承晚急于要用“武力”“统一”北朝鲜而发动战争，确有相似之处。编者的写法倾向性明显。

1999年版编者这样改写是袒护战争发动者，为别有用心颠倒是非歪曲战争性质的人提供“把柄”。比如有个化名青石的人，就写文章胡说：“南朝鲜没有发动进攻”，是北朝鲜“先发制人……大举越过‘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了”。（见《百年潮》1997年第1期）还有人胡说美国不是“侵略者”，而是“在南朝鲜军队被击溃后向南方紧急驰援”的。还有人胡说魏巍同志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把“侵略者和反侵略者搅浑”了。（见《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一四五）删改【上甘岭战役】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的内容：

1.“粉碎美国侵略军”。

2.“敌人用爆破、燃烧、烟熏等毒辣手段，企图破坏坑道”。

3.“打破了敌人封锁和破坏坑道的企图”。

4.“志愿军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打垮了敌人数百次冲击”。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72页与1999年版第206页）

1999年版编者删掉的是敌军的“毒辣手段”和我军的“英勇顽强”，这正是“上甘岭战役”的基本特点，怎能违背历史事实而加以否定？

（一四六）删改【朝鲜停战协定】词条。

1999年版被删除的内容：

1.删除“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发动的侵略战争失败后……”。

2.删除“停战协定的签订是朝中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994页与1999年版第2399页）

这又是否定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和我方的胜利。

（一四七）删改【彭德怀】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掉原词条所写的彭德怀“曾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并肩战斗，直至胜利，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仅仅保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句话。天下后世的人们查到这个词条时，真不知道这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志愿”是什么呢。（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817页与1999年版第984页）

必须指出：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并非师出无名，而是为了履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荣义务，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这是彭德怀一生之中的特大功勋。理应永载史册，怎能无只字表达？

（一四八）删改【中国人民志愿军】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中国人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志愿组织的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组成，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25日，开赴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三年苦战，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以无比英勇顽强和惊人的刻苦精神，打退了美国侵略军及其帮凶军，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在三年战争中，中朝人民军队共同歼灭敌人一百零九万，击落击伤敌机一万二千多架，击毁和缴获坦克三千多辆，击沉击伤舰艇二百五十七艘。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朝鲜人民的战后恢复和建设工作，并同朝鲜人民军一道维护了朝鲜停战协定。在完成了祖国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后，于1958年10月全部撤离朝鲜。参见“朝鲜祖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8页与1999年版第1711页）

1999年版编者删除、否定志愿军是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

件下”，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也只字不写“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直至胜利，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只写到“停战”为止，不提胜利。这没有做到完整地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四九）删改【抗美援朝纪念章】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1952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给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人员的纪念章。发给：（1）在朝鲜境内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切人员。（2）在朝鲜境内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的中国医务、铁道、运输、翻译和参加停战谈判的工作人员；民兵、民工及其干部；记者、作家、摄影和摄制电影的人员。（3）因组织调动，或因伤、病、残废，或因服务期满而回国的上述人员。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77页与1999年版第819页）

在此，必须着重指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灵魂和核心内容就在于：“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当时这个重大决策的正确性也正在于此，颁发纪念章的宗旨和意义也正在于此，删除和否定它，岂不等于在实际上否定了抗美援朝吗？

（一五〇）增添【李奇微】词条。

1979年版《辞海》未列为一个词条，1999年版第1531页增列为一个词条，全文是：美国陆军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空降兵师长、军长，参加过意大利境内的战争和诺曼底登陆战，并在荷兰和比利时作战。1945年8月，任驻菲律宾美军司令。朝鲜战争期间，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晋升上将。后历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总司令、美国陆军参谋长。著有回忆录《士兵》等。

1999年版编者在增写的这个词条中，只称作“朝鲜战争”四个字，这就模糊了美、李战争的侵略性质。并写李奇微在“朝鲜战争期间，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晋升

上将。”写他在“朝鲜战争期间……晋升上将”，岂不是表明他在朝鲜战争中立了“功”吗？可是，彭德怀是被金日成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编者为什么只写李奇微的“功”而对彭德怀的“功”却只字没写？

（一五一）取消【绞杀战】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4年3月，美国军队在意大利战场上为了瘫痪敌方交通运输，集中强大的空军力量反复轰炸对方交通线上的咽喉地区，并把这种战法叫作“绞杀战”。1951年7月至1952年6月，美国侵略军队又对朝鲜北部交通枢纽和铁路咽喉地区采用过。曾每日以平均约百架次的飞机轰炸新安州、西浦、价川间三角地区公路、铁路。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进行了英勇的反“绞杀战”斗争，顽强地进行抢修抢运，彻底粉碎了“绞杀战”。（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175页与1999年版第1420页）

我们只要读一读这个词条，就能体会到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的残酷性，侵略者正是靠了他们的钢铁多，就不分昼夜地对被侵略国军民实行残酷的狂轰滥炸，而且还使用细菌武器。李奇微为了挽救在朝鲜战场上的败局，使用了“绞杀战”和“细菌战”这两个杀手锏，他也因此被“晋升上将”。1999年编者只写他的“功”（晋升上将），却取消他搞“绞杀战”之罪，同时还删除、否定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为保家卫国所作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和牺牲精神。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编写词条？

（一五二）删改【李承晚】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南朝鲜“总统”。出身两班家庭。战前长期流亡美国。1945年，随美军返回南朝鲜。1948年，在美国支持下，成立“大韩民国”，任“总统”。1950年，派军侵入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仍不断鼓吹武力“统一”北方。1960年,爆发“四·一九”人民起义。1961年,发生军事政变,逃亡夏威夷。(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67页与1999年版第1532页)

以上被删除掉的李承晚的好战言行,都是客观存在的铁的历史事实。是不应该加以删除、否定的。

(一五三)删改【黄继光】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四川中江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10月20日,在朝鲜江原道金化郡上甘岭战役中,他所在的营奉命夺取某高地,当连续攻下敌人数处阵地后,被敌人一个集团火力点所阻,他挺身而出,要求负担爆破任务,勇敢地冲向敌人地堡。当他掷完手雷,打垮几个火力点后,发现还有一个火力点在顽抗,严重影响战斗,就忍着重伤剧痛,跌倒了爬起来,毅然直扑上去,以胸膛堵住敌人正在扫射的机枪射孔,保证部队完成攻克高地的任务,全歼敌人两个营,自己壮烈牺牲。根据他生前的申请,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056页与1999年版第2473页)

1999年版编者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把烈士的英雄事迹删除、否定了,还否定他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光荣,把“荣获”中的“荣”字删掉。

(一五四)取消【许家朋】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安徽绩溪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6日,在朝鲜涟川西北石岘洞反击战中,

攻击部队被敌暗堡所阻，他两腿重伤，仍继续爬至敌暗堡，因炸药包受潮爆破未成，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机枪射孔，壮烈牺牲。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382页与1999年版第470页）

取消这个词条，对许家朋连抽象肯定也没有了。可是，2006年《人民日报》在《永远的丰碑》中还是详细介绍了许家朋烈士的光辉事迹，予以表彰。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共中央的党报纠正编者的错误。

（一五五）删改【罗盛教】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湖南新化人。1950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1月2日，在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冒着摄氏零下20度严寒，三次跳入冰窟，救出滑冰落水的朝鲜少年崔莹，自己光荣牺牲。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模范”称号。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追认他为“模范青年团员”。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682页与1999年版第2033页）

众所周知，罗盛教是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榜样，可是编者把他的“光荣牺牲”这四个字中的“光荣”两字删除，并把他“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中的“荣”字删除。

（一五六）删改【邱少云】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四川铜梁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10月11日，在朝鲜反击敌占金化以西三九一高地的战斗中，他和全排战友奉命于夜间潜伏在距敌六十余米处的山脚，待次日傍晚配合大部队

发动进攻，以便突然袭击敌人。12日中午，他被敌燃烧弹所引起的烈火烧身，为了不暴露部队埋伏地点，忍受着剧痛，坚持不动，直至壮烈牺牲，保证了整个战斗的胜利。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445页与1999年版第548页）

"以便突然袭击敌人"、忍受"剧痛"，"壮烈"，"保证了整个战斗的胜利。"这都是邱少云烈士最可贵的精神和贡献，却被1999年版编者删除、否定掉了，荣获的"荣"字也被删除、否定。

（一五七）删改【杨根思】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江苏泰兴人。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历次作战英勇顽强，曾荣获战斗模范、爆破大王、华东三级和一级人民英雄称号。1950年9月，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9日，在朝鲜咸镜南道长津郡下碣隅里围歼敌人的战斗中，他带领一个排坚守小高岭阵地，打退了敌人数次反扑。当战斗到只剩他一人时，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猛拉雷管，炸死大量敌人，自己壮烈牺牲。完成了切断敌军退路的任务。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他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他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61页与1999年版第1523页）

1999年版编者把以上几位烈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主要表现、革命精神和功绩贬低或抹杀掉了，并把他们在抗美援朝中"荣获"英雄称号的"荣"字删除掉了。表明无光荣可言。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在【杨根思】词条中，杨根

思因国内的战功获奖时，编者仍写他曾“荣获”战斗模范称号，但在写他因抗美援朝中的战功“获奖”时，就把“荣”字删除掉了。这表明编者认为杨根思在国内获奖是光荣的，抗美援朝获奖不光荣。

（一五八）删改【杨朔】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山东蓬莱人。1937年，参加革命，并开始文学创作。1939年，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到华北抗日革命根据地；1941年底，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后深入矿山、部队进行创作活动。1950年10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前线，创作了反映抗美援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1956年起，从事外事工作，曾出席当年的亚洲作家会议和1958年的亚非作家会议，曾任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著有散文集《海市》、《东风第一枝》，长篇小说《洗兵马》的上卷《风雨》等。现有《杨朔散文选》问世。他的散文革命激情充沛，结构严谨，文字含蓄、洗练，富有诗意。（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59页与1999年版第1520页）

1999年版编者所作的上述删除，不仅是对作家杨朔的贬低和否定，也是否定抗美援朝，抹杀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深入抗美援朝前线的伟大精神和作出的突出贡献。

综观1999年版编者对以上23个有关“抗美援朝”的词条的删改或取消，反映了编者是贬低和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英明决策以及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和伟大胜利。编者是贬低和否定具有高度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震撼世界的功绩。这也是编者对志愿军无数先烈的亵渎。

实际上，毛泽东当年作出抗美援朝这个英明决策的正确性

是毋庸置疑的。这场战争的性质和胜负是非常明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贡献，是谁也抹杀不了的。这已经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我们必须批驳1999年版编者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和胜负的歪曲，纠正其对有关词条的错误删改。

第一，1999年版编者帮助美国掩盖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侵略性不仅是公认的，而且是美、李方自己也承认的。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客观事实和形势便是美国要利用朝鲜和台湾作为远东的反共基地，侵略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侵略者自己都公开承认，并不讳言的。早在194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认为“现在朝鲜是美国范围的一部分，应该在军事占领上利用它来反对苏联”，“朝鲜有可能成为亚洲东部海岸上的一个控制基地和进攻中国大陆的一个跳板”。（转引自《朝鲜战争实录》上卷第25、2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出版）

1949年“韩美同盟”条约草案第7条就写到“双方承认并成立谅解：如果解放战争（按：指“解放”劳动党领导的北朝鲜）一定要在满洲领土上进行，以答复中国共产党对朝鲜的侵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阁下，将帮助大韩总统阁下把解放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转引自1950年12月16日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

1949年10月7日，李承晚向美联社扬言：“占领北韩，可以实现统一”；10月21日，又说：“要不流血，统一独立是不可能的，即使实现也不能维持长久”；10月31日，又在美国巡洋舰上发表演说：“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12月30日，李承晚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说，在新的一年中“必须统一南韩和北韩。”（转引自《朝鲜战争实录》上卷第27页）

1950年1月1日，麦克阿瑟发表对台湾问题的“意见”说：“台湾如果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将破坏整个西太平洋的防共

锁链”，“台湾地位重要，必须由非共产主义的势力控制。”（见《台港澳百科大辞典》第166页【对台湾问题的五点意见】这条词目）

美军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不但有言，而且有行，请看：

“1950年1月，为了便于指挥，美国将其驻远东地区陆军（第八集团军辖第7、第24、第25师和骑兵第1师等部队）、空军（辖第5、第13、第20航空队等）和海军第七舰队统一组成美军远东司令部。同时，与李承晚集团签订了《韩美联防互助协定》统一由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第3页，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样，美李为了“防共”、“反共”就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已正式通过签订《协定》把他们自己捆到一起，合二为一了。显然，从此以后，李承晚的战争行动就是美国的战争行动，美国的战争行动亦是李承晚的战争行动，因为是由同一个司令部统一指挥的。

当年美国海军部长马休斯说：“我们甘愿偿付任何代价，甚至发动战争”，“我们会因此被称为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我们也心安理得地接受”。（转引自《人民日报》社论，1950年11月6日）

当年美国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写信给李承晚说：“北伐的时间已经确定——虽然战争由我们来发动，但应找出一个借口作为正当的口实。”（转引自《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杜辛将军的文章）

“1950年6月17日，美国的杜勒斯以杜鲁门总统顾问的身份到南朝鲜，由美国军事顾问和李承晚集团军事头目陪同视察‘三八线’一带，并在‘三八线’的战壕里最后审查批准了关于‘北伐’的作战计划。”（转引自《朝鲜战争实录》上卷第27、28页）

基于上述情况，李承晚集团不断向北方武装挑衅，“据不完全统计，仅 1949 年即进行武装袭击 1836 次。”（《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第 3 页）并于 1950 年 6 月 25 日在三八线全线向北方大举进攻，从而爆发了朝鲜战争。

就在爆发战争的第二天，且不谈朝鲜北方的报道，连西方媒体也是这样报道的：

《纽约先驱论坛报》（合众社汉城 6 月 26 日电）：“精选的南朝鲜部队越过作为边界的‘三八线’，占领了正好位于该线以北的工业城市海州。韩国军队缴获了大批装备，包括十辆卡车和大约 100 挺机枪。”

《芝加哥论坛报》（美联社汉城 6 月 26 日电）：“在‘三八线’以北 5 英里处的一座城市被南朝鲜军队占领。”

李承晚这位南朝鲜总统一直到签订“朝鲜停战协议”时，还狂妄提出他愿“脱离‘联合国军’，单独北进，用‘武力’统一北朝鲜”的要求，这个“要求”曾迫使参加停战谈判的美方代表哈利逊不得不正式向朝中方面表示，美国保证遵守停战协议，并保证“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不予支持”。（转引自《第一次较量》第 324、325 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 1 月出版）这又证明连美方谈判代表也不讳言李承晚欲“侵略”北方之心不死。

以上这些美、李方面自己坦然承认的“侵略性质”，难道说服力还嫌不够吗？在这样的事实面前，1999 年版编者竟然还要为之掩盖“侵略性质”。真荒唐！

第二，1999 年版编者抹杀抗美援朝战争的反侵略性质是错误的。编者在【彭德怀】这个词条中，竟然删除彭德怀“曾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并肩作战，直至胜利，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等词条中，也没有写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履行

"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义务";在【抗美援朝纪念章】这个词条中更是删除了原来写的颁发纪念章的宗旨在于"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否定"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这是否定"抗美援朝"的核心内容和灵魂,这是否定"抗美援朝"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性质,这是对彭德怀和全体志愿军以及支援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的污蔑和否定。这不仅使参加过抗美援朝还健在的人们感到愤慨,如果彭德怀和所有在朝鲜战场牺牲的烈士们地下有知,更会提出强烈抗议。其实,彭德怀在拥护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时就已表示过了,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四句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出兵有利还是不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见张树德文《彭德怀统率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前前后后》,载《新华文摘》2005 年第 22 期第 97~98 页)同时,1999 年版编者还否定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艰苦性,还否定为抗美援朝而献身的英雄模范烈士的牺牲是"光荣"的。我志愿军是为反侵略的爱国战争而牺牲,怎么不光荣呢?

第三,1999 年版编者否定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编者改写的是"1953 年 7 月 23 日,战争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随之结束。"这是表示这次战争未分胜负,到"停战协定签字"而"结束"了。可是,正如当年参加这场战争的迟浩田和张万年两位高级将领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文章中所写:"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是新中国的无上光荣和骄傲,是中华民族的无上光荣和骄傲!"(《求是》2000 年第 21 期)这场战争是侵略者强加于我们的,

我们不得不起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的。实践已证明当年毛泽东关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决策是英明和正确的。这已是载入史册的铁的事实。

全世界的正义人士都认为中国的抗美援朝是取得了伟大胜利,并且他们都为之感到精神振奋、欢欣鼓舞。在停战协定签订时,“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领袖、人民团体、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纷纷发来贺电。表达了一个声音:‘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是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和争取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朝中两国人民团结一致反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是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伟大胜利’。”(《朝鲜战争实录》下卷第 734 页)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方的胜利和美方的失败,对此,“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则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朝鲜战争》第 202 页,中译本军事科学院 1993 年出版)甚至连侵朝美军最后一任“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也是承认失败的,他说:“我们的失败在于敌人仍然没有被击败，并且甚至比以前更为强大及更具有威胁性。”并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字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克拉克著《从多瑙河到鸭绿江》第 1 章,转引自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 1 月出版的《第一次较量》第 217 页和《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第 359 页)美国的通讯社一致报道说:“这是美军历史上的最丢脸的失败,最黑暗的岁月”。美国的评论家和媒体,如《每月镜报》也评论说:“美国在朝鲜受到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失败。”《纽约先驱论坛报》说: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转引自

《第一次较量》第 74 页）美国前总统胡佛也承认："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击败了"。（转引自《中流》杂志 2000 年第 10 期第 26 页）这岂不是侵略者自己也承认"失败"和"不光荣"吗?

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不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进步人类都承认我们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光荣，连侵略者也承认自己的侵略战争的"失败"和"不光荣"，而 1999 年版编者却要抹杀和不承认我方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和光荣。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十、评1999年版《辞海》对1949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否定

1999年版编者全盘否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毛泽东思想，用同样手法取消和删改下列第一五九至第一七九这21个词条，来否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及其成就。

（一五九）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的主要内容是：

1. 删除“1952年底，党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同年9月，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团结全党，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1957年，党发动和领导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1958年，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现了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1960~1962年，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三年经济困难，反击了国际上的反华反共逆流。1963~1965年党在实

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4年的第三届和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我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2. 删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3. 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开始。”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3页与1999年版第1706页）

（一六〇）在【毛泽东】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民主革命要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以后，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54页与1999年版第1759页）

（一六一）在【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地制订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55页与1999年版第1761页）

1999年版编者在以上三个关键性的词条中，把有关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和内容删除、否定，表明编者是不同意1949年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无产阶级革命在取得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之前，确实是个“不间断革命”。（见《马恩全集》第7卷第104页）对此中文也有译为“不停顿地革命”。后来毛泽东又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

续革命”，这都是一个意思。由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还没有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当然不能把革命“停顿”下来，更不能放弃甚至背叛。孙中山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何况无产阶级革命者呢？当然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可是，编者和有些人的观点就是要让革命“停顿”下来，结束革命。亦即是某些先生的所谓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主张不要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并帮助它发展，补“资本主义课”。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社会已存在两大因素，即：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和没收来的官僚资本大企业均属社会主义因素；民族资本家的工商业属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已是主体兼主导，到底应该主要地发展社会主义因素改造资本主义因素，还是反过来发展和改造呢？两种因素都存在，你主要建设哪一种？这道理很简单，事实明摆着。但是，编者不要社会主义革命，要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请看对如下一系列词条的删改。

（一六二）删改【新民主主义论】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写于1940年1月。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历史情况的根本变化，以及中国革命二十年中的新经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区别了中国革命的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两个不同历史范畴，全面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毛泽东以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观点，解决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粉碎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它不再属于旧

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并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特点和发展的历史。(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88 页与 1999 年版第 1803 页)

1999 年版编者在上述词条中删除的是核心内涵。

1. 删除"区别了中国革命的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两个不同历史范畴"。

2. 删除"毛泽东以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观点，解决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粉碎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

3. 删除"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看了 1999 年版编者如上所删内容,再联系编者已把【旧民主主义】、【旧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等词条一概加以取消来看，显然，编者不同意把"民主主义"作"新"、"旧"之区分;更不同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观点。

(一六三)删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规定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根据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确定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充当领导者,才能取得民主革命

的彻底胜利，并由民主革命胜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9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805 页）

在这里，特别应该加以注意的一点是：1999 年版编者在“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由民主革命胜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句话的中间，删掉一个“并”字，另外，增写“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又是突出表明编者的观点是不同意“民主革命胜利”后“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编者只同意“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革命，未说什么时候才可以向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前途”转变，显然不同意“不停顿地转变”。这是 1999 年版编者又一次在有关词条中表明不同意或反对在 1949 年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和马列主义的理论常识均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确是以“夺取政权”为革命的“结束”；而我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也以“夺取政权”为革命的“结束”，那岂不是自己否定了这个“新”字而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了吗？试问；无产阶级政党夺取了政权还不开始搞社会主义革命更待何时？如果说要等生产力高度发达了再“转变”，那末，美国的生产力已够发达了，它却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前途”上去。这又怎么解释？

（一六四）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这个词条中，1999 年版编者也是把“全国解放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删除。（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2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13 页）

这是 1999 年版编者又一次在有关词条中表明不同意新中国建立后，立即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而把这句话删除掉了。

（一六五）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叫“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这个词条中，也是把“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删除。（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882页与1999年版第1714页）

这是1999年版编者又一次在有关词条中表明不同意新中国建立即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一六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词条中，编者也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删除；同时还删除“1953年起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1958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工、农、交通及科学文化事业等都有迅速发展”。（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7页与1999年版第1711页）

这是1999年版编者又一次在有关词条中表明不同意新中国成立即“标志着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持否定态度。

（一六七）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个词条中，1999年版编者也是把“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句完整的话中的上半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这个史实删除。试问：假如没有这个史实，知识分子队伍怎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呢？（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734页与1999年版第2095页）

这是1999年版编者又一次在有关词条中表明不同意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1999年版编者在以上接连9个词条中，把凡是指出新中国的建立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标志”的话或意思都一律删除、否定掉。这绝不是偶然和孤立的，这是同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思潮相呼应的。这股思潮名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巩固私有制的秩序搞资本主义(后来又名为“补资本主义课”),总之是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1999年版《辞海》的删改词条便充分反映了这股思潮。在1999年版《辞海》出版后,这股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潮在进一步扩大。这不能不引起我国所有热爱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严重关注。

再看以下9个词条的删改,实质上都是在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一六八)删改【过渡时期总路线】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中国共产党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过渡时期中的总路线。党中央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于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终结时期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9页)”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把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的唯一经济基础。为实现这条总路线,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了巨大努力和复杂斗争。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又提前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可对比《辞

海》1979年版第1040页与1999年版第1256页)

1999年版编者删改的用心就是否定这条总路线、否定社会主义革命:

1. 删除"党中央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改写为"毛泽东在1952年下半年首次提出,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同年8月正式写入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的结论中。毛泽东最后确定的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表述是:(见《毛选》第5卷第89页)"

这是编者示意这条总路线不是"党中央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提出的,而是毛泽东"个人"提出的。这是为否定这条总路线作了铺垫。

2. 删除"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为实现这条总路线,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了巨大努力和复杂斗争。"

这是把这条总路线的核心内涵、实质是改变所有制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伴有复杂斗争的历史事实都删除,这是编者对这条总路线的否定。

3. 删除"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编者对实行"这条总路线"后所取得的成绩的否定。

4. 编者认为对以上的否定还嫌不够,同时增写:"在实现这条总路线的过程中,存在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改变过快等缺点和偏差。"这是装出似乎没有否定这条总路线,而只嫌它"改变所有制过急、过快",但是,换言之就是在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时候,过早地搞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应该搞的。

对1949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否

定，还表现为编者否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成就和意义。

（一六九）删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中国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之一。旨在消灭资本家所有制和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没收官僚资本、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根据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重作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国家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这一改造分两个步骤：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先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再进而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改造过程中，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不断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和改造，是实现企业改造的重要条件。这是一场限制和反限制、改造和反改造的严重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到1956年初，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项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偏差。1956年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1966年9月，国家停止支付资本家的定息，公私合营企业已完全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38页与1999年版第1741页）

1999年版编者的这种删改是在明显地否定社会主义革命：

1. 把“这是一场限制和反限制、改造和反改造的严重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删除。这就否定了这场改造的“阶级斗争”性质，否定了这场改造的两条“道

路的斗争”性质,否定了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歪曲了历史事实,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单纯的方法和技术问题。

2. 只讲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缺点,不讲成绩。1999 年版编者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修改这个词条的,可是,却又违背《决议》的基本精神。因为《决议》首先肯定:“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然后才指出:“在这次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偏差。1956 年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然而,1999 年版编者对《决议》“整个来说……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评价只字不提,只写《决议》指出的“缺点和偏差”。这就不符合《决议》的主要精神和历史事实。显然,这样的修改,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性质、伟大成就和意义的否定。

对于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99 年版编者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词条中写道“在实现这条总路线的过程中,存在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改变过快等缺点和偏差”。也是如上一个腔调。实际上是根本不承认什么“社会主义改造”,这可从编者对下述词条的取消和删改中进一步得到证实:

(一七〇)取消【合作工厂】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u>中国各级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经营的工厂。合作工厂是联合社领导下的独立核算单位。有的合作工厂由联合社直接拨资兴办，有的由基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转变而成,是手工业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一种形式,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工厂后，生产资料由社员小集体所有变为联</u>

合社大集体所有。资金由联合社统一调度，股金退还社员，劳动分红取消。工厂利润除向国家缴纳所得税外，归联合社统一处理，由联合社统负盈亏。（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318 页与 1999 年版第 390 页）

这明明是取消掉了“手工业合作社”，哪里是什么“要求过急、过快”？

（一七一）删改【合作商店】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中国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形式，个体商贩在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领导下，根据自愿原则组成。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它实行资金入股，统一经营，独立核算，共负盈亏。其盈余主要按公积金、公益金、奖励等进行分配。（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319 页与 1999 年版第 390 页）

这也是取消、否定它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形式”，哪里是什么“要求过急、过快”？

（一七二）删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8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当时规定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8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16 页）

1999 年版编者删除最后这段话，就把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和

目的都否定了。

（一七三）删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亦称“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由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加以支配和使用的一种公有制形式。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社会主义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与集体所有制比较,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其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可直接由国家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作有计划的统一分配。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

（一七四）重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词条。

1999年版全文是: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般采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形式。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在明确所有者权能的前提下确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国家作为总体最终所有者,侧重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优化国有资产的配置,从而使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580页与1999年版第1916页）

这样重写词条是割断历史,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辞海》收录词条的原则的:

1. 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是有其历史前提的。编者把全民所有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社会主义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个历史前提删除,显然是割断历史的错误。

2. 原词条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这同“国家作为总体最终所有者,侧重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优化国有资产的配置,从而使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不是“领导力量”、不

能起领导作用而只能起“主导作用”？主导与领导的区别是什么？二者是什么样的关系？编者没有写清楚。

3. 这个重写的词条不符合《辞海》收录词条的原则。《辞海》收录词条的原则之一是："凡是正在发展或经常变动的词目，暂不收入；对时间性较强或未能肯定的材料，避免在释文中引用"。我们面对的现实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我国的"改革是一种试验"。(《邓选》第3卷第130页和《邓小平年谱》第1280页)既然"改革是一种试验"，"改革"还在进行中，还没有通过实践的检验作出科学的总结，有些做法已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动摇，引发了争议。又如主体与主导是什么关系等问题，也存在争议。1999年版编者却写正在"发展变动"中的有争议的问题。

(一七五)删改【社会意识形态】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亦称"意识形态"、"观念形态"。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促进的或阻碍的作用)，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改变后，反映该基础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并发生一定的影响。自从阶级产生以来，社会意识具有阶级性，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代表先进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对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的作用，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而先进的社会意识是在同旧的社会意识作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是阶级性最强烈、最鲜明的部分，比其它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基础起着更直接的作用。哲学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它对其它意识形态具有指导作用。(可对比《辞海》

1979 年版第 1579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15 页）

（一七六）重写的【社会意识形态】词条。

1999 年版全文是：亦称“意识形态”、“观念形态”。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中。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的发展起巨大的能动作用；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具有历史继承性；它的发展同经济发展并不总是平衡的，有时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思想领域会超过当时经济上先进的国家。自从阶级产生以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79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15 页）

对比一下上述这两个词条，重写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词条是删除原词条 5 个方面的重要内容，淡化或否定：

1. 删除“社会意识形态”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

2. 删除“代表先进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3. 删除“先进的社会意识是在同旧的社会意识作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

4. 删除“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是阶级性最强烈、最鲜明的部分……对社会经济基础起着更直接的作用”。

5. 删除“哲学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它对其它意识形态具有指导作用”。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删除原词条的核心内涵之后，虽然写了“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这么一句抽象概括性的话，

但阶级性的具体表现只字不提。这还是“原则肯定,具体否定”。

特别应该指出:1999 年版编者这样做的背景是什么?

背景是大洋彼岸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正在讲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竞争,必须发挥六项关键性能力:(1)意识形态;(2)外交;(3)经济援助;(4)军事援助;(5)军事力量;(6)秘密行动。尼克松不但把意识形态放在首要地位,而且强调说:“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尼克松著:《1999 不战而胜》第 114~123 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出版)在资本主义企图消灭共产主义如此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今天,1999 年版编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却把【社会意识形态】这个词条的核心内涵全部删光,改写的词条强调的是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具有历史继承性”,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丰富的阶级内容,只用“具有阶级性”一句抽象的空话一笔带过。这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还是主动地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

(一七七)删改【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

1. “会议是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形势下召开的。毛泽东主持了这个大会,在预备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

2. “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3. “完全肯定了党中央从‘七大’以来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伟大的”。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2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24 页)

可以对“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不同的评价,

但是以上三点，笔者对照党史都属客观事实，却被编者公然删除。这岂不是意味着编者不承认“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承认“《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这个词条也被取消）不承认“党中央从“‘七大’以来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伟大的”？这是违背事实的严重错误。这岂不是把党在“七大”路线指引下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土改、抗美援朝等五大运动的胜利……都不承认和否定了吗？因为每次“党代会”都要对前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的经验、教训和成绩做总结。关于“八大”对“七大”以来的路线是否“正确”、是否取得“成绩”，在改写的词条中无只字表示。这也不合逻辑。

（一七八）删改【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

1.“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重要讲话，……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2.“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 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3.“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4.“会议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

5.“会议还讨论了关于 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26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25 页）

1999 年版编者删除以上 5 点内容，也都属于客观事实，已

成历史。即使编者对这次会议有不同看法和评价，也不应否定客观史实。

（一七九）取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所作。编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讲话针对当时的右倾错误，论述了经济工作中进和退、上马和下马、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关系，肯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强调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出乱子，出坏人，“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被他们“基本上丢了”。讲话批评了一些干部在民主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点，批评了那种脱离群众，不与群众同甘苦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肯定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斗争考验的，联系群众的，有经验的。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有了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62页与1999年版第192页）

1999年版编者取消上述毛泽东的《讲话》这个词条，就是：

1. 不承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

2. 不同意“应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泼冷水”。

3. 不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搞“非斯大林化”是“丢刀子”，是帮助敌对势力。丢“刀子”的“刀子”是比喻“思想武器”的。

4. 不同意毛泽东的“讲话批评民主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点”。

总之，1999年版编者对上述词条的取消，显然是不同意搞

"社会主义建设",不相信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否定毛泽东重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作、重视"思想武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1999 年版编者对以上 21 个词条的删改、取消、增写,显然是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同我国社会上的否定社会主义、搞私有化的思潮相呼应的。这股思潮曾经集中地反映在 1998 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交锋》一书中。《交锋》论述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本不应该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指责"中国共产党"本不应该把"私营经济大企业""义不容情地""大规模没收"(谁都知道只有反动派"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企业"才称得上"大企业",于 1949 年被"没收")。这是作者公然为"四大家族"辩护,把他们的企业说成是"私营经济大企业",反对"没收"。作者还污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搞公私合营是"强制性兼并",说这些都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咒骂和污蔑我国没收"官僚资本"后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国营企业",说"所谓'公有',其实只是最有权的人所有","搞了几十年计划体制的'公',总说'公有'好,可是,怎么样呢?民不聊生。"(见《交锋》第 338、258 页)作者的结论是:"'大一统'公有制的误国误民以及只能造福少数人,莫有更甚。"(同上书第 264 页)这就是否定和反对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潮最露骨的表现。这也就形成为一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意识形态。

《交锋》这本书影响之大,还在于当时的作者马立诚,是以《人民日报》在职评论员、资深主任编辑名义所写的书,并由在位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作的《序》,这本书曾发给中共"十五大"到会代表,还有高层领导为之做广告。后来还有些单位规定为干部必读书。可见还被不少人视作有分量的一本书。此书还

在《中国改革报》上连载过。但是,毕竟邪不压正,之后,《交锋》这本书还是受到众多同志的批评,马立诚等人也下了台,一时间也没有人再敢宣扬这本书了。但是,实际上《交锋》宣扬的思想观点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彻底的批判和清算。

后来,这股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潮,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被 1999 年修订版《辞海》继承,并在众多词条的删改中,继续更加全面地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社会上也有人继续与《辞海》相呼应,不断推波助澜。

例如 2005 年,就有杨发民发表的长篇论文,污蔑、攻击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什么在"'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搞的。他大谈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本来不应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他说是毛泽东的"'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错误地"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使我国社会始终处于国无宁日的不断折腾之中……以致给党和国家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见陕西省《人文杂志》2005 年第 1 期《"左"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这已受到公众的批评和有关方面的处理。

还有,如徐庆全发表《胡绳"回归自我"的历程》,在文章中对原来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后来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张真理多元论的胡绳大加赞扬,说什么胡绳也认为"建国后从 1953 年开始,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强调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实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把新民主主义理论放弃了……这是毛泽东的重大失误"。(《炎黄春秋》2005 年第 5 期)他对胡绳背离原来的信仰赞扬说:这是胡绳"回归自我"了。这就是说,徐、

胡都认为从1949年开始，新中国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应该停止革命，只搞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

1999年版《辞海》既集中反映这股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潮，又和社会上的这股思潮相互呼应，推波助澜，起了极坏的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即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不但如前所说党在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凭无可争辩的事实作了充分的肯定，在党的领导人历次《讲话》中，也是一再根据事实加以肯定的。

邓小平说："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邓选》第2卷第313页）正因为是搞得"最成功的"，所以邓小平又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时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同上书第167页）并用事实证明道："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他们大，建设的速度比他们快。"（同上第356页）

邓小平还说：特别是"有二十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情况，主要靠自力更生……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同上第406页）

我们还冲破了洋框框，找到了石油，脱掉了"贫油国"的帽子。我们的农业水利基本建设取得的成绩也是巨大的。

陈云同志也说："即使在'文革'期间，先念同志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总理……使一大批在建和新建项目得以建

成或加速了建设速度……继续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打基础。”（见1992年7月23日全国各报刊登的陈云的文章）

以上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并且那时期我国没有腐败，没有环境污染，没有内债外债，也没有财政赤字。社会安定风气良好。

1949年蒋介石统治留下来的是百废待举的烂摊子。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总理和我们全党全民的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成绩，才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创造了物质和精神前提。否则凭什么去改革开放？这是国内条件。不仅如此，邓小平说毛泽东还给我们创造了外部条件，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同上书第172页）

显然，1999年版编者在以上所有相关词条中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全部删除，否定我国这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及其伟大成就。但“非毛化”精英们还不止于单纯的否定，支持编者观点的人如胡绳就进一步把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说成“是毛泽东的最大的失误”；杨发民就更升级把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说成是“使我国社会始终处于国无宁日的不断折腾之中……以致给党和国家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这样抹杀事实，颠倒是非、颠倒功过，真是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他们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用心何在？立场站错了还可改正，如若别有用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绝不能容许其险恶阴谋得逞的。

十一、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重视农民、农村、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思想路线及其实践的否定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个农业大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战无不胜的真理传到了中国，就有一个怎样正确看待中国农民的问题。如果中国革命得不到中国农民的欢迎、参与和支持，那也将一筹莫展，一事难成。毛泽东正是看出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正确解决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的第一人。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深刻论述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如果不依靠占人口 90%以上的"农民的援助"就"将一事无成"。"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中国的"无产阶级"若不与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同样重视农民的作用，重视农业的改造、发展和农村建设。

然而,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解决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一系列思想观点、理论、方针、政策和实践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充分表现为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如下第一八〇至第二〇八共29个词条的删改和取消:

(一八〇)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

1.“党领导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

2.“党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3.“我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现代化”。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3页与1999年版第1706页)

(一八一)在【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关于工农联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关于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55页与1999年版第1761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以上这两个词条中的有关内容已定了否定的调子。

首先就轻视、否定农民阶级、农民领袖和农民在历史上起过的革命作用。

(一八二)删改【农民阶级】词条。

1999年版《辞海》作了如下删改:

1. 删除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是同地主阶级相对抗的基本阶级……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2. 删除“广大贫农和中农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同贫农和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74页与1999年版第459页)

（一八三）删改【陈胜】词条。

1. 取消了陈胜遗像，给这个农民领袖降了格。

2. 删掉陈胜“被叛徒庄贾杀害”，改写为“被御者庄贾杀害”。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429页与1999年版第528页）

“御者”，即是为陈胜驾车的人。这个本为农民领袖陈胜所用、所信任的御者庄贾，竟背叛和杀了陈胜，难道应该给他摘掉“叛徒”的帽子吗？

（一八四）删改【吴广】词条。

1. 取消吴广遗像，也给这个农民领袖降了格。

2. 删除吴广是“贫苦农民出身”。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730页与1999年版第878页）

（一八五）删改【洪秀全】词条。

1. 摘掉洪秀全“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帽子。改写为“太平天国领袖”。

2. 此外，经笔者核对在其他所有“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革命将领”的词条中的“革命”二字均删除。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926页与1999年版第1103页）

1999年版编者对以上词条的删改是取消了洪秀全和农民阶级的“革命”资格。

（一八六）删改【太平天国革命】词条。

1. 删除革命这个概念，把词条名称改写为【太平天国运动】。

2. 删除太平天国“革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证明

在资本主义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勾结起来的情况下，农民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42页与1999年版第780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词条的删改，取消了太平天国的“革命”资格，以及对这场“革命”斗争精神的肯定和失败教训的总结。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以上5个有关农民阶级和农民革命领袖的词条中，所删除的内容都是毛泽东重视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的正确的思想观点。编者无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从贬低、否定陈胜、吴广等农民革命领袖开始，完全否定农民阶级的“革命”资格和革命作用。直到否定毛泽东和我们党与国家关于“三农”“方面”的思想观点。

应该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之后，有些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与革命之所以失败，往往是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铁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革命是靠了农民阶级这个革命的主力军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二者缺一不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否定农民阶级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否定无产阶级的领导都是错误的。

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搞“非毛化”的先生发表文章，否定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污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沿着刘邦、朱元璋、洪秀全的道路向封建主义滑行。”他们以资产阶级老爷的姿态出现，视毛泽东为中国又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攻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反动派别。”他们不但完全否定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而且说，从“经济意义上”看，农民这个“小生产者”是

革命的“主要敌人”。（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的文章《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初期的几个理论问题》）当时，以这篇文章为代表的反动思潮，受到了全国的批判。可是，批判没有彻底。这股思潮被《辞海》一些编者继承下来，并作了发展，进一步否定农民的革命性，取消了农民阶级和农民革命领袖的“革命”资格，还否定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许多有关词条的删改便是明证。再看以下对我国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盘否定。

（一八七）删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词条。

1. 删除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从1926年开始，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2. 删除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针对这种情况……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972页与1999年版第1160页）

（一八八）取消【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1926年下半年，湖南的农民运动迅速高涨。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国民党右派，和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当时的农民运动是“糟得很”、“惰农运动”等。为了击退这股反动的逆流，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12月1日至28日，在长沙召开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一百七十人，代表五十二县、二特别区，会员一百三十万人。大会并发出了邀请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回湘指导一切”的专电。毛泽东在大会举行的欢迎会和闭幕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斥责了攻击农民运动的谬论。大

会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纲，通过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和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组织农民自卫武装，建立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等决议。选出了全省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正式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这次大会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右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农民运动的攻击，领导和支持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运动的继续发展。

（一八九）重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词条。

1999年版重写的全文是：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的反封建革命运动。1923年起，刘东轩、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先后到湖南衡山、湘潭一带农村秘密组织农会，发动农民开展斗争。北伐战争开始后，湖南农民运动由秘密转入公开，迅速得到发展。到1927年春，全省农协会员发展到200万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斗争，使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由广东转移到湖南，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同年1~2月，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作了实地考察，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高度赞扬了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972页与1999年版第1160页）

上述三个关于农民革命运动的词条，一个被删改，一个被取消，一个是重写的。这进一步表明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毛泽东、对中国近现代农民阶级的伟大革命精神和行动的贬低和否定。前一个词条是把“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湖南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这个应该永载史册、光照千秋的农民阶级的革命精神和行动，淡化、删除和否定；又取消一个和重写一个词条，把毛泽东直接领导农民革命运动的事实删除，把毛泽东在农运方面同“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国民党右派，和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和经验教训都删除、抹杀。而这些都是湖南农民革命运

动的核心内涵。

（一九〇）删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之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在于：小农经济分散落后，生产力很低，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小农经济不稳定，经常向两极分化，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农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把农民引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农业合作化是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趁热打铁，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进行农业合作化。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党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中国农业合作化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和形式，首先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接着发展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再进一步建立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集体化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右倾思想，提出了“积极领导、全面规划”的方针，从而大大推动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业合作化是一场变革私有制的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能不遇到敌对阶级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形形色色的反抗。经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反复斗争，到1956年，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76页与1999年版第461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的这些内容明显地是出于否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 删除“小农经济分散落后”，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

2. 删除“小农经济不稳定，经常向两极分化”。

3. 删除小农经济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4. 删除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5. 删除“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6. 增写了“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前5点是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小农经济的特点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全都删除、否定掉了，后增写的话，从表面上看是批评“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实际上，不是步子快慢应调整速度问题，而是编者认为农业不应搞社会主义改造，不该走合作化走集体化道路。下面三个词条的删改就是证明：

（一九一）删改【小生产者】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小生产者“经济地位极不稳定，经常向两极分化。……我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引导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11页与1999年版第1343页）

（一九二）删改【小农经济】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小农经济“经常向贫富两极分化，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11页与1999年版第1343页）

（一九三）删改【小农经济稳固论】词条。

1999年版编者把1979年版原词条所写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倡导的“小农经济稳固论”认为小农经济能“稳固地保存自己”（不“向两极分化”）是错误的“一种反科学的农业经济理论……掩饰农业中的阶级矛盾，赞美使千百万小农经济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删除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13页与1999年版第1345页）

1999年版编者在以上3个词条中已都删除、否定小农经济会“向两极分化”和“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词条中又认为修正主义者所倡导“小农经济稳固论”不是错误的“反科学的理论”而加以肯定。显然，这表明编者认为古今中外的“小农经济”都不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农业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然而，这不仅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违背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没有否认会出现“两极分化”而要求加以防止，中国的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不搞两级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选》第3卷第64、139页）编者和至今还否认两极分化者，也应看现实世界。

编者不仅删改上述4个词条否定“两极分化”和改造的“必要”，还取消下边3个词条：

（一九四）取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报告全面地阐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号召全党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那种认为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

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的看法是不对的。无论是因胜利冲昏了头脑而犯“左”的错误,或者是因胜利吓昏了头脑而犯右的错误,两者都是不好的,而“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报告认为我国现在不但正在进行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285 页与 1999 年版第 347 页)

(一九五)取消【农业集体化】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农民的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成的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农业集体化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参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375 页与 1999 年版第 461 页)

(一九六)取消【农业社会化】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指把个体的、落后的私有制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的过程。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实现农业社会化包括生产关系的改造和技术改造两个方面,即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375 页与 1999 年版第 461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把上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小农经济】等 4 个词条的核心内容一律删除,同时又取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农业集体化】、【农业社会化】这 3 个词条,实际上,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出发点、必要性和应走的集

体化方向道路全否定了。试问:党和政府还要不要去管农业?小农经济不“改造”、不搞“合作化”、不搞“集体化”,也不考虑农业生产的“社会化”问题,难道只能让小农经济走“向两极分化”和“破产”吗?难道要让农民破产后都去城市当“农民工”吗?这已导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三农问题”。

(一九七)删改【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简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劳动群众集体占有的一种公有制形式。通过合作化道路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产生。它在我国农业中占绝对优势,在工业和商业中也占一定比重。如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商店等都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比较,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现阶段一般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并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1999年版编者在删除上述原词条的内容后,增写的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在改革开放中新生的。除原有的集体所有制形式之外,股份合作制和职工持股会组织等经济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性质。”(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580页与1999年版第1916页)

应该指出:1999年版《辞海》编者是否定农业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里“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已被“包产到户”所代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已少见,至于“改革开放后新生的股份合作制和‘职工持股会组织等经济形式’”有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然而,编者现在仍写“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我国农业中占绝对优势”,这符合实

事求是原则吗?

(一九八)删改【人民公社】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即“农村人民公社”。中国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农业、工业、商业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人民公社是1958年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在现阶段,一般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各级组织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人民公社又是中国农村的基层行政区域。人民公社的人民代表大会(即社员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集体经济的领导机构。

(一九九)重写【人民公社】词条。

1999年版把原词条上述内容删除后,改写的词条中增写了以下内容: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改变人民公社制度下存在的平均主义和社员缺少经营自主权的状况,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制定的宪法规定,农村建立乡政府和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基层政权机构同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分开设立。至此,以政社合一和集体统一经营为特征的人民公社遂告解体。(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05页与1999年版第372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通过这样的“删除”和“改写”,实际上“集体经济”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所代替。

1999年版《辞海》取消和删改以上10个词条,是明显否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否定农业集体化的方向道路。这个否定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农业集体经济”在中国存在了20多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合作化、集体化的方向道路没有错;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需要加快也没有错。但在具体工作过程

中，由于缺乏经验，犯过“刮五风”的错误（时间不长），这是应该承认、纠正和接受教训的。后来很快纠正了“五风”，改为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指标也作了调整。显然，我们不能把“农业集体化”同“刮五风”混为一谈。实际上，中国农村20多年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方向道路，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相当长时期内也确实是“跃进”的速度。这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选》第2卷第167页）犯过“一些错误”也就包括短时期内的“刮五风”吧。但是，“农业集体化”不等于“刮五风”。正确的做法是编者应该把“刮五风”专门列为一个新词条，对这个具体错误作具体的分析。可是，1999年版《辞海》编者不是这样做，而是把全局性和局部性问题，把方向道路和具体错误混为一谈，一概否定。这又如邓小平曾一再说过的“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了。（《邓选》第3卷第137页）编者的做法正是这样。

同时，我们对于产生“刮五风”的错误也要作具体分析，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这显然错了。因为具体工作是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以及各级干部共同做的，“刮五风”是某些人在具体工作进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错误。毛泽东是最早发现“刮五风”和最早起来纠正“五风”的。应实事求是地写才对。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有关词条中把我们的错误造成的损失写成“遭到巨大破坏”。（见1999年版第772页）“巨大破坏”这个话，本来是敌对势力攻击我们所惯用的词语，我们党和人民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是不用这些词语的。请看党的《决议》是怎么说的：

党在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急于求成……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高指标、共产风……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0年发生严重困难，遭到重大损失……1962年开始，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805~806页）

中共中央的文件明确说："'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带来较大的损失。针对这些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几次调整，才使集体经济逐步稳定下来。现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巩固，农村集体化的方向已为广大农民所认识和拥护。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的生产力有了初步的改善。目前，全国灌溉面积已有七亿亩，大中型拖拉机六十多万台，各种农业机器总动力一亿八千万马力，社队公共财产八百多亿元，社队企业总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在我国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三中全会以来》上册第543~544页）

显然，中共中央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指出错误也曾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但错误被及时纠正了。这才是全面看待事物和客观估量错误后果的正确态度。

（二〇〇）增添【联产承包责任制】词条。

1999年版在第2199页写的全文是：中国农业中以承包产量为特征的各种生产经营责任制的总称。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生产队实行的"三包一奖"，对作业组实行的"包工包产"，对农户实行的"包产到户"，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

综观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取消、删改和增写新的21个词条，说明了什么呢？这首先说明编者对从古至今农民阶

级的革命性、革命作用和革命资格的否定，同时编者把我国革命胜利后农业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应走“合作化道路”的内容完全删除、否定掉了，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个词条也干脆取消掉了。这是明显否定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合作化集体化的方向道路。编者只是片面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主要是“包产到户”）。这不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也是违背邓小平理论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第一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选》第3卷第355页）显然，从长远看“发展农业集体经济”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道路问题。可是，编者也否定邓小平说的“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生产社会化的需要”还要搞“集体经济”，竟干脆把【农业社会化】这个词条也取消，并肯定“小农经济稳固论”。这岂不是意味要永远坚持个体小农经济吗？

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我国农业应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集体化的方向道路的否定，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十分错误的。

第一，从党的文件来看，党中央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农业走集体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方向是充分肯定的。《决议》写道：“我国全体农民……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租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800页）

在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农业的发展、建设也是有成绩的。《决议》写道：“1966年同1956年相比……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

（同上第 803 页）

第二，从实践情况来看，“农业集体化”道路是一条康庄大道。2003 年，中央有位高级干部到全国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后在《报告》中说：“我在农村看了许多地方，不但河南的南街村坚持农业集体化道路，搞得很好。……我在农村调研中还发现不少始终坚持毛主席指引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实现了共同富裕的村。湖北省洪湖市洪林村党委书记说，据有关资料介绍，全国坚持集体道路的有七千多个村，这些村群众没有负担，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很好，群众的收入很高。河南省武陟县西滑封村的党委书记说，当年搞联产承包的时候，我坚持不搞。县委书记亲自找我谈话，我仍然不搞。……现在证明，这个村坚持集体道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搞得很好。……石家庄市附近的周庄乡，仍坚持全乡统一核算，集体经济也搞得很好，2001 年时，人均收入即达四千元，还有许多福利。”（见张全景在毛主席逝世 28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1998 年《交锋》一书的作者马立诚吹嘘“包产到户”是个法宝时是这样说的：“全党对包产到户认识的重大转折和突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据他说“这个文件的序号是中发 1980 年 75 号”，他说：“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凤阳 48 万公社社员生产的粮食还不能养活自己。自从包产到户，凤阳人可以神气活现地说，他们不要国家来养活，而且可以养活国家。”（见《交锋》第 135、137 页）他还说：“经过 20 多年的合作化、公社化……农业生产率反而大为降低……1983 年 12702 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 98%。这一年，粮食生产又比前一年增产 9%。”（《交锋》第 141 页）

然而，这个“包产单干”的具体政策经过 20 年的实践检验，已证明不是农民、农村、农业的出路。有报道说：“20 多年过去

了，小岗村还那么风光吗？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严俊昌对记者无限感慨道：‘我们是一步越过温饱线，25年未进富裕门’。”（天津《今晚报》记者2004年4月24日的报道）

2006年3月6日《文摘周报》上有篇文章，今照录全文如下：

> 《小岗村从“分田到户”到“土地集中”》：2004年11月，安徽省凤阳小岗村支书沈浩同志带领一班村官参观南街村，在档案馆内“土地分了，人心散了”的图片前“默默无语，驻足良久”。当年曾按过血手印积极要求分田到户的严宏俊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沈浩说：“这是一次洗脑之旅”。在2006年1月25日下午的村民大会上他又说：“小岗村应该合起来，一家一户是不适应的！”文章最后说：小岗村将在政府的推动下实行“二次改革”，分三步走：第一步土地合并，发展现代农业；第二步开发旅游业建成“大包干纪念馆”；第三步是招商引资办工厂。安徽小岗村这位六十多岁的发起“包产到户”的带头人严俊昌到南街村参观后说：“到南街村一看，还是集体好，看来分田单干就是没有出路。”小岗村人反复三次到南街村参观的留言是：“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正是坚持了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基本思想，克服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错误，仍坚持走集体富裕之路，在发展村级经济的过程中，积极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完全集体所有。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加供给的办法，并且逐步扩大供给范围，提高供给档次，最终实现生活资料的全部集体供给。它就不存在如今全国普遍存在的严重的“三农”问题。

人民公社是农业走集体化道路过程产生的一个新事物。犯

过“刮五风”的错误，只是几个月的错误，随即得到纠正。三级所有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际上已纠正求快而退到了高级合作社地步。人民公社和“刮五风”不能划等号，纠正“刮五风”不能连集体化的方向道路一起“纠”掉。上述提到的河南省的南街村始终坚持集体化方向道路，生产搞得好，2000 年产值已达 14 亿元，实现利税 6900 万元。群众吃饭不要钱，每户住着 70~90 平方米的公寓楼，看病有公费医疗，孤寡老人集体供养，孩子入托到上大学的一切费用，全部由村里承担。精神文明、社会治安也良好。（见《王宏斌在“中西部地区基层干部研讨班”上的发言》2001 年 3 月 13 日）据有关资料介绍，全国坚持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有七千多个村，总不能说是个别现象吧。

显然，我们不能在纠正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具体错误的同时，竟然把正确的方向道路也否定。应该纠正的是具体错误，不是纠正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方向道路。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不仅仅是否定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合作化集体化的方向道路，还取消、删改以下 8 个词条，否定我们党关于发展农业经济的方针，否定毛泽东关于重视“三农”的思想路线和实践。

（二〇一）取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我国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革命根据地某些干部不重视发展生产的片面财政观点而提出。这一方针要求通过领导军民大力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方针有了发展。发展经济，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和工业的生产；保障供给，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根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通过分配和交换，保障社会主义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保障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发展经济是保障供给的基础，保障供给则是发展经济的目的。（可比照

《辞海》1979年版第492页与1999年版第605页）

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针（见《毛选》第3卷）。1999年版《辞海》编者取消【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词条已连同取消了这个方针；编者又在【毛泽东思想】词条中也取消了这个方针；在这里又干脆取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词条。这3处的删除、取消，显然是否定毛泽东重视生产的经济思想。

我们要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你们还要不要考虑到历史条件和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在历史上，当年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遭到日寇、汪伪、国民党顽固派等三方面的经济封锁，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个"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英明正确的方针，能够坚持抗日，坚持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直到胜利吗？毛泽东这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已被实践证明是有成效的、正确的，是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我们也不是认为在提出这个方针后，以后只能照搬这个方针。但这是毛泽东在历史上就"重视发展经济"的史实，这是历史。你们怎能为了"非毛化"竟这样无视历史、抹杀历史？

（二〇二）取消【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指我国"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于1962年提出。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概括。它反映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这两大经济部门的本质联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因为农业为整个社会提供粮食，为工业提供原料，是国家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农村又是工业品的重要市场，是工业和其它部门劳动力的主要源泉。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必须以工业为主导，因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对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技术改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工业的

发展，可以促进农业的机械化，保障国家经济独立和国防现代化。贯彻执行这个总方针，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就比较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就能高速度发展。（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492 页与 1999 年版第 605 页）

以上两个词条中关于发展经济的方针，都是把农业作为基础来重视的。现在世界各国都在重视发展经济。在发展工业方面，能源问题之重要已成为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共同忧虑的问题，因为世界上可供利用的常用能源是有限的。可是，在发展农业经济方面，还有个粮源问题。有识人士已经提出粮源比工业能源更为重要，更需要关注。古人云：民以食为天。现在，我国不但可耕地因为发展工业和交通而大量被占， 由于环境污染，过量使用农药，特别是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自然灾害频发而且越来越大……农业生产也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粮食生产如果不以“自力更生”为主，难道十几亿人吃的口粮要依赖向别国购买吗？因此，否定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请问 1999 年版编者：你们否定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那么，你们认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和位置究竟应该怎么摆法才合乎科学发展观呢？

（二〇三）取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1956 年 1 月，在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纲要草案， 经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人民广泛讨论后，1957 年 10 月，公布修正草案，1960 年 4 月，经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纲要》全文共四十条。主要内容是：采取各种措施，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力提高粮食和其它农作物产量， 分别规定全国各地区在十二年

内应达到的粮食和棉花的每亩平均年产量；发展畜牧业、林业、水产业等多种经济；坚持勤俭办社，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粮食储备；发展山区经济；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办好国营农场。此外还制定了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广播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315 页与 1999 年版第 385 页）

请问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你们取消这个词条是否意味着它全错了？全无意义？党和国家是否应该有个发展农业的纲要或计划？还是党和国家根本用不着管农业？

（二〇四）取消【农业“八字宪法”】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根据我国农民群众的生产经验和科学研究的成果，毛泽东于 1958 年总结出来的农作物八项增产措施。其内容以下列八个字来表示：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壤规划）、肥（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375 页与 1999 年版第 461 页）

请问 1999 年版《辞海》编者：这个词条被取消是否也意味着它全错了？全无意义呢？

（二〇五）取消【合作医疗】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群众自己创造的依靠集体力量同疾病作斗争的一种医疗制度。它是在我国农村合作化以后发展起来的。群众自愿参加，实行集体互助。在农村，一般由生产大队、生产队、社员共同筹集医疗资金，免费或部分免费开展疾病的防治工作。合作医疗的建立，加速了农村医疗网的建设，增加了与疾病作斗争的力量，对保护社员身体健康，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319 页与 1999 年版第 390 页）

（二〇六）取消【赤脚医生】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赤脚医生是经过一定时期培训，具有一定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的农村卫生人员。他们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防病治病。赤脚医生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和农村卫生面貌；对开展预防工作，保障社员健康；对发展农业生产起着积极作用。（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953页与1999年版第2350页）

（二〇七）取消【巡回医疗】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医务人员定期或不定期深入到工厂、农村、边远地区开展医疗工作的一种形式。医务人员在巡回医疗时，除送医送药上门给群众治病外，还积极开展卫生宣传，进行预防工作，为基层医疗机构培训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041页与1999年版第1257页）

（二〇八）重写【合作医疗】词条。

1999年版全文是：我国农村的基本医疗保健制度。在政府领导下，按照自愿量力、受益适度的原则，用农民为主、集体扶持、国家引导的办法筹集医疗基金，通过互助共济、风险共担的办法，减轻患病农民的医药费负担，保障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具体办法因地因时制宜，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19页与1999年版第390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以上这3个词条删改和取消后，重写的【合作医疗】词条，与原词条实际上是无法比了。因为后者是改革后的新事物了，而且改革还在进行中。现在农民看病难的呼声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了。重要的是应联系当年和今天的实际来评价农村的医保事业和制度。农民阶级这个占中国人口比重最大的阶级，不仅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年代是革命的主力军，贡献极大，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仍是一个重要力量。党和

国家是绝对不可亏待农民阶级的。

综观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反映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反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医疗建设以至整个"革命与建设"方针的共26个词条，被编者取消的有11个词条，删掉主要内容的有11个词条，编者还重写3个词条、增写1个词条。这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周总理主持的政府关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特别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就被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辞海》中基本上否定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词条，只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个词条有幸未被取消，但核心内涵也都被删除，只剩下一个空壳。其余都干脆取消掉了。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呢？比如【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个词条被轻率取消了，然而，据张宏志同志在近著中指出：实际上当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产生，"可谓慎之又慎。毛泽东花四年的心血所产生的文件在其墨迹未干之时，党内竟有人说毛泽东头脑发热，鼓吹高指标，大刮浮夸风。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二十多年来这个谎言不知蒙骗了多少人?!是该说说清楚了！"还是在"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作了第一次修改，……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1960年4月，提交第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见张宏志著《还清白于毛泽东》第57、56页，国际炎黄出版社2004年出版）它怎么会成为刮浮夸风的原因呢？只要翻阅一下当年的《人民日报》的报道，就不难搞清楚刮浮夸

风的是哪些人、是怎样刮起来的。“农业‘八字宪法’”、“赤脚医生”等词条被取消和否定，人们要问编者，你们进行过实地考察没有？这些不但在当时起过作用，有的现在仍在起作用。

在此必须指出：毛泽东一向重视农民问题：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集体化、机械化道路，加快发展建设农业的问题。他费尽心血，领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他对农业、农民的重视和坚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向道路的正确性是无容置疑的。他亲手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与各省负责人多次商讨，经4年的实践总结，反复修改，于1960年才经“人大”正式通过。即使在贯彻过程中发生偏差和失误，也及时纠正了的。现在，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这些词条都取消或删改、否定了。

至今，改革开放近30年了，“三农”问题是如此的严重！实践证明了什么？在2000年3月2日，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信，信中说：“我已做了17年乡镇干部，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总理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详见全国许多报刊均有刊登和转载的）这就是现在大家都关注的“三农”问题。不久，又有著名作家陈桂棣、春桃的34万字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出版，震动了全国和世界。作者历时三载，跑遍安徽乡村，深入调查，在安徽省也证实了李昌平所说和湖北省一样严重的“三农”问题。今天，我们还不应该认真总结一下改革开放近30年来竟出现如此严重的“三农”问题的经验教训吗？还不应该认真地从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制订的关于“三农”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道路中去寻找根本解决的办法吗？

十二、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肯定的中国新文化的代表鲁迅、郭沫若的贬低和对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否定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写"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那当然包括文化、文艺领域方面的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们再来看编者对这方面的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否定。这可举出编者对第二〇九至第二一八这 10 个词条的删改和取消为例来评析。

(二〇九)在【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的内容是:

1. 删除"毛泽东思想关于反帝反修……"。

2. 删除"关于文艺为工农兵及其干部服务等等,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删除"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5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61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上述词条所作的删除、否定，为否定毛泽东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思想，否定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定了调子。

先说在文化方面，毛泽东是充分肯定鲁迅的。他说：“中国的新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又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99 年版《辞海》编者正是从这里开始否定鲁迅，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评价。

（二一〇）删改【鲁迅】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02 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 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展开大论战时，鲁迅站在革命派一边，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重要论文。1909 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 年 5 月，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并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取一致步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1918 年到 1926 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

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 年 12 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 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在这一时期，鲁迅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26 年 8 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 年 1 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教育，彻底放弃了进化论思想。1927 年 10 月，到达上海，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1930 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其他革命文艺战士一起，同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及其他反动文人、反动文学进行不懈的斗争，粉碎了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正是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1936 年初，“左联”解散后，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 1927 年到 1935 年，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后十年的杂文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深刻地分析了各种社会问题，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韧性的战斗精神。这些作品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

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1938年，出过《鲁迅全集》（20卷），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10卷），《鲁迅译文集》（10卷），《鲁迅日记》（2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56年，党和人民政府在上海迁移并重建了鲁迅墓。毛泽东亲自为鲁迅墓题字。北京、上海、绍兴等地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016页与1999年版第2425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否定或贬低鲁迅，【鲁迅】词条释文被删除达11处之多：

1. 否定鲁迅的伟大。在原词条所写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句话中，删除"现代伟大的"这一正确的评价。

2. 删除"1905~1907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展开论战时，鲁迅站在革命派一边"。

3. 把鲁迅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这句话中的关键词"反帝"二字删除。这不仅仅是否定鲁迅个人，否定鲁迅这位新文化的"旗手"的反帝，而且同时是否定诞生于"五·四"的中国新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

4. 删除鲁迅"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取一致步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

5. 删除"这一时期，鲁迅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6. 删除鲁迅1927年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工作……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愤而"辞职……"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教育，彻底放弃了进化论思想"。

7. 删除鲁迅先后参加……"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种种迫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8. 删除"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正是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9. 删除鲁迅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深刻地分析了各种社会问题……。

10. 删除鲁迅是"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

11. 删除"1938 年出版过《鲁迅全集》(20 卷)，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10 卷)，《鲁迅译文集》(10 卷)，《鲁迅日记》(2 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56 年，党和人民政府在上海迁移并重建了鲁迅墓。毛泽东亲自为鲁迅墓题字。北京、上海、绍兴等地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以上 11 处的内容是违背众所周知的客观历史事实的。同时，这是明显的贬低和否定鲁迅，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正确评价，否定中国的新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这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

(二一一)删改【郭沫若】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四川乐山人。1914 年，赴日本留学，原学医，回国后从事文艺运动。1918 年，开始新诗创作。"五·四"时期，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1921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并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1924 年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倡导革命文学。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党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 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夕，他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重大影响。同年，参加南昌起义，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旅居日本，从事

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划时期著作。《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等综合研究甲骨文，《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系统探索青铜器铭文和纹绘，对文字、史实、年代的考订，贡献很大。旅日期间，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运动。抗战开始，回到中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这一时期他所著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鼓励了人民的斗志。1944 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经验，当时被定为中共整风学习文件。所著《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对考证先秦社会历史和评价各派哲学人物，颇多创见。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及其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9 年，北平解放后，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新中国成立以来，继续进行文艺创作，发表了《蔡文姬》等历史剧作。所著《奴隶制时代》等书，提出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见解，为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届常务委员，二、三、五届副主席。他长期担负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对发展中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1978 年 6 月 12 日，病逝于北京。生平著述很多，现有《沫若文集》行世。（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452页与1999年版第558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贬低、否定郭沫若，删除【郭沫若】词条主要内容有9处：

1. 删除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

2. 删除郭沫若“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

3. 把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句中的“接受”这个词，改为“接触”。

4. 把“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夕，他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重大影响”这句话中的“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和“在人民群众中”删除掉了。

“安庆惨案”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事变。郭文确实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重大影响。编者删除、抹杀这些，岂不是要掩盖蒋的罪行，否定郭的功绩吗？

5. 把郭沫若抗日时期在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改写为郭沫若抗日时期在重庆“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99年版编者这样改写只会使读者误以为郭沫若是到国民党政府中当官去了。其实，郭沫若是以无党无派人士的身份，确实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为了给党做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才出任这个职务的。

6. 删除郭沫若的作品“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鼓励了人民的斗志”。

7. 郭沫若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1999年版编者把该文“当时被列为中共整风学习文件”删除。实际上当时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确实“被列为中共整风学习文件”对全解放区的整风运动都起了重大教育作用。

8. 删除郭沫若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及其”发动内

战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特别是以上6~8这三点，不仅是编者抹杀历史事实更是抹杀郭沫若的三大重要贡献。

9. 删除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见中共中央的悼词）1978年6月12日病逝于北京。生平著述很多”。

1999年版《辞海》编者贬低、否定郭沫若，也同时贬低、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郭沫若的肯定和正确评价。

对鲁迅、郭沫若两个词条所删除、否定的内容，显然都是违背历史事实、颠倒是非和针对毛泽东和我们党对于鲁、郭的正确评价的。

在“非毛化”思潮之下，“非鲁”、“非郭”也有其必然性，“非鲁”、“非郭”也是他们“非毛化”的组成部分。他们有些先生的偏见极深，把受过毛泽东赞扬、肯定的人和事，几乎都要吹毛求疵，加以否定或贬低。

毛泽东实事求是地评价鲁迅是“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非毛化”者连毛泽东本人的“伟大”也否定，自然也要否定鲁迅的“伟大”了；鲁迅从未站在“改良派”一边而是站在“孙中山革命派”一边，他们也否定；“鲁迅与李大钊步调一致”，他们也否定；鲁迅“不顾国民党种种迫害，而成了共产主义者，文化革命的伟人”，他们也否定；甚至，把鲁迅始终站在“反帝”斗争的最前列，他们也否定；他们对“鲁迅墓、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等，也都加以删除。这就不仅是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人民对鲁迅的正确评价，进而对“鲁迅墓、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客观存在的铁的事实都不认账了，也从词条中删除。这是否要读者忘掉鲁迅，不要再纪念鲁迅？

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些先生要显示自己“非毛”、“非鲁”的完全和彻底。

毛泽东说过“我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1971年11月，毛泽东在视察武汉时又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的书不大好读，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就懂了。”同时，毛泽东重申了他1937年第一次公开评价鲁迅时所做的结论：“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毛泽东在逝世前半年多的时候，还说：“我建议，在一两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作者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一书中引证了上述文字后，问道：为什么鲁迅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有如此显著的地位呢？他回答道：“鲁迅本人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上的独特贡献；鲁迅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情和理解；他们两人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对传统思想道德的批判的相通共鸣……。当然还有一个性格上的原因。当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时候，无疑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他的人格理想，诸如反迷信、反权威的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在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中，都从不屈服的敢于应战和挑战的气概；对国民性弱点的冷静揭示，对新人格气象的热情渴求；以及坚定地相信未来、相信青年的旷远胸怀。”（该书第657页）笔者大段引证作者陈晋的话，不仅因为完全赞同作者的高见，也是为了证明“非鲁”者之所以这样“非鲁”，实在也是由于他们“非毛”的需要。因为毛泽东以鲁迅的学生自居，他们就要把他的老师也加以否定。

“非毛”的先生们之所以“非郭”，实际上也同“非鲁”一样，是有着同样的必然性。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新文化的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他在南昌起义前，就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著名檄文。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共产党，后经周恩来直接布置，秘密出国，东渡日本，研究学术、文化、历史长达十年之久，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之下，

在国统区扎扎实实地起到了文化界旗手的作用。他那时的著作《甲申三百年祭》，还被中共中央定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对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1942年的整风运动，都起到了极大的教育、警示作用。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干部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也是继续要求接受李自成的这个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始终忠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在是一个赤胆忠心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奋斗终身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郭沫若逝世后，出现了揭批郭沫若的所谓阴暗面的文章和思潮，许多先生最主要的是指责郭沫若始终无限崇拜毛泽东，指责郭沫若的遗嘱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指责郭不断地“非己”，亦即自我批评。其实，这正是郭沫若最大的优点。郭沫若是在毛泽东逝世后两年才病逝的，凭郭沫若的睿智和敏感，他无疑已经看到了“非毛化”现象，并预见到这个思潮将会在中国泛滥起来。“非毛化”者无疑地也希望郭沫若也起来“非毛”，可是他们的这个希望落空了！郭沫若不仅没有“非毛”，而是更加信仰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他在遗言中一再对家人说：“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这是具有极大的聪明和勇气的表现，这不仅是告诫他的家人，也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告诫。他进一步以请求死后将“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表明了他是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事业，献给人民。这也意味着他要永远站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绝大多数人民的一边。农民在中国当时的人口中仍占有百分之八九十。无论革命者、文化工作者，站在工农这一边是不会错的。郭沫若真不愧为继鲁迅之后又一位新文化的旗手！

当然，若说鲁迅、郭沫若也有某些缺点、错误的一面，只要符合事实，我们也不会否认。因为“人无完人”，即使马恩列斯

和毛泽东也是会有缺点、错误的。问题在于首先要分清缺点、错误的性质，他们没有、也不会犯大是大非、立场性质的错误。其次要分清主次，对功过的评价要恰如其分。这都要作具体的分析才能说服人。

有人说郭沫若是有思想矛盾的，这也是正常的。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一般都有一个思想改造过程，都有过“旧我”与“新我”的矛盾斗争，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非己”。如果说郭沫若也是在“旧我”与“新我”的斗争中经过“非己”，“新我”战胜了“旧我”，这也是正常的。他无论是自我批评或受到过批评都是好事，都不是拒绝思想改造、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先生说的什么“蒙受羞辱”，也不是不幸“非己”，也不是失去了“自我”。

鲁迅成为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也经历过“非己”。“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到……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的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见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不但鲁迅经历过不止一次的“非己”，毛泽东也是一样，他少年时信过佛，后又信过孔夫子，之后才信仰马克思主义，岂不是也有过不止一次的“非己”吗？

但是，总的来看，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的方向道路都是选准了的，都是正确的。他们的功绩都占主要地位，而且巨大，他们都是伟人。在实践过程中即使产生缺点、失误或错误，但不是方向道路性质的。即使拿“文革”来说，邓小平曾经正确地指出过：“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但是不必匆忙去

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是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邓选》第 2 卷第 149 页）“文革”“主要是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这“主要”二字十分重要，忘记了这“主要”二字，不去研究“主要”方面，就会在“次要”方面费太多力气而无益。

（二一二）删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著作名。毛泽东 1942 年 5 月所作。包括 5 月 2 日所作的引言和 5 月 23 日所作的结论。编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讲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总结了“五·四”以来我国的革命文艺运动，提出并解决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彻于文艺工作，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毛泽东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特别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才能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明确解决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应当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讲话还深刻论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等的辩证关系。这一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艺问题的历史文献。（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62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2 页）

只要认真看一看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上述词条的这些删节，就可知这些恰恰都是《讲话》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精神。再想一想编者删除、否定《讲话》“提出并解决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就可想

见还没有被删除的已不是“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了。当然,表面不否定而实质否定还表现在对其他许多有关词条的删改方面。

(二一三)大面积删改【文艺批评】词条。

197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运用一定的观点,对文艺家、文艺作品、文艺思潮、文艺运动所作的探讨、分析和评价。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各个阶级都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进行文艺批评,提倡和扶植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反对敌对阶级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并且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无产阶级文艺批评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它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也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等不良倾向,总结无产阶级文艺实践的经验,热情扶植革命文艺作品和文艺新生力量,使之健康成长,以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二一四)重写【文艺批评】词条。

199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指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运用一定的观点,对文艺家、文艺作品、文艺思潮、文艺运动所作的探讨和评价。批评的基本含义是“辨识”和“论定”,即对文艺事实进行描述、证明、分析、解说、批判和分类。一般说,文艺批评有宏观和微观两类。宏观的文艺批评偏重于对文艺现象进行综合性研究。微观的文艺批评则偏重于对具体、个别的文艺现象的分析与批判。对文艺作品的成败得失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思想分析与艺术分析,有利于提高文艺家及其作品的表现水平,提高广大群众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由于文艺现象本身的复杂性,文艺批评可以运用历史的、道德的、美学的、心理的等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536页与1999年

版第 1861 页）

对比上述两个词条，原词条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所写，亦即根据《讲话》的精神写的，却被 1999 年版编者几乎全部删除、否定了。而重写的词条，是以超阶级（实际上超不出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写的，是不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所谓文艺批评。当然，也就无法来评析文艺家及其作品的是与非，也谈不上"文艺批评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了。党不能用"文艺批评"这个"重要方法"来"领导文艺工作"，那又怎能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呢？

（二一五）删改【工农兵方向】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的需要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从文艺工作的实际状况出发而提出，得到与会文艺工作者的一致承认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方向。它要求所有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立场转移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方面来，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创造为工农兵服务、表现工农兵群众、以工农兵及其干部为主要工作对象，并为工农兵所需要和便于接受的作品；要求革命的文艺家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并帮助和指导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将文艺的普及工作、提高工作辩证地统一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教育鼓舞了所有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506 页与 1999 年版第 621 页）

1999 年版编者对原词条的删节：

1. 删除“得到与会文艺工作者的一致承认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方向”。

2. 删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教育和鼓舞了所有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3. 删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以上3点，是想表明“工农兵方向”在当时就没有得到“一致承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无“经验”可言；现在则更无意义了。这是编者的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这个“工农兵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经过讨论是取得了一致的。《讲话》也不是要求文艺服务的对象仅仅限于“工农兵”，还有“人民大众”。《讲话》是提倡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首先和主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永远不会错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大众当中，工人、农民仍占多数，而且他们的文化知识和欣赏文艺作品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关于文艺服务的对象问题，应该说为工农兵和为人民大众是统一的，过去和现在也是统一的。

（二一六）删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词条。

197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1956年，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为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这一方针的着重点，是发扬社会主义的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主张在坚持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在人民内部采取放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

形式和风格流派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方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中得到发展；有利于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识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有利于推动科学、文化、文艺工作者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充分发挥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艺术事业得到发展和繁荣。（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768页与1999年版第2135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的删节：

1. 删除“坚持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这就把实行“双百”方针的前提否定了。

2. 删除“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这就把实行“双百”方针的基本要求否定了。

3. 删除实行这一方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地位的加强和巩固，有利于“人民群众识别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推动科学、文化、文艺工作者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就把实行“双百”方针的基本目的否定了。

1999年版编者把实行“双百”方针的前提、基本要求和目的全否定了。这样，还有什么“双百”方针可言呢？这样的否定是违背史实，也违背党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决议》写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见《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831和801页）

（二一七）删改【杨朔】词条。

全文见本书举例第一五八词条。

1. 删除杨朔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深入矿山、部队进行创作活动"。

2. 删除杨朔在"1950 年 10 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前线，创作了反映抗美援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

3. 删除杨朔的"散文革命激情充沛，结构严谨，文字含蓄、洗练"。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259 页与 1999 年版第 1520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杨朔词条的删改，不仅仅是对杨朔的贬低和否定，也是针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显然是否定作家应该熟悉人民群众，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火热斗争中去获得自己的体验。这种否定也是明显错误的。发达国家有不少作家虽在物质方面很富有，可是脱离群众，精神却贫困，怎么也拿不出伟大文学作品来。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重写的【毛泽东思想】词条中写"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可是，在具体论述"文化、文艺方面的毛泽东思想"时，岂不是通过上述 9 个词条的删改来了个全面的具体否定？否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否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党和国家通过运用文艺批评的方法，对文艺、文化工作的领导，否定文艺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

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应提倡的方向呢？是不是体现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呢？我国十亿以上的人是农民、工人，士兵大部分是穿上军装的工人或农民。这些人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主体吗？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那么，反映这十多亿人民的工作生活并为其服务是正常的事。同时也没有排除文艺反映工农兵以外的人民。可是，1999 年版《辞海》编者却是明目张

胆地取消和否定了它曾经是当年得到“一致承认”的方向，更不承认它是今天的方向。

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这些年来的电影、电视以及舞台上，还能见到有多少工农兵的形象吗？

正如有些人所说，工农兵已经从文艺、舞台上“下岗”了。现在在文艺领域“上岗”的绝大多数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流氓、阿飞、买办、老板，还有盗贼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不但歪曲历史，给观众许多错误的“历史知识”，而且无中生有，误导观众都去编“谎”、骗人。实质上，有些节目是起败坏道德的教唆作用，是搞精神污染。

实际上，1999 年版《辞海》编者已把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的主旋律废弃了，而是把封建文化奉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流了。这只要再看一看编者对【孔子】这个词条的删改即可得到证明。

（二一八）删改【孔子】词条。

删除、否定孔子学说是“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

1. 1979 年版《辞海》写的是：“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1999 年版《辞海》编者改写为：“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极大。”这是编者否认“孔子学说”是“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竟给“孔子学说”摘掉“封建”帽子，把它说成是超阶级的“两千余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也就是说对各阶级都适用的，当然在今天仍应占主流位置了。

2. 1979 年版《辞海》写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仁’实际上是以维护贵族等级秩序为目的。”1999 年版《辞海》在原词条中增写一句：“但也表现了对一般人的重视。”这仍是编者在表明“孔子学说”是超阶级的，在“贵族等级”之外对全民都适用的，孔子、孔学对贵族和被压迫阶级的“人”，也是一视

同仁地“重视”的。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19页与1999年版第1352页）

这就难怪这些年以来，舞台上宣扬帝王将相，宣扬君君臣臣、主子奴才，等级分明，成了主旋律了。哪里还有工农兵的位置呢？

对传统文化，当然要总结。毛泽东的名言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91年版《毛选》第2卷第534页）但是，作“总结”是要进行具体分析的。分清哪些是统治阶级的“传统”，哪些是人民的“传统”。就拿“忠”“孝”来讲，这也不是封建主的“专利品”。历史上就有两种“传统”。孔孟讲“忠”“孝”有孔孟的要求和标准，忠是无条件的忠于君皇个人，孝是无条件的孝父母。人民群众也有讲忠孝的传统，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民讲“忠”是“忠于国家”而不是盲目“忠君”，更不会对暴君、昏君讲忠。人民群众也是讲究孝敬父母的，但常言道：“大义灭亲”，人民不会对当了汉奸叛徒的父母讲孝。当然，我们对统治阶级的“传统”也是要研究总结，才能做到改造和吸取其中对人民有益的因素。显然，1999年版编者删除、否认“孔子学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封建文化的正统”，而改写为超阶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错误的。这是要误导人们向哪里去？

“2005年9月在山东济宁曲阜”举办“全球联合祭孔”大典（见2005年9月21日《人民日报》第20版）。据2005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11版《文化》版介绍，不到一年，全球已建成了26所孔子学院。《人民日报》2006年2月9日、2月16日还报道世界各地都在建“孔子学院”。如果是作为民间的文化交流，可当别论。但是，我们的党和国家应该看到西方的意识形态同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我们不应忘记

和背离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倡导什么孔学。

现在,奇怪的是在党报上竟看到一些报道,例如在《哈尔滨:"四书五经"摆上儿童书桌》的大标题下,有这样一整段话的报道:"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孩子们每天有30分钟跟老师读经典,每学期进行经典诵读竞赛,孩子们兴趣很高。现在已坚持三年,最大的感受就是通过经典文化的熏陶,孩子在校文明了,在家孝敬了,学习主动了,真是受益匪浅。"真似乎"四书五经""一读就灵"了。还有,在《拜孔子读经典送"红包"》的标题下,报道南京一些小学新学年开学活动的"新招":"由老师带领到夫子庙,在孔子像前依次鞠躬参拜。"(以上见《人民日报》2005年1月19日和2006年2月15日)还有让儿童头戴古帽、身着古装来行跪拜礼读经的,例如"武汉的一所现代私塾——童学馆举办了隆重的开馆仪式。45名四五岁的小朋友头戴冠帽,身穿汉服……"(见《人民日报》2006年8月17日)这些复古的东西,比当年的北洋军阀政府强令小学四年级以上学生读经的复古倒退行为,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大有把"孔子学说"、"四书五经"作为今天的"经典"、"圣经"、"先进文化"来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小学生开始向全民推广之势。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党的领导深思、猛省吗?如果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非毛化",把我们唯一正确的精神支柱搞掉,那么,"非毛化"者想树自己是树不起来的,那就要去寻找填补"真空"者孔老二了。

"孔学"能填补我国的精神支柱的"真空"吗?显然不可能。"孔学"的基本思想的反动性,历代都有先进的思想家批评过,在"五·四"运动时更已被批臭了。可是,现在有人竟想用"孔学"来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它作为我国人民"新的精神支柱"。有位先生这样美化和颂扬"孔子学说":"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一种精神在生活中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且成

为规范人生的尺度，又在千百年中被发扬光大，它的伟大是显然的，是超越时空的，不是一代帝王，几个英雄所能包含了的；反而，它却包含了一切帝王和英雄。”（见《人民日报》2006年4月25日第19版署名文章）这就把“孔子学说”和孔子的“伟大”说成无所不包了。这真是新“天方夜谭”。

有些人认为只靠封建正统文化“孔子学说”做“精神支柱”不行，那就又把反动文人胡适及其思想，加以百般美化、无限拔高，以“胡适思想”来作为“新的精神支柱”。

胡适、胡适思想又是怎样的呢？胡适曾写文章为奸臣秦桧辩护，说秦桧“主和”是明智，是“有大功”的；胡适赞赏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说这是袁“能柔亦能刚”，是外交方面的“开明”之举；胡适支持、鼓励汪精卫投降日本，当年国民党元老程潜在高层会议上就指责胡适为“汉奸”；胡适还“委托”周作人当汉奸；胡适还建议日本侵略者应“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并建议日本培养“一百个周作人”；……“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是始终“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详见本书第十九专题）

能用“胡适思想”来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吗？现在，有些人已明确提出这个主张。说什么“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说胡适“在中国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胡适全集》序）说什么今天的中国应该“走胡适代表的方向……这是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说什么“整个的西方社会，大致都生活在胡适思想中……只有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见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第31、33、7、8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还有人造舆论说：“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见《炎黄春秋》2003年第6期第59页）

这种错误思潮都是同《辞海》1989年版、1999年版编者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文艺思想相呼应的，与《辞海》为孔子和胡适翻案相呼应的。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文艺思想的逻辑的必然，也只能是饥不择食地妄图用“孔学”、“胡适思想”来填补“真空”。这就令人不禁想到黄克诚同志的先见之明，还是在1981年黄克诚就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些人要丢掉我们自己的宝贵精神财富，难道要请孔夫子，请三民主义回来？那是过去的历史已证明是过了时的和行不通的……那是不是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搞来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不可能为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现在的事实证明，这是黄克诚的一个英明的预见。1999年版《辞海》编者和“反毛”、“非毛化”者正是在走请孔夫子……的这条路。但是，走这条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受蒙蔽的、糊涂的同志还没有清醒，放着好好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精神武器不用，想拣起“孔学”、“胡适思想”为“新的精神支柱”，这是完全错误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已到猛省、清醒的时候了！应该起来击退这股逆流！

十三、评 1999 年版《辞海》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倡导、培育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否定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生活方式”，什么是“基本生活方式”。

什么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社会群体及个人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各种活动形式和行动特征的总和。包括劳动方式、社会交往方式、道德价值观念等。这是通过个人或群体的具体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而体现出来的。

什么是“基本生活方式”？那就是上述“生活方式”中占主要地位、主导地位的部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生活方式在物质经济基础领域中，就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主导；在消费分配领域中，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形式。在精神领域中，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和主导的地位，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同志式关系。其具体表现为：1.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为人民服务

的公仆，领导关心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拥护党和国家的领导，学习党和国家的领袖的著作，响应党和国家领袖的号召，争当模范；党和国家的领袖提倡、表彰先进分子、英雄模范人物，倡导向英模人物学习；2.人民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人人学先进、赶先进，先进帮后进；有矛盾用思想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改造思想的方法，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处理和解决；3. 遇有用上述方法不能解决的矛盾，则可诉诸法律，由法院处理。这就是我国人民主要的生活方式或者叫做基本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价值观荣辱观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两个领域中，什么样的思想、行动是光荣的，什么样的思想、行动是耻辱的，就属于我们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荣辱观的问题。我们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概括了一个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体现：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这是对我国人民和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的概括。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先烈方志敏写了《可爱的中国》，感动着无数的读者以爱国为荣；毛泽东的名著《为人民服务》，更是家喻户晓人人拥护；我们党一贯重视爱国、爱人民、劳动、团结、遵纪、艰苦奋斗等的教育，我国人人都争创先进，这已是世所公认的。

然而，1999 年版《辞海》编者的观点却与此明显不同。这表现为编者对如下第二一九至第二三八这 20 个词条的增、减和删改中。请看编者新增写的一个词条：

（二一九）新增【价值观】词条。

1999 年版全文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点。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的作用。表现为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职业价值观、生活价值观、人生价值观等。受到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具体的历史的。（《辞海》1999 年版第 266 页）

请问 1999 年版编者：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价值观"，你们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写这个词条的，怎能绝口不提"阶级"，似乎只有一个全人类通用的价值观？虽然，提到"社会地位"，也只是说它是影响价值观的"因素"之一而已。可是，实际上"超阶级"的价值观是不存在的。你们自己的价值观、荣辱观也仍是有"阶级性"的。比如，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认为："狼牙山五壮士"为了爱国抗日而牺牲是光荣的，而你们却把这个【狼牙山五壮士】词条取消掉了；我们承认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牺牲是"光荣"的，你们作为编者却在"光荣牺牲"的英、模烈士词条中把"光荣"二字删除、否定；把"荣获"勋章的"荣"字删除、否定；又比如，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荣辱观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极有歌颂价值的，是应该歌颂的。然而，你们作为编者却要在词条中取消、删除、否定这些内容。这些实例岂不是证明你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价值观不同吗？

再看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意识形态、精神领域中，是怎样通过对如下 19 个词条的取消、删改，从而否定我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价值观、荣辱观的。

（二二〇）在【毛泽东】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为中国人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赢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5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59 页）

（二二一）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1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06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上述两个词条中所删除的，正是人民群众尊敬和歌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基础和前提。编者删除、否定这个基础和前提，这难道不是编者与人民群众价值观不同的具体反映吗？下面这个词条被取消就很典型：

（二二二）取消【东方红】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中国革命歌曲。曲调取自陕北民歌，1942 年冬，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1903~1955）作词。全曲以庄严雄伟的气魄和亲切动人的感情表达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爱戴。（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48 页与 1999 年版第 58 页）

为什么几十年以来，直到今天亿万人民始终歌唱《东方红》呢？这是因为毛泽东是完全彻底为人民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党。因此，人民是热爱和歌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这 3 个词条是：两个词条被删除核心内容，一个词条被取消。这不仅是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而且是侵犯人民歌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权利，这也是否定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价

值观。这是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倒行逆施,是对亿万人民的意志和思想感情的极大伤害。

实际上,几十年以来,直到今天,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一直在唱《东方红》!歌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这体现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是要永远唱下去的！这是 1999 年版编者和任何人也取消和否定不了的。

我们必须批评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取消【东方红】这个词条的严重错误:

1.《东方红》的第一段歌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有人认为“救星”这个提法不适当。其实,这个提法很好。什么叫“救星”？科学的回答是:“【救星】比喻帮助人脱离苦难的集体或个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 608 页。商务印书馆 1993 年出版,北京)“帮助人脱离苦难”的共产党(集体),及其杰出的代表毛泽东(个人),“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这个代表能代表集体,那么,歌颂这个代表亦即歌颂集体。得“救”者感谢共产党和毛泽东,就以“救星”这个比喻称呼他们,这是亿万苦难群众的心声。这岂不是实事求是的吗?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和伟大领袖，一生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他一家为人民流血牺牲的人就有 6 位。毛泽东这位杰出代表救了中国共产党,救了中国革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救了中国人民……为什么人们不能对他表示感谢而称他为大救星呢?

至于前些年别有用心者搞“非毛化”,为了污蔑毛泽东而将“救星”与“救世主”乱联系,那只能暴露这些人的无知、庸俗和偏见。其实,这首歌词是完全经得起“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的检验的。它准确地反映了亿万人民的意志和思想感情。至

于用什么名词来反映这个现实，当然是用自然形成的“救星”这个最通俗、最能为大家接受的名词为好。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常常把杰出的球员称为“球星”，把杰出的歌手称为“歌星”，那么，“救助”他人最杰出者为什么不可以称为“救星”呢？

2.《东方红》的第二段歌词是：“毛主席为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咳呀，领导我们向前进”。这段歌词又有哪一句不是反映千真万确的客观事实呢？谁也不能否认毛泽东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道路是正确的。至于工作中有失误，那既非方向问题，也不能归过于毛泽东个人。失误虽带来损失，但功绩还是基本的。如果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故意抹杀“过去”的功绩，就更甚于“忘记”。

3.《东方红》的第三段歌词是“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咳呀，哪里人民得解放”。

这段歌词中说的共产党是指的一个“集体”，人们感谢她，把她比作给人民带来光明和温暖的太阳来歌颂，有什么不对呢？这里又有哪一句、哪一个字不是反映了千真万确的客观历史事实?!

请问：搞“非毛化”的先生们，难道你们为了“非毛化”就一定要把毛泽东连同中国共产党一起否定吗？你们凭什么来取消《东方红》？凭什么来取消人民群众歌颂党和领袖的权利？其实，党和党的领袖以及人民群众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马列和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但群众也要有党去组织和领导，这也是不能少的；党是领导群众的，但党也不能没有一个杰出的领袖来领导全党，坚持集体领导，也不能没有一个领袖。而毛泽东本人是始终谦虚谨慎的。他强调党和人民的作用，不提自己个人的作用，他反对把他与马恩列斯相提并论，比如学习革命导师的《三十三条语录》时，他就

没有同意把自己的话语编进去。又比如他的书法水平很高，但也不随便“题字”。他直到逝世前，头脑一直很清醒，他始终信任大家都尊敬的周恩来，在周恩来当选最后一届总理前，他是说“总理还是总理”。这也反映了他同人民的心愿是一致的。

1999年版编者取消【东方红】这个词条，这不仅是否定毛泽东，也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也是蔑视亿万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侵犯人民歌颂党和领袖的权利。《东方红》自从1942年诞生以来，在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世界大国中，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是一首传诵传唱最广的民歌。《东方红》唱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把她带上太空后，“东方红”也即成了响彻太空的人民胜利的凯歌。

1999年版编者虽然在《辞海》中取消了【东方红】词条，但是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取消她，至今《东方红》的歌声仍然响彻中国大地！

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党和领袖的关系，领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虽然有搞个人崇拜的人，但绝大多数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是不会盲目地去崇拜一个不值得崇拜的领袖的。几十年来，人民对毛泽东及其缔造的党的信赖和歌颂，绝不是凭空而来的，绝不是少数人搞个人崇拜搞得起来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有切身的体验，出自内心的敬爱、信赖和歌颂。

在革命航船遇到的许多风险中，人们亲身体会到只有毛主席最善于掌舵，善于绕过航道上的暗礁，使革命的航船避过翻船风险，安全到达目的地。这是最根本的。有些同志即使曾经挨过毛主席批评或者挨过“整”，而且“整”得很厉害，甚至也有的是“整”错了的，但是他们敬爱和佩服毛主席之心还是没有变。比如，“文革”开始时，首先被大“整”的是彭、罗、陆、杨四位高干。在“文革”中彭真被“整”，被“打倒”，家庭也受到株连。但是，彭真在1975年出狱，回到北京时却说：“没有毛主

席,我们的革命不会成功,不会有新中国,不会有今天,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领袖,对毛泽东同志必须全面地看,在我心目中毛泽东同志还是我们的毛主席。看了我们党的历史,更使人感到:只有毛主席才能拨正革命的航船。”“我彭真在历史上大大小小的错误不少,都是毛主席纠正的。”(转引自王燕玲:《彭真同志的晚年——访新华社高级记者李尚志》)杨尚昆也有同样的体验,他说:“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被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是讲毛主席好。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全面地估价毛主席。”(见《不尽的思念——名人忆毛泽东》第35~36页,地震出版社1992年出版)黄克诚、丁玲等人也都挨过批评,挨过“整”,但是他们热爱和敬佩毛主席的感情却是有增无减的。这种事例举不胜举。这就是看事情要看大局、全局,不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

总之,领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怀群众,人民群众拥护歌颂领袖。歌颂领袖毛泽东和歌颂党是一致的。这都体现着我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道德观,理想,信念,高尚的情操。1999年版《辞海》编者想加以否定是大错特错,这是否定不了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很善于在人民群众中发现和树立好的榜样。毛泽东就为我们树立过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等好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英、模人物,学习先进。我们就是这样形成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形成优良传统,这也体现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是主张继承这种优良传统的。他说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

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和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邓选》第2卷第367页）

胡锦涛同志任我们党的总书记以来，也是在继续大力坚持这个传统，树立了张云泉、任长霞、宋鱼水、牛玉儒、杨业功、丁晓兵等先进英、模人物。他们认真学习党的文件，学习革命导师的著作，学习现任领袖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这是完全应该和很正常的事。因为他们是响应党和领袖号召的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党和领袖也支持关爱他们，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这样，就能在全党、全军、全国树立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完全正确的，完全符合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的。我们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单位和部门，都应该这样做。这也是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

我国人民的传统之一是不仅歌唱《东方红》，歌颂领袖，歌颂党，而且努力学习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著作，从而在学习和工作方面不断涌现出先进人物、英雄、模范。我国广大群众，长期以来，普遍学习马列、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科学文化，至今党和政府仍提倡建设学习型的社会。先进帮后进，后进学先进，是我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

然而，1999年版《辞海》编者不仅取消、否定《东方红》，侵犯人民群众歌颂领袖和党的权利，还贬低、否定所有响应党和领袖号召的先进分子和英、模人物对领袖著作的学习。

毛泽东同志本人就是最重视学习、善于推动大家学习的。他最早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就是一例。但是这也受到编者的

淡化、贬低甚至否定。

（二二三）删改【湖南自修大学】词条。

1999年版编者把湖南自修大学倡导“办学要和‘改造现社会’相结合，……”删除；还把“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发展党、团员组织等方面，都起了较大作用”删除。（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972页与1999年版第1160页）

1999年版编者删除的是核心内涵。否定毛泽东重视学习的做法及其成效和意义。

其实，重视学习，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的一大优点和功绩，美国人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施拉姆写道：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其宗旨是创造一种环境，时而听演讲，时而同教员和同学开展讨论，以推动学生像毛泽东本人曾经作过的那样，进行独立学习和独立思考……它可以被看作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形成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象征。因为自修大学虽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这是他后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功。”（见《毛泽东》第4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译，红旗出版社1987年出版）

后来，在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办各类学习班是很普遍和经常的。在各个方面，在各条战线上、各行各业中，提倡学习，培养干部、英、模人物，也已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体现我们的价值观。这也是应继承发扬的优良传统，至今我们的党和国家还是在这样做的。但是1999年版编者却在删改词条中加以淡化、贬低、否定。请再看如下许多词条的删改。

（二二四）删改【夏明翰】词条。

1999年版编者把夏明翰“1921年到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

修大学学习。1925 年，后任中共湘南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极力主张武装农民，在推动湖南农民运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这段话删除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838 页与 1999 年版第 1010 页）

这位先烈临刑前写的壮烈诗篇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对广大的革命者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夏明翰就是到“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接受马列主义宣传，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入党的。他在重视农民革命作用问题上和毛泽东观点一致，是最早学习和支持毛泽东的同志之一。1999 年版《辞海》编者的删除这个内容显然出于“非毛化”的需要，不仅贬低毛泽东及其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起过积极作用，还贬低夏明翰烈士在“推动湖南农民运动方面起的积极作用”。

（二二五）删改【十七勇士】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把抢渡大渡河是“在敌炮火严密封锁下，在汹涌的波涛中”，“在火力的掩护下”“抢渡” 删除。（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1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37 页）

“十七勇士”是红军长征途中抢渡大渡河的英雄。其光辉事迹一直鼓舞教育着无数革命者。编者作此删除用心何在？这不是要后人对英雄的光辉事迹产生怀疑吗？

（二二六）删改【张思德】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张思德（1916~1944）四川仪陇人。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1932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1944 年 9 月 5 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并发扬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革命精神。”（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088 页与 1999 年版第 1316 页）

1999 年版编者删除的内容：

1. 删除“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这个定位和身份，难道就因为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地位卑微不能写进《辞海》？

2. 删除张思德在 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在长征时“负过伤”；难道这不算光荣历史？

3. 删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并发扬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众所周知，中国亿万人民都学习过“老三篇”，都敬佩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都敬佩毛泽东为一个普通战士致悼词。1999 年版编者删除这些内容，显然是对张思德，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的无理贬低和否定。

（二二七）删改【刘胡兰】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1932~1947）山西文水人。女。1946 年，在文水县云周西村积极领导群众投入土地改革和支援前线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 1 月 12 日，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军队突然袭击该村时被捕。她在敌人的威胁面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阎军计穷，又将同时被捕的六个农民当场铡死。但她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壮烈牺牲。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42 页与 1999 年版第 1869 页）

（二二八）删改【董存瑞】词条。

众所周知，董存瑞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用自己的手臂和身体来顶住炸药包炸桥，从而为部队前进扫除障碍的英雄。是位最

著名的“壮烈牺牲”者。可是,1999 年版编者恰恰删除、否定掉“壮烈牺牲”这四个字。(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599 页与 1999 年版第 730 页)

1999 年版编者在以上几个词条中,都是把英、模、先烈的事迹和“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精神删除,使人对这些事迹和英勇精神产生怀疑。例如,一位电影导演在文中写道:“没有谁亲眼看见他(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见《大众电影》2006 年第 8 期)对此,王多写文章批评道:“此文一出,‘董存瑞是虚假英雄’的论调一时间甚嚣尘上……但根据 2006 年 5 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董存瑞》一书记载:1948 年 5 月 25 日凌晨,隆化战斗打响,下午 4 点战斗结束,时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军分区司令员程子华率随行人员进入隆化视察战果。走到隆化中学门前,程子华发现一个班的战士在那里痛哭,上前一问,才知道他们的班长董存瑞为了战斗的胜利,手托炸药包炸毁了敌人的桥型暗堡,壮烈牺牲了。现场留下的一只鞋、半只袜子,确证为董存瑞的遗物。……对那种玷污英雄人物董存瑞的言论,许多参加过当年战斗的老战士,个个义愤填膺,进行了驳斥……除了董存瑞,对刘胡兰、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人物同样被某些人污蔑为‘宣传出来’的‘虚假典型’。”(见《解放日报》2006 年 8 月 19 日)

显然,1999 年版《辞海》编者几乎对所有的英、模、先烈的事迹和“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都作了删节,使人对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产生怀疑。这是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所起了的特别恶劣的作用,后果已很严重。近两年来,《人民日报》在《永远的丰碑》栏目中已一一重新刊登出了他们的光辉事迹。

(二二九)删改【焦裕禄】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1922~1964)山东淄博人。1947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副区长、区长、中共区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等职。1962年12月，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粮食产量降到最低水平，他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对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身患肝癌，仍忍受剧痛，坚持工作。被群众誉为"党的好干部"。1964年5月14日，在郑州逝世。（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012页与1999年版第2421页）

（二三〇）删改【王进喜】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1923~1970）劳动模范、大庆油田工人的英雄代表。甘肃玉门人。1938年，在玉门油矿当徒工，解放后任钻井队队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春，为了打破帝修反对我国的经济封锁，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党派他率领一二零五钻井队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他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工作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作出了贡献，被群众誉为"铁人"。1964年，出席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1968年，任大庆革委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在北京病逝。（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98页与1999年版第1447页）

在今天，私营企业主有评为"劳动模范"的，然而，王进喜的"劳动模范、大庆油田工人的英雄代表"的光荣称号却被取消了，王进喜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模范事迹被删除了，他"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也被删除。这又应该怎么理解？

（二三一）取消【向秀丽】词条。

1979年版原词条全文是：（1933~1959）广东广州市人。

女。1954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13日，她工作的广州何济公制药厂化工车间失火，危及爆炸性药物，整个厂房和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她奋不顾身，扑往正在迅速蔓延的火焰，抢救了国家财产，保护了群众安全。因严重烧伤抢救无效，于次年1月15日光荣牺牲。（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83页与1999年版第101页）

1999年版编者竟把介绍这样一位杰出的青年女共产党员模范事迹的词条取消掉了，把这样感人的事迹和贡献，这样一个值得学习的好榜样取消了。这是为什么？

（二三二）取消【郝建秀工作法】词条。

197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棉纺细纱挡车工的先进工作法，我国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在青岛国棉六厂时所创造。她根据环锭细纱机的生产在不同阶段中的规律，掌握挡车的巡回路线，主动将清洁、接头、换粗纱等工作合理组织，抓住清洁工作这一关键，在断头多时着重接头，断头少时多做清洁工作，结合其余工作，使劳逸协调，减少回花，提高产量和质量及看台能力。经1951年的总结与提高，全国纺织厂各工种中掀起了学习与推广的热潮，大大提高了职工们的操作水平。历年来还在不断充实提高中。（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953页1999年版第2351页）

王进喜、郝建秀和向秀丽等人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事迹、工作方法和精神不但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而且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不论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等程度，掌握技术的仍然是人，而人就是要有像王进喜、郝建秀和向秀丽那样的精神，才能做出巨大的贡献。这个简单的道理编者不是不懂，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删改和取消这些词条呢？

（二三三）删改【雷锋】词条。

197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雷锋（1940~1962）湖南长沙人。出身贫农家庭，父母兄弟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和资本家的迫害相继惨死，他七岁就成孤儿，在穷亲戚的帮助照顾下生活。1949年解放后，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被送入学校读书。他刻苦学习，并积极参加土地改革斗争。1956年，高小毕业后，在该乡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望城（现长沙县）县委当通信员和公务员，被评为工作模范。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参加根治沩水工程、团山湖农场和鞍钢等建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入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他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迅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评为节约标兵和模范共青团员。196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升任班长，并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1963年1月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997页与1999年版第2402页）

1999年版编者删除、否定的都是核心内容：

1. 删除雷锋"出身贫农家庭，父母兄弟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本家的迫害相继惨死……"。

2. 删除"1949年解放后，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

3. 删除"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4. 删除"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

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段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

1999 年版编者删除了上述四方面的内容，这就抽掉了雷锋成长为英雄模范人物的阶级基础，抹煞了党和政府对雷锋的关爱、教育加上雷锋本人努力学习和改造思想，才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事实。经这样删除后，雷锋岂不成了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精神、没有灵魂的“空壳子”？这就把雷锋变成了一个没有阶级立场，只知道盲目地“做好事”的人。把雷锋变为无害的偶像，赋予他某种荣誉，却阉割了雷锋精神的革命内容，磨灭了他的革命锋芒。青年人谁还能知道雷锋的个性特点是什么？雷锋是怎样成为雷锋的呢？

（二三四）删改【王杰】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山东金乡人。1961 年 8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班长。1962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伍后，一贯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工作中不怕艰苦困难，曾荣立三等功两次。1963 年 3 月，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他事事以雷锋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成为模范的共青团员、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战士。1965 年 7 月，他到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训练，在炸药发生意外爆炸的紧急时刻，他为了掩护在场的 12 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的生命安全，舍己救人，用身体扑到炸药包上，英勇牺牲。根据他生前的申请，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5 年 11 月 27 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王杰班”。（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19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442 页）

1999 年版编者删除的内容是：

1. 删除王杰“一贯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

2. 删除他在“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他

事事以雷锋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成为模范的共青团员、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战士”。

3. 删除他“舍己救人”。

看来，1999年版编者似乎见到“共产主义战士”都要删除。但又因人而异，在1999年版《辞海》第1216页【宋庆龄】词条中，仍写她是“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的确无愧于“共产主义战士”这个光荣称号。可是，请问编者：为什么雷锋、王杰就不够“共产主义战士”的资格？

实际上，所有的先进、英、模人物的共同的首要优点，就在于积极学习党和领袖的著作与思想，响应党和领袖的教导和号召，然而，这些都被1999年版编者完全删除。这又是最有力地证明1999年版《辞海》编者肯定毛泽东思想是假，否定毛泽东思想才是真。雷锋、王杰等人“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被删除；王进喜“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也被删除；焦裕禄“运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发扬大无畏精神”也被删除。这就成了：毛泽东的“著作”不能学、毛泽东的“思想”也不能学，也不可“运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进行革命或建设工作了。那么，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究竟应该怎样学？怎样用？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这些体现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先进人物、英雄、模范、先烈们的事迹和英勇精神的删节例不胜举。但是，正如中共中央党报在《永远的丰碑》中再次重申和强调的“立功创模运动”是我们的一个“优良传统”。(《人民日报》2007年9月14日)这个“优良传统”是应该坚持和发扬的。实际上，在我们的党和国家里，至今仍然是在不断地产生先进、英、模人物，如任长霞、宋鱼水、牛玉儒、杨业功、丁晓兵等等。他们的事迹，代表我们党和社会上存在的浩然正气！我们的党和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是表彰他们，号召大

家来学习他们的。因为这体现我国人民的价值观、荣辱观和基本生活方式。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价值观、荣辱观都是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的价值观、荣辱观是不同的。1999 年版编者公然否定我国公民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荣辱观还表现在取消和删改如下词条：

（二三五）删改【同志】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把"同志"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也删除、取消了。（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96 页和 1999 年版第 236 页）

几十年以来，我国人民群众彼此之间，一般已习惯相互称呼为"同志"。这是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和有着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的称谓。也体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价值观和生话方式。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取消"同志"这个称谓，绝非一件小事。这是同十三亿人民都有直接关系的大事。从我国的历史来看，称谓的改变从来就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意味着"改朝换代"的大事。清朝统治时代对人有"大人"、"老爷"的称谓；辛亥革命，改朝换代了，1912 年 2 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取消"大人、老爷"的称谓，改称为"先生"或"君"；之后，1914 年，袁世凯窃取大总统的职位后，又想改朝换代当皇帝，于是再下令恢复"大人、老爷"称谓，一律禁止彼此以"先生"相称。（见《历代篡逆史鉴》第 4 卷第 2868 页）当今，在欧洲，捷克反共势力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后，也下"命令""取消'同志'的称谓，一律改称'先生'。"（新华社报道，见《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 1 辑第 336 页）匈牙利共产党"十四大"转向，"同意在宪法中抹去'社会主义'字样"，公民彼此之间的称谓自然也随之改变。（同上书第 111 页）

鲜明的对比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古巴，他们就是始终“不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甚至普通百姓对国家最高领导人，见面都称‘同志’……对外来客人，多数情况下称‘同志’，在正式官方场合则称‘先生’或‘同志’，是出于礼节性交往的需要。”（见《中国社会报》2005年2月28日报道）

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你们这样取消我国公民之间的“同志”称谓，难道认为毛泽东逝世后我国已“改朝换代”、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吗？可是，现在中国共产党还在执政，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有些糊涂的同志，长期以来不问政治，竟然在党内也不称“同志”了，而称党委书记为“老板”、“老总”。这岂非咄咄怪事！这样取消“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为“同志”，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这个执政的共产党警醒和深思？

对于“同志”这个称呼，毛泽东极为重视，毛泽东在1959年8月3日《致刘少奇、周恩来等》信中说：“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彭总，称彭德怀同志……”（《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是把“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列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的。（《邓选》第2卷第367页）

如果说同志是指理想相同、志愿相同，那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我们十三亿人民共同的理想。我国公民彼此之间理应互相以同志称呼。党员更应带头这样称呼。可是，编者取消、否定了这个称谓，这是为什么？

（二三六）删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1951~1952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要对象是解放以前的旧知

识分子。目的是为清除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方法是发动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动员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在实际斗争中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经过这一运动，知识分子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734 页与 1999 年版第 2095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的正是关键性的核心内容：

1. 删除“目的是为清除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 这就取消了运动的目的性。

2. 删除“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取消了改造思想依靠的武器和方法。

3. 删除“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等运动，在实际斗争中提高认识、改造思想”。这又取消了结合实际学习和改造思想。

4. 改写的词条在写了运动的具体经过后突出增写：“但运动中存在着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的偏向，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

运动中产生缺点和“偏向”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纠正的。但是，删除、取消了上述 3 点，岂不等于否定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其实，学习和改造思想，实质上对所有的人都是适用的，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都说过，包括他们本人在内大家都要学习、都要改造。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正体现我们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二三七）取消【批评和自我批评】词条。

全文见本书上文第六九词条。（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671 页与 1999 年版第 812 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既然否定思想改造，自然也要否定"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学习和改造思想是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所谓"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还不是由于受了批评或批评重了或批评错了吗？这也是难免的，但这是可以纠正的，经验多了，错误就会少犯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因此，在对待和处理矛盾的时候，绝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要分清是非、达到团结的目的，很自然地就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如果要求所有的批评都百分之百正确是不现实的。

1999年版编者否定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大错特错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而且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它是人们保持思想健康的防腐剂。只有依靠它才能把违纪犯罪思想消灭于萌芽状态。可是，编者把它取消掉了，这就等于取消了人们的免疫功能，这样，人们的错误思想，也就可能发展成为违纪、犯罪、腐败行为了。

实际上，"批评和我自批评"是个好方法。这个方法，也早已被运用到我国广大人民之间，成了我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毛泽东1956年12月4日致黄炎培的信中说："你们的会议（民主建国会）开得很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日益做得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对人民内部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希望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4、51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的确是改造思想、解决党内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创造良好社会风气的好方法。

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反复多次强调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党内、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关系到培养下一代的问题。”（《邓选》第2卷第14、392页）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强调的两个问题之一，就是“要在党内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号召“全党同志必须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进一步健全党内生活制度，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你们为什么要取消【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词条？

（二三八）取消【团结—批评—团结】词条。

197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就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763页和1999年版第918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取消【团结—批评—团结】这个词条，否定解决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更显得荒谬了。因为这个公式，无论从过去到现在，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领导到基层领导，从干部到群众，大家都是把它作为一个解决党内、人民内部矛盾的好公式来使用的。编者为了搞“非毛化”，取消毛泽东思想、取消毛泽东的贡献，竟然把这个词条连同这个公式都取消了。

对以上3个词条的删改和取消，说明了一个根本性的大问

题，这就是在毛泽东逝世后我国就出现了一股“非毛化”思潮。这主要是一部分世界观没有改造又不愿意改造的知识分子掀起的。他们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对“批评与自我批评”。1999年版《辞海》编者取消和否定“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团结—批评—团结”词条，删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词条，正是反映和支持这股错误思潮，并与之相互呼应的表现。

有些先生公开发表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们把党内的与非党的知识分子，都说成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与傲骨的个人。或者把知识分子说成超越于任何阶级、不承认任何别的阶级的权力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阶级。有位先生的文章说：“知识分子的批判的独立性、自主性……贯穿和体现在每一个知识分子个体身上，构成人格力量……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是反权力、反集体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会一个又一个遭到政治的打击和社会的遗弃”，文章还认为知识分子当然有知识分子的“思想”，“思想这个东西，按其实质来说是超越组织的。”（见林贤治《郭沫若与鲁迅》，载《黄河》1998年第1期）

因此，他们认为要求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就是否定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是要知识分子“非己”，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有位先生写道：“非己，意味着熄灭自己的光。非己，并非单独的个别现象。岁月变幻中，几乎每一个文人都在非己，都在非己选择上徘徊。在非己方面，郭沫若显然比冯友兰走得更远。……长达十年的‘文革’，郭沫若始终把它与毛泽东视为一体……他始终因为崇拜心中的红太阳而去歌颂，而去非己。”（见李辉《太阳下的蜡烛》，载《沧桑风云》，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有位先生进一步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说成是：“知识分子之改造之所以形成悲剧，是因为其整体趋势是把独

立者改造成为附庸者，把思考者改造成为盲从者，把批判者改造成检讨者和阿谀者……抵制改造，实际上是抵制堕落。”（见丁东《从五本书看一代文人》，载1996年第4期《黄河》）

因此，他们认为郭沫若等学者一生是在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即“非己”中度过的。郭沫若最后没像巴金一样写《随想录》就被他们骂为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阿谀”者。毛泽东去世后，这些先生认为反攻的时机到来了，就把“非己”改为“非毛”！

既然他们认为“自我批评”就是自我“非己”，那么“批评”就是外部强加的“非己”和打击迫害了。1999年版《辞海》编者就反映和支持这股思潮，干脆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词条取消，还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个词条的相关内容绝大部分删除掉，并增写：“思想改造”中“存在着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

实际上，这些先生是颠倒了是非。“思想改造”、“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革命党派或个人都是个好东西，是个宝贝，是绝对必须的。人类历史的进步，从来都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只是在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人们才更加自觉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改造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毛泽东还首创了“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又每经历一段时期进行一次整风，改革开放后也进行过整风。邓小平还说过：“在以后一个适当时间，还要进行整风，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邓选》第2卷第381页）为什么现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整风也不提了，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得很明确：“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运用，阶级感情还是旧

的……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未转变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毛选》第5卷第407页）

毛泽东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以身作则，就是这么做的。他说过：“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比如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1991年版《毛选》第3卷第851页）自觉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这已在中国共产党内实行了几十年，并已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批评和自我批评”、“改造思想”已经发展到全社会去了。本文前面已提到民主党派的领袖之一的黄炎培，首先把它运用到民主建国会中去了，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工商界的领袖人物荣毅仁也是个知识分子吧。他也经历过这个时代，他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毛主席鼓励我们说，要为人民做好事，一贯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怀的”，“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是可以掌握的，是大有希望的”。荣毅仁说：“毛主席的话是激励我改造思想、脱胎换骨的有力鞭策”。（见《人民日报》1993年9月8日）荣毅仁是始终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不久前，荣毅仁同志逝世了，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共产主义战士”。（见《人民日报》2005年11月4日）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岂不是也自觉改造思想，并取得世人都惊叹和称道的良好效果吗？思想改造好，“非己”“非”得

好,“旧我”变成“新我”的事例是多得举不胜举。

为什么有些先生却是如此反对、仇恨、攻击和污蔑“思想改造”、“批评与自我批评”呢？可能他们就是1999年版《辞海》编者说的在运动中受了“伤害”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那末,如果不“要求过急过高”、不“批评”他们是否就好了呢?恐怕也不见得。即使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概不搞,只进行正面教育，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还是要坚守他们自己的阶级立场,还是要起来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请听北京大学的某些教授和知识分子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是怎么说的。他们污蔑我国50多年来的中学语文教育说:“中学语文教育承担的重要功能,就是培养听任流氓语言支配的奴隶和奴才”,他们污蔑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教育的“酱缸”里,“腌出一批批发咸、发酸、发臭、发苦、发甜、发辣、发木的脑瓜”,“中国人民真是一个既极为可怜又极为可怕的群体”。（见《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正面教育已恨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要求取消《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些课文,说这些课文都是教育和要求人“做党的驯服工具”,把人变成“工具”为“阶级斗争”作“牺牲品”的。他们说现在这种观念已“陈腐”了,不能再提倡了。他们要求换上汉奸周作人、胡适等人的文章作课文。这样他们才满意,才算实现了意识形态“与国际接轨”。但是绝大多数人民是绝对不能允许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善恶、倒行逆施的。

综观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上述词条的取消、删改,充分地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真实面目和图谋。他们是要利用《辞海》的修订来篡改和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用他们的世界观、阶级立场、价值观念、基本生活方式来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国家,改造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能允许吗?!

十四、评 1999 年版《辞海》对马恩列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否定

我们在上文分十三个专题，着重指出了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 238 个有关词条删改中的严重错误，是在于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如果有人认为，这些删除只是针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是要把反映在 1979 年版原词条中的所谓“左”的影响或内容删除，是为了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思想路线的轨道上来，那就错了，那就大错特错了！1999 年版《辞海》之所以要全面否定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否定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开创的事业和学说，也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1999 年版《辞海》编者的指导思想是全面否定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也用上述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同样办法，通过对众多有关词条的删改，否定马恩列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现

在，我们就来看一看1999年版《辞海》编者是怎样通过对如下第二三九至第二八五这47个词条的删改和取消，来贬低和否定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其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第一，对马克思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及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否定。

（二三九）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的删节：

1. 删除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2. 删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3. 删除“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3页与1999年版第1706页）

（二四〇）在【毛泽东】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大党，如果这个大党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党，也不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党，如果这个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不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大部分否定掉了。因此，对上述两个词条的删改，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否定。

1999年版编者进一步通过删改马克思、恩格斯词条否定他们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的地位和革命理论：

（二四一）删改【马克思】词条。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1979年版原词条的主要内容是：

1.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2. 马克思以犀利的笔锋对反动政府的政策作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3. 马克思于 1843 年 10 月迁居巴黎，同德国和法国秘密工人团体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并经常参加德国和法国工人、手工业者的集会。

4. 马克思第一次指出了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消灭剥削制度的阶级，提出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

5. 两位伟大导师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6. 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

7.《宣言》总结了以往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重要的思想，完整、系统而严密地阐述了他们的伟大学说。

8. 反对各国反动派，特别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俄国；团结国内一切革命的和进步的力量，打击以普鲁士政府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势力。

9. 马克思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著名论点。

10. 马克思早在主编《莱茵报》时期就致力于钻研政治经济学，1859 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详尽论证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

11. 同时，还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12. 爱森纳赫派领导人醉心于形式上的团结，竟向拉萨尔派妥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坚决反对这种“拿原则做交易”的机会主义倾向。

13. 批判德国党内苏黎世三人团的改良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

14. 反动政府的迫害、极端贫困的生活以及十分繁重的理论和实际工作，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

15.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是"科学巨匠"，但是"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74 到 575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131 页与 1999 年版第 1366 页）

（二四二）删改【恩格斯】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的主要内容是：

1. 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2. 恩格斯发表文章强烈反对君主政体、等级制度、贵族特权等。

3. 恩格斯对反动的神秘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反动的人物的批判语句中的"反动的"这个词。

4.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深刻矛盾，有力地控诉了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

5.《宣言》总结了以往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重要的思想，完整、系统而严密地阐明了他们的伟大学说。

6. 两位导师创办了《新莱茵报》，把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在周围，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7. 恩格斯亲自参加了德国人民武装起义，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8. 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这部著作中对于武装起义问题作了重要的论述。

9. 恩格斯在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后，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积极地参加了国际的领导工作，对蒲鲁东派等等进行了原则性的路线斗争。

10. 恩格斯在第一国际解散后，在马克思主要致力于写作《资本论》的情况下，承担了在定期报刊上，特别是在同敌对思潮的斗争中发表他们的见解的任务。

11. 恩格斯对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妄图推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杜林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这些批判文章印成《反杜林论》，它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42 页）

12. 恩格斯还同马克思对法、英、美等国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批判和揭露。

13. 恩格斯有力地批驳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

14. 恩格斯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战斗不息。

15.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首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03 页）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9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31 页）

（二四三）删改【共产主义者同盟】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秘密革命组织。1847 年 6 月，在伦敦由正义者同盟改组而成。马克思、恩格斯是同盟的领导人。他们为同盟制定的纲领，就是不朽的《共产党宣言》；为同盟规定的战斗口号，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建筑在阶级对立上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建立无阶级、无私有财产的新社会。同盟团结了各国革命工人，广泛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其盟员并积极参加了欧洲 1848 年革命。革命失败后，同盟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852 年 11 月，宣告解散。同盟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雏型。（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24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499 页）

1999 年版《辞海》在以上 3 个词条中，删除原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这个基本的事实，以及对他们的革命业绩的评价。改写为：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再加生平简历。其实，对照国际共运史，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曾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早期的领袖，后又是"第一国际"的"创立者和领袖"。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指导第二国际数年。后来列宁、斯大林都曾是第三国际的领袖。在第三国际解散后，无产阶级还是把马、恩、列、斯视作自己的精神领袖的。1999 年版编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词条中所删除掉的各 15 项内容，恰恰都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事实或理论贡献。可以说，这些内容对于资本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来说都是最不愿肯定或"接受"的；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来说，却是肯定和热诚拥护的。

古人云："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因此，欲否定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敌对势力是从歪曲和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及其领袖和理论开始的。

（二四四）删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词条。

《辞海》1999年版编者删除的内容：

1. 删除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在于不了解人的革命的实践活动在认识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2. 删除"《提纲》还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揭露了它的认识论的根源，并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纲》强调哲学应从解释世界的工具变成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86页与1999年版第347页）

这个《提纲》是马克思1845年写的，恩格斯把它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旧世界观、旧唯物主义只是"解释世界的工具"，而新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在肯定"人的革命实践活动"的前提下使之"变成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了。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内容。1999年版编者是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告别革命"的思潮相呼应，竟把这个核心内容删除。难道这个删除不是否定吗？

（二四五）删改【共产主义世界观】词条。

《辞海》1979年版全文是：无产阶级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49页）。它如实地反映世界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规律，指导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的目标。它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科学的世界观。（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40页与1999年版第1499页）

1999年版编者在前述词条中，把"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也删除，在上述词条中，把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如实地反映世界

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规律”的“最完全最进步最科学的世界观”又加以删除。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是否也考虑到西方对此“不接受”?有些共产党人许久以来已不提共产主义世界观,也不提无产阶级世界观了,更不提它是“最完全最进步最科学的世界观”了。只抽象空洞地提“正确”的世界观。共产党人是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的,而今不敢理直气壮地讲共产主义世界观,这意味着什么? 值得深思。

(二四六)删改【共产党宣言】词条。

1979年版《辞海》全文是:著作名。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完整、系统而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宣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它的阶级斗争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宣言》论述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历史使命,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代表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真正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宣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公开宣布无产阶级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并运用这个武器去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宣言》阐明了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宣言》还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宣言》最后,庄严地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这部著作

从它诞生时起就鼓舞和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成为无产阶级最锐利的战斗武器。恩格斯指出，它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40页与1999年版第1499页）

1999年版编者删除、否定1979年版原词条的内容是：

1. 删除、否定《宣言》是“完整、系统而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

2. 删除、否定《宣言》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3. 删除、否定《宣言》“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代表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真正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

4. 删除、否定《宣言》是“公开宣布无产阶级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并运用这个武器去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

5. 删除、否定《宣言》是“阐明了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6. 删除、否定《宣言》是“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7. 删除、否定《宣言》“这部著作从它诞生时起就鼓舞和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成为无产阶级最锐利的战斗武器。恩格斯指出，它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1999年版编者所删除、否定《共产党宣言》的以上7点核

心内容，正是《宣言》的灵魂和革命性所在。经过这样的删除，《宣言》还剩下什么呢？真是既“阉割它的革命内容”又“磨灭它的革命锋芒”。

（二四七）删改【反杜林论】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原词条的主要内容：

1.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杜林企图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实行全面的‘变革’，他得到了伯恩施坦等人的支持。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使德国工人运动健康地发展……”

2. “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作了论述。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列宁指出：《反杜林论》‘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92 页），它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42 页）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66 页与 1999 年版第 322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既删除、否定《反杜林论》这部著作产生的背景及其针对性和战斗性，又删除、否定这部著作和《共产党宣言》具有同样重要性和同样是“工人必读的书籍”的评价。可谓竭力贬低。

（二四八）删改【剩余价值学说】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掉原词条内容：“这就以革命的思想武装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指导他们为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91 页与 1999 年版第 229 页）

对上述词条的删节也是把它的实践意义删除掉，即“磨灭它的革命锋芒”。

（二四九）删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掉的主要内容：

1. “本书概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原理。”

2. “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

3. “本书还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解决这一矛盾。马克思称本书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8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16 页）

1999 年版编者删除掉上述词条的 3 项内容岂不都是核心内涵？

（二五〇）删改【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写于 1850 年 1~11 月。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这部著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法国 1848 年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书中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著名论点，并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经典术语，阐明了这个专政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任务。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书中还阐述了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农民和小资产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5 页与 1999 年

版第6页）

1999年版编者承认"这部著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法国1848年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 这表明对这个"总结"在原则上是肯定的，但是这个"总结"的精髓却全部被删除。那岂不是使肯定变成了"抽象肯定"？结果还是具体否定。

（二五一）删改【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词条。

1999年版《辞海》删除的内容是：

1. "强调了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指出：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2. 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的著名原理。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812页与1999年版第979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是否以为上述几个词条的"革命锋芒"太尖锐了，对旧世界统治者也太刺激了，所以，就要狠狠地磨灭其"革命锋芒"，加以删除？

（二五二）删改【哥达纲领批判】词条。

1999年版《辞海》删除的内容是：

1. 删除这一著作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2. 删除这一著作"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

3. 马克思指出：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认为，这个著名的论断总结了马克思的全部革命学说"亦被删除。

4. 删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5.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迫使个人奴隶般

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有了巨大增长，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这段话亦被删除。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59 页与 1999 年版第 70 页）

《哥达纲领批判》这一著作是我们党曾组织全党学习过的，很多同志是比较熟悉的。上述 5 处被删除是为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是错的？因为是空想？因为……

（二五三）删改【论权威】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恩格斯写于 1872 年 10 月至 1873 年 3 月。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本文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权威、任何服从的谬论，分析了产生权威和服从的社会经济原因，并阐述了在任何社会活动中权威的客观必要性。无政府主义者在产生国家的社会关系没有消除以前就要求一举废除政治权威和国家，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恩格斯揭露了这一要求的反动性和荒谬性，指出：革命本身就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要求，其实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382 页与 1999 年版第 470 页）

（二五四）删改【巴黎公社】这个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1871 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了工人革命政府，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资产阶级政府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投降政策，激起广大群众极度不满。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工人举

行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26日，进行公社选举。28日，公社宣告成立。公社委员中，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多数派”，蒲鲁东主义者组成“少数派”。在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公社打碎了资产阶级军事官僚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家政权。将逃亡业主的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实行工人监督生产，颁布一系列保护劳工利益的法令。公社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许多国外革命家和工人参加了公社战斗。但公社缺乏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领导，未能建立工农联盟，没有及时地向凡尔赛进行军事进攻，没有坚决地镇压反革命。5月21日，凡尔赛反革命分子在普鲁士军队帮助下攻入巴黎，经过激烈巷战，28日，公社失败。马克思对巴黎工人的“冲天壮举”予以高度评价，曾通过第一国际对巴黎公社给以具体帮助和指导，并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的这一革命原则是永存的。（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02页与1999年版第123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了以上这个词条的全部核心内容，基本上否定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和精神。

1. 取消了对公社基本概况的简要正确的介绍，只抽象地写了一些社会改革的措施，使后人不知道“巴黎公社”的主要的革命措施体现在哪里。

2. 把“马克思对巴黎工人的‘冲天壮举’予以高度评价，曾通过第一国际对巴黎公社给以具体帮助和指导”等重要内容都取消了。

3. 把“巴黎公社的这一革命原则是永存的”这个“革命的内容和锋芒”取消了。

第二，否定列宁斯大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否定列宁主义。

（二五五）删改【列宁】词条。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改原词条的主要内容是：

1. 删除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改写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主要创建人。”再加生平简历。

2. 删除列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

3. 删除列宁“开始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进行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4. 删除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农联盟思想”。

5. 删除列宁“在监狱和流放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从事写作”。

6. 删除列宁“对党内知识分子同路人打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配合资产阶级在思想理论战线发起的进攻给予有力的回击；概括了恩格斯逝世以后的科学发展成果，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坚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

7. 删除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继战前对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探讨，先后在许多著作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关于这一问题的纲领和政策”。

8. 删除列宁“指出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意义，规定了工人阶级在创造自己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论述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基本特点”。

9. 删除列宁“在1918年7月以后的两年中，用极大的精力总结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10. 删除列宁“揭露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11. 删除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指出这一问题是总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

12. 删除“列宁把自己的整个一生献给了为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专制政体的压迫下、从资本的压迫下、从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下解放出来的事业，献给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他同各种敌人进行了坚决无情的斗争。”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33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612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否定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又否定列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更否定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伟大贡献。这实际上也同时是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一种手法。

（二五六）删改【斯大林】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原词条的主要内容是：

1.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2.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的一生，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对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绩……”。改写其生平历史，并突出增写“斯大林的一生有严重错误……”

3. 斯大林 1894 年进梯弗里斯（今第比利斯）正教中学读书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在这个时期努力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许多著作，并在工人小组里从事宣传、组织罢工活动。

4. 斯大林从1900年12月列宁在国外创办《火星报》时起，斯大林就完全拥护该报的主张，认定列宁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立者、领袖和导师。

5. 斯大林先后被捕七次，流放六次，从流放地逃出五次。在这期间从未间断过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6. 斯大林缺席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7. 斯大林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纲领，得到列宁的很高评价。

8. 斯大林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俄国获得胜利的学说，阐述并坚持了列宁的武装起义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

9. 斯大林先后写了《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再论民族问题》等论文，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

10. 斯大林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常被派到最重要的战线上去工作。

11.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者，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的事业，领导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并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12. 斯大林同党内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头目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等作了坚决的斗争。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78页与1999年版第1790页）

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的事业，领导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并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

政的国家。这是主流。否定这一点，实际上也是敌对势力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手法。

（二五七）删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词条。

1979版《辞海》全文是：著作名。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经联共（布）中央审定。1938年9月，在《真理报》上发表，10月，出书。这部著作是在斯大林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编写的。全书分为12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联共（布）的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叙述了1883~1937年这一时期联共（布）的产生和发展，总结它领导人民推翻沙皇制度、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了同工人阶级的一切敌人、同工人运动中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党、同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的经验。这部著作的结束语把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时期的基本经验概括为：（1）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取得胜利；（2）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3）如果不粉碎那些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4）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者的使命；（5）党如果陶醉于胜利而骄傲，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地公开地诚恳地纠正这些错误，党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6）党如果不同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如果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如果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有能力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删除掉上述内容后增写了这样一段话：

该书曾被各国共产党作为学习联共（布）历史经验的重要读本而得到广泛传播。但该书受到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在论述联共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时存在不实事求是和曲解之处。（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820页与1999年版第2199页）

可是，上述词条被1999年版《辞海》编者所删除、否定的却不是所谓对历史的“曲解之处”，而是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精髓部分，即：《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六条》。当年“延安整风运动”曾将它作为二十二个学习文件之一，组织党员学习过这“六条”经验和理论。这“六条”无论在当时和现在来看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怎能把凡是斯大林的著作或参与编写的历史书，无条件地一概否定、抛弃呢？

在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内部出现了叛徒、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他首先带头造谣污蔑和攻击斯大林，实质上也是污蔑和攻击苏共，攻击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被各国反动派所利用，一时期造谣污蔑和攻击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思潮。社会主义进入了低潮时期。1999年版《辞海》编者竟不辨大是大非，紧跟这股反动思潮。不但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了歪曲与全盘否定，还把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等等词条，（可对照《辞海》1979年版第117页与1999年版第139页）以及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的《列宁主义问题》等词条都取消。（可对照《辞海》1979年版第1334页与1999年版第1416页）种种造谣、污蔑、攻击，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不公正，而且是对苏联共产党、对国际共运、

对社会科学真理的污蔑和攻击。

其实，斯大林不仅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斯大林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纲领，得到列宁的很高评价”；斯大林“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引用这个理论并加以发展，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并用它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些都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和真理。

乌云总是不能长久地遮住太阳。多少年月过去了，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很多受谎言蒙蔽的人开始清醒过来了。在俄罗斯已出现了重评斯大林的思潮了。官方和民间，老干部和年轻干部，很多人起来为斯大林说公道话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了。

据吴恩远同志在《俄罗斯重评斯大林》的文章中介绍，俄罗斯“尤·叶梅利亚诺夫在其著作《对斯大林编造的谎言》中指出：‘过去强加给斯大林的几项罪名主要是违背列宁明确要解除他领导职务的遗言，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力，为了建立其个人专政，实行残酷的恐怖行动而首先打死基洛夫；由于其多疑的性格，斯大林清洗消灭了很多军队领导人，导致卫国战争初期红军失利’”。尤·叶梅利亚诺夫在著作中批驳了“过去强加给斯大林”的“谎言”。《俄罗斯重评斯大林》的文章指出：“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和民众涌现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2003 年 3 月 5 日，在斯大林逝世 50 周年之际，这股思潮达到一个高峰。苏联解体以来，围绕斯大林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但这一次的特点，正如《消息报》指出：‘在人民领袖斯大林逝世 50 周年之际，为他恢复名誉完全成为有组织的行动。’同时，如果说过去对斯大林的情感主要在老一辈人中，现在则呈现出向俄罗斯年轻人转移的倾向；如果说过去主要是共产党人纪念斯大林，现在则扩大到其他党派和民众。2002 年 1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波兰

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可见，目前俄罗斯对斯大林的评价已经引起相当高的层次、相当范围的关注。"对于评价斯大林，有一个根本性的事实是任何造谣者都无法否认的："当斯大林逝世之际，他给俄罗斯留下了什么？俄罗斯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国！而斯大林给个人留下什么？在其逝世之际，工作人员在他的驻地仅仅找到几双织补过的短袜子，几双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和两套军服，其中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于节日检阅穿的。"（见 2004 年第 8 期《新华文摘》第 123~126 页）

最近，俄罗斯教育部再版发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了。此次再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完全采用了 1945 年的装帧风格。出版者在扉页上大字写道："你读过《简明教程》吗？她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浓缩，曾在世界上以 126 种文字出版，发行 4280 万部。"（见《中华魂》杂志 2006 年第 3 期第 53 页）

如果我们认为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辞海》中否定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确有太多太大的所谓错误，他们并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又错了，是大错特错了！他们之所以要全盘否定斯大林，正是因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是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开创的事业和学说的人。当然，错误也是有的，问题在于必须站在革命者和人民的立场上，分清错误的性质，分清功过的主次，作具体分析。他是功大于过的。他的错误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修正主义者是打着否定斯大林的招牌，实际上否定斯大林所继承的马列主义。

（二五八）删改【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词条。

197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著作名。斯大林写于1926年1月。编入《斯大林全集》第8卷。这部著作批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组织的新反对派对列宁主义的歪曲，揭示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文中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三个基本方面：（1）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巩固和其它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促进世界各国的发展和胜利；（2）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和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证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3）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文章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工会、苏维埃、合作社、青年团）的关系，指出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群众组织；没有党这个主要领导力量，就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83页与1999年版第471页）

（二五九）删改【论列宁主义基础】词条。

197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著作名。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发表于1924年4月和5月。编入《斯大林全集》第6卷。文中论述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方法、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农民问题、民族问题、战略和策略、党、工作作风等问题。斯大林阐明了列宁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概括了列宁在新的历史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新贡献，给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这一著作对于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保卫列宁主义起了重大作用。（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83

页与1999年版第471页）

以上这3个词条，主要反映了斯大林继承列宁主义，对苏共历史的正确总结和伟大历史贡献。1999年版《辞海》编者却加以删除、否定。可是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存在，真理也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斯大林继承和捍卫列宁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就是证明。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1999年版《辞海》编者否定列宁、斯大林和苏共历史的目的，在于否定苏共和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于是，还在如下一系列词条中删除列宁、斯大林的正确理论：

（二六〇）删改【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词条。

《辞海》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列宁写于1905年6~7月。编入《列宁全集》第9卷。这部著作阐明了布尔塞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正确策略，批判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论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贯串全书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列宁指出，民主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但是民主革命进行得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因此，民主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无产阶级不要避开和不关心民主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而应该尽最大努力参加并领导这种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而斗争。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它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争取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人民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应当是工农民主专政。列宁在书中还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

的思想，明确指出，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不应当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而应当立即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有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1999 年版编者在这个词条中删除的，不但是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俄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中国学习这个经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遵循的策略和理论。因此，编者否定它不仅是对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的否定，也意味着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否定。（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8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16 页）

（二六一）删改【论国家】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列宁 1919 年 7 月 11 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编入《列宁全集》第 29 卷。列宁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实质、历史类型和无产阶级对待国家问题的态度。指出：尽管国家的历史类型和组织形式不同，但都是专门从事管理的强制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它是阶级社会的特殊产物，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无产阶级要摒弃关于国家问题的一切资产阶级偏见，把国家机器从资本家那里夺过来，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用它去消灭一切剥削，消灭阶级。只有到世界上再也没有阶级的时候，国家才会消亡。（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382 页与 1999 年版第 470 页）

（二六二）删改【国家与革命】词条。

1979 年版《辞海》全文是：著作名。全名《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写于 1917 年 8~9 月。编入《列宁全集》第 25 卷。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作了经典性的论述。书中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书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

家的学说，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考茨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充分暴露了他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面目。书中还指出：无产阶级需要专政和执行专政职能的国家，是为了用来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国家机器能否为无产阶级服务，取决于它是社会公仆还是社会主人；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能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能够用来为自己服务的国家机器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的、最高的民主形式。书中还分析了国家消亡和经济基础变化的关系，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完成，建立了单一的公有制，阶级消灭，国家的镇压职能消亡，但国家还有保卫按劳分配的职能，按劳分配是保证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所代替，国家保卫按劳分配的职能消亡，国家也就完全消亡。本书在国家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771 页与 1999 年版第 927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的主要内容：

1. 删除这部著作是对国家的“经典性的论述。书中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

2. 删除“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考茨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充分暴露了他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面目”这两句名言。

3. 删除“书中还指出：无产阶级需要专政和执行专政职能的国家，是为了用来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4. 删除“国家机器能否为无产阶级服务，取决于它是社

会公仆还是社会主人”。

5. 删除“本书在国家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999 年版编者这样的删除上述 5 点都是核心内容和基本的观点，实质上把这部极重要的马列经典著作的革命锋芒和重大意义取消掉了。

（二六三）删改【无产阶级专政】词条。

《辞海》1979 年版全文是:亦称“工人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对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阶级实行的专政。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在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的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 页）无产阶级专政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它的形式由各国革命发展的进程所决定。它的历史任务,在国内方面,主要是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为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在国际方面,主要是防御国外敌人的侵略和颠覆活动，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660 页与 1999 年版第 800 页）

1999 年版编者删除上述词条的内容，一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是对“敌对阶级实行的专政”，二是它“在国内方面”和“在国际方面”的“历史任务”。那岂不等于否定、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二六四）删改【社会制度】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总称。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经济制度，即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社会制度还包括由经济制度所决定，并为它服务的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包括它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制度，体现着不同的社会性质。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78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12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这样的删除，显然是不承认“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制度”。

（二六五）删改【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著作名。列宁写于 1919 年 10 月。未完稿。编入《列宁全集》第 30 卷。文章根据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年来的经验，科学地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经济和政治的特点。文章指出，过渡时期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与此相适应的阶级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过渡时期的经济表现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激烈斗争：资本主义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以投机倒把来反对国家实行余粮收集制。针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否

认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攻击实行余粮收集制是破坏平等，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只不过阶级斗争改变了形式，改变成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政权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影响小资产阶级。列宁还进一步指出，要消灭阶级斗争，实现平等，必须消灭阶级，消灭小商品生产这个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基础，变多种社会经济结构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结构，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了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地主、资本家，而且要消灭工农之间在所有制上的差别。为此，就要改组整个社会经济，就要在根本改造农业技术的基础上从个体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661 页与 1999 年版第 801 页）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邓选》第 2 卷第 182 页）

（二六六）删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词条。

1979 年版《辞海》全文是：著作名。列宁写于 1920 年 4~5 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编入《列宁全集》第 31 卷。本书针对当时西欧新成立的一些共产党内出现的"左"倾思潮，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策略问题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在痛斥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背叛，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仍是主要敌人的同时，着重批判了"左"倾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书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成功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它有着极严格的纪律，并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体群众的拥护；共产党只有善于揭露和分析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及时加以改正，才是不可战胜的。书中批判了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作了经典性的论述。书中批判了"左"倾学理主义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指出，制

定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根据一个集团或政党的愿望和决心，而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列宁教导革命政党必须把革命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裂痕，利用一切机会来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达成妥协，以得到大量的同盟者；应当善于区分什么是革命所容许的妥协，什么是叛卖和变节的妥协；应当充分掌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应当善于把整个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群众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共产党员应该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工作，应该参加反动工会和资产阶级议会。列宁指出：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恶劣影响；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书中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同时强调各国革命政党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这些基本原则，使它们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24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499 页）

（二六七）删改【论欧洲联邦口号】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列宁写于 1918 年 8 月。编入《列宁全集》第 21 卷。文章“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思想。列宁写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原理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坚定了世界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信念”。（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383 页与 1999 年版第 471 页）

必须指出：1999年版编者删除列宁"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是贬低列宁的重大贡献；删除"坚定了世界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信念"，这是进一步贬低和否定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重大贡献。这是"磨灭其革命锋芒"，贬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思想、理论。

（二六八）删改【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列宁于1917年发表的一个著名提纲，简称《四月提纲》。编入《列宁全集》第24卷。《提纲》给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工人阶级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的革命路线和计划。《提纲》揭露了俄国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反动本质，号召把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并提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步骤；没收地主的土地，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实行银行国有化；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提纲》还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应抛弃被第二国际所糟蹋了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改称共产党；并倡议建立第三国际。

这个《提纲》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和争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83页与1999年版第471页）

1999年版编者在删除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后明确否定社会主义革命：

（二六九）删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词条。

删除原词条的主要内容：

1. 把原词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删除，改写词条名称为【十月革命】。

这是公然否定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2. 删除"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领导下，联

合贫苦农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更为明确地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3. 删除“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

4. 删除“根据列宁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在广大群众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并领导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举行了四月示威、六月示威和七月示威。”

5. 删除“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士兵暴动和各民族地区解放运动空前高涨。”

6. 删除“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奠定了苏维埃政权胜利的前进的基础。列宁称之为‘苏维埃政权的凯歌行进’时期。”

7. 删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8. 删除“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7页与1999年版第138页）

必须指出：1999年版编者把这个词条从名称到具体内容都删除和改写了。显然是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同时也否定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事实和伟大世界意义的充分肯定。国内外敌对势力早就在反对和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可是，我国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辟了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国人民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请问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你们是否承认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指引下取得的呢？你们是否认为中国已背弃了马列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了呢？

（二七〇）删改【赤卫队】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参见“民兵”。（2）“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武装，是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革命初期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力量。1918 年 1 月，俄国工农红军建立时，赤卫队成为红军的基础。（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 1952 页与 1999 年版第 2350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否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也把世界上的第一支苏联的“赤卫队”从词条中取消了。而苏联的“赤卫队”是之后建成红军的“基础”。

（二七一）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词条。

1979 年版的全文是：著作名。列宁写于 1916 年 9 月。编入《列宁全集》第 23 卷。文章批判了主张“废除武装”、反对任何战争的错误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问题的根本态度，论述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原则区别。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就等于拒绝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念头。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列宁还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再次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在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因此，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准备自卫战争。（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661 页与 1999 年版第 801 页）

1999年版编者否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不需要“准备自卫战争”来保卫这个国家了，于是，取消了上述词条。但是，实践已证明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建立“红军”保卫了这个伟大的国家是客观事实。1999年版编者竟然坚持“不承认主义”，仍把已经进行并取得了胜利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词条取消：

（二七二）取消【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词条。

197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著作名。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1941~1945年）作的报告、演说和命令的汇编。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和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指明，战争的正义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383页与1999年版第471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取消这个词条，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显然，“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对苏联，而且是对全世界、全人类来说是一件大幸事。这个胜利是在斯大林和苏共领导下取得的。这是斯大林和苏共对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特大贡献和不朽功勋。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斯大林领导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希特勒灭了苏联，控制了其石油等重要资源，岂不是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要横行天下？这些年来污蔑攻击斯大林的人，实际都是些背叛者、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如果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末，故意“否定过去”就比“忘记过去”的罪过更大得多了！

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几个词条或作删改，或取消，显然是认为当年的俄国也是不应搞什么“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应“武装夺取政权”，不应“首先在一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不应进行“伟大卫国战争”以保卫这个社会主义

的国家、保卫全世界人民免受德日法西斯强盗的蹂躏。

（二七三）删改【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词条。

197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著作名。列宁于1918年10~11月为批判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而写。编入《列宁全集》第28卷。这部著作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论证了“民主”、“平等”、“自由”的阶级性质，驳斥了考茨基所宣扬的“纯粹民主”、“抽象平等”、“和平变革”等机会主义谬论，揭露了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其他领导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列宁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指出剥削者被推翻后，多年内还保持着事实上的巨大优势，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无产阶级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粉碎他们的反抗，就不能获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列宁分析了专政和民主的辩证关系，指出，专政并不消灭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要消灭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列宁阐明了无产阶级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是对少数人的民主、对富人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则是对绝大多数居民的民主，对被剥削的劳动者的民主。列宁还围绕战争和革命问题，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背叛国际主义的反动本质及其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和策略。（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61页与1999年版第801页）

以上这个词条删除的全是核心内容和要害问题。这还可联系以下两个词条来评析：

（二七四）在【考茨基】这个词条中，也删掉1979年版《辞海》写的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还删除“考茨基1918年发表《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著作中对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观点和叛徒立场进行了

彻底的批判”。

1999年版编者在改写的词条中写“考茨基（1918年）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讲他“反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应受批判）（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37页与1999年版第1496页）

（二七五）在【列宁】这个词条中，把“列宁在1918年揭露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这一段话也删除掉。（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333页与1999年版第1612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是同考茨基立场、观点一致的，于是，也就在以上3个词条中把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谬论”删掉，把考茨基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删掉，把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著作中对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观点和叛徒立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等内容全删掉了。这只是再次表明1999年版编者的立场和态度。

在社会主义低潮期，只要看1999年版编者同样地否定马克思列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就明白污蔑攻击斯大林和毛泽东，不过是全面否定马克思列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步骤或两个组成部分。

现在的世界形势又怎样呢？我赞同一位专家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的分析。

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冲击，至少已经有过两次。第一次是1871年巴黎公社。第二次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巴黎公社仅限于法国的一个城市，存在了72天。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72天。公社失败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最大的国家发生。苏联人民依

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把一个本来属于第三世界的、落后的国家，建设为具有世界第一流经济、文化、科技、国防水平，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并驾齐驱而属于人民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个消灭失业现象的国家，第一个实现8小时工作制的国家，第一个实现全民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的国家，第一个向全民免费提供住房的国家，第一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国家。

苏联不是存在了72天，不是72个月，而是73年。

苏联作为统一的国家解体了。苏维埃原则是永存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创的历史道路在继续。

中国革命发生了，胜利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以社会主义国家而强大、而发展、而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古巴，一个美国卧榻之侧，被封锁、制裁、武装入侵威胁半个世纪的小国，因为坚持社会主义而成为独立支持的大树，成为一个以其实现人民的权力和某些领域的先进科技水平而获得世界尊敬的国家。不久前，卡斯特罗在五一群众大会演讲，说今年第一季度古巴经济增长率超过12.5%。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取得了自己建设和发展的成就。

但是，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期。然而，低潮过去必将迎来新的高潮。现在已可看出开始走出低潮期了：

从2001年起，每年一次的社会论坛，是第三世界人民普遍觉醒和开始新的群众性斗争的信号，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联合国"、"二十一世纪的万隆会议"。论坛已经举行6次，从拉美开到亚洲和非洲，参加者从高层政界人物、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科学家到普通工人、农民、学生，人数从数万增加到十几万。和新自由主义所谓"别无选择"相对立，它的共同呼声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2006年，年会提出"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

拉美抛弃新自由主义,已经出现的左翼政权站住脚了,出现更多的左翼政权为期不远。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宣布实现新社会主义或者叫拉美社会主义。新近当选的智利总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玻利维亚新任总统莫拉莱斯,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他宣布石油天然气国有化。巴西和阿根廷总统已经明确支持玻利维亚石油天然气国有化。难怪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司令哀叹:美国正在失去对拉美的控制。

在亚洲,日本、韩国、菲律宾不时爆发人民反对美国驻军的示威游行。

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派)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10年,兵力扩展到7个师,控制国土三分之二。

与上述形势相反,西方7国首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头头们,已经连找一个平静开会的地点,都要大伤脑筋了。东躲西藏,军警林立,坦克飞机一起出动,不敢在宾馆住宿跑到军舰上去过夜。他们的每一次聚会,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示威游行,发出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种调侃的说法是:7个人开会,7000人保卫,7万人示威。

这些岂不是说明社会主义运动已在开始走出低潮时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欢迎了吗?!

第三,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否定。

1999年版编者在如下8个重要词条中均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内容删除。否定之意是明确的。

(二七六)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我们要严肃指出:明明是否定,有人却还说删除不等于否定。现在就来验证一下,1999年版《辞海》编者,又在如下一系列重要词条中,把马、恩和列宁提出的两大著名的“国际主义”

口号和内容都删除掉。这样,共计 8 个词条中的“国际主义”全删光。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地否定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吗?

(二七七)删改【工人阶级】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也是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中删除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两大反映国际主义基本精神实质的口号。这就把“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取消、否定了。(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504 页与 1999 年版第 619 页)

(二七八)删改【国际主义】词条。

1979 年版《辞海》全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原则之一。是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从共同的革命利益和反对共同的阶级敌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团结的观点。它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相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列宁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是国际主义的基本精神。“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74 页)它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反对压迫和剥削,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要求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革命的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教育全体劳动人民。(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769 页与 1999 年版第 924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把 1979 年版原词条的核心内容都删除了:

1. 把“反对共同的阶级敌人”这个实行国际主义的“目的”

取消了。

2. 把反映“国际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办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两个伟大口号取消了。

3. 把列宁说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具体含义和内容取消了。

4. 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各国共产党的“要求”取消了。

1999年版《辞海》编者接连将“工人阶级”和“国际主义”这两个词条中的5大核心内容全删除，那还有什么来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呢?更多的证明是下边众多词条中的“国际主义”字眼均被删除。

(二七九)在【彭德怀】这个词条中,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原词条写的彭德怀“曾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并肩战斗,直至胜利,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这段话删除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817页与1999年版第984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否定“抗美援朝”是“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请问编者:假如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行动,作出了这么大的牺牲都不算是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还有什么能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呢?

(二八〇)在【抗美援朝纪念章】词条中,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原词条写的颁发纪念章的宗旨是“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删除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77页与1999年版第819页)

本来颁发纪念章的宗旨,就在于纪念和“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1999年版《辞海》编者之所以要加以删除、否定,显然是企图否定“抗美援朝”是体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重大事实。

（二八一）取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词条。

1979年版《辞海》全文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1963年6月14日发表。《建议》共二十五条，系统地批驳了苏共领导集团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修正主义理论和总路线，并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问题作了分析。（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286页与1999年版第348页）

1999年《辞海》版编者取消上述词条，不仅是否定国际主义，而且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存在，如果承认历史上有这个运动，那末，在这个运动中存在路线的分歧和斗争，是合乎规律的事，否认它，是无视历史，违背客观存在的事实。

（二八二）删改【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词条。

1979年版《辞海》全文是：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12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马列主义政党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宣言强调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中共代表团对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表述不满意，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阐明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普遍规律。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删除上述词条的这些核心内容后，改写为："《宣言》广泛论述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

势、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内容都取消不谈，又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但是这却证明了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运动的建议】这个词条取消是无理的，因为既然承认存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任务和问题”，那末《建议》正是中共中央对这些“任务和问题”的论述和建议，有何理由取消这个词条呢？（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5页与1999年版第6页）

（二八三）删改【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词条。

1979年版《辞海》全文是：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声明表述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高度评价当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阐明了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革命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相互关系的准则，重申了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任务。但在关于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上，声明仍沿袭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提法。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此重申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并在会上散发了1957年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删除上述具体内容后，改写为：“刘少奇、邓小平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声明》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发表了意见。”这还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把具体内容全部删除不谈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5页与1999年版第6页）

上述《建议》、《宣言》和《声明》这3个词条的核心内容都是强调“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要求各国、各党应把反修、防修作为主要“任务”来抓。此后，几十年的

实践证明:看不到这个“主要危险”和没有采取反修、防修措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党都垮了,而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反修、防修的国家和党不但没有垮,而且还在发展,并在经历着社会主义低潮的考验和锻炼,在为坚持反修、防修,争取社会主义新高潮的到来而奋斗着。1999 年版《辞海》编者取消和删改这 3 个词条所反映的基本精神,这又一次表明了编者的错误立场和态度。

第四,1999 年版编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删改和否定。

(二八四)删改【马克思列宁主义】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第 1139 页全文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统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994、995 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了革命实践,总结了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地吸收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崩溃、共产主义必然要胜利,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马克思主

义是在同各式各样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同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复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进行了不妥协的原则斗争。通过这些斗争，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坚决地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作了斗争，从各个方面捍卫并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64页）毛泽东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1）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2）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2页）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坚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斗争中，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不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并将继续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二八五）重新改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词条。

1999年版《辞海》第1376页全文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统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的产物。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总结了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特别是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它用唯物史观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指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它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根据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趋势,无产阶级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伟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一些构

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生产按照社会需要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等等。马克思主义以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特征,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自己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它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研究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现象和新材料,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他根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获得胜利的理论。他总结了俄国党内斗争经验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经验,制定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总结了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和方法,阐明了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需要经历一些特殊发展阶段或中间环节的重要思想,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等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终极的真理,而是发展的学说。它始终同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

一起，成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战斗旗帜和指导思想。它在指导各国革命实践中显示出巨大威力，又从各国革命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活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原词条所作的删除，显然是从"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出发的，我们不妨重复地对照一下被删除的 8 条，足见被"阉割"和"磨灭"的点滴都不遗漏。

1999 年版编者删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词条如下 8 项内容：

1.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十分严整而彻底，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

2. 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

3.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4.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专政"。

5.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式各样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同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复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

东派、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进行了不妥协的原则斗争。通过这些斗争，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确立了主导地位”。

6.“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7.“毛泽东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1)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2)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

8.“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坚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斗争中，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不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并将继续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39页与1999年版第1376页)

应该指出：1999年版编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词条删除掉以上8点，无不属于核心内容，这就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的

灵魂”和“革命锋芒”都删除掉了。我们在把原词条与重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词条作比较时,恐怕有必要参考一下列宁的还有一段名言。列宁说,有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知道不能“公开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要表面上承认它,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偶像”,“换句话说,采取了马克思主义中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一般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8、199页,《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的论述是一面极好的镜子。然而,有些人对列宁的论述“心领神会”,却接过列宁的“论述”,从反面来加以利用,《辞海》在《公开信》中宣称要以美方(即资产阶级)的“接受”或“不接受”为依据,来修改、规范“词条”;1999年版编者也就以西方(即资产阶级)“接受”或“不接受”为依据,来删改有关马恩列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条了。

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有人为了使西方、帝国主义能够“接受”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在又在制造一种舆论了,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对内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含义真的仅在于此吗?难道这就是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吗?那末,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反帝、反霸、反修的任务呢?其实,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主张不“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或主张“反和平”的社会主义。然而,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别国内政,存在着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颜色革命”。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难道我们不应和不能反帝、反霸、反修、反“颜色革命”吗?难道我们只能用“发展生产力”去应对一切吗?难道我们只能像汪精卫那样用“和平”(投降)去回答侵略吗?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从来就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共产党人相信各国的矛盾和问题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解决，所以共产党人历来都是反对输出“革命”的。也正因为这样，共产党人也反对输出“反革命”、即反对国际“反革命”势力干涉、镇压别国革命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和霸权主义行为。

综观对以上有关马、恩、列、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条的删改或取消（当然只是举出这47个词条为例，其实远不止于这些词条），显然，1999年版《辞海》编者是企图全盘否定马、恩、列、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企图全盘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然而，如此重大的关系到全人类的解放和命运的大事，能由1999年版《辞海》的编者们任意删改吗？

在贬低、否定革命导师和领袖时，1999年版编者由于心虚胆怯，也是采用“渐进”式的逐步推进的手法。比如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辞海》1989年修订版中先把“伟大”二字删掉，但仍保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的评价；到1999年修订中才进一步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删掉，取消了“全世界”和“领袖”这两个词，但还保留“无产阶级的导师”的评价，意味着马克思列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已不属于“全世界”的“领袖”了；再下一步是否要给马克思写上“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给列宁写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把他们都“遣送”回国呢？

可是，大家知道，思想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恩、列、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仅是德国和俄国的，而是全世界的。是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成为我国的立国之本。这是写进了国家《宪法》和《党章》的。显然，《辞海》贬低、否定马列，亦即是贬低、否定我们的立国之本，这不但是政治、理论上的严重错误，也是国法、党纪、政纪都不能容许的。而

且抬高和肯定修正主义也是违背我们党一贯的立场观点的，也是违背三中全会的路线的。1999年版《辞海》所反映出的一系列错误，需要写许多专文批评。

1999年版《辞海》这样贬低、否定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能得逞的。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候开始，旧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就想否定和消灭它了。《共产党宣言》第一段文字便写到："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惧而挥之不去的这个"幽灵"不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吗?!那时，普鲁士、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采取种种措施欲消灭之，没有得逞。而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全世界第一个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者，也想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利用手中的权力甚至宣布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党籍，也没有得逞。那时，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们附去了这篇声明（反机会主义的）……于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党中央机关报）就声明我们不属于社会民主党。当然，这样革出教门，我们毫不在乎。"（《马恩全集》第31卷第466页）

历史已证明，这种攻击和否定损害不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也曾在回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是由我们自己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人任命的。而这种任命已经由于旧世界的一切派别和政党对我们所怀的那种特有的普遍的仇恨而得到确认。"（见《马恩全集》第29卷第419页）

历史上也有巧事，当年在德国，机会主义者利用党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来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党籍，来反马克思主义，如今在中国，又有人利用工具书《辞海》来妄图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的资格和地位，妄

图否定马恩列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其实,他们要否定马列主义,这也不难理解,他们恨马恩列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由他们的立场决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搞机会主义,要搞资本主义,要搞修正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及其马克思主义妨碍他们搞机会主义,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他们就反对马克思主义。

这些年来,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时期,这些人以为“反攻”的机会到了,于是又掀起否定马恩列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在《辞海》修订前后,在我国的党内党外都有一些“精英”人物,成了掀起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浪潮的急先锋。我们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中宣部理论局长的李洪林辈的表演,他们是怎样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否定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真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把我们党一贯坚持并取得了胜利的真马克思主义说成为“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而把他们制造的假马克思主义,却说成为“我们党现在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李洪林写道:“我们党前后所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一样……不要说左的观点已被抛弃,就是公认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都被新的观点代替了。变化之大以致国外的观察家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一笔勾销’了。”李洪林抑止不住自己的得意心情说:“有碍于中国现代化的观点(按:实际这是指有碍于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观点)”“确实被一笔勾销”得好!李洪林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强大的生命力”,“《资本论》反映的是资本的运动,被反映者既然在运动,反映它的理论自然就该发展”。那即是说他所要制造或肯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反映资本主义的“强大的生命力”和为这个“强大的生命力”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李洪林把它说成为“我们党今天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华文摘》1985年第2期第90页)还有曾任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的苏

绍智先生，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宣告：“传统的经典作家（指马恩列斯等人）的思想已不能统一中国人民的思想了”（《世界经济导报》1988 年 12 月 5 日）。他也主张要“发展”出一个新（他们都把“假”叫做“新”）“马克思主义”来。

可是，曾几何时，这些“发展”新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支持 1989 年“动乱”失败了，有些人就收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流亡到国外去公开反马克思主义了。暴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但是这股否定马恩列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仍由 1999 年版《辞海》的一些编者（和还留在国内的“精英”）继承了下来，充分地反映在大量有关词条的删改方面，并且继续和社会上始终未得以清除的这股思潮相互呼应。

看来这样“发展”新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也还不乏后继者。他们就是既要否定、取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不过，可以断言，无论是他们的前辈和后辈当然也包括他们自身，妄想否定马恩列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图谋，妄想制造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图谋，最后都只会以失败告终。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有坚定的继承者，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和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毛泽东这些当之无愧的继承者。而且必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使更多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 72 天就失败了，但是马克思说得好，斗争只是“延期”而已，“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是永存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胜利，存在就不是 72 天而是 73 年了，其规模更非可比了。虽然像任何事物的发展道路都有曲折一样，共产主义运动也遇到了曲折和低潮，但是，毫无疑问，它必将战胜困难走向新的高潮和更大规模的胜利！

让我们也来看一看今天的现实世界，社会主义虽然处在低潮时期，然而，全世界的无产者、被压迫被剥削者、先进知识分子等，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相信它必将发展和走向胜利的人还是在增加着：

一看“据《新闻报·晚刊》（1999 年）10 月 3 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最新网上调查结果，19 世纪革命理论家、作家卡尔·马克思击败相对论缔造者、科学家爱因斯坦，获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调查数据表明，马克思的得票率远远超过了位居第二的爱因斯坦。挪威网民托里森称马克思是现代政治学之父。美国网民卡布尔认为，马克思最精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机制，对人们了解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世界，同样有效。”（上海《报刊文摘》1999 年 10 月 11 日）

我们还要指出：位居第二的“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爱因斯坦，他虽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但凭他那大科学家的超群智慧，在全人类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根本问题上，得出的是和马克思完全一致的结论。（详情请见爱因斯坦的文章《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译文见《当代思潮》杂志 1997 年第 4 期，《中流》杂志 1999 年第 3 期）

可以设想：如果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都有条件成为“网民”，并都接受调查，那岂不是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会选马克思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吗?!

二看“1996 年盛夏……7 月 12 日到 19 日，来自英国各地以及西欧、北美、亚洲 10 多个国家的近 6000 名代表，在这里举行‘1996 马克思主义大会’。会议地点设在伦敦大学。大会每天按不同议题分近 10 个会场同时举行会议，前后共举行了 260 多场报告会和讨论会。在众多的与会者中，工人、学者、大学生占主要成分。会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人数之多，议题之广，在西欧乃至整个西方国家都是罕见的。”（见《中流》1997 年第 9 期第

21页）

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首都的最高学府内，进行如此规模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大会”，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深得人心的结果，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有众多继承者的有力证明。

三看1998年5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名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士参加的马克思主义大会。我国也有12名代表参加了大会。“盛况空前，情景动人。”证明“《共产党宣言》的声音将响彻全世界！”（详情请阅《中流》1998年第11期《会议纪要》）

四看2000年3月，在美国纽约，由马克思学院等单位主办，召开了世界社会主义者大会（已是第十八届大会），有数十个国家的代表2000多人到会，其中学者400多人，有各政党、工会、青年联盟的代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占三分之一以上。“他们强烈地谴责和批判资本主义，主张未来世界应属于社会主义。”（详情请阅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靳辉明《访美报告之一》载《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7期）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心脏——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美国的纽约，持续不断地进行如此规模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大会”，恐怕即使在社会主义高潮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也不多见。这样的大会不是靠权力或少数人的意志所能组织得起来的，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有众多的拥护者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的有力证明。

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知何故《中流》、《真理的追求》杂志不见了，以上这样的连续报道也就见不到了。

为什么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是如此地既害怕又仇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必欲将其封杀、否定、诋毁、消灭而后快呢？这是人们的不同立场问题所决定的态度问题。马克思曾在给友

人的信中这样说过："《资本论》，这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马克思全身心地投入这种"炮弹"的制作。他继续写道："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这部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不能不管人类的痛苦……一定要完成这部书。"（《马恩全集》第 31 卷第 342~344 页）马克思恨资产者、剥削者，爱无产者、被剥削者，这就是马克思的爱憎分明的立场。令人无限崇敬！可是这也就触怒了所有的压迫阶级和所有的剥削者，以及同压迫者剥削者站在同一立场者。这些人都恨透了马克思和他的"主义"，当然绝对不会承认马克思的"伟大"了。

可是，站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以及广大人民立场上的人，对于马克思为了无产阶级、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和广大人民，以如此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作出如此伟大的贡献，怎能不承认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怎能不把"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称号给马克思呢？现在，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呢？一些受他们影响跟他们的观点走的人，1999 年版《辞海》有关编者，是否也该问一问自己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十五、评 1999 年版《辞海》为新老修正主义翻案

1999 年版《辞海》编者通过对如上 285 个词条的取消、删改或增添，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全盘的贬低、否定已是明显的事实；现在，我们再来看 1999 年版编者怎样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对立面修正主义翻案，企图证明修正主义是"正确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批判是"错误的"。这也就从反面来证明编者对马恩列斯和毛泽东以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否定。请看编者对如下第二八六至第三二四这 39 个词条的删改或取消。

（二八六）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表述。（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1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06 页）

（二八七）在【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反修"的内容。（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5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61 页）

（二八八）大面积删改【修正主义】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其社会基础是工人运动“和平”发展时期逐步形成起来的工人贵族阶层以及补充到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使它的敌人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从工人阶级内部进行破坏和腐蚀活动。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故名修正主义，亦称伯恩施坦主义。后为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等机会主义领袖所接受。他们在哲学上背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以各种面貌不断出现，除了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之外，还有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表现为：用最革命的词句和最激进的姿态，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是老修正主义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继续和发展，其代表有苏联的赫鲁晓夫集团和中国的林彪、“四人帮”等。

（二八九）重写【修正主义】词条。

1999年版全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以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故名，亦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背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鼓吹新康德主义和庸俗进化论；在政治

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除了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之外，还有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如托洛茨基主义。（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42 页与 1999 年版第 292~293 页）

1999 年版编者重写的词条没有否认修正主义，但是删除原词条的 3 项内容：

1. 删除“修正主义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这是隐瞒修正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使人忽略对修正主义的警惕和注意，有利于修正主义者搞假马克思主义。列宁说：“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表现出来的特征”。（《列宁全集》第 14 卷 349 页）

2. 删除“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因为修正主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词句掩护下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普遍真理”的，删掉这话是否意味着基本原则、普遍真理可以违背，为违背和抛弃“四项基本原则”埋下伏笔？

3. 删除“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其社会基础是工人运动在和平发展的时期逐步形成起来的工人贵族阶层，以及补充到工人队伍的小资产阶级。”这一整段话。这是否定了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这就把出不出现代修正主义变成没有社会、阶级基础的偶然现象了。麻痹人们对出现修正主义必然性的警惕。

（二九〇）大面积删改【伯恩施坦】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EduardBernstein，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领袖，修正主义时代的代表人物。德

国国会议员（1902~1906，1912~1918，1920~1928）。1872 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881~1890 年，任该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编辑。在早期活动中就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1895 年，恩格斯逝世后，他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在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特别是在 1898 年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1899 年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文中，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公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在哲学上，鼓吹“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认为垄断组织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在政治上，主张阶级调和，宣扬“议会道路”，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十月革命后，反对列宁主义和苏维埃政权。列宁斥之为无产阶级叛徒。

（二九一）重写【伯恩施坦】词条。

1999 年版全文是：（EduardBernstein，1850~1932）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领袖，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1872 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8 年，流亡瑞士，为苏黎世三人团成员。1881~1890 年，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曾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俾斯麦的政策。被逐至伦敦，受费边社影响。1896~1898 年，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发表系列文章（后汇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并予以全面“修正”。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否认剩余价值学说，主张阶级调和，宣扬“议会道路”，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1901 年，回国后多次当选国会议员。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对俄国十月革命抱有敌意。(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33页与1999年版第281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重写的上述词条虽还未公开否认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实际上这同编者的观点是矛盾的,这应作具体分析:

1. 编者在有关"修正主义"的三十几个词条中,给所有"修正主义者"都摘掉了"帽子",分别把他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鼓吹"和平过渡"等错误观点和主张都删除、否定掉了。还写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可是他"代表"谁呢?

2. 编者删除伯恩施坦"在早期活动中就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并改写为"曾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俾士麦的政策被逐"。这段被删除的话本来是说明伯恩施坦后来成为修正主义者绝非偶然的历史原因,但编者却隐瞒了这个历史原因,相反写他是"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了。这是颠倒是非,美化伯恩施坦。

3. 编者删除伯恩施坦"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公式",这是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最根本性错误也删除和否定了。

4. 编者删除伯恩施坦"在十月革命后,反对列宁主义和苏维埃政权。列宁斥之为无产阶级叛徒",改成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对俄国十月革命抱有敌意"。

以上这四项是伯恩施坦作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核心内涵,都被删除、否定掉了。足见编者写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是一句抽象的空话。而且自相矛盾。

5. 编者之所以还写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代表人物",还

难以为伯恩施坦摘掉“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是因为伯恩施坦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帽子”不是批判者给他戴上的，而是他自封的，并自称为“大修正主义者”的。

1999年版编者在抽象地还承认“修正主义”及其“代表人物伯恩施坦”的情况下，通过对一系列词条的删改具体地否定马克思主义观点、肯定修正主义观点：

（二九二）删改【阶级性】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阶级本质的表现。由每一个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们由于长期处于不同的阶级地位，因而养成了各自的生活方式，有各自的利益和要求，各自的心理、思想、习惯、观点和气派等等，这就形成了不同阶级的阶级性。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国家、政党、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等等，都贯穿着阶级性。”（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411页与1999年版第506页）

1999年版编者删除掉原来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阶级地位养成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删除掉阶级性贯穿在“国家”、“政党”等等之中。这表明1999年版编者主张“生活方式”、“国家”和“政党”都是没有阶级性的修正主义观点。当然，还要联系下面许多词条的删改来证实编者的这个主张。

（二九三）删改【党性】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不同阶级的政党有不同的党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它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它的科学性，从世界观来说，是最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加强党性锻炼，就是要不断通过革命实践，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克服非无产阶级意识。

（二九四）重写的【党性】词条。

1999 年版全文:政党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不同政党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有不同的党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工人阶级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党的组织和党员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必须坚持党纲、党的指导思想、党的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党的近期目标和最终理想奋斗到底。（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662 页与 1999 年版第 2011 页）

必须指出:1999 年版编者重写的“党性”词条是错了:

1. 原写的“党性”词条是正确的。写了“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及“表现”在哪些方面。却被 1999 年版编者几乎全部删除了。

2. 重写的“党性”词条首先就文不对题。因为词条名称是“党性”，但是编者却不是写 “不同阶级的政党有不同的党性”,而去写所谓“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了。其实,世界上只有“不同阶级的不同党性”,不存在“不同国家的共产党有不同的党性”。一切共产党只有一个党性,即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为什么不去写这个集中表现的具体方面的内容?

3. 重写的【党性】词条,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也说不通。编者把实现“党的路线”、“党的近期目标”都包括在“必须坚持”的“党性”之中。然而,“路线和近期目标”有正确与错误之别,如果“坚持”错误的“路线和近期目标”,也能说成是坚持“党性”吗?

这种任意解释“党性”,所谓“中国共产党的党性”的提法,是适应搞修正主义的需要,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

（二九五）取消【政权】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政权也叫‘国家政权’。通常指国家权力,即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权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

力保证其实现。有时也指体现这种权力的机关。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二九六）重写的【政权】词条。

1999年版全文是：“政权亦称国家政权。通常指国家权力。有时亦指体现这种权力的机关。”（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65页与1999年版第1773页）

这个重写的“政权”词条是把原词条写得正确的，关于“政权”具有阶级性的内容全删除光了。表明1999年版编者再次认定“国家”、“政权”都没有“阶级性”。人类社会从来都是“全民国家”。

（二九七）取消【政治制度】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通常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有关的制度。它的确立和变更，都是由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所决定，是和国家的根本制度相适应的。”

（二九八）重写的【政治制度】词条。

1999年版全文是：通常指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广义包括政治领域的各项制度。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66页与1999年版第1774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的改写是只讲政治制度的“形式”，不讲政治制度的内容即阶级实质、“阶级性”和政治制度决定于“国家的根本制度”。

如上所述，编者把国家、政权、政党和政治制度的阶级性都取消了，把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等问题都取消了，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又是什么呢？1979年版编者是把这个任务放在“无产阶级专政”词条中的。然而被1999年版编者在如下词条中删除掉了：

（二九九）删改【无产阶级专政】词条。

1979年版原词条被删除掉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亦即“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在国内方面主要是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为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在国际方面,主要是防御国外敌人的侵略和颠覆活动,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60页与1999年版第800页)

(三〇〇)删改【社会主义国家】词条。

1979年版原词条被删除掉的内容是: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实行专政的工具。参见“无产阶级专政”。(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579页与1999年版第1914页)

再来看看1999年版重写的这两个词条:

(三〇一)重写的【无产阶级专政】词条。

1999年版全文是:亦称“工人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实行的统治。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其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它同历史上的剥削阶级专政根本不同,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的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

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4页）无产阶级专政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其形式由各国革命发展的进程所决定。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参见“社会主义国家”。（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60页与1999年版第800页）

（三〇二）重写的【社会主义国家】词条。

1999年版全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经过革命斗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使自己变为统治阶级而建立的新型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也是最高类型的国家。和过去几种类型的国家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国家把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同对敌人实行专政结合起来，成为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相结合的国家。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后，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的对外职能，是维护主权，防御国外敌人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和颠覆活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还要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共产主义实现时，社会主义国家将自行消亡。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579页与1999年版第1914页）

经过对比可以看出1999年版编者重写的以上这两个词条删除掉了1979年版原词条中如下重要内容：

1. 把“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删除了。

2. 把“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删除了。

3. 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根本任务删除了。

4. 把"消灭三大差别"或缩小"三大差别"删除了。

5. 把"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也删除了。

必须指出的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是我国宪法的明确规定和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重申的原则，竟被删除、否定；而为消灭"三大差别""创造条件"被取消后，现在"三大差别"是更扩大了；"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也被取消了，其实，这除了物质上、人力上支援以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支援"便是道义上、舆论上的"支援"，比如，目前巴勒斯坦人民为维护自身权利进行的革命斗争，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道义上、舆论上也不该支援了吗？

（三〇三）删改【资产阶级专政】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暴力统治。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本质上总是资产阶级专政，其基本任务都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压迫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37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39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掉三处关键词语：

1. 把资产阶级专政的"暴力统治"的"暴力"二字删除。

2. 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都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中的"剥削"二字删除。

3. 把"压迫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这句话删除。

编者增写了一句话是：资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不讲"下降"时期转化为反动性。

请问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你们这样删除符合实际吗？这样增写是不是认为全世界至今还处在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三〇四）删改【资本主义国家】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历史上最后一种剥削阶级类型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建立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统治的机关,是资产阶级维护其剥削制度,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实行专政的工具。资产阶级向来标榜“全民国家”或“全民政权的国家”,以虚伪的民主和自由来掩盖其阶级专政的实质。它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上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两种。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三〇五)重写【资本主义国家】词条。

1999年版全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历史上最后一种剥削阶级专政类型的国家。资产阶级借助于农民和城市劳动人民的力量,或者推翻封建主阶级、或者与封建主阶级政治妥协取得政权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建立。是资产阶级维护其剥削制度,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实行专政的工具。它的政治组织形式基本上是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36页与1999年版第1739页)

对比上述两个词条,证明1999年版编者不认为“‘全民国家’或‘全民政权’的国家”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标榜”,也不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是“虚伪的”。

(三〇六)删改【帝国主义国家】词条。

1979年版第353页全文是: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垄断资本集团为了维持其统治和追求高额垄断利润,在直接控制国家机器,扩大行政权力,强化军事官僚机构后形成的暴力机关。对内加强剥削和镇压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参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53页

与 1999 年版第 433 页）

1999 年版把上述词条中的“对内加强剥削，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删除，是公然否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显然，以上这一系列词条的删改，都是既违背客观历史事实，又颠倒是非的。都是用超阶级的观点代替了应作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

（三〇七）删改【三权分立】词条。

1979 年版删除的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把三权分立作为政权组织的基本原则。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权力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谓三权分立，只是用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形式来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1999 年版《辞海》把原写的正确的这段话删除掉了，改写为：“资产阶级革命后”以“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把“三权分立”的“阶级性”的实质取消了。（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0 页与 1999 年版第 24 页）

（三〇八）删改【议会】原词条。

1979 年版第 380 页写的全文是：“议会，亦称‘国会’。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一般由上下两院组成，有的国家只设一院。资产阶级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三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称议会为立法机关。在内阁制国家法律上还规定议会有监督政府的权力，如组织内阁须经议会授权，议员有权对政府提出质问，要求答复，议会通过不信任案时，内阁就应下台。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三〇九）重写【议会】词条。

1999 年版全文是：亦称“国会”。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源于英国，由等级会议演变而来，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逐步成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拥有广

泛权力的代议机关，后为各资本主义国家所仿效。一般都由上、下两院组成，也有的只设一院。议会的职权各国不尽相同，通常有立法权、财政监督权、行政监督权等。在议会制（内阁制）国家，议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有决定内阁人选、监督内阁施政、决定内阁去留的权力。曾有社会主义国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用此名。（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380 页与 1999 年版第 467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把“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一句表明议会阶级实质的话删除了。这不符合事实。

（三一〇）删改【议会制】原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亦称“代议制”或“国会制”。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议会是全国政治活动中心的一种政治制度。采用这种政治制度的国家，在宪法中规定议会行使立法和组织、监督政府的权力。内阁由议会决定，并对议会负责。实际上，议会权力的大小，是由资产阶级根据它的利益来决定的，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三一一）重写【议会制】词条。

1999 年版全文是：亦称“国会制”。以议会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政权组织形式。广义的亦称“代议制”。指由选举产生议员组成议会，按三权分立的原则，由议会执行立法职能，并在不同程度上对政府实行监督的制度。最早产生于英国，后许多国家广泛推行。狭义的与总统制对称。指以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政府（内阁）由议会的多数党或政党联盟组成，并对议会负责，议会有权监督政府施政、决定政府去留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国家虽设有议会，但政府由国家元首直接掌握，并不对议会负责，就不属议会制，而是总统制或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380 页与 1999 年版第 467 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原来站在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立场上写的词条取消后，站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立场上重写了这些关于议会的词条。把“实际上，议会权力的大小，是由资产阶级根据它的利益来决定的，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删除、否定了。

（三一二）删改【议会斗争】原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指资产阶级议会中各政党、派别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也利用议会进行合法的斗争，例如利用议会作为讲坛，宣传革命主张，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和反动政策，以提高人民的觉悟。但是马列主义认为议会斗争不能代替无产阶级暴力革命。

（三一三）重写【议会斗争】词条。

1999年版全文是：议会中各政党、派别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力量对比。各政党、派别各在议会发表各自的政见，就政府的政策、法令、国家预算等进行辩论和表决，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议会斗争的形式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对政府的影响，因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同而不同。一般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其影响大于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也利用议会进行合法的斗争，例如利用议会作为讲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揭露资产阶级的政策，以争取人民的支持。但是议会斗争只能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种形式、一个部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80页与1999年版第467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的错误在于：

1. 把1979年版第380页原来写的“马列主义认为议会斗争不能代替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删除，改写为“议会斗争只能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种形式、一个部分”，取消了

“暴力革命”。

2. 以“议会”属于全民议会为前提,写道:“议会斗争反映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力量对比。”实际上,“议会”并不能真正反映无产阶级的力量。

(三一四)取消【议会迷】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指迷信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万能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致左尔格的信中首先使用了这个术语。议会迷把议会斗争看作是唯一的、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都是议会迷。”(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380页与1999年版第467页)

“议会迷”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个重要典故,围绕着“议会问题”的斗争是长期的,马克思是在1879年9月19日《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第一次使用“议会迷”这个名词的。后来列宁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作斗争的著作中常用这个名词。《列宁全集》第8卷第552页的注释:“这是对机会主义者的信念的一种称呼,这种信念认为议会管理制度是万能的,而议会斗争在一切条件下都是政治斗争的唯一形式。”

1999年版《辞海》编者却不承认历史上和现实中有“议会迷”,也不承认“议会迷”是指的修正主义者。这是抹杀国际共运史和隐瞒修正主义的根本性大错误。

(三一五)删改【和平过渡】(即议会道路)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新老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鼓吹“议会道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只要利用选举,取得议会多数,就能合法地取得国家政权,“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列宁在驳斥这种谬论时指出:“凡是以为可以

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的粉饰，对真理的隐瞒。”（《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4页）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继承老修正主义者这一套思想，在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大上又宣扬“和平过渡”。他们以世界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为借口，认为“工人阶级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以至“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从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741页与1999年版第2102页）

（三一六）重写【和平过渡】（即议会道路）词条。

1999年版第2102页全文是：认为无产阶级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而以和平的方式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的理论。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提出“议会道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只要利用选举，取得议会多数，就能合法地取得国家政权，“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列宁曾予以驳斥。20世纪50年代，“和平过渡”和“议会道路”又被有些人重新提出，他们认为世界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工人阶级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多数，使议会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一说法未被事实证明。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改的错误是在于：

1. 删除“新老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改写为：“认为无产阶级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而以和平的方式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的理论”。是谁“认为”？既不指明老修正主义者，也不指明新修正主义者。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修正主义者这个所谓的“理论”，本来是有引号的被删除掉了。这就是编者承认它和马列主义一样的也是一种理论。

2. 把修正主义者以世界情况已发生 “根本变化”“为借口”这句话中的“为借口”这个词删掉，这就变为这不是“借口”了。

3. 编者还增写了一句：“这一说法未被事实证明”。这就是说“和平过渡”的理论算不上“修正主义”，仅仅是一个有待于后人或编者用“事实”去加以证明的一种“说法”了。

（三一七）删改【阶级调和论】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掩盖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的谬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叫“劳资合作论”，主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 世纪以来，曾为资产阶级学者孔德、狄骥等所鼓吹。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白劳德等，也竭力美化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制”，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宣扬资本主义国家已变成“解放”劳动人民的工具，主张阶级合作，“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三一八）重写的【阶级调和论】词条。

1999 年版全文是：在阶级对抗社会中，掩盖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的思想。19 世纪以来，为孔德、狄骥、伯恩施坦等所宣扬。如“劳资合作论”。（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411 页与 1999 年版第 507 页）

必须指出这种删改的明显错误：

1. 1999 年版编者把修正主义的具体表现全部删除后，只用“掩盖阶级矛盾”一句抽象的空话取而代之。这样，使读者无从知道历史上的“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与“修正主义”是什么关系？更不知道修正主义者是怎样用“美化资产阶级虚伪的

'民主制'"的办法来"掩盖阶级矛盾"的,因为重写的这个词条,没有向读者表明"阶级调和论"与"修正主义"的关系。

2. 把提出这种"阶级调和论"者的身份是"修正主义者"隐瞒掉了,使读者无从知道提出这种"主张"或"理论"者是什么人。

3. 伯恩施坦自己也承认:他"不是一般的修正主义者"而是"大修正主义者",是始祖。可是1999年版编者在这里也隐瞒掉他的"修正主义者"身份。这是在欺骗读者。

(三一九)删改【福利国家】词条。

1999年版删除的内容是:

1. "福利国家是标榜'全民福利'以掩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质的一种谬论"。

2. "主要代表为英国工党和一些凯因斯主义者。以福利经济学和凯因斯主义为理论支柱,把资产阶级国家描绘成'全民国家',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说成是'为全民谋福利'的政策"。

3. "实质上是利用这个幌子欺骗人民群众,以对抗社会主义,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588页与1999年版第1925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上述这三段指出所谓"福利国家"实质的话全部删除、否定后,只将资本主义国家自己所"标榜"、所"声称"的内容写出。是完全站在所谓"福利国家"的立场上正面介绍其搞"福利"的经验,对其阶级实质只字不提。

必须指出:1999年版编者对以上这十几个词条的删节和修改,显然是为在中国也这样搞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制"介绍经验,为搞所谓"全民国家"、"福利国家"制造舆论,铺平道路。

（三二〇）删改【考茨基】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的内容：

1. 删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

2. 删除“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中对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观点和叛徒立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37页与1999年版第1496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上述内容，一是为考茨基摘掉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首领之一”的“帽子”；更重要的是删除了列宁在“考茨基1918年发表《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后对他的反击所作的批判。

笔者曾想过，这是不是在写【考茨基】词条时只写他本人的事而不必写列宁对他的批判，等到写【列宁】词条时再写“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中对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观点和叛徒立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呢？但是，再查阅【列宁】这个词条，也没有发现写列宁批判考茨基的这一段话（见1999年版《辞海》第1613页）。这倒值得我们注意了！这岂不是只准修正主义者攻击、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准马列主义者为自己辩护和反批评？这岂不是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专”无产阶级的“政”、“专”列宁的“政”的一个典型实例？这是很能说明舆论工具到底是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的。

（三二一）删改【希法亭】词条。

1999年版删除的内容是：

“歪曲马克思主义，破坏工人革命运动，成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开敌人。列宁指出，希法亭之流是替资产阶级从工人运动内部、从社会党内部影响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派别。”（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26页与1999年版第401页）

（三二二）删改【白劳德】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EarlBrower，1891~1973），美国修正主义者，1921年，为美共中央委员，1930年，当选美共中央行政书记，后任总书记。1944年4月，发表了《德黑兰》一书，鼓吹所谓德黑兰精神，认为世界已进入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要求各国人民同统治阶级实行妥协，宣扬取消主义，反对革命。1944年5月，解散美国共产党，另立非党组织“共产主义政治协会”。1945年6月，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在福斯特领导下，批判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同年7月，举行全国代表会议，重建美国共产党。1946年2月，白劳德被开除出党。（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763页与1999年版第2128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的删改是：

1.“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被摘掉了。

2.“要求各国人民同统治阶级实行妥协，宣扬取消主义，反对革命”的修正主义重要的具体表现被删除了。

3. 福斯特为首的美共领导对“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被删除了。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删除以上三点后，改写为：“白劳德，鼓吹‘德黑兰精神’，认为世界已进入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同年解散美国共产党……1945年美共重建，次年被开除出党。”

（三二三）删改【福斯特】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威廉·择布伦·福斯特（WilliamZebulon-Foster，1881~1961）。美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29~1938）和全国委员会主席（1938~1944；1945~1957）。工人出身。青年时即参加工人运动。1901年，参加社会党，1909年，为右翼集团开除。此后，曾多次领导大罢工

和进行组织工会的斗争。1921 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历任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委员会主席并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1957~1961 年,为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曾领导 1927 年反对洛夫斯东(JayLovestone)集团“美国例外论”的斗争;1944~1945 年,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斗争;1956 年,反对以盖茨(JohnGates)为首的修正主义分裂活动。1961 年,病逝莫斯科。著有《美洲政治史纲》、《三个国际的历史》、《美国共产党史》、《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等。

1999 年版编者把福斯特的光荣历史和“反对修正主义”的功绩全部删除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88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25 页)

(三二四)删改【赫鲁晓夫】词条。

1999 年版删除的内容是:

1.“赫鲁晓夫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首脑;把“修正主义集团首脑”这顶“帽子”摘掉了。

2.“斯大林逝世后,篡夺党政大权……借口反对个人迷信,攻击和否定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提出并推行所谓‘和平过渡’等修正主义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破坏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用大国沙文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3.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作的“秘密报告”是大背叛的典型表现,帮了帝国主义最大的忙,却被改写成“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反斯大林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从表面上看对这“秘密报告”未作评价,实际上是为赫鲁晓夫表“功”。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955 页与 1999 年版第 2353 页)

综观对以上 39 个词条的修改和取消，1999 年版《辞海》编者已为所有新老修正主义者翻案、摘掉了“帽子”。对修正主义的观点和具体表现，或被隐瞒或被曲解成正确；对于批判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却被删除、否定。编者竟然认定不论在有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国家”、“政权”和“政党”都是没有“阶级性”的，都是全民国家、全民党，这就胜过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说苏联已建成了社会主义才成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编者还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内加强剥削……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本性也删除、否定了；还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任务也删除、否定；还把社会主义国家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任务也删除、否定掉了。这明显违背我国宪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的“国家保障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1999 年版编者对以上 39 个词条的删改或取消，是为新老修正主义者翻案的明显表现，在这里必须联系我国实际搞清楚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是它的阶级根源，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要它不反映到党内来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思想认识方面的根源；还有国际帝国主义压力的作用。所以，各国共产党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有防修反修的任务。不能让修正主义错误危害党的正确路线和党的事业。

我们要批评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为新老修正主义翻案，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历史上的新老修正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因此，应该先对新老修正主义的历史表现作出简要的回顾和说明。

什么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得很明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毛选》第5卷第418页）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呢？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普遍真理，是谁也不能违背的。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呢？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到社会领域中，如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我们的立党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等都是。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同上第392页）恩格斯也早就说过："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马恩全集》第35卷第380页）

历史事实的确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简要地作一个历史的回顾。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初，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不久，就有人出来搞"修正"了。1850年，马克思在《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中说："在今年6月22日贵报的一篇杂文里，您责备我说，我维护了工人阶级的统治和专政，而您恰恰和我相反，认为重要的是根本消灭阶级差别。这个修正，使我莫名其妙。"（同上第7卷第378页）

马克思是主张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但是那位编辑却以消灭"阶级差别"为"理由"要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认为这位编辑是错误地把"消灭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了起来，马克思说："维护工人阶级的统治和专政"不

是要使阶级永远存在,《共产党宣言》中已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是要"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如果像这位编辑那样"修正",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又由谁来实现"消灭阶级差别"的任务呢?所以,马克思说"这个修正,使我莫名其妙"。

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反对"修正"的斗争是从来也未停止过的。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多年来始终不渝地进行了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打击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庸俗观点和市侩习气。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实。一般人都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看作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策和策略的模范,但是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同该党'右翼'(恩格斯的说法)怎样经常进行斗争。恩格斯逝世不久,这种斗争就从隐蔽走向公开了,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数十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356 页)

1879 年,"苏黎世三人团"(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三人)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文章,错误地指出德国的工人运动 "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提出党要让"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来领导工人运动,提出"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愈平静、客观和慎重",愈不会"吓倒资产阶级"。(转引自《马恩全集》第 19 卷第 182 页)

"苏黎世三人团"的文章说:"正是现在,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同上第 184 页)

在德国反动统治者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士麦于 1878 年 10 月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在这压力面前不但放弃斗争,而且在文章中还责怪自己的党说:

"党对十月法律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同上第 18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指出"苏黎世三人团"的文章已提出了机会主义的"纲领"。并严厉批驳了这三个人，要求党不能再把他们三个人留在党内了。

在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就公开猖獗起来了。1902 年，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已经成为国际现象。第二国际所领导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都变质成了修正主义党。1909 年，伯恩施坦本人在《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的演讲中说："很久以来在各个国家里的社会民主党内，事实上出现了被称为修正主义或者修正主义派别或分子……的确，我所提倡的是修正。"

伯恩施坦说："人们谈到我时，不是把我当作一般的修正主义者，而是当作大修正主义者。"（上海社科院情报所编印《学术界动态》第 23 期第 11 页，1982 年 6 月 15 日）

伯恩施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声称："装备很差或装备不足的群众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行动一致的力量所进行的每一个斗争，都很可能带来失败和士气沮丧的结果。"（伯恩施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

伯恩施坦说：要"为阶级斗争创出比较和缓的调停形式"，"在百年以前想来是需要流血革命的改革，在今天则只需要用投票、示威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威压手段就能贯彻了。"（伯恩施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第 6~7 页，三联书店 1958 年出版）

他还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声称："还是固执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名词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阶级的专政必须看做是一种倒退或政治的隔世遗传。"（同上书第 89 页）

他还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09年英译本序言中说："整个来说，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政治倾向的说明。"又说："修正主义……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成为改良主义。"

伯恩施坦声称：他这本书是要"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说"，"纠正"马克思的"错误"；

他说："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的最致命之点"，是妨碍对事物正确认识的"陷阱"；（同上书第39页）

他说："劳动价值论是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同上书第39页）

他说："马克思的体系内实际存在着空想论的残渣"；（同上书第125页）

他说："国际主义，在今天还过于遥远，而似乎是属于未来时代的东西"；（同上书第103页）

他又说："不管哪个阶级或党派，如果问他们的多数人让他们用最简洁的公式来表明社会主义的定义，他们一定要感到困难。"（同上书第73页）

他提出一个著名修正主义公式："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同上书第4~5页）

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3月第三国际的建立，是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反修斗争取得胜利的产物。这也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那时为了划清界线，列宁宣布："名称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6页）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又使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开始向新的高潮转化。修正主义名声臭了。但是坚持修正主义立场、观点、

思想的人还是有的，不过不再公开打出修正主义的旗号了，而且还否认自己是修正主义者。这是他们改变了策略。

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使国家和党变质为“全民国家”、“全民党”。苏共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在新的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政党已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变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转引自《人民日报》1964 年 7 月 14 日）

现代修正主义还鼓吹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放弃革命，按资产阶级的选举法“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老修正主义者白劳德有句话说得是符合事实的，他说赫鲁晓夫的新政策 “同我十五年前所创导的路线几乎是逐字逐句相同。”（转引自《人民日报》1964 年 3 月 31 日）

显然，所有修正主义者，都不可能不与他们的老祖宗一脉相承。不同之处是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就不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者，而说自己是创造性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

可是，万变不离其宗，在遇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时，在遇到无产阶级应怎样取得政权，应该怎样看待政权的阶级性质，应该怎样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这一系列问题时，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就再也难以掩盖，就非暴露出来不可了。

第二个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是否已“没有”修正主义和反修防修任务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没有修正主义？我们党有没有反修防修的任务？回答是肯定的。事情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年来确实有些人是“不提”修正主义和反修、防修了，其中有些人自己就在搞修正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党没有否定反修、防修，而且许多真正信仰马列的同志是在不断地批修、批评“怀

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怀疑和否定我们党的性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毛泽东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毛选》第5卷第392页）显然，出现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便属于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人们有时只是没有用“修正主义”这个词而已。

邓小平一再批评过有些人“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怀疑和否定我们党的性质”，他说有些人认为“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而且“这些错误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邓选》第3卷第42页）如果我们把当年的报刊翻出来看看，有些人的思想观点和言论是比伯恩施坦和赫鲁晓夫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试问：这些人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而又能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党报党刊上发表这类文章者，若不是修正主义者又是什么人物呢？

实际上，我们党不是已经“不提”修正主义。我们只要看一看党的文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党对于反修、防修并非“不提”，更没有否定：

一看《三中全会以来》（上册）：

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说：“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三中全会以来》上册第13页）

2. 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胡耀邦也说：“我们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继续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同上第57页）

3. 叶剑英代表党和国家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

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同上第219页）

4.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几十年中党内斗争经验教训，规定：“要反对和批判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和修正主义思潮。……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必须始终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

这就说得明白透彻极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准则》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相提并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新提出就是针对右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正如毛泽东早就说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毛选》第5卷第417~418页）四项原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者不论或明或暗或以各种借口和形式出现，当然都是修正主义的东西。

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不开反修防修，离开了反修防修，四项基本原则便成了“无的放矢”或几句空话；反修防修如果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也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显然，二者密不可分。这条《准则》写得好，这的确是共产党人应该永远坚持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二看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领导人的历次重要讲话：

1. 邓小平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邓选》第2卷第149页）

2. 邓小平说：“三中全会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就谈不上

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同上第 278 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里是把“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三句话并列作为三中全会重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内容。

3. 邓小平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时又一次强调：“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同上第 346 页）在这里，值得注意，邓小平把“反修防修”、“反对复辟资本主义”是视作同一件事的。

4. 邓小平强调要“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斗争”，要“对从右的方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同上第 166 页）

5. 邓小平说：“有些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内。”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邓选》第 3 卷第 198、199 页）这就明确说明在我们党内有修正主义。这些在“党内”的人，不就是一些尚未公开打出修正主义旗号的修正主义者吗？

6. 邓小平说：“所谓右的干扰就是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同上第 225 页）

7. 邓小平说：“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同上第 229 页）

8. 邓小平说：“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我们也不能忽视右的干扰。”（同上第 248~249 页）

9. 邓小平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词，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

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同上第297页）

10. 邓小平说："两个总书记……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错误，栽了跟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同上第324页）

11. 邓小平在1985年8月接见外宾介绍我国的经验教训时说："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邓选》第3卷第137页）同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同上第141页）

显然，尽管伯恩施坦及其门徒们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他们无非是把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当成"极左"来搞他们的所谓"纠正"。这些年来中国的"自由化"精英、1999年版《辞海》的编者等人岂不是也正干着这样一件事吗?! 只不过他们没有像伯恩施坦那样自称为修正主义者罢了。

以上情况充分有力地说明对于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不是"不提"了，更不是已"否定"了，而是作为根本性问题"提"的，而且是不断地"提"的。只不过在提法上有时不直接提修正主义这个词，而常常提"右的干扰"或"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思潮"而已。从邓小平的历次提法来看，他是把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右的干扰，常常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实际上，不论怎么称呼它，本质只有一个即资产阶级思潮。

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伯恩施坦为首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破产之后，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已经没有人再

敢打出这面“破旗”自称为修正主义者了。相反，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已经“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些善于“装扮”者的特点是说的和做的相反。因此，我们的反修防修任务是特别复杂，特别艰巨。

这二十多年来，我国的修正主义，正像市场上的伪劣假冒商品一样，包装是很精美的，如果不打开来检验是会叫很多人上当的。但假货终究是假货，其真面目的掩盖是不能长久的。

第三个问题：1999 年版《辞海》为什么为修正主义翻案。

1999 年版《辞海》全面系统地为新老修正主义翻案这个事实，是令人震惊的。这个翻案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表现，这个翻案为的是什么？现实的和长远的目的是什么？它同现实中存在的修正主义是什么关系？等等。笔者在这里谈一些看法作一些分析。

1. 这个全面翻案，实际上是为取消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了在意识形态方面毁掉社会主义轨道，以便“与国际接轨”。

这翻案的重心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的革命学说。

列宁说：“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马克思全部观点体系的重心。”又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又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286 页，第 24 卷第 18 页，第 25 卷第 257、399 页）

正是在这些“重心”、“根本问题”上，1999 年版《辞海》编者来了个彻底翻案。它说“国家”、“政权”、“政党”从来就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即：从来就是“全民国家”、“全民党”。所以，它把原来写了的“资产阶级向来标榜‘全民国家’或‘全

民政权的国家’，以虚伪的民主、自由来掩盖其阶级专政的实质”这句正确的话删除、否定掉。（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36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39 页）显然，编者以为这样做了，就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国际接轨”了。可是，我们党从来没有允许过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建设和基本生活方式等问题上”搞所谓“与国际接轨”。（《人民日报》2003 年 9 月 1 日）

2. 这个全面翻案是为了支持和助长社会上早已存在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修正主义思潮。《辞海》编者搞的意识形态“与国际接轨”，是与四项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它所表达出来的这股思潮，是与国内外的这类思潮相呼应的。《辞海》有关编者的头脑反映这股思潮，这股思潮又利用《辞海》这部权威的工具书为依据进一步造舆论。是互相配合、互相影响的。

在《辞海》1999 年修订版出版的前后，我国社会上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实在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已从局部的“修正”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全部抛弃马克思主义。仅举数例如下：

伯恩施坦说：“马克思的体系内实际存在着空想论的残渣”，需要他来“修正”；而中国的“理论家”苏绍智说，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 “只能作了一些估计和一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空想”；（转引自《人民日报》1990 年 4 月 25 日）王若水则说得更干脆彻底了，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王若水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 11 页）

伯恩施坦说他的著作是要“批判”和“纠正”马克思的一些“错误”；李洪林说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一笔勾销”，他写道：我们 “党前后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一样……不要说极左的观点已经被抛弃，就是公认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都被新的观点代替了。变化之大，以致国外有的观察家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一笔勾销’了”。李洪林这位原中宣部理

论局局长说:“确实被‘一笔勾销’得好。”不过,李洪林仍主张要搞一个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假“马克思主义”,他说:“《资本论》反映的是资本的运动,被反映者既然在运动,反映它的理论自然就该发展。”(见《新华文摘》1985 年第 2 期第 90 页)李洪林认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就应该跟着“资本”一起运动、发展资本主义。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怀疑,他说“劳动价值论”是一个“科学的假设”;我国的理论家高放说:“剩余价值”过去说是“工人创造”的,“现在随着信息化程度提高,很多剩余价值是科技成果创造的”。(《理论信息报》1989 年 2 月 20 日)

宦乡不承认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他说中国有的只是“以封建主义传统为内核,把从苏联引进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为外衣包起来的东西”。(上海《社会科学报》1987 年 1 月 1 日第 1 版)照他所说“中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东欧也只有“所谓马克思主义”。哪还有什么地方有马克思主义呢?

高放先生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修正主义。他在学术《报告》中说,“‘批修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犯了一个历史性大错误”,他说这是几十年来各国共产党的一场“混战”,是把“探索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当作修正主义来“批”了。(见福建《每周文摘》1986 年 8 月 21 日摘自《党史信息》1986 年第 14 期)

这些歪曲、抹杀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区别的文章、言论之多,之荒唐是难以尽述的。而且大造这种舆论者的身份也非一般人可比,有的是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有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有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都是一些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媒体、舆论工具的人,他们的言论是很容易被群众误认为是党和国家的观点的。就拿宦乡来说,他是国务

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又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政治顾问”，高放是专家，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委。

实际上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国际接轨”，最初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合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达成《协议》而搞起来的。（见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前言》）

于是，《辞海》有关编者也就根据上述这个《协议》，又来了个“按此意见办理”了，竟把《辞海》中原来写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身份和评价语：“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全都删除、否定掉了；同时，把原来写了的那些“修正主义者”也都删除、否定掉了。（被删除、否定的还有大量相关的内容）可是，这不仅违背客观历史事实，在中国，删除、否定这些有关我们立国立党之本的基本原则、原理，都是违背国家宪法，违背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这在全党和全国十三亿人民中是绝对通不过的！

3. 1999 年版《辞海》为新老修正主义全面翻案，是为了进一步在我国搞修正主义的需要。

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中国的一个著名“改革家”曹思源先生就向“十六大”提出改掉“共产党”的“宗旨”、改掉“共产党”的“党名”的“建议”。曹思源先生曾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后来破产法几经波折，终于通过”了，并且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他认为现在经济改革已基本完成，私有化实现了，已到名正言顺地公开承认私有制是我国的经济基础的时候了。

于是，曹思源又起草和公布了一个“法”，他自己把它叫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法与措施》。（公布在香港《前哨》杂志 2001 年 8 月号第 12~20 页上）笔者看了觉得这实质上是一个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破产的“政治破产法”。曹思

源说，据他的测算中国搞目前这样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至少要搞“六百年”，至多则要搞“二千七百年”，“至于二千七百年以后搞不搞共产主义，那只能由子孙后代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投票决定。反正我们的子子孙孙在未来的二千多年内都要安心搞社会主义（即加强私有制这个经济基础），而这个党改称社会主义党（即领导搞私有制的党），正是恰如其分。”“简称社会党，社会党在英语中和社会主义党是同一个单词。”（同上第18页）

曹思源说，共产党的“宗旨”要改，“理由”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不可能人为地划分阶级。共产党不能只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它要作为全民的优秀代表，直接为全民的共同利益奋斗。”党的“宗旨”这么一改，对“新时期的活动有着全面的指导作用。”（同上）

曹思源又说，宗旨和党的名称这么一改有两大“好处”：一是稳定人心，“私有经济投资”者放心了，因为至少二千七百年内不会“共产”；二是“便于放下历史包袱”。像“企业破产”一样，共产党在政治上、历史上犯的错误和“罪行”，在“破产”后也不怕人“追究”了。

曹思源还说，应“借鉴”早已变“修”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他说，有几十个社民党“都以社会主义为旗帜”，“有着丰富的执政经验”。是的，西欧15个资本主义国家就有11个是社民党执政的。可是，曹思源隐瞒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党是在为哪一个阶级执政。

在这里必须指出：曹思源已没有像鼓吹私有制那样的坦率了。他没有勇气打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招牌，而为了更有效地欺骗人民，他建议中国共产党改挂“社会主义党”招牌。列宁曾说我们“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7页）当然

我们也不能禁止曹思源挑选什么招牌，当年希特勒挂“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招牌也没有谁禁止过。关键不在招牌而在于实质。列宁说：“历史事实……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学说，都是胡说八道……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582~584 页）不知曹先生以为然否？

2002 年，曹思源在香港再次重申他的上述“建议”。据香港《东方日报》2002 年 8 月 12 日报道说：“北京知名学者曹思源在中共十六大前夕公开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各界应该推动十六大，而不是等待十六大。”真是咄咄逼人！

2003 年，一些“精英”人物又在青岛聚会，还是这位绰号“曹破产”的曹思源等所谓“改革家”、学者 40 多位聚集于青岛议论“修宪”，他们完全无视在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出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事实，公然提出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取消“宪法的《序言》（即表达四项基本原则为我国立国之本等内容的《序言》）；提出实行“总统制”、“两院制”（议会）等主张。（见香港《明报》2003 年 6 月 30 日）后来，胡锦涛总书记、国家主席明确要求全党、全民认真学习宪法、实行宪法，表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曹思源等人就跑到国外，继续宣传他的西化主张去了。

2006 年 3 月 4 日，又有一些“改革家”在北京开了个新“西山会议”，还是继续竭力鼓吹他们的西化主张。看来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股思潮在没有达到他们取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之前是不会罢休的。

综上所述，1999 年版《辞海》全面地为新老修正主义翻

案，绝非偶然，这是其立场所决定的。然而，客观事实不容违背，历史不容倒退，真理不容诋毁。四项基本原则是写进了国家宪法，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的。是我们的立国立党之本。批评《辞海》编者的错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邓小平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个根本问题："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邓选》第 3 卷第 299 页）

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也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党的重要文献选编《十三大以来》中册第 547 页）

2007 年，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又一次重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接力棒"是一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直到全人类解放、全球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揭露、批评 1999 年版《辞海》违背客观历史事实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彻底纠正并消除这个严重错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十六、评 1999 年版《辞海》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我国投降派翻案

反帝反封建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现在，我们就再来看一看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是怎样否定这个方面的。编者首先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进而否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从而为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及中国的投降派翻案。这是 1999 年版《辞海》编者通过对以下第三二五至第四○九等 85 个词条的删改或取消而充分表现出来的。

现在，我们把被 1999 年版《辞海》编者错误删改了的有关词条分五个方面来评析：(1) 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错误修改和否定；(2)对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错误修改和否定；(3)为帝国主义侵华历史人物翻案；(4)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错误修改；(5)为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中国投降派、汉奸、叛徒翻案。

第一，1999 年版编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错误修改和否

定。

这可以举出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如下第三二五至第三四二这18个词条的删改为例来加以评析：

首先，1999年版编者定了一个调子：这就是抹杀铁的历史事实，把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中国新文化的代表鲁迅等都改写成是不反对帝国主义的。

（三二五）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1999年版《辞海》编者作了这样的删节：

1. 删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2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2. 删除“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3. 删除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坚决支持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建立发展关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3页与1999年版第1706页）

（三二六）在【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性词条中，1999年版《辞海》编者作了这样的删节：

1. 删除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半个多世纪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结晶”。

2. 删除毛泽东思想“关于反帝……的理论”。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55页与1999年版第1761页）

（三二七）删改【帝国主义】词条。

1979年版《辞海》的全文如下：亦称“垄断资本主义”或

"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后形成。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具有如下的经济特征:(1)在生产和资本集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垄断统治,是它的基本特征;(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为一,形成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产生金融寡头;(3) 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业已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表现在:技术进步受到人为的阻碍,货币资本集中于少数国家,资本输出造成食利者阶层的增加,工人贵族的形成和修正主义的出现,政治上的反动和对殖民地的掠夺、剥削的加强。由于垄断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奴役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并用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等办法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使劳动和资本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这一切表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强,使以重新分割世界、争夺世界霸权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只有消灭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才能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53页与1999年版第432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上述词条二分之一以上的重要内容删除掉了。这实际是否定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特别是对世界三大矛盾的正确分析及其所得出的结论。其实,虽然在二战结束后,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矛盾得到某些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经济暂时还得到一定的发展甚至较大的发展。但对这个情况,列宁在讲资本主义的垂死性等问

题的时候，也是估计到并讲了的，然而，在实质上资本主义的垂死性和世界性的“三大矛盾”都依然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也没有变，而且有许多矛盾是更加发展、扩大和深化了。

（三二八）删改【帝国主义国家】词条。

1979 年版《辞海》全文如下：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垄断资本集团为了维持其统治和追求高额垄断利润，在直接控制国家机器，扩大行政权力，强化军事官僚机构后形成的暴力机关。对内加强剥削和镇压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参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353 页与 1999 年版第 433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这词条中删除掉“对内加强剥削和镇压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段话，这明明是否定“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镇压和侵略本性。请问 1999 年版编者：你们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从来就不存在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本性呢，还是在什么时候这个本性改变了？你们能明说吗？

（三二九）删改【社会帝国主义】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58 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考茨基之流，背叛无产阶级立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宣扬民族沙文主义来欺骗和毒害工人阶级，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者。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打着‘社会主义’、‘支持民族解放’、‘和平合作’的旗号，推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侵略扩张政策，成为最危险的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79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15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把“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打着‘社会主义’、‘支持民族解放’、‘和平合作’的旗号，推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侵略扩张政策，成为最危险的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这段话全部删除、否定掉了。理由何在？你们能说清楚吗？

（三三〇）删改【军国主义】词条。

1979 年版《辞海》全文是：为了进行侵略，疯狂扩军备战，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的黩武思想、政策和制度。18 世纪的普鲁士曾流行军国主义，其最高形态是帝国主义历史阶段的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和日本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它们对内竭力增加军费，造成军需工业畸形发展，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强迫人民服兵役，加强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实行军事独裁；对外加紧镇压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干涉、破坏他国主权，进行颠覆活动，发动侵略战争。（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373 页与 1999 年版第 456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掉的这些核心内涵，难道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真实历史和客观存在过的事实吗？为什么要加以抹杀和否定？你们能作出明确回答吗？

（三三一）删改【殖民地】词条。

1999 年版《辞海》删除的内容是：“占有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殖民地作为垄断的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和军事基地等。”（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337 页与 1999 年版第 1616 页）

请问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你们删掉的这些基本内容，难道不是客观存在过的历史和今天还存在的事实吗？

（三三二）删改【殖民主义】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掉原词条所写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时期殖民主义剥削的主要形式。”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情况下，更多地使用新方法、新形式来保持其统治和掠夺。参见【新殖民主义】。（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337 页与 1999 年版第 1616 页）

（三三三）删改【殖民主义体系】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掉原词条所写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了被压迫民族解放的道路，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加深了这个危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日益由帝国主义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后方，变成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前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仍竭力推行新殖民主义，妄图继续奴役各国人民。（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337 页与 1999 年版第 1616 页）

应该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给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沉重的打击，使它陷入了危机，但它并未完全崩溃，因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仍竭力推行新殖民主义，妄图继续奴役各国人民。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这句重要的话，并改写为“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长期斗争，先后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这就隐瞒了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仍未取得“独立”，仍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这会使这些“经济上”仍未取得“独立”的国家忘记为经济独立继续斗争，这是为“帝国主义……仍竭力推行新殖民主义”打掩护。再联系看编者取消【新殖民主义】词条，就证明了编者就是这个观点：

（三三四）取消【新殖民主义】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第 1488 页全文是：帝国主义在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的形势下，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推行的一

种更狡猾的殖民主义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继续使用旧殖民主义手段（直接的政治、经济控制和军事镇压）的同时，还对民族独立国家和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采用比较间接和隐蔽的方式：如通过经济、军事“援助”、文化渗透、组织军事集团、扶植代理人、制造分裂以至制造军事政变和进行颠覆活动等手法，或利用某些国际组织作掩护，企图保持和扩大殖民统治。（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488页与1999年版第1802页）

（三三五）取消【共同安全法】词条。

197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也叫“共同安全计划”。美国国会1951年10月通过。主要内容：“设立共同安全署”以代替原来的“经济合作署”，统一掌管对外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确定四年（1951~1954）的援外拨款数额，增加军援比重等。并宣称：要“以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办法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实现”，要“为了美国的利益”去开发“不发达”国家的资源等。后来，美国政府曾不断补充修改，其组织机构也多次变动。（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240页与1999年版第1499页）

“共同安全法”，实质上也是新的殖民主义，这是历史事实。

1999年版《辞海》编者取消、删改以上关于殖民地、新老殖民主义等词条，删掉其侵略罪行的主要表现和侵略本性，实在是向读者隐瞒、掩盖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本性。这只能麻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使他们丧失警惕，迷失方向。

帝国主义者也有其聪明之处，他们懂得“旧”办法不行了就会采用“新”办法。杜勒斯说：“西方国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现状，必然招来暴力革命和失败”。（杜勒斯：《战争与和平》）因此，要改变“现状”，即改变“旧”殖民主义的“旧”形式和“旧”办法，采用“新”形式和“新”办法，即新殖民主义，或者改叫“共同安全法”，名字多好听啊。于是，他们允许“旧”殖民地宣

布为“独立国家”，条件是事先培养好“代理人”，或扶植个傀儡政权，以求做到在实际上仍然控制和奴役这些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这就是“新殖民主义”，或者叫做实行“共同安全法”。基本目的在于保持控制，这没有变，但是控制的方法是可以变的。

对于这种新殖民主义，拉美国家体会特别深刻，正如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美国的投资超过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

近年以来，拉丁美洲地区有十几个国家正在或将陆续进行大选，大多数国家的左翼力量受到广大选民的拥护。据报道，“拉美左翼（左派）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不仅指左翼政党和左翼社会运动，而且包括一些对现状不满的政治力量。它们大多数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持批评态度，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实现更大的社会公正，反对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建立更为平等与合理的国际秩序。”（《人民日报》2006 年 2 月 17 日）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这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实质就是意味着一切进入市场，市场主宰一切，意味着国际垄断资本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无止境的压榨和剥削，意味着强者成为唯一赢家的绝对自由。拉美国家已有切身体验，所以，批评“新自由主义”，明确“反对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可悲的是在中国有些人竟要搞“新自由主义”，紧跟“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要帮助西方保持这样的“国际秩序”。

1999 年版编者对有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词条的删改，实际上，是抽象肯定“帝国主义”这名词（甚至连抽象肯定也难

说），具体否定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及其侵略本性，否定马列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科学理论。这也是同一股社会思潮相互呼应的。有些人就是认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已不存在了，或者说帝国主义本性已改变了，马列主义“过时”了。有人写文章说：现在已到“和平发展的新时代”了。他们说什么“战争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世界性的“三大矛盾”，因此才产生了“革命和战争”，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制”已“崩溃”了，原来这个世界性的“三大矛盾”已随着时代的“转换”先后逐步“减少”、“淡化”、“消亡”了。于是，他们说“时代的主题转换”了，并说世界在“二战结束后就开始”向“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转换”了，并由此断言：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时代的产物”，由于它没有与时俱进跟上“时代主题的转换”，已“落到了时代发展的后面”而“过时”了。他们把我国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称之谓“乌托邦”，说什么如不紧跟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只能重陷“乌托邦”，是没有出路的。（见《新华文摘》1999 年第 5 期黄宗良、孔寒冰：《关于社会主义与时代的挑战的对话》）

他们把帝国主义者，既使用旧殖民主义的办法，又使用新殖民主义的办法，还使用“共同安全法”，还使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办法企图控制全球，也作出随心所欲的解释。比如他们不顾帝国主义至今仍用旧殖民主义的办法武装入侵一些小国、弱国的大量事实，竟说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本性已改变了。有人发表文章说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职能”已改变，它已经“从侧重于内外政策上的暴力与镇压”“转变”为“侧重于管理与协调”了。（见同上刊物）试问：难道

美国帮助南朝鲜李承晚妄图“统一”北朝鲜,美国侵略越南、南斯拉夫,入侵伊拉克等等都不是“暴力”、“镇压”和“战争”而都是属于“管理和协调”吗?

新老帝国主义推行侵略都少不了扮演“世界宪兵”这个角色,为了掩盖其侵略面貌,编者也就决定取消这个词条:

(三三六)取消【世界宪兵】词条。

1979年版《辞海》第37页全文是:也叫“国际宪兵”。列宁1909年7月在《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一文中指出,沙皇俄国支持欧洲各国反动派,镇压邻国的革命运动,“一直牢固地保持了世界宪兵的荣誉”。当代霸权主义者,其所作所为超过沙皇俄国,也被称为世界宪兵。(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37页与1999年版第44页)

(三三七)删改【世界主义】词条。

1979年版《辞海》全文是:为垄断资本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攻击民族文化传统和国家主权是“过时概念”,反对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和爱国主义,主张取消国界,组织所谓“世界国家”、“世界政府”,统一世界经济和文化,实际上是企图把世界上一切民族、国家都置于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世界主义是帝国主义用以掩饰侵略政策、垄断世界市场、妄图独霸世界的思想工具;也是反动阶级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借口。它同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7页与1999年版第44页)

这样的删除就把上述“世界主义”明确的具体内涵作了具体的否定。然后编者抽象地改写一句:“世界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思想工具”,然而编者的所谓“帝国主义”,也已是个空洞的抽掉了侵略本性的“帝国主义概念”而已。

关于“世界主义”这个骗人的概念,在马立诚等写的《交锋》一书中写道:“80年代中国的领导人,也即中国第二代领导

人，所确定的开放之方针，乃是要在中国实行世界主义……在当时叫做融入国际大循环”，“那时候，在中国人中间流行的书，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新思维》”。（见《交锋》第285、286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出版）马立诚等人把“世界主义”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提升到我国“开放之方针”的地位，竟然主张中国跟着美国走“世界主义”道路了。这同他们否定马列主义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科学理论是分不开的。

实质上，1999年版《辞海》编者还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看成是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走向现代化。请看1999年版编者对下面三个词条的删改：

（三三八）删改【甲午战争】词条。

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订立了可耻的马关条约”这句话中“可耻的”这个词删除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673页与1999年版第2023页）

为什么“可耻”变成了“不可耻”呢？这在下一个词条的删改中可找到答案：

（三三九）删改【马关条约】词条。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掉原词条对“马关条约”的评价和论断：“这个条约表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删掉后改写为“该条约适应了列强……输出资本的需要”。（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35页与1999年版第1371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的这种删改，就是说本来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中国闭关锁国“不接受”，这是中国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幸好有这次战争的失败和签订了这个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开放重庆、苏州等商埠，让帝国主义在那里为我国发展经济，搞现代化。编者认为这是好事。好在哪里呢？再看

对【资本输出】这个词条的删改：

（三四〇）删改【资本输出】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垄断组织为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用过剩资本向他国投资或贷款。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之一。在帝国主义时期，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形成了垄断统治，少数最富的国家已经积累大量资本，国内“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结果在这些国家里就产生了过剩资本。过剩资本首先向经济不发达国家输出，以攫取高额利润。因为那里资本少、工资低、原料贱、地价便宜，而且那些国家已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具备投资的起码条件。资本输出加剧帝国主义国家和经济不发达国家间的矛盾，也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有利的投资场所的斗争尖锐化。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删除上述划了横线的这段话后，改写为“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民族经济的前提下，利用外国资本，有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36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38 页）

这就是说幸好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能“适应”“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了，这才使中国可以“利用外国资本”发展本国的经济了。这样，1999 年版《辞海》编者就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割让台湾等等，不但不“可耻”，而且使中国能“适应”列强的“资本输出”，变成“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的一件好事了。

应该指出，对以上这 3 个原词条的删改是错误的。当年日本拒绝清政府派去的谈判代表，指名要派李鸿章去，在谈判期间又开枪击伤李鸿章，最后李鸿章被迫签字，割让国土台湾和赔款。那场战争的失败和被迫订立“马关条约”确实是“可耻的”，这是历史事实。1999 年版《辞海》编者否定这个客观历史事实，否认那时帝国主义搞“资本输出”是经济侵略。这是编者的立场站

错了。

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它们自己从来也没有承认过到不发达国家来是实行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的，而是说发展“友谊”“亲善”关系的。1937年“七·七”，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口号就叫“日中亲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说是来“帮助”中国发展和繁荣经济的。中国以八年抗战来回答日本这种“善意”是否错了呢？没有错。这是早已为历史证明了的。即使在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到中国来投资，难道只有乖乖地被中国所“利用”的一面吗？它的目的就只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的吗？它就不会“利用”我国的弱点和“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掠夺我国的资源，“攫取高额利润”吗？我们还要问：我们是否真正地做到了“维护国家主权”，真正做到了维护中国劳动者的权益，真正做到了“保护民族经济”呢？如果外资工厂是严重污染中国环境的，我们是否都接受和引进呢？现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辩证的，常常讲的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显然不能把他们的“资本输出”都无条件地视为我们可“利用”的“机遇”或“双赢”。

社会上有与此相呼应的舆论，有人说什么当年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有助于台湾经济的现代化。因此，李鸿章不但不是卖国贼，而且是功不可没的“爱国者”。有人还写文章说：“李鸿章作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核心人物和国家大局的主持者，在一系列对外交涉中，一再妥协退让，忍辱负重，千方百计避免与列强发生军事冲突……所采取的方针政策，都体现了良苦用心和韬晦之策”，说李鸿章把台湾割让给日本避免了“东北被全面占领，京师不保。”（见《人物》杂志2003年第6期《李鸿章与台湾》）还有电视剧《走向共和》、《买办之家》等歌颂李鸿章卖国“有功”。老修正主义者爱德华·大卫曾在1907年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发言中说：“殖民统治是进步

的，它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了生产力。”（转引自《人民日报》1963 年 10 月 22 日）现今中国也有人表示希望中国“再当三百年殖民地”的。毫无疑问，这些论调都是颠倒是非黑白，是极其错误的。

再看，由于 1999 年版《辞海》编者认为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本性变掉了，编者对“买办”和“买办阶级”的性质也就改写如下：

（三四一）删改【买办】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代外国资本家推销商品，掠夺资源，从中获取巨利。他们依靠外国资本家生存和发展，是旧中国反动统治的社会支柱之一”。（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08 页与 1999 年版第 129 页）

（三四二）删改【买办资产阶级】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买办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所豢养……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主要社会支柱，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08 页与 1999 年版第 129 页）

以上两个词条被这样删节后，就使读者不但搞不清楚“买办”一词是“买”什么，“办”什么，为“谁”买，为“谁”办，完全掩盖了“买办”、“买办资产阶级”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帮凶的真实面目。

看了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 18 个词条的删改或取消，这种否定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战争政策的侵略本性和侵略事实，编者无视历史事实、颠倒是非，为帝国主义翻案已是足够地明白和清楚了。

第二，对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错误修改和否定。

这可以举出第三四三至第三五五共 13 个词条为例进行评析：

（三四三）删改【鸦片战争】词条。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从十八世纪末期起英国就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大量输入鸦片……”(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358页与1999年版第1640页)

本来是说明“大量输入鸦片”和“鸦片战争”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的发生并非偶然。战前英帝国主义已在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实行经济侵略政策,进而发展到军事侵略的。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长达600字的【鸦片战争】原词条中,唯独删除英国“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这一句骨节眼上的话,这就把“大量输入鸦片”和“鸦片战争”的性质改变了——不属于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了。那末,此后所有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侵华事件还算不算是侵略呢?联系编者在【帝国主义国家】词条中删除它“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中国共产党】词条中删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等等一系列的删除来看,这种删除、否定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的。这样,亦即是把以1840年英帝侵华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侵略完全否定了。这样,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就被否定了。如果这个观点得以成立,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要重定了,中国的整个近现代史就要重写。这是个根本性的重大原则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著作中就已解决,已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证。但是,介绍毛泽东这一著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个极重要的的关键性词条也被1999年版《辞海》编者取消掉了。(全文见本书上述第四个词条)

(三四四)删改【南京条约】词条。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39页与

1999 年版第 165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以上的“鸦片战争”词条中删除、否定“英国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后，又在“南京条约”词条中也删除“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也证实编者是否认帝国主义有推行“侵略政策”的本性。

（三四五）删改【洋务运动】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洋务运动是“一部分带有买办性的当权派”，“依靠美英法的援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自强’和‘求富’为标榜”，为了“保持其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以及“因所办企业在技术和原料方面依赖外国，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93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113 页）

这样，1999 年版《辞海》编者就把原词条写的洋务运动的实质和目的及其后果的话都删除、否定掉了。我们不去全面评析洋务运动的功过，但是，洋务运动的实质和目的是“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及其“依赖帝国主义”和必然失败的后果，这是绝对否定不了的。然而，这个基本事实却被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否定掉了。这显然是为洋务运动的历史翻案。随后报刊上也就有许多文章，把搞洋务运动的人物李鸿章等人颂扬为“改革开放”的先驱和爱国者。这同时也是否认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事实。

（三四六）删改【八国联军】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1900 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联军……攻陷北京，掠夺财物，残杀人民”这句话中把“帝国主义”删掉，改为“八个国家”的“联军”，把“残杀人民”删掉，改为“一路杀掠”（这可以指仅仅杀掠清军），回避了“人民”这个帝国主义不愿承认的概念。（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73 页与 1999 年版第 331 页）

（三四七）删改【东南互保】词条。

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英国勾结我国东南各省督抚分裂中国的侵略活动。"这句话中的"勾结"东南各省督抚"分裂中国的侵略活动"删除、否定掉了，改写为"策动"东南各省督抚，"保护列强既得利益的活动"；还把"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在北方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影响及于全国"，"'东南互保'破坏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这个说明"东南互保"的性质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的话也删除、否定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50页与1999年版第60页）

在以上两个词条中，1999年版《辞海》编者既为8个侵华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摘掉了"帝国主义"这顶"帽子"，又抹杀它们"残杀人民"和"勾结"起来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罪行。完全违背史实为它们开脱罪责。

（三四八）删改【领事裁判权】词条。

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原来为"领事裁判权"定性的第一句重要的话"帝国主义国家侨民不受居留国法律管理的非法特权"删除、否定掉了。接着改写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亚非国家的领事按照本国法律对本国侨民行使司法管辖权的特权"，而且编者还为之写了一条"理由"：说是亚非国家的"法律制度劣于或异于它们的制度"。还删除"十月革命后，苏俄立即宣布取消沙皇俄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848页与1999年版第2230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是认为帝国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确实完善，因为它们是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其法制优于亚非国家，因此，"领事裁判权"是发达国家来推广他们的完善的"法制"，值得亚非国家学习和借鉴。这就掩盖了"领事裁判权"是侵犯亚非国家主权的实质。

（三四九）删改【门户开放政策】词条。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原词条所写美国“提出这个政策是为了分沾侵略利益，把中国变成它们共有的半殖民地。后来，美国一直利用‘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作为排挤其它帝国主义势力，独霸中国的外交手段。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所签订的《九国公约》中，又重申了这一政策。”（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876页与1999年版第1044页）

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1979年版《辞海》原来写的是完全符合史实的，这在胡绳的著作中也有大量有关史实的记载。“门户开放政策”虽是美国在1899年提出，实际上，中国早已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共有的半殖民地”了，在1858年，美国参加与英法俄等四大国订立的《天津条约》就是他们“自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华政策……总之，四大国取得的权利，其他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过略费唇舌就得到了。从此中国成为一切大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共同侵略的对象”。（见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374至377页）你们凭什么要把原词条中这些符合史实的记述删除、否定呢？能这样抹杀史实取悦于美国吗？

（三五〇）删改【望厦条约】词条。

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原词条完全符合史实的两个关键词均删除、否定：

1. 把“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句话中的“侵略”这个关键词取消、否定。试问：既是“不平等条约”又不属于“侵略”，难道也属于“双赢”吗？

2. 把“美国专使顾盛强迫清两广总督耆英在望厦村签字”这句符合史实的话中的“强迫”这个关键词删除、否定。试问：签不平等条约，难道一定要写成“平等”、“自愿”的条约吗？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14页与1999年版第1470页）

（三五一）删改【反美华工禁约运动】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把“当时刊印的许多书报……都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排华罪行”删除、否定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67 页与 1999 年版第 324 页）

以上这些词条的删改，岂不都是明显地否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为历史上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进行开脱和翻案吗？

（三五二）删改【万县惨案】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1926 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英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在长江一带不断制造挑衅事件。……当地驻军奋起抵抗，击伤英舰一艘……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万县工人举行了罢工……（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7 页与 1999 年版第 31 页）

这样违背史实的删除，岂不是向读者隐瞒历史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吗？

（三五三）删改【南京事件】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的内容：

1. 把“1927 年 3 月 24 日，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第六军和第一军占领南京，帝国主义即借口保护侨民，炮击南京，中国军民死伤二千余人……”这句话中的“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这话删除掉了。这就隐瞒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

2. 又删除掉在事件后“蒋介石不仅不支持南京军民进行反击，反而派特使到南京和各国领事联络，为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叛变革命作了准备。”原来写的“派特使到南京”是具体的加快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步伐，被改写为：在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同帝国主义勾结的步伐。” 这是把明确具体的事实隐去，用空洞抽象的语句代替。1999 年版《辞海》编者就是常用

这种手法来进行淡化的。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39 页与 1999 年版第 165 页）

（三五四）删改【“三·三一惨案”】（即“重庆惨案”）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把“1927 年 3 月 31 日重庆市民为抗议美英帝国主义军舰炮击南京……遭到军阀镇压……”这句话中的“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删除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05 页）

这是否定美英两国是帝国主义。

（三五五）取消【东方慕尼黑】词条。

（全文见本书上文已引第一〇四词条）1999 年版《辞海》编者取消了这个词条，这是向读者隐瞒帝国主义阴谋亡我的一段危险历史，是要中国人民忘记在八年抗战期间，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曾经进行过几十次秘密谈判，拿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交易，欲制止中国抗日战争以牺牲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这阴谋的及时揭露，以及美日之间的其他矛盾的难以解决，这桩交易才终未作成。编者取消了这个词条所反映的历史，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重演这种历史。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 13 个词条有关帝国主义侵华历史事实、侵华事件的删改，难道不是都在否定帝国主义、否定帝国主义侵略、为帝国主义翻案吗？

第三，为帝国主义侵华历史人物翻案。

这可以举出以下第三五六至第三七一共 16 个词条的删改为例进行评析。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修改帝国主义侵华代表人物词条，把他们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全部删除、否定，把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文化侵略的表现和实质，改写成帮助中国搞经济、文化建设。

（三五六）删改【赫德】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的内容：

1. 删除赫德“取得洋务派李鸿章的信任……伸展英国侵华势力”。

2. 删除赫德在……1876 年订立《烟台条约》“时，他担任李鸿章的助理”。

3. 删除赫德是“英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这句话中的“英帝国主义”，改写为“英国”，把“主要”二字删除。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954 页与 1999 年版第 2352 页）

这位赫德的确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担任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达 48 年之久，一直任职到死为止，实际上是代表英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财政、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的主要人物之一。1999 年版编者通过以上删改，就把帝国主义侵华的代表人物赫德与李鸿章的勾结抹杀掉或隐瞒了起来。

（三五七）删改【福开森】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JohnCalvinFerguson，1866~1945）美国马萨诸塞州人。1886 年，来中国“传教”。1888 年，在南京成立汇文书院，任监督。1897 年，被盛宣怀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督学。1899 年，接办上海《新闻报》。一贯以传教、办学、办报为名，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1899 年，参加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侵略活动。1900 年，义和团运动时，充当两江总督刘绅一的顾问，策动“东南互保”，以便利八国联军的武装侵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迭任总统府顾问，一贯支持军阀，挑拨内战，并盗窃大批中国古物。1941 年，太平洋大战爆发，被日军拘禁于北平（今北京），1943 年，遣返美国。1945 年，病死。

（三五八）重写的【福开森】词条。

1999 年版《辞海》全文是：（JohnCalvinFerguson，1866~

1945）美国传教士、报业资本家。1888 年，来华传教。曾任教会刊物编辑。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先后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首任监督、淞沪铁路会办。1899 年，购得《新闻报》股权，控制该报三十年。1907~1910 年，为《上海泰晤士报》馆主。清庭曾授二品顶戴。民国成立后，先后任北洋政府总统顾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顾问。1942 年，返美。（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87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25 页）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1999 年版《辞海》编者重写的【福开森】词条同 1979 年原写的【福开森】词条是一个何等鲜明的对比啊！这不是把历史作了一个彻底的颠倒吗？把侵略者变成了“帮助”中国搞经济、文化建设的“大功臣”。以编者的立场观点来讲，对于福开森这位洋“大功臣”，不但“清庭曾授二品顶戴”，我们现在还应给他兴建纪念堂馆，以利发展中美经济、文化关系。虽然编者不喜欢搞纪念馆，是把“古田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鲁迅纪念馆”等都从《辞海》中删除掉的，但是对“清庭曾授二品顶戴”福开森，编者大概会赞成建个“福开森纪念馆”来发展中美传统友谊吧。

（三五九）删改【陈纳德】词条。

这是又一个极为典型的实例。197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陈纳德（1890~1958）美国人。生于德克萨斯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美国陆军空翼部队。1937 年，来华任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后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1942 年，改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任少将队长。1946 年，在华组织‘民用航空公司’，旋改称‘行政院救济总署空运队’，包运‘救济物资’，并走私贩毒，猎取暴利；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帮蒋空运军队、武器，侦察和轰炸解放区，屠杀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台湾进行活动，并在香港英国的庇护下，强夺中国两个航空公司在香港的财产。

（三六〇）重写的【陈纳德】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1890~1958）美国空军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加美国陆军空翼部队。1937 年，来华任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称“飞虎队”），帮助中国抗日。后编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任少将队长。1946 年，在华组织中国民用航空公司，旋改称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空运大队，包运美国‘救济物资’。新中国成立后，曾去台湾活动。”（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431 页与 1999 年版第 531 页）

对比一下以上这两个词条，就可看出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是把陈纳德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全部从原词条中删除，抹杀掉了。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美化陈纳德，1999 年版编者还为他增写了两个新词条如下：

（三六一）增写的【飞虎队】词条。

全文是：“飞虎队，即‘美国志愿航空队’。”（见 1999 年版《辞海》第 133 页）

虽只一句话，1999 年版编者的良苦用心是要引导读者去看另外增添的一个新词条，即：陈纳德任指挥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要中国人别忘了陈纳德的“大恩大德”：

（三六二）增写的【美国志愿航空队】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飞行员志愿援华抗日的航空部队。因队徽图案为带翼虎，俗称“飞虎队”。1941 年成立，指挥官陈纳德。1942 年 7 月，编入盟军第十航空队中国战区空军特遣队（美国志愿航空队撤销）。1943 年 3 月，特遣队改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先后在彰德、汉口、岳阳、长沙、桂林、香港、台湾等地上空单独或协同中国空军作战，击落、炸毁日机上千架，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见《辞海》1999 年版第 2313 页）

以上有关陈纳德的4个词条的删改和写法，是值得认真比较研究的，因为这能说明伪造历史、颠倒是非善恶的大问题。大家知道，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有历史的和当前现实的关系之不同，有官方关系和民间关系之不同，有国家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之不同，是应实事求是作具体分析和根据求同存异的原则区别对待的。1999年版编者对【陈纳德】原词条作了错误的删除后改写的词条是更进一步颠倒了大是大非的：

1. 陈纳德是个历史人物，是要具体分析的。

在历史上他代表美国援助过中国的抗日战争，但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前四年一直把军用物资卖给日本作侵华之用；还曾与日方秘密谈判作交易，欲制止抗日战争而牺牲中国；直到“1941年8月”，美国才“禁止把石油运往日本”。（见《中外历史年表》第67页，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翦伯赞主编）1941年9月陈纳德才组织“志愿航空队”，同年12月8日，日本向美国正式开战，1942年7月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撤销，改编为美军第十航空队中国战区空军特遣队，这时的陈纳德已是为“美国自己”而“抗日”了。实际上他援华抗日不足三个月，成立时也只有40架飞机。

当然，他总是曾经帮助过中国抗日，写上一笔也是应该的。但是编者玩弄手法，夸大其“功绩”，竟然写他“单独或协同中国空军作战，击落、炸毁日机上千架，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美国科技水平高，它在几个月中究竟有多少“战绩”是有记录的。编者却把他在几个月内的“战绩”与中国空军八年抗日的“战绩”捆在一起写“击落、炸毁日机上千架”。但《辞海》中却没有给中国空军抗日八年的“战绩”写上一个字。

2. 陈纳德主要是执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他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轰炸、屠杀中国人民。

1999年版《辞海》编者把原词条如实写了的陈纳德“走私

贩毒，猎取暴利；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帮蒋空运军队、武器，侦察和轰炸解放区，屠杀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台湾进行活动，并在香港英国的庇护下，强夺中国两个航空公司在香港的财产”这些史实一字不留地全部删除、否定掉了。实际上，在“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以军用飞机（是陈纳德指挥的飞机——引者注）和军舰，将国民党军队十四个军共四十一个师……约五十四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23页）其中就有陈纳德的“大功劳”在内。陈纳德其人“极端仇视中国人民。中国解放后，他叫嚣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和海南岛。”（见《世界知识词典》第372页，195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由于历史是非被颠倒，有人甚至主张斥巨资为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建纪念碑。

退一万步说，即使“帝国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后来“本性”改变了。变成了“发达国家”对我“友好”的人士了。我们可以不咎既往而表示欢迎，但在1946年开始的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及其代表人物确实是以帝国主义者的身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这怎能加以否认和美化呢？这叫中国人怎样学习中国的现代史呢？

以下可举出一系列帝国主义侵华人物词条删改的例子，1999年版编者基本上都是这个思路：

（三六三）删改【哈同】词条。

哈同，英国籍。删除“凭借帝国主义势力，大规模进行房地产投机，剥削中国人民，获取暴利……设立‘仓圣明智大学’，进行文化侵略活动。”（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742页与1999年版第893页）

（三六四）删改【李太国】词条。

李太国，英国人。删除“从此中国海关完全为英国侵略者所控制，1863年为镇压太平天国，代清政府赴英购买军舰”。（可

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268 页与 1999 年版第 1532 页）

（三六五）删改【芮恩思】词条。

芮恩思，美国外交官。删除、否定他“加紧侵略中国……扩大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等话。（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555 页与 1999 年版第 681 页）

（三六六）删改【李提摩太】词条。

李提摩太，英国人。把他“扩大侵略活动……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中国变为英国的殖民地……企图利用维新运动……从事文化侵略”等话都删除、否定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27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535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以上这些词条中，都是删除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史实，这是为把他们描写成友好的西方文明传播者铺平道路。这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别人的评价和态度问题，而是由此反映出编者的爱憎和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态度问题。由这样的先生们来编写中国的《辞海》能不使爱国的正义的人们感到愤慨?!

（三六七）删改【朱尔典】词条。

朱尔典，英国外交官。编者把他“掠取中国矿山、铁路，侵略中国西藏……支持北洋军阀”删除掉了，还在“扶植亲美英的直系军阀”这句话中删除“亲美英的”四字删除。（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82 页与 1999 年版第 99 页）

（三六八）删改【华尔】词条。

华尔，美国人。华尔是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洋枪队长。编者把他“屠杀中国人民”这句话删除、否定。（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2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46 页）

（三六九）删改【丁韪良】词条。

丁韪良，美国传教士。编者删掉他在“义和团运动时，主张各国划定势力范围，宰割中国……”同时，1999 年版《辞海》编

者偏偏还增写他一件并未成为事实的“功绩”,即:“后曾协助张之洞在武昌等地办大学堂,未成。”(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页与1999年版第13页)

“未成”也是功不可没,不惜篇幅也要写进《辞海》。

(三七〇)删改【赫尔利】词条。

赫尔利任美国驻华大使时,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发表过两篇坚决谴责他的文章。可是,1999年版编者却删除原词条写赫尔利“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坚决谴责”。(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954页与1999年版第2352页)

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难道当年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对这位反共大使的坚决谴责不是事实或谴责错了吗?

(三七一)删改【司徒雷登】词条。

把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时“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人民内战,并企图拉拢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培植中间势力”删除了,另外还新增加一句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遭日军拘禁。”(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07页与1999年版第128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16个词条的删改和重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1999年版编者确实是在颠倒历史是非、为帝国主义及其侵华代表人物一概翻案吗?

第四,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错误修改。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事实,是有必要专门作为重点来评析的。因为这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特别重大的问题。1999年版编者对这些历史事实作了重大的歪曲。

这可以举出如下第三七二至第三九一共20个词条的删改为例进行评析:

(三七二)删改【三一八惨案】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1926 年 3 月 12 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经守军击退。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于 16 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时称“大沽口事件”。3 月 18 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李大钊等人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竟令卫队开枪,群众死 47 人,伤 150 余人。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2 页与 1999 年版第 26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竟然不称“日本帝国主义”,难道也要为它摘掉“帝国主义”帽子?

(三七三)删改【济南惨案】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第 934 页的全文是:也叫“五·三惨案”。1928 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5 月 1 日,蒋军开进济南,日军即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3 日,日军又大举进攻,蒋下令不准抵抗,并撤出济南。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造成惨案。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耳、鼻,最后与 17 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矛盾,1929 年,日军撤出济南。(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93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113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上述两大“惨案”的词条中都讳言日本“帝国主义”,并为侵略者删除、隐瞒和掩盖“割去”中国外交官员“耳、鼻”等暴行。编者如此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开脱,实在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据专家考证,当时制造“济南惨案”的元凶就是后来任军阀孙传芳的顾问，之后在八年侵华战争中任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

的冈村宁次。这个侵华日军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最后受到国民党政府庇护，是被宣布“无罪”回国的。这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与中国亲日派、投降派勾结的一个典型实例。

（三七四）删改【九·一八事变】词条。

1979 年版《辞海》全文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事件。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驻在中国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当时蒋介石集中力量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卖国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日军在 19 日侵占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等省，至 1932 年 1 月东北全境沦陷。（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66 页与 1999 年版第 78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就是这样为本国反动阶级和帝国主义开脱罪责的。

（三七五）删改【塘沽协定】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删除：

1. 删除国民党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及驻守长城沿线的其他军队自动进行抵抗。蒋介石却加紧镇压抗日运动，阻挠前线抗战，……

2. 删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

3. 删除这样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有东三省及热河，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承认被改为“默认”。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546 页与 1999 年版第 670 页）

（三七六）删改【何梅协定】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全部承诺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出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30 页与 1999 年版第 277 页）

（三七七）删改【华北事变】词条。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是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在华北的统治权……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坚持卖国投降政策，……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5页与1999年版第148页）

（三七八）删改【七·七事变】词条。

197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也叫“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开始。1937年6月起，日本侵略军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附近连续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这些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军队拒绝，日军即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推动下，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抗战，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页与1999年版第217页）

1999年版编者在上述4个词条中所删除的都是重大的历史事实。这样要中国人民忘记屈辱的历史，岂不是有利于国内外反动阶级重演这样的历史吗？

（三七九）删改【南京大屠杀】词条。

197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之一。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六周的血腥大屠杀。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报告：中国军民被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十九万多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十五万多具。抗日战争胜利后，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

（三八〇）重写【南京大屠杀】词条。

1999年版《辞海》重写的全文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之一。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逢人便杀，见房就烧，奸淫虏掠，无所不为，有计划地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六周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十九万多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十五万多具。全市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焚毁。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0页与1999年版第166页）

对比上述2个词条，1999年版《辞海》编者重写的词条所作的删除，错误极其严重！

1. 日本右翼势力坚持不认罪的立场，正在制造翻案舆论，他们否认"南京大屠杀"，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其判决的合法性。面对这种谬论，1999年版《辞海》编者竟然在《辞海》中也把"根据远东军事法庭的调查报告"和"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这两段核心内容删除，否定了。这岂不是在误导人们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和"调查报告"、判决的权威性产生怀疑，从而怀疑"南京大屠杀"吗？编者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

2. 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并反诬"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造谣。在此情况之下中国《辞海》的编者作出这样的删节岂不是助长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右翼势力为"南京大屠杀"翻案吗？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你们同日本右翼势力怎样划清界线？

3. 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追随者正在日本为这个战犯翻案，你们在此情况之下从词条中删除给松井石根定案的"法律根据"，岂不是在客观上配合了日本右翼势力为松井石根翻案？

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现在我们把国外的辞书关于【南京大屠杀】词条全文照录,让公众拿来与中国1999年版《辞海》所写的【南京大屠杀】词条作个对比,评评理。

(三八一)(国外辞书)【南京大屠杀】词条。

见1998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1卷第522页全文是:屠杀中国人民的重大暴行。又称南京惨案。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对中国军民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大规模屠杀,杀害了无辜市民和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共30万人以上;据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的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共28案,被害人数达19万多人,日军还普遍地分散进行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余具。日军采取的手段极其残忍,除枪击外,还有砍头、剖腹、活埋、火烧、水溺、支解四肢,等等。日军除疯狂进行大屠杀外,还灭绝人性地奸淫妇女。从幼女到老妇,甚至孕妇都难以幸免,很多妇女在被蹂躏后又惨遭枪杀、刀戳和毁尸。在日军占领南京的一个月中,市内就发生了约两万起强奸妇女的暴行。此外,日军所到之处均遭大规模的抢劫,十室九空。抢劫之后,纵火焚烧,巨火浓烟,笼罩全城,全市被烧毁的房屋达三分之一以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血腥暴行得到了清算,松井石根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为了纪念这场震惊世界的惨案,1985年,南京人民在当年日军屠杀中国人的现场遗址之一的江东门,建立了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厅陈列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图表、照片和实物,揭示了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杀、烧、淫、掠的种种暴行。此外,还在其它屠杀现场如燕子矶、草鞋峡、中山码头、汉中门等遗址及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中华门外等处,建立了15块纪念碑。

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为什么上述国外的面对全球

读者的辞书能以大于你们三倍以上的篇幅来记述“南京大屠杀”？而你们是中国人，身受其害的中国人写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却轻描淡写地用极小的篇幅来描述这一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以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

（三八二）删改【松井石根】词条。

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甲级战犯。1999年版编者对他的表述是有删有增：

1. 把他“指挥部下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大屠杀”这句话中的“对中国人民”和“血腥”等词语删除掉了。

2. 增写他是“陆军将领。曾任日本台湾军司令官，1933年升陆军大将”。

（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77页与1999年版第1544页）

1999年版编者的错误在于一是删除他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历史；二是补写了他的光荣历史不惜篇幅，写了“陆军将领”还要写“陆军大将”；三是承认台湾是日本的，写他是“日本台湾军司令官”。

日本右翼有个“诡辩”，说什么两军相战死人是正常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南京主要是杀“中国人民”，因此不应向这种“诡辩”让步，1999年版编者删掉他“对中国人民”大屠杀这五个字是错误的。“血腥”二字实际上还不足以形容“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于万一，删掉“血腥”二字是错误的。

在此应该强调指出的是：1999年版《辞海》对上述两个词条内容的删改，是在1984年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为松井翻案，出版《“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和田中正明说“东京审判是按事后立法进行的，是无效的”。（见日本《全貌》月刊1986年第11期）以及1994年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答记者问》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等等情况下做的

删改。编者作这样的删改，岂不是也认同他们的翻案吗？这是极其错误的。

（三八三）删改【冈村宁次】词条。

把这个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是“日本战犯”，他在“1945 年 8 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争罪犯”，和他在任内“对中国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的原有表述删除掉了（国民党政府错误宣判冈村宁次“无罪”）；还把原词条写的冈村宁次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为蒋策划向解放区进攻”这个确凿史实，改写为在 “日本投降后，帮助国民党打内战” 这个模糊词语。（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95 页与 1999 年版第 235 页）

请问 1999 年版编者：究竟应该根据事实来写，还是应按照国民党政府错误宣判冈村宁次“无罪”来写？怎能为这个战犯开脱！

（三八四）删改【吉田茂】词条。

吉田茂，日本首相，曾五次组阁，他 1951 年就参拜靖国神社，1952 年“与台湾蒋介石政府签订日华条约”，1954 年与美签订《日美共同防共协定》。可是，1979 年版如实写他“奉行亲美反华政策”这句话却被 1999 版《辞海》编者删除、否定掉了。“日华条约”、《日美共同防共协定》难道不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吗？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历史事实。怎能不顾史实掩盖这个右翼政要的政治面目。（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517 页与 1999 年版第 634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不仅删改以上词条，甚至对几百年前日本侵略者的“老祖宗”也加以美化，对几百年前我国的反侵略英雄也加以贬低。表现为对如下词条的删改：

（三八五）删改【武士道】词条。

1999 年版编者把原词条所写“武士道”的“内容有忠君、节

义、廉耻、勇武、坚忍等。”改写为：“武士道”“要求武士有忠勇、节义、廉耻、守信、坚忍等品质。”（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718页与1999年版第865页）

1999年版编者竟把“忠君”，即“忠于天皇”这个首要前提改写为超阶级的“忠勇”了，更讳言“天皇”。这就隐瞒了武士迷信天皇、为天皇卖命的野蛮凶残的反动本质。这就把都是从属于“忠君”、忠于“天皇”的所谓“节义、廉耻、守信、坚忍”等都提升为独立的“品质”，把这些“品质”说成各阶级都适用的东西了。难道人民军队也应借鉴学习“武士道”这种“品质”吗？大谬不然，“武士道”对“武士”的这些要求是一个整体，是有其阶级性的，日本皇室是一直利用“武士道”来作为巩固其统治与对外侵略的工具和精神支柱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3卷第268页写的是对的：“武士道，日本武士阶级的行动准则”，“主要是提倡效忠天皇的尚武精神。”这几项只能叫“武士阶级的行动准则”，不是超阶级的独立存在的“品质”，如果把它说成独立存在的所谓“品质”，难道能像日本制造的物质机械一样可以到处通用吗？

（三八六）新增写【靖国神社】词条。

1999年版《辞海》第2158页全文是：日本祭祀阵亡官兵的场所。1869年，设于东京。原名“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今名。社内供奉自明治天皇维新以来在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官兵共246.4万余名，其中包括东条英机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战犯。过去每年春秋举行大祭，由天皇或其代表主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日本宪法关于政教分离的规定，取消由国家主持的祭祀活动。但日本的一些政界要人仍有以各种身份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的，引起曾受日本侵略之害的各国人民的愤慨。（1979年版《辞海》无此词条）

1999年版编者这样写有原则性错误：

1. 没有写出“靖国神社”的“污秽”本质：(1)该社建于1882年的“游就馆”是该社最大的一个展馆。展出的是二战前从各国掠夺来的战利品和战殁者的遗物。把侵略美化为正义行为。(2)说大东亚战争是一亿国民为了国家和人民生存而进行的自存自卫的悲壮决战。这是当年军国主义对外广播语言，至今仍在“游就馆”内回荡。(3)该社在5大卷的《打开世界的昭和战争纪念馆》书中认为“靖国神社供奉的英灵，为了侵略而战者，一个也没有”，“日本没有把朝鲜、台湾当作殖民地”。(见《人民日报》2005年8月12日吴广义：《危险的“靖国文化”》)

2. 把“靖国神社”这么一个侵略战争的产物和鼓吹再侵略的工具，写成“日本祭祀阵亡将士”的“场所”。这是附和日本军国主义右翼势力的观点。其实，“众所周知，战前，靖国神社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酵母，一直致力于鼓吹对外侵略扩张。战后，靖国神社又成为汇聚战犯幽灵右翼势力的罪恶精神渊薮，一再宣扬‘侵略有功’、‘审判无效’、‘战犯无罪’等谬论。”(见《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8日评论员文章)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也说：“靖国神社是彰显战死者，是新的战争动员成为可能的装置。”(同上报8月16日)在这里，也有个鲜明对比：1979年版《辞海》和《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没有收入或写【靖国神社】词条。这就是不为日本右翼势力义务宣传“靖国神社”。为什么1999年版编者为它作义务宣传？

(三八七)删改【倭寇】词条。

1979年版《辞海》所写【倭寇】这个词条，被1999年版编者作了错误删改。经删改后的词条虽然简略写了14~16世纪我国东南沿海江、浙、闽以及山东、广东都遭到倭寇劫掠，但是有三大错误：

第一个大错误是修改“倭寇”的定义。原词条写的是：“日

本海盗集团”，被改写为“日本海商与海盗集团”。放在首位的是“日本海商”。这样改写是违背历史事实和违反常识的。1993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对“倭”的解释是：“我国古代称日本。”对“寇”的解释是：“（1）强盗或外来的侵略者（也指敌人）：海寇、外寇。（2）敌人来侵略：入寇。”对“倭寇”的解释是“14世纪至16世纪屡次骚扰、抢劫朝鲜和我国沿海的日本强盗。”然而，1999年版《辞海》编者却把“倭寇”首先解释为“日本海商”，这就把“强盗”、“侵略者”和“日本海商”混为一谈了。实际上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没有把“日本海商”当做“强盗”、“侵略者”对待过。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是始终友好的。

第二个大错误是把“倭寇”说成“日本海商”后，又增写了“明政府严禁海外贸易……使倭患愈趋严重”。这岂不是等于说“日本海商”来通商无罪，明政府“闭关锁国”才使“倭患”愈趋严重，这就把责任推到了中国明朝政府身上。这就像日本右翼势力把从甲午战争开始五十年侵华的责任都推给中国一样了。其实，倭患始于1419年之前，而明政府在1405~1433年的28年间就支持郑和七次下西洋，与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海外贸易。最近我国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有历史学家就指出，明朝没有“严禁海外贸易”、“闭关锁国”，“中国真正走向闭关锁国之路始于清朝乾隆时期。”（见《新华文摘》2005年第18期第65页）

第三个大错误是把倭寇侵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和中国人民奋起抗倭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事迹删除、否定掉了。把原词条中写的“嘉靖三十一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闽军民被杀害的达数十万人。每年清明节后的三、四、五月和重阳节后的九、十月常为其活动时间。沿海人民奋起抗倭，长江下游沙岛上的沙兵，南汇盐民组织的盐丁，都力战有功。至今东南各地尚有许多关于抗倭的遗迹和传说。后在人民抗倭斗争的推动下”这段话全部被删

除了。改写为“后经名将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征战多年，到16世纪60年代中才逐渐解决。”（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52页与1999年版第306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竟如此篡改、歪曲历史！为侵略者开脱，诬蔑本国政府，抹杀本国人民的反侵略爱国事迹和精神，这已造成恶劣的影响和严重恶果。正是在1999年版《辞海》把“倭寇”曲解成是“日本海商”的情况下，安徽歙县也就欢迎“倭寇”的后代到安徽来，为在400多年前因勾结“倭寇”而被明朝政府镇压的头号大汉奸王直平反、修墓，墓碑用日中两国文字刻着：“此墓由日本长崎福江市捐资修建”，还建了“明人堂”、“芳名塔”，把大汉奸当做“开放先驱”来纪念，并举办所谓“王直节”来作为发展中日贸易的一个“节日”（见《大家文摘报》2005年2月7日）。这真是认贼作父，丧尽国格。难道我们今天的开放是继承大汉奸卖国贼王直勾结侵略者的衣钵吗？

（三八八）删改【曹顶】词条。

1999年版编者把原词条表明曹顶的身份和历史对他评价的第一句话：“明代民间抗倭英雄”删除掉了。否定了这个四百多年来被人民公认的英雄。（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396页与1999年版第1684页）

至今南通还保存着的400多年前的古迹之一是城南的“倭子坟”，它像一座小土山一样埋葬着大量倭寇的尸骨。附近还有一个纪念抗倭英雄曹顶的“曹公祠”，祠的大门前有横刀立马的英雄曹顶塑像。这两处古迹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南通八年也没有敢否认和破坏。然而，1999年版《辞海》编者却否定曹顶是“明代民间抗倭英雄”。这是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

（三八九）取消【狼牙山五壮士】词条。

本书举例第九一词条已引全文。（可对照《辞海》1979年版第823页与1999年版第992页）

有人从教科书中删除掉《狼牙山五壮士》课文，作为工具书的《辞海》则是取消【狼牙山五壮士】这个词条。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为什么这样无视反映中国人民历史上的伟大反侵略英雄主义精神的狼牙山五壮士？

（三九〇）删改【赵一曼】词条。

本书举例第九二词条已引。1999年版编者把我国著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领导当地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不幸负伤被捕，"在狱中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删除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944页与1999年版第2340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作这样的删除，使读者对革命先烈的事迹产生怀疑，可是，2005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在《永远的丰碑》中写的赵一曼，确实是"领导当地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的，受伤被俘后，确实是"在狱中英勇斗争，宁死不屈，从容就义"的。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你们为什么要删除掉赵一曼的反侵略"英勇斗争"的事迹？

（三九一）删改【杜重远】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1897~1943）辽宁开原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沈阳创办肇新窑业公司，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加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后来积极帮助邹韬奋编辑《生活》周刊。1935年，主编《新生》周刊，因该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提到日本天皇，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提出抗议，曾被国民党政府判处徒刑一年又两个月。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1943年，被军阀盛世才杀害。（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55页与1999年版第1516页）

1999年版编者这种删改均是为日本侵略者和国内投降派开脱罪责。原词条正确地写道：杜重远是在"日本驻沪总领事"蛮横无理地以《新生》周刊的文章"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

提出抗议”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者才以“妨碍邦交”罪判处《新生》周刊的主编杜重远14个月徒刑和封闭刊物的。可是，这个关键性事实被删除后，就完全颠倒了是非，变成了中日两国的反动统治者皆无罪，只有杜重远爱国“有罪”了？这是中国人在本国无言论自由、无爱国权利和受凌辱的典型实例，也是侵略者与中国的亲日派、投降派勾结的一个典型实例。

以上这些词条的删改，岂不是严重歪曲和颠倒历史是非吗？请问1999年版编者：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作这些删改的？

第五，为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中国投降派、汉奸、叛徒翻案。

在这里，可看出1999年版编者对汉奸、叛徒、投降派是什么态度，他们是怎样对如下第三九二至第四〇九这18个有关投降派、汉奸、叛徒的词条进行删改或取消、增写的。

（三九二）删改【投降主义】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指背弃民族或阶级利益，对敌人屈服、投降的思想或路线。有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表现为散布亡国论调，卖国求荣，迎合外国侵略者的利益和需要。阶级投降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它背叛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对剥削阶级不敢坚持斗争，而是迁就、屈服和无原则的妥协，迎合剥削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

（三九三）重写【投降主义】词条。

1999年版全文是：背弃原则，对敌人屈服的主张或行为。民族投降主义表现为出卖民族利益，散布亡国论调，迎合外国侵略者的利益和需要。阶级投降主义表现为背叛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对敌对阶级屈服和无原则的妥协。（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74页与1999年版第816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的删除、否定的都是原则问题。

1. 删除、否定投降主义是指“投降的思想或路线”，改写为是指“主张或行为”，讳言思想路线。

2. 删除、否定“阶级投降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讳言二者的关系。

3. 删除、否定“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讳言二者的关系。

4. 删除、否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对剥削阶级不敢坚持斗争，而是迁就、屈服”，改写后只空洞地写“背弃原则”这四个字，谁知道是哪一家的原则呢？

（三九四）删改【汉奸】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

（三九五）改写的【汉奸】词条。

1999年版的全文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886页与1999年版第1054页）

值得注意的是：

1. 原词条写“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1999年版编者把“外族”删除掉了。这样，就可给秦桧、吴三桂平反了，因为秦桧降金、吴三桂降清，金、清是少数民族而非“外国侵略者”。像秦桧、吴三桂就都不算投降派、汉奸、民族的叛徒，都可翻案了。

2. 编者还把“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这句话中的“叛徒”这个概念删掉，改写为“人”。这就是说“出卖祖国利益”的不论姓秦还是姓汪都是“人”，是人就应该都有人权，都不扣“叛徒”帽子。

（三九六）取消【叛徒】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通常指革命组织或政党成员中背叛革

命，投靠敌人，或被捕被俘后，向敌人自首并出卖组织和同志，破坏革命事业的分子。（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9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14 页）

1999 年版编者取消【叛徒】词条是否定有“叛徒”的存在，于是，就给历史上的一些民族败类——叛徒、投降派一律摘“帽子”翻案了：

（三九七）删改【秦桧】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给秦桧摘掉“南宋投降派代表人物”的帽子，为秦桧翻案。由于编者同样地也是为胡适翻案的，想必早就知道胡适为秦桧翻案的文章了。胡适在《南宋初年的军费》一文中就说：“秦桧主张议和，确有不得已的苦衷”。胡适说：缺少“军费”，“此实南宋不能不议和的主要原因。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见《胡适全集》第 13 卷第 55~56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于是，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秦桧】这个词条中，不仅为秦桧摘掉“投降派”帽子，还把原词条写的秦桧杀“抗金名将岳飞”这句话中的“抗金名将”这四个字删除，这意味着岳飞“抗金”是错的，秦桧“降金”是对的，秦桧杀的是不服从他的命令的岳飞，杀得是对的，不能再“冤枉”“有大功”的秦桧了。（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612 页与 1999 年版第 1954 页）

这就难怪在上海某展览馆出现了“站立了起来的秦桧雕像”，作者就是说秦桧也是“人”，他有人权，不能叫他老是跪着。然而，我们认为中国的历史应由中国人民来写，不是胡适与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所能随意篡改的。把秦桧和岳飞的历史是、非、善、恶加以颠倒，只能暴露“颠倒者”自身的阶级立场，人民是永远不会认可的。

（三九八）删改【倭寇】词条。

本书上文已作过评析，1999 年版编者是为“倭寇”摘掉了

"海盗"帽子,改写为:"倭寇"是"日本海商与海盗",编者把"海商"放在前边是想表明主要是一些到中国来通商、搞外贸的人,是不可都当作"海盗"对待的。这实质上是篡改历史,为"倭寇"翻案。(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52页与1999年版第306页)

(三九九)删改【王直】词条。

王直在我国明朝时期勾结并加入"倭寇"为王,在我国东南沿海建立了据点,自称为"净海王"。他是后来被明朝镇压了的大汉奸。1999年版编者把王直派倭寇入侵我国"劫掠财物……东南军民死亡不计其数"的罪行和祸害删除。实际上也是为王直这个大汉奸开脱、翻案。(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94页与1999年版第1442页)

1999年版编者修改以上两个词条,已产生严重后果。本书在上述评析第三八七、三八八两个词条时已指出:在删改"倭寇"等词条后,"倭寇"的后代和"王直"家乡的当局竟视大汉奸王直为"对外开放"的先驱,为王直修墓和建纪念塔并举办"王直节"来作为发展中日贸易的"节日"。

(四〇〇)删改【李鸿章】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原词条的主要内容:

1. 把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这句话删除,为李摘掉了"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的"帽子"。

2. 把李鸿章是"淮军军阀"改写为"淮军首领",为李换了一顶光荣"帽子"。

3. 把李鸿章曾经"扼杀太平天国革命"删除掉。

4. 把李鸿章"对外一贯妥协投降"删除掉。

5. 把李鸿章在"1896年接受帝俄贿赂……出卖主权,允许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等"删除掉。

6. 把李鸿章在"临死前还推荐袁世凯继承他的职务"删除掉。

（以上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268页与1999年版第1533页）

1999年版编者为这个典型的“媚外卖国人物”摘“帽子”翻案，把他的主要罪行删除，这是明显地抹杀历史事实。这为把李鸿章描写成“爱国者”铺平了道路。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国家主权是不可出卖的。邓小平在回答撒切尔夫人时说：“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了。（《邓选》第3卷第12页）可见，李鸿章早已是“媚外卖国”的代名词。可是，1999年版编者却为李鸿章翻案。

果然，不久，在我国就出现了一部《走向共和》大型电视连续剧，大家看了剧中被美化了的李鸿章，思想大乱，到处有人在议论。人们问：“到底什么叫卖国贼？什么叫爱国者？”“李鸿章到底是卖国贼还是爱国者？”

不少党员、干部、教师、教授都说，看了“电视剧”得出一个很深的印象：“李鸿章是一个能干的、爱国的外交家。”

有人说，“李鸿章是个好人，过去说他是‘卖国贼’，是极左观点，无限上纲，是不公正的。”

有人写文章说：“李遭到日本浪人的袭击，险些丧命，李利用这个机会，指责日本的不道德行为和侵略行径，力图降低日本提出的条件，经过李鸿章的苦苦力争，日方不得不作出了让步，赔款由三亿降为二亿，辽东半岛的割地也划出了辽阳地区，少割将近一半。应该说，在马关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见《中国剪报》2003年5月19日第6版，此文摘自发行量也不小的《周末》报）

有一家报纸更把李鸿章捧上了天，它突出介绍政客梁启超在其所写的《李鸿章传》中对李的无限拔高的评价，说：“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夏商周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

所凭借，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文摘周报》2003 年 5 月 26 日第 7 版）他把李鸿章说成超过诸葛亮的聪明、能干和忠诚，是个永为“百世所钦者”，只是“得君不及之”，悲叹他的主子是慈禧而“不及”刘备。该《文摘周报》用半版篇幅，全是介绍吹捧李鸿章的谬论。

于此可见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为李鸿章翻案后果之恶劣和严重了。

（四〇一）删改【袁世凯】词条。

1999 年版编者为袁世凯翻案，也删除原词条 6 项内容：

1. 删除袁世凯把持的北洋军阀政府是“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阶级性质，这是为袁世凯摘掉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帽子。

2. 删除袁世凯曾经“伪装赞成维新运动”后又向清政府“告密”出卖“维新运动”的行为。

3. 删除袁世凯“勾结德国侵略者”，残酷镇压义和团。

4. 删除袁世凯参加“帝国主义策划”的“东南互保”。

5. 删除袁世凯“出兵向国民党要挟议和”。

6. 删除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

（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535 页与 1999 年版第 657 页）

（四〇二）删改【汪精卫】词条。

1979 版原词条全文是：汪精卫（1883~1944）大汉奸。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10 年，因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收买，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袁世凯失败后，又投奔孙中山。1925 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1927 年，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外交部部长等职。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一贯主张对日妥协。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

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1938 年 12 月，离开重庆，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 年底，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 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1944 年，死于日本。（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89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064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上述【汪精卫】原词条中删除的内容：

1. 为汪精卫摘掉“大汉奸”帽子，改写为一般的汉奸。

2. 把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收买，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这句话中的核心内容“破坏革命”四个字删除。

3. 把汪精卫一贯主张对日妥协的“一贯”二字删除。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为汪精卫开脱罪责还删改下列词条：

（四〇三）删改【“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加紧反革命活动。6 月 10 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 日，冯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密谋蒋汪合作，共同反共。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不仅不加强工人阶级的武装，准备应付突然的事变，反而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装交给国民党。7 月 15 日，汪精卫即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6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有关汪精卫的这两个词条作这样的删除显然是错误的：

1. 国际法庭审处“战犯”尚有甲级和乙级之分，中国的“汉

奸”就无大小之别吗？汪精卫这个头号“大汉奸”同基层的乡、保长那种级别的一般的小汉奸是应该有所区别的。

2. 在历史上汪精卫既然“受袁世凯收买”、“拥袁窃国”，这岂不是“背叛”了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编者不但不给他戴“叛徒”帽子，还要把他“破坏革命”四个字删除、否定。

3. 把汪精卫一贯主张对日妥协的“一贯”二字删除。

4. 把汪精卫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严重罪行删除、抹杀。这是为什么？

1999年版《辞海》编者如同对待蒋介石一样为汪精卫开脱罪责，篡改历史。这就为美化汪精卫者除去了障碍，铺平了道路。不久，我们看到了美化汪精卫的一篇奇文。该文写到汪精卫认为自己投降日本、当汉奸是“有理”、“有功”，是什么“真正的爱国”、“真正的救国行为”。奇文共欣赏！现将这两段文字照录如下：

> 汪精卫与李时雨等人的《对话》，汪说：“中国汉文化博大精深，有几千年历史，日本到中国来，慢慢地会被中国文化同化。辽金元清进入中原，到最后还不是归化，被我们同化了。”（李：我们插话：“今天的时代已不同了”。）汪说：“这一点你们不要怀疑，我在日本留过学，他们地处岛屿，想找个好地方生存发展。元忽必烈那么强悍，满清那么强悍，都没在中国统治到底，日本也一样。”汪说：“现在中国的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所以我们不是卖国，而是真正的爱国，我们不能眼看中国共产党坐大，把中国引向灭亡。”这就是说投降日本是“有理”、“有功”，是“爱国行为”。
>
> 更进一层，汪说；“我叫什么卖国……我是失掉个人的

历史、名誉，我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从重庆回来（指回到南京）……我们这是真正的救国。中国打不过日本，这是最好的选择。”（见《百年潮》杂志2005年第3期第69、70页李时雨口述张德旺整理）

笔者看了这家向全国发行的大型杂志竟在《口述历史栏目》内无批判地刊登这种文字，岂不是让人感到这是在为汪精卫当大汉奸“有理”、“有功”作义务宣传吗？

再来看1999年版《辞海》编者为死不改悔的旧中国最大的“亲日派”何应钦翻案。编者在《辞海》中增写了一条原来没有的新词条：

（四〇四）新增写【何应钦】词条。

1999年版第277页的全文是：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字敬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曾任黔军团长兼贵州讲武学校校长、第五混成旅旅长。1924年，任黄埔军校总教官、教导团团长，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8年后，任军政部长、军委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行政院院长。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和“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

上述增写的“何应钦”词条，完全是写他的学历、革命经历、职务、显赫的官衔，这些自然意味着他非“不学无术”之辈和有相应的历史功绩的历史人物。编者不但不写他这个“亲日派”一贯主张对日妥协投降的罪行和劣迹，而且，还在【何梅协定】词条中把他在《协定》中“全部承诺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出卖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删除，在所有与何应钦有关的词条中，都删除掉这个“亲日派”的罪行和劣迹。何应钦的历史变成了“一生清白”。（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230页

与 1999 年版第 277 页)

这岂不是美化和为"亲日派"翻案?事实上,何应钦是个死不改悔的"亲日派"。直到 1956 年他还专程去东京拜访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请看何应钦与战犯冈村宁次的一段对话是多么形象生动地反映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投降派的勾结:

何应钦:"我初次见到先生是在北平谈判塘沽协定的时候"。

冈村宁次:"是的。我至今未能忘怀当时你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如果继续向中国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得益坐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不幸得很,今天变成了现实。"

何应钦:"当初碰到你,一谈起来,才认识你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总而言之,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先生和我们看来很像是同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冈村宁次:"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见日本国《文艺春秋》杂志 1956 年第 4 期。转引自《蒋介石评传》第 477、478、482 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5 年 5 月出版)

此外,冈村宁次还在回忆录中写道:1945 年"向中国友人中最亲密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同上书第 473 页)这有力地证明了一条真理:从国家角度看中国和日本是两个国家,从民族角度看汉民族同大和民族是同文同种的两个民族,但是从阶级角度来看日本侵略者同中国的汉奸投降派都代表压迫、剥削人民的反动统治阶级,他们是阶级兄弟、是"同志"。为了巩固本阶级的反动统治的利益,它们是可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攘外必先安内"岂不正是贯彻的这个原则吗?

这些人,都是帝国主义侵华必须依赖的人物。当然,还远不止上述列举的这一些。1999 年版编者把他们勾结帝国主义侵略

者的罪行都删除、否定掉了。这里也有个鲜明的对比:在这个爱国与卖国、忠与奸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韩国就不同。韩国对待“韩奸”、“亲日派”的态度就很严肃,韩国总统卢武铉在2004年纪念朝鲜半岛光复59周年讲话中,精辟地分析了韩国社会不分爱国和卖国是非所造成的后果。他说,近几年,韩国展开一系列清算“韩奸”的调查,自2004年3月起,韩国国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赋予清算行动以法律地位,成立了“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查明委员会”和“亲日反民族行为人财产调查委员会”,进行了许多工作。韩国人在60年后再抓“韩奸”,要清理的是几代人的是非曲直，要解开的是被扭曲的历史谜团。(《报刊文摘》2006年11月3日第4版)看看韩国的做法,我们是否应该从中受到某些启发?中国的汉奸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民族叛徒,正直的中国人都视汉奸、叛徒为可耻和应谴责与惩罚者。

还有使人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版《辞海》编者如上所述在无理取消原来写得正确的【叛徒】这个词条后,就进一步给历史上的“叛徒”一律摘掉“叛徒”帽子,对未戴帽子的“背叛者”也不再给戴“叛徒”帽子了。例如:

(四○五)增写【张国焘】词条。

1999年版《辞海》编者为张国焘翻案,在词条中只写他“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为他摘掉了“叛徒”帽子。(见1999年版第1319页)

张国焘投降国民党,当了特务。中共中央在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中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当年的这个《决定》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见1991年版《毛选》第2卷第531页)然而,1999年版编者竟然把张国焘的这个“叛徒”帽子摘掉了。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张国焘翻案吗?

(四○六)增写【顾顺章】词条。

1999年版编者虽然未敢否认“顾顺章被捕后叛变”这个事

实，但不给戴“叛徒”帽子。（《辞海》1979 年版无此词条，1999 年版第 2227 页新增）

（四〇七）增写【向忠发】词条。

1999 年版编者虽然未敢否认“向忠发被捕后叛变”这个事实，但不给戴“叛徒”帽子。（《辞海》1979 年版无此词条，1999 年版第 101 页新增）

（四〇八）在【方志敏】词条中，1999 年版编者把“方志敏与国民党作战时因叛徒出卖被捕”这句话中的“因叛徒出卖”删除，以示“叛徒”这个名词、概念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4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873 页）

（四〇九）在【陈胜】词条中，1999 年版编者为杀害古代农民革命领袖陈胜的“叛徒”庄贾摘掉了“叛徒”帽子。（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429 页与 1999 年版第 528 页）

请问 1999 年版《辞海》编者：难道由于《辞海》中【叛徒】这词条被你们取消，过去、现在和今后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叛徒”了吗？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叛”字的解释是指“背离；背叛”。大家知道，张国焘、顾顺章之流背叛中国共产党而参加反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这是投敌行为，是可耻的叛徒。叛徒是一个贬义词。可是，自由化“精英”王若望颠倒大是大非，竟说“背叛共产党是光荣的”。王若望答《美国之音》记者说：“我年轻的时候，几乎到四十岁以前，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以后我开始反省，我开始怀疑毛泽东，怀疑共产党的政策，走上了背叛共产主义、背叛这个党的道路。这个背叛，我认为是光荣的，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转引自《中流》杂志 1993 年第 9 期第 44~45 页）现在，1999 年版《辞海》编者否定张国焘、顾顺章之流背叛共产党是可耻的叛徒。难道也是认为张国焘、顾顺章之流

“背叛共产党”不是“叛徒”而是“光荣的”吗?

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西方也有出卖了耶稣的叛徒犹大,为什么在中国的《辞海》中就只有“背叛”的人而没有“叛徒”呢?

我们仔细看了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5个方面共85个词条的删改、取消和增写的内容,同原词条进行了核对,更重要的是同客观历史事实进行核对,证明编者是违背客观历史事实,是颠倒是非善恶,为帝国主义翻案,为勾结帝国主义的中国投降派、汉奸、叛徒翻案。这真是白纸黑字,昭然若揭,无容置疑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翻案现象?显然,这只能用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理解、认清和给予说明。这绝不是个别人、少数人的思想观点,而是一种社会思潮,是一种阶级的思潮,一种阶级现象。因为资产阶级还存在,还在发展,它的思想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必然要反映出来的。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众多词条的修改、重写正是这股翻案思潮的反映,是翻案的集大成者。紧接着,这股翻案思潮也在文艺领域充分地反映了出来,这就是2003年出现的轰动一时的《走向共和》与《买办之家》两部大型电视连续剧。那是形象地表现了1999年版编者所掀起的这股翻案思潮,可以说是对1999年版《辞海》的一个很好的注脚。他们都是根本不承认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不承认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以及后来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是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因,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观众受这种电视剧欺骗之深,这里仅举一篇《扬子晚报》(2003年5月15日B4版)的报道,就足见一斑了。这篇报道题为《专家盛赞〈走向共和〉》,这是报道一批教授、作家、评论家

聚会畅谈，认为电视剧《走向共和》“让人物面貌一新，冲击了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让观众对一百多年来形成的概念提出了质疑”，让观众“重新审视”已经“面貌一新”的“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实非“不学无术”的一般人物。这说明不仅有专家、学者、评论家，而且是“一批”，他们都普遍对电视剧歪曲描写的李鸿章等人的形象深信不疑，全盘接受，也就是肯定了这股翻案思潮。

在这里，所谓的“一百多年来形成的概念”岂不正是1999年版编者从1840年【鸦片战争】词条中所删除、否定的“帝国主义具有推行侵略政策的本性”这一类“概念”吗？所谓的“冲击了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岂不正是与1999年版编者对数以百计的原词条的删改、取消或重写的内容有关吗？换句话说，他们就是要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取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便实行意识形态与国际接轨。中国的“资改派”就是打着“改革”的招牌一心一意想搞掉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公有制，同时搞掉我们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然而，新老殖民主义、新老帝国主义和勾结侵略者的中国的新老投降派、汉奸，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是谁也抹煞和否定不了的。

关于老帝国主义和老殖民主义的问题：

最早研究帝国主义的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在1902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帝国主义》。作者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写《帝国主义》的，但他对帝国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经济危机、垄断组织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等等问题，也都是作了明确肯定的说明的。

在历史上，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学者有许多关于帝国主义的说明解释还是非常生动的。例如罗德斯说：“我昨天在伦

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充满了‘面包，面包！’的呼声和粗野的发言。回家时，我把看到的情形思考了一番，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为了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去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取得推销我国工厂和矿山出产的商品的新区域。我常常说，帝国就是饭碗问题。要是你不希望（英国）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见《新时代》杂志1898年第16卷第1期第304页，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9页）

自称为“殖民主义政治家”的罗德斯，他把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本性决定其必然要搞“侵略”和“战争”说得多么坦率、明白。

直到一百多年后，1991年初，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海湾战争，有的国家附和，有的国家不敢反对、不敢批评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可是，英国却没有“取消”或回避“帝国主义”的提法，英国政界名人前首相希思就针对美国总统的言论，指名道姓地批评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希思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布什总统想把他选择的秩序强加于世界，那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见《文汇报》1991年2月5日）由此可见，这位英国老资格的政治家希思，他认为“老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美国对“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也没有“取消”。美国学者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这本风行世界的书中，有专论《帝国的战争》一章，他写道：“新兴的帝国主义从殖民地搜括原料，加工后以高价把成品卖给殖民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欧洲政治家恬不知耻地宣扬：‘帝国即贸易’……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是不公平的……为了争夺世界经济的控制权，不断开展流血战争。”这也把帝国主义对外必搞“侵略”（经济侵略、

不平等贸易）和“流血战争”的本质说得很坦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什么情况呢？托夫勒写道：“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成统一的世界贸易体系，从1944~1970年基本上控制了各国的贸易。”（见《第三次浪潮》第10~11页，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这就是说能进行“控制”当然就不需要进行“战争”。

但是，到了“控制”不了的时候，或到了争夺经济控制权的矛盾激化时，便会发生“流血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控制朝鲜和越南，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所投的炸弹，据美国的统计就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投的炸弹总量六十三万多吨还多十二倍以上。（见1971年7月14日《参考消息》）仅就投炸弹的规模来讲，美国已经相当于打了十二场“二次世界大战”了。据国际专家统计1946年至1992年，全球发生局部战争一百七十多次。“死掉七千多万人，比二次世界大战战死的人数还多”。（见《中流》1995年第2期）据美国统计1946~1989年全球每年平均发生“局部战争”二点八次，1990年至1999年全球平均每年发生“局部战争”五次。有人说，这是一种分“时间阶段”、分“空间地段”，分散进行的特殊的新形式的“世界大战”，恐怕也不无道理。因为战争的合计规模、死伤人数、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等等与两次世界大战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在美国发动第一次对伊拉克战争时，美国前总统卡特就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这是“非正义战争”。

后来，美国又绕过联合国进行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难道这些只是行使“管理与协调”的“国家职能”而不属于“战争”吗？恐怕美国自己也没有否认这是“战争”吧！

关于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新汉奸的问题：

关于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新汉奸是不是客观存在着呢？请看新帝国主义者与新汉奸的一场形象的、生动的表演：

“2006 年 5 月 11 日小布什率副总统切尼、国务卿赖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海德、白宫幕僚长波顿、白宫首席撰稿人葛尔森和白宫发言人史诺等一干人马，在白宫接见了来自中国的三个铁杆洋奴、汉奸兼反共分子，他们是自由职业者余杰、讲师王怡和律师李柏光。

余杰：里根总统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

布什（打了一个响指）：啊，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做才能帮助你们呢？

余杰：我有三个建议。第一，在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任何场合，都持续地、坚定地向他们表达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关注。

布什：是的，我们一直在这样做……

余杰：是的，这样做很好。我的第二个建议是，美国驻华使馆可以定期邀请中国的家庭教会人士、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等聚会，以显示对他们的支持……

布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余杰：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希望美国政府和国会对某些美国公司在中国行为有更多的约束和监控。比如互联网公司雅虎向中国警方提供个人资料……

布什：我理解你的想法……我相信这些公司会停止他们的错误行为。

据报道说，谈话中布什还带领大家为中国的‘家庭教会’及中国的‘自由民主’祷告，鼓励他们‘从地下走到地上’。”（转引自《中华魂》杂志 2006 年第 11 期第 56 页）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岂不是把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迫不及待地在进行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活动充分展现在我们眼前

了吗?中国的新汉奸的代表人物岂不是也赤膊上阵了吗?而且在利用宗教、传教士这种手段上,新老帝国主义是很一致的。

以上这些事实，难道不是证明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本性的论述一点也没有过时吗?现在,某些帝国主义者还以其所谓“经济实力”来吓唬人,其实,这个纸老虎的本质早已被戳穿了。一位美国专家约翰·里德写道:“发达国家能够不断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它们的资金控制了第三世界的市场、人力和自然资源……是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资源和市场的这种剥削才使其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的。”(见《人民日报》1990 年 8 月 2 日)美帝国主义还以其所谓军事超级强国吓人,欺侮、侵略别国,但也没能吓倒伊拉克人民。现在,侵略军在伊进退两难,赖在那里不断有伤亡,而且军费开支也是个无底洞,不从伊撤军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人民更反对;不撤难,撤也难,骑虎难下。

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总会有人出来与侵略者勾结，即总会有甘当国家、民族叛徒的败类也不稀奇,列朝列代都有这种败类。即使在新中国的土壤里也会有毒草长出来。他们想过富裕生活而不愿靠自己艰苦奋斗，于是就想投靠侵略者来过不劳而富的生活。他们有句名言是说要富起来“中国应该再当三百年殖民地”。这样,侵略者就会给高薪雇他们当走狗了。1999 年版编者删改【汉奸】词条,把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者,出卖祖国利益的人不称为民族的“叛徒”、“汉奸”而称为“人”,编者还把【叛徒】这个名词、概念和词条都取消,恐怕正是为适应这些既想当汉奸、叛徒,又不愿被骂为汉奸、叛徒者的意愿。例如方励之就声称他主张“解散中国”,他自己则去当“世界公民”。这样岂不是就不能被骂为“民族的叛徒”和“汉奸”了吗?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可是，这些民族败类与十三亿拥护社会主义的同胞相比毕竟是极少数。

十七、评 1999 年版《辞海》为蒋介石翻案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是怎样抹杀中国的反动统治者蒋介石的罪行和为之翻案的。编者是通过删改、重写和取消如下第四一〇至第四七七等 68 个词条进行翻案的。现分九个方面来评析。

第一，为蒋介石翻案，从否定他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开始直至否认他是“三座大山”的“集中代表”。

请看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第四一〇至第四一八等 9 个词条的删改和取消：

（四一〇）删改【蒋介石】词条。

1979 年版《辞海》的全文是：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学名志清。早年曾求学保定军官学校，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依附沪军都督陈其美。1924 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蒋表面拥护，取得孙中山的信任，被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旋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 年，撕下“左派”伪装，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

案”，排斥共产党人，并乘机攫取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1927 年，北伐军进占长江下游地区，革命节节胜利之时，蒋受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指使，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在各地“清党”，公开破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控制军政大权，对内实行独裁专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坚持不抵抗政策，并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反共内战，对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发动五次“围剿”，此外又不断制造新军阀混战。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后，被迫结束十年内战，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一面抗战，一面企图与日谋和。1938 年，武汉失陷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曾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妄图独吞胜利果实，伪装和谈，准备内战部署，旋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1946 年，一手召开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 年，任“总统”，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代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蒋管区内，特务横行，经济破产，百业萧条，民怨沸腾。1949 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率残部退至台湾。1975 年 4 月 5 日，在台北病死。

只要看一看 1999 年版编者在上述词条中所删除掉的文字，就可见把蒋介石及其政权主要的罪行、劣迹都删除、抹杀了；把蒋介石及其政权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代表”（即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蒋介石是“三座大山”的代表）也删除、否定了。这还不是明显的翻案吗？

（四一一）重写【蒋介石】词条。

1999年版《辞海》的全文是：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乳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1907年，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次年去日本学习军事，加入同盟会。1910年，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在沪军都督陈其美属下任沪军团长。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参与护国战争。在上海赋闲期间，在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1923年，被孙中山任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同年8月，赴苏联考察。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广州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得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使国共合作破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和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反共内战。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抗战时期，任国民党总裁，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多次掀起反共高潮。1943年9月，再次出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一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一面部署内战。1946年，命令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同时操纵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任“总统”。1949年，在反共内战失败后去台湾。任台湾当局“总统”和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著作有《西安半月记》、《中国之命运》、《蒋总统集》等。（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01页与1999年版第732页）

1999年版编者重写的这个词条，不但把原词条如实写了的蒋的罪行、劣迹和蒋政权代表“三座大山”的性质都删除、否定了，而且增写了他的显赫官衔达20项以上。

因为蒋介石先是以拥护“三大政策”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后又从背叛“三大政策”开始背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1999年版《辞海》编者为他翻案，就把“三大政策”及其相关词条全都取消或删除其基本内容：

（四一二）取消【三大政策】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1923年底，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会议，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是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是以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为中心。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基本相同，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20页与1999年版第23页）

（四一三）取消【旧三民主义】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指孙中山在1905年建立同盟会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和同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宣布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主张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采取由国家核定地价、核价后增涨的地价归国家的办法实行平均地权，企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案来改造中国。1924年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后，称“新三民主义”。（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372页与1999年版第1656页）

（四一四）取消【新三民主义】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指孙中山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主义；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的民主政治的民权主义；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这时期的三民主义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其实质，亦称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487 页与 1999 年版第 1800 页）

（四一五）取消【旧民主主义革命】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指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指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如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372 页与 1999 年版第 1656 页）

“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相区别，是以有无“三大政策”这个重要内容为标志的。这是毛泽东在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科学的区分并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的。1999 年版编者把【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旧民主主义革命】这 4 个在中国革命史上很重要的词条全都取消，否定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否定民主主义有新旧之分。这就把孙中山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论断都否定了。为什么要都否定呢？主要因为其中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和反帝、反封、节制资本等内容。要肯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必须否定这一切。

1999 年版编者对【三民主义】这个词条的删改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一六）删改【三民主义】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1）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19 世纪末孙中山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1905 年在组织同盟会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同年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了“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封

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初期的三民主义（即旧三民主义）还没有一个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后来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以俄为师，唤起民众，因而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要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为中心。这就是后来以"三大政策"为实质的新三民主义。（2）书名。孙中山著，1924年出版。系汇编三民主义演讲稿十六讲而成。今编入《孙中山选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0页与1999年版第24页）

因为1999年版编者否定了"三大政策"，蒋的谋士戴季陶反对"三大政策"的活动也就不作为"反革命活动"来看了，在下列词条中被删除：

（四一七）删改【戴季陶】词条。

1999年版编者把戴季陶进行"……反革命活动……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删除掉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824页与1999年版第2192页）

（四一八）删改【西山会议派】词条。

1999年版编者把"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反动议案。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成立反动政府后……继续反共反人民。"这段话中把"反动"、"继续反共反人民"删除掉。（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836页与1999年版第2216页）

请问1999年版编者：戴季陶反对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

策”为什么不算作“反革命活动”？西山会议派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议案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成立的政府为什么不能说是“反动”的呢？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这 9 个词条的删改和取消说明了什么？

1. 否定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的“三大政策”。显然，这是为蒋介石背叛革命翻案。

2. 这个翻案同时亦即是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得很清楚：“实行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这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基本上相同。”（1991 年版《毛选》第 2 卷第 692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取消和删改这些词条是一箭双雕，既否定了孙中山及其革命的“三大政策”，又否定了继承和发展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及其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上文已指出编者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词条也取消。

第二，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开脱罪责。

（四一九）取消【安庆惨案】词条。

1979 年版全文：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制造的惨案之一。1927 年 3 月 23 日，蒋为打击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安庆收买流氓地痞，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下的安徽省党部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总工会、省农会，打伤多人。（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00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211 页）

必须指出：1999 年版《辞海》编者取消【安庆惨案】这个词

条是进一步为蒋介石翻案，因为“安庆惨案”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郭沫若在其名著《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长文中根据确凿证据，以大量篇幅揭露了蒋介石制造“安庆惨案”的阴谋和残忍。郭文中说这是蒋介石总部的交通处长陆福庭这位“忠厚长者”亲口告诉他安庆之变是蒋介石亲自布置“杨虎他们联络青红帮干的”。郭沫若在弄清这个真相后写道：“安庆之变我看出了蒋介石的真相……蒋介石，你要掩盖些什么，你的肺肝我已经看得透明，你真可谓心劳日拙了。”（见《郭沫若文集》第8卷第130、132、136、137页）果然，紧接着蒋介石就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了。

（四二〇）删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是年春，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影响下，工农群众运动蓬勃高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大为恐慌，积极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物色新的代理人，进行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不断制造反共暴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蒋即到上海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不作任何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4月5日，竟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硬说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摧毁工会之事”，使党和人民处于无戒备状态。4月12日，蒋利用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雇用一批流氓，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队部。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纠察队缴械，纠察队员死数十人，伤二百余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汪寿华也于11日晚被蒋介石指使杜月笙骗去杀害。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十万余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队伍行至闸北宝

山路时，又遭国民党军队开枪屠杀，死百余人，伤无数。接着蒋又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三天内，即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4月18日，蒋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762页与1999年版第916页）

1999年版编者把以上关于蒋介石进行血腥反革命大屠杀的两个词条，一个取消，一个大量删除，为蒋介石开脱罪责。这完全颠倒了历史、颠倒了大是大非。实际上，蒋介石是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勾结，搞阴谋夺取政权的。否定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受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指使”，是完全违背史实的。请看史书的有关记述：

1.“（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时，帝国主义就派汽车把他接到法租界祁齐路交涉局。租界的政事处长大特务吉文斯隆重接待了蒋介石。第二天，《字林西报》发表文章，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希望蒋介石‘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蒋介石受宠若惊地表示‘中国革命军是列强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原载1927年3月31日《北华捷报》）帝国主义则答应给蒋介石发动政变提供方便，并愿以驻沪各国侵略军助蒋镇压革命。江浙财团和上海大资产阶级亦随即送给蒋介石1500万元作为政变经费，政变成功后，再给蒋3000万元以资建立政权。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则组织流氓打手，供其政变使用。”（见《中国革命史》第140~141页，马洪武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2.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不仅受帝国主义指使，而且还与日本帝国主义订了《密约》。

美国著名记者兼日本问题、中国问题专家戴维·贝尔加米尼，出生在日本，八岁到中国，曾目睹日军侵华罪行。他在其一百多万字的名著《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中写道："裕仁的党羽和蒋介石本人磋商后，同意他先从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人，然后在长城以南的整个传统中国的土地上确立蒋介石一人的统治。其交换条件是，长城以北的中国省份——满洲和蒙古的一些辽阔的、可能蕴藏着丰富的资源的地区——则由日本控制。蒋介石的控制一旦建立起来，日本人希望他把西方实业家赶出上海，将来还可以指望日本提供一切经济、技术援助。"（见戴维·贝尔加米尼著《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第 482 页）这是 1926 年的事，该书还记载有日本特务头子、皇室成员东久迩宫（裕仁的党羽）的种种活动。

王俯民在其专著中也引证上述秘密协议并写道："蒋介石于 1926 年冬至 1927 年初，曾为反共反苏和独揽中央大权而和日本天皇裕仁密定了以上的秘密协议，是毫无疑问的。"（王俯民著《蒋介石详传》上册第 236 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 年 5 月出版）

3. 日本人古屋奎二写道，当年蒋介石"曾经对张群透露：'这次访日，最重要的是和田中首相会谈'，在这次会谈时，张群以翻译身份同行，而对方为田中翻译的人，则是佐藤安之助少将……在台湾总统府保存的档案中，有此次会谈时一问一答的记录……对于共产党问题，双方意见一致，都认为非予清除不可。"（《蒋介石秘录》第 2 卷第 474、476 页，日本《产经新闻》社撰，古屋奎二主笔，1988 年 12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发行）

再从逻辑上来看，"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在中国的势力还不大，他对外需要勾结帝国主义，找好靠山，对内需要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种必然性；帝国主义者要利用中国军阀以实现其扩大势力范围的图谋，也是一种必然性。

试问：1979年版《辞海》概括地写“革命节节胜利之时，蒋受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指使，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控制军政大权，对内实行独裁专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要把这些说明客观事实和政变的阶级性质的话加以删除呢？

蒋介石从“四·一二”直至败逃台湾，“对内实行独裁专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难道不是始终一贯的吗？且不说“十年剿共”、“八年抗战”时，仅仅是“1946年1月至6月，美国援蒋物资总额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两倍，给国民党军队25个师的武器装备，训练军事人员15万人。”（见同上《中国革命史》第258页）

美国自己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中，说得是再明白也不过了。美国说除了“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之外的所有办法和援助都做了，“45亿多美元的美援”也给了，只因“国民党已失去了民心”，才无可挽救地失败。

蒋介石在1948年12月10日还派人向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华主持反共战争和供应工作。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每年提供十亿美元”等要求。在1949年8月5日美国发表《白皮书》表示“今后不再援蒋”之后，蒋介石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痛惜，不能不为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叹。”（转引自《蒋介石详传》下册第1319、1363页）由此可见，蒋把他自己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之密不可分喻作臂膀与身躯之关系。

第三，为蒋介石十年“剿共”开脱罪责，同时贬低毛泽东反“围剿”的正确策略路线。

再看1999年版编者为了给蒋介石翻案对如下第四二一至

第四二九等 9 个词条的删改：

蒋介石通过反革命政变夺取政权后，实行白色恐怖，空前残忍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当时提出的杀人口号是："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见李新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第 1 卷第 242 页》）后又加紧屠杀，提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三千，决不可错放一人。"（见《国共两党关系史》第 210 页，武汉出版社 1988 年出版）试想推行这两个口号时是什么情境？亲历其境的老同盟会会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吴玉章说，那时是："血流遍地，呼声震天，惨不忍睹，痛不忍闻。"（见《吴玉章回忆录》第 168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出版）"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三十一万多人"。（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77 页）

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围剿"实行"三光政策"，杀人更是无法统计。（同上书第 110~127 页）可是，1999 年版编者把蒋对革命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的这个词条删掉了。

至今，许多革命老同志回忆起蒋介石搞的白色恐怖来仍是毛骨悚然。然而，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还认为"杀"共产党和"杀"人民都"不够彻底"。蒋介石在总结反共、反人民失败的教训时说，反共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对付共产党的"手段不够彻底"，太"手软"，蒋还认为"对中共的外围组织和同路人'过于轻忽'了"。（见蒋介石著《苏俄在中国》第 181 页，转引自《蒋介石详传》下册第 1493 页）

可是，1999 年版编者竟不顾历史事实，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词条中把蒋"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句话中的"大批"二字也加以删除。现在看以下 9 个词条的删改：

（四二一）在【蒋介石】词条中删除"……对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发动五次'围剿'，此外又不断制造新军阀混战"。（可对比

《辞海》1979年版第601页与1999年版第732页）

这样的删除岂不是睁着眼睛瞎说吗?难道蒋介石连对共产党的五次“围剿”也没有搞过吗？编者进而把蒋在“围剿”共产党时,对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实行的“三光政策”也删除。

（四二二）删改【三光政策】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力量,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时实施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空舍清野,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也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内残酷地施行这种政策。（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0页与1999年版第24页）

1999年版编者还抹杀蒋介石在“剿共”时残酷地推行迫害人民的“联保连坐”法。

（四二三）取消【联保连坐】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中国国民党政府保甲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国民党政府为实行法西斯统治,进一步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照过去封建统治者的法律,于1932年8月颁行《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迫使人民以五户联合写出“联保连坐”切结,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如有一户违犯,各户连同办罪。参见“保甲制度”。（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819页与1999年版第2198页）

1999年版编者还删改蒋介石在“剿共”时颁布杀人的反动法规,把“杀戮”二字删除。

（四二四）删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词条。

1999年版编者把“用‘危害民国’的罪名作为迫害和杀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一切抗日爱国和要求民主的人民的借口”这话改为“此法用‘危害民国’的罪名,迫害中国共产党党员及

爱国要求民主的人士。”把“杀戮”二字删除，这是抹杀血写的史实；把“借口”删除，这就变成确有其罪了；把“人民”改为“人士”。（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458页与1999年版第565页）

“杀戮”、“借口”和“人民”这三个反映事实的概念的删除说明了什么？

蒋介石反共、“剿共”的残酷性，不仅老一辈人记忆犹新，他们的幸存的子女也是亲耳听说过的。真是谈虎色变！为什么要把这个历史抹掉呢？记住这个历史不是为了要算账、报复，而是为了防止这种历史的重演。我们现在不是还经常告诫日本，应正确对待历史，应以史为鉴吗？我们自身就应该作出榜样，绝不能像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那样否定历史。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为蒋介石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开脱罪责的同时，也不忘贬低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胜利业绩。

（四二五）删改【第一次反“围剿”】词条。

删除1979年版原词条所写：“……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极大震动。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约十万人的兵力，采取‘并进长追’的战略，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发动群众……和镇压反革命，为转入反攻准备条件。……俘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以下九千人。”（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880页与1999年版第1717页）

这个删节很明显地是对毛泽东领导的挫败蒋介石第一次“围剿”的英勇斗争及其胜利和意义的贬低和否定。

（四二六）删改【第四次反“围剿”】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这次反‘围剿’时，虽然王明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其错误路线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指挥下，仍取得了胜利”。（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881页与1999年版第1717页）

这样的删节又是歪曲党的历史，否定路线是非，贬低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领导正确和广大军民革命者反“围剿”的英勇斗争和胜利。

（四二七）删改【第五次反“围剿”】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端错误的战略”（编者把机会主义改为：“冒险主义”）已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1934年4月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曾先后提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苏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去，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正确建议，但“左”倾机会主义者均拒不接受。（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881页与1999年版第1717~1718页）

这些删节都是在歪曲党的历史和贬低毛泽东。

（四二八）删改【反文化“围剿”】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向革命势力发动文化“围剿”所作的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武装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进行了反革命文化“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采用政治高压手段，禁止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破坏进步文化团体，迫害进步作家，并唆使反动文人阻挠、破坏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鲁迅和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反文化“围剿”的英勇斗争，有力抨击国民党反动派

的法西斯统治，深刻揭露、批判了黑暗的文化界的现状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文化思想，使反革命文化“围剿”归于失败。（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67页与1999年版第323页）

这是给反革命文化“围剿”摘掉“反革命”帽子。其实反革命是与革命对称的，如果“围剿”者不是反革命的，那么，被“围剿”者也就不是革命的了。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是否西方势力施压要我国取消“革命”与“反革命”的提法，你们就把历史上客观存在的“革命”与“反动”都取消？这还能算真实历史吗？

（四二九）删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左翼作家“同‘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等反动文艺流派作了坚决斗争”；改写为“批判国民党官方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9页与1999年版第1714页）

这样把“‘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等”具体的对象改成抽象的“国民党官方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只能使读者无法抓摸具体的历史。

第四，为蒋介石翻案贬低“西安事变”对促进抗日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西安事变”的发生绝非偶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同斗争的结果，也是蒋介石对内杀戮对外妥协投降政策必然引出的后果。这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张学良不愧为千古功臣。请看与“西安事变”有关的第四三〇至第四三六等7个词条被删改：

（四三〇）删改【九一八事变】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当时蒋介石集中力量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卖国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6页与1999年版

第 78 页)

(四三一)删改【一二八事变】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淞沪抗战……卖国的……"(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4 页与 1999 年版第 5 页)

(四三二)删改【何梅协定】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出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230 页与 1999 年版第 277 页)

(四三三)删改【塘沽协定】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国民党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及驻守长城沿线的其他军队自动进行抵抗。蒋介石却加紧镇压抗日运动,阻挠前线抗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这样,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有东三省……"(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546 页与 1999 年版第 670 页)

(四三四)删改【华北事变】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是年 5 月,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坚持卖国投降政策……"(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2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48 页)

这许多"事变"惊醒了中国人民,才引出了"一二·九"运动。

(四三五)删改【一二九运动】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接着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1935 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在严重的民

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于 8 月 1 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12 月 9 日，北平（今北京）学生六千余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次日，北平各学校宣布总罢课。16 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形成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4 页与 1999 年版第 5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对上述这个词条删节的用意是：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一二·九”抗日运动的领导；淡化国民党政府对“一二·九”抗日运动的“镇压”；否定“一二·九”抗日运动对全国的“影响”及其重大成果是“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是编者对真实的历史的歪曲。真实的历史正如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讲话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3 页）

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以上这些重大的帝国主义侵华事件中，把蒋政权的对外不抵抗主义、妥协、退让、投降和卖国的错误和罪行全部删除、否定了。这是歪曲历史，既否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否定了中国的投降派的罪行。正是在上述这样的许多“事变”和“一二·九”运动的爱国人民呼声面前，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方面的爱国高级将领受到影响，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了，于是，才发起“西安事变”。现在再看 1999 年版

《辞海》编者是怎样违背史实，贬低“西安事变”的：

（四三六）删改【西安事变】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也叫“双十二事变”。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张杨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仅拒绝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12月上旬，蒋到西安督战，并屠杀当地抗日青年，于是张杨于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企图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在有利于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这一事件，即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调停，争取蒋介石抗日。经过周恩来向各方面耐心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迫使蒋接受如下条件：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25日，蒋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835页与1999年版第2215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这些说明了什么：

1. 把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的形势下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删除；把蒋介石继续“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不得人心和张、杨受共产党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删除；

在删除这些后改写为"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是可以作不同解读的)

2. 把蒋接受"保证人民自由……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删除。

3. 删除"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

这个删改是抹杀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即人心皆反对"不抵抗政策",和贬低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其实,还是毛泽东说得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1991 年版《毛选》第 3 卷第 1037 页)

第五,为蒋介石翻案,否认他残忍暗杀政敌的罪行。

再看 1999 年版编者隐瞒蒋介石用暗杀手段对付政敌和爱国人士,又删改以下第四三七至第四四〇等 4 个词条:

(四三七)删改【杨杏佛】词条。

删除杨杏佛由于"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而被暗杀这个主要原因,为蒋介石开脱罪责。(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26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522 页)

(四三八)删改【邓演达】词条。

1999 年版《辞海》编者把原词条中写的"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这句话中的"蒋介石"三字删除,又为蒋开脱罪责。(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481 页与 1999 年版第 592 页)

(四三九)删改【史量才】词条。

1999 年版编者把史量才这位《申报》的老板,报业资本家因为坚持宣传抗日"被蒋介石派遣特务杀害"这句话中的"被蒋介石派遣"删除,改写为"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又是为蒋介石开脱罪责。(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725 页与 1999 年版

第 873 页）

（四四〇）删改【李公朴】词条。

李公朴因为“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1946 年 7 月 11 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编者把“暗杀”二字删除改写为“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265 页与 1999 年版第 1529 页）

众所周知，“暗杀”和“杀害”，这两种情况的性质是不同的。

以上 4 个词条中被暗杀 4 人，被编者取消的【南通惨案】词条也涉及有顾迅逸和孙日新两烈士被暗杀。（见《辞海》1979 年版第 140 页）这都反映了一个极重要的真实历史，这就是作为一个统治者最卑鄙无耻的行为是用“暗杀”手段对付不同政见者，蒋介石是惯于“暗杀”要求抗日和要求和平民主的爱国人士的。1999 年版《辞海》编者却要为蒋介石隐瞒、讳言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编者甚至在表述蒋介石政府颁布的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这个“杀人”法的词条中，把“杀戮”二字也删除。当年死于这个“杀人”法之下的无数先烈如在地下有知，能不向编者提出强烈抗议吗？

第六，为蒋介石翻案，否定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

1999 年版《辞海》编者为此又删改和取消如下第四四一至第四五〇等 10 个重要词条：

（四四一）在【蒋介石】原词条中，删除“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一面抗战，一面企图与日谋和。1938 年武汉失陷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曾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601 与 1999 年版第 732 页）

1999 年版编者删除的这些都是客观真实的历史，都有大量的证据。至于把“三”次反共高潮改写为“多”次，实质却是抽象

肯定“多”次而达到具体否定“三”次的目的。只表面上讲“多次”，实际上在《辞海》中是一次也不写了。这就是上文已评析过的第九五、九六、九七、九八这 4 个重要的词条之全文被取消。在此必须简要地再提一下：

（四四二）取消【三次反共高潮】词条。

该词条是“三次”反共高潮的概括性叙述。1999 年版编者在表面上抽象承认“多次反共高潮”的掩护之下，竟然把“具体综述”“三次反共高潮”和具体的“历次的反共高潮”词条一概取消。再次玩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手法。（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24 页与 1999 年版第 27 页）

（四四三）取消【第一次反共高潮】词条。

该词条是写 1938 年 10 月至 1940 年 3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秘密颁布了许多反共文件，制造平江、确山等惨案，侵占了陕甘宁边区五个县等，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石友三等进攻八路军。（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881 页与 1999 年版第 2268 页）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作了坚决斗争，才击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四四四）取消【第二次反共高潮】词条。

该词条是写 1940 年的 10 月至 1941 年 1 月，由于项英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阴谋得逞，新四军九千多英勇抗日功勋卓著的爱国干部和战士遭到围歼。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顽固派作了充分揭露，坚决斗争，取得很大的胜利；在军事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继续得到了恢复和扩展。这些重要业绩和经验，都由于词条的取消而使读者无从知晓了。（可对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881 页与 1999 年版第 2268 页）

（四四五）取消【第三次反共高潮】词条。

该词条是写 1943 年 3 月，国民党顽固派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至同年 7 月调集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闪击……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及时揭露和反对而被制止。（可对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882 页与 1999 年版第 2268 页）

这三次反共高潮，都是毛泽东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才得以击退和取得了胜利的。毛泽东亲自领导，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亦即在坚决斗争时，掌握分寸，不使抗日统一战线破裂。这样既拖住了蒋介石继续抗日，又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的武装力量得以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四四六）删改【中国之命运】词条。

1999 年版编者把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是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舆论准备”删除掉了。为蒋开脱罪责。（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413 页与 1999 年版第 1706 页）

这段时期，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使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逆转。国民党政策的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各地的反共磨擦活动日趋严重，接连发生‘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袭击和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或后方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167 页）可是，1999 年版编者不仅在“蒋介石”词条中违背史实，删除国民党政府“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还在许多词条中删除这些史实：

（四四七）删改【博山惨案】词条。

删除、否定原词条所写的开头第一句话“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之一”。（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5页与1999年版第172页）

（四四八）删改【深县惨案】词条。

删除、否定原词条所写的开头第一句话“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之一”。（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969页与1999年版第1156页）

（四四九）删改【平江惨案】词条。

删除、否定原词条所写的开头第一句话“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之一”。（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44页与1999年版第53页）

（四五〇）删改【确山惨案】词条。

删除、否定原词条所写的开头第一句话“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之一”。（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642页与1999年版第1988页）

三次反共高潮、四次惨案难道不是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严重罪行？然而，1999年版编者把这些词条中蒋介石的罪行都删除、否定。在“皖南事变”和这些惨案中，无辜而被残酷杀害的爱国有功的干部、战士是数以万计的。他们的鲜血就算白流了吗？

这样，把蒋介石的罪行都删光，是为伪造历史，颠倒是非善恶，为之翻案，甚至为别有用心者美化蒋介石把他描绘成爱国的“民族英雄”铺平道路。

第七，为蒋介石翻案，否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肯定蒋介石的所谓“戡乱”。

为此，编者又删改或取消如下第四五一至第四五七等7个重要词条。

（四五一）在【重庆谈判】（全文见本书第一一一词条）词

条中删除：

1. “蒋介石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和‘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妄图在‘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2. “这次谈判击破了污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揭露了他们的假和平阴谋，并使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积极参加了反对美蒋的革命斗争。”（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86页与1999年版第105页）

（四五二）在【蒋介石】词条中删除“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601页与1999年版第732页）

应该指出：编者还别有用心地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个词条中也删除“中国共产党严格地履行停战协定”。（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882页与1999年版第1714页）编者这样违背史实的删改用心何在？是想把破坏“停战协定”的责任推到谁身上？

（四五三）删改【国共停战协定】词条。

删除原词条写的：“……国民党为独吞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遭到解放区军民有力反击。由于人民的压力和军事上的失利，国民党不得不和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771页与1999年版第928页）

1999年版编者把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妄图独吞胜利果实，伪装和谈”这句话中的“妄图独吞胜利果实”和“伪装”删掉，这是为蒋介石掩盖事实真相。请看史书的记载：

在“1945年9月17日，蒋介石在与毛泽东谈判过程中，密颁反共之‘剿匪手册’，这是蒋介石等伪称要求和平实则决心内

战之证明。”（见翦伯赞等编著《中外历史年表》第 77 页，三联书店 1959 年出版，另外，在《中国历史大事纪年》第 437 页上，也有同样的揭穿蒋伪装和谈的记载）

“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开始的第二天，就密令各战区印发他 1933 年编印的《剿匪手本》，要求部属遵此手本，对解放区‘努力进剿’。”（《中国革命史》第 254 页）

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在《日记》中屡次写到与“共匪”谈判。（见《蒋介石秘录》第 4 卷第 426、427 页）如果是真诚与共产党谈判，怎么会始终视共产党为“匪”呢？

在谈判最终达成的《双十协定》公布的前夕，蒋介石召集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等四人说：“今天我请你们四位来，只是告诉你们：什么谈判都是假的，现在我们应该如何迅速消灭中共才是真的！……我要在最短时期以内，把中共消灭。”（转引自《蒋介石交往与谋略》第 55 页，华文出版社 2001 年 9 月于北京出版）

重庆各界人民庆祝《双十协定》的大会遭到特务破坏，参加庆祝会的郭沫若、李公朴等多人被打伤。

可见，蒋介石并无和谈的诚意，“伪装和谈”只是为了实现“独吞胜利果实”而要的一个花招。1999 年版编者为蒋辩护是徒劳的。

（四五四）取消【南通惨案】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1946 年 3 月 18 日，江苏南通市民集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军警武装镇压，多人受伤被捕。此后，并有参加集会的顾迅逸和孙日新等人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可比照《辞海》1979 年版第 14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65 页）

这个词条所反映的事实，表明蒋政权破坏停战协定，对蒋管区“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人民的镇压。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全面内战”，主要依靠美国。“首先要把他的精锐部队运到华东与华北……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以军用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队十四个军共四十一个师，八个交通警察总队约五十四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美国还出动海军陆战队九万多人，进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地，直到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23页）蒋介石在作了上述准备后，颁布反动法规《戡乱条例》，发动“大规模全面内战”。

1999年版编者站在蒋介石立场上否定《戡乱条例》是“反动法规”，因而取消原来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写得正确的关于《戡乱条例》的词条：

（四五五）取消【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简称《戡乱条例》）词条。

全文见本书第一二三词条。取消这个词条是由于1999年编者站的是国民党立场，不同意原词条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写这是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反动法规”。（可对照《辞海》1979年版第1352页与1999年版第1634页）

1999年版编者为了否定《戡乱条例》是蒋政权颁布的“反动法规”，在取消上述词条后，运用曲笔，在下述词条中写它是胡适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经大会通过，暗示有其“合法性”。

（四五六）在【胡适】词条中，1999年版编者增写胡适“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504页与1999年版第1822页）

1999年版编者，取消一个词条、改写一个词条，就否定了《戡乱条例》是蒋政权颁布的“反动法规”了。编者为了站在蒋政权立场上解释《戡乱条例》中“戡乱”这个名词的需要，就再

增写一个原来《辞海》中没有的新词条。

（四五七）增写【戡乱】词条。

1999年版第1634页全文是：【戡乱】平定叛乱。《隋书·音乐志下》："成功戡乱，顺时经国。"亦作"龛乱"。

这样，在1999年版编者笔下，蒋政权的"剿共"、"戡乱"就变成是合法的"平定叛乱"了。

显然，看了上述这些词条的删、改、增、减，1999年版编者为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翻案，昭然若揭。而且已经是在肯定蒋介石的"剿共"、"戡乱"了。

第八，为蒋介石翻案，编者用釜底抽薪之法，否定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和"三座大山"的存在。

1999年版编者在为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主义翻案，上文已列举85个词条的取消、删改；为蒋介石翻案上文也已列举48个词条增减、删改。实际上，这些都是否定"三座大山"的存在。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编者在对如下第四五八至第四七七等20个词条的取消、删改中，是怎样否定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和"三座大山"的存在的。这样，1999年版编者也就彻底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我们面对的大问题是：1840年至1949年间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主义势力压迫中国人民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看来，1999年版编者认为不是。这表现为对如下20个词条的删改或取消：

（四五八）在【帝国主义国家】词条中，1999年版编者把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删除。（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53页与1999年版第433页）

这样，编者就把世所公认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性否定掉了。相反，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反而把社会主义国家说成"流氓国家"。

（四五九）在【鸦片战争】词条中，1999年版编者删除这是“英国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358页与1999年版第1640页）

1999年版编者既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是无侵略本性的国家，也就认为“鸦片战争”不是侵略政策或战争政策了。于是，原来所说的“侵略”都错了，编者就在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华事件、侵华人物一系列词条中，如：【南京条约】、【东南互保】、【门户开放政策】、【望厦条约】、【赫德】、【福开森】、【哈同】、【李太国】、【芮恩思】、【李提摩太】、【朱尔典】等等词条中，把“侵略”这个名词概念都删除掉了。

1999年版编者既然如此否定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就必然认为世界人民没有反帝的任务了。于是，取消反帝任务：

（四六〇）取消【反帝国主义同盟】词条。

1979年版的全文是：简称“反帝大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保卫和平组织。1927年2月，由宋庆龄（中国）、高尔基（苏联）、罗曼·罗兰（法国）和巴比塞（法国）等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1932年8月，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大会，有来自二十九个国家的二千多名代表（代表三万个团体和二千余万各界会员）出席。会议通过决议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并成立世界委员会和各国分会，以发动和指导全世界人民的反战斗争。1933年8月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合并，改称“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267页与1999年版第324页）

上述3个词条被1999年版编者删改、取消，是表明编者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帝国主义侵略，世界和中国人民也没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因此，也不存在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受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的国

家的问题。近代中国也就不存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这还表现为对下列词条的删改：

（四六一）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3页与1999年版第1706页）

（四六二）在【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性词条中删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分析，正确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和转变等问题。”以及“反帝”的内容。

以上2个词条反帝反封的内容被删除，能不使人怀疑这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为推翻“三座大山”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二十八年的历史吗？

（四六三）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词条中删除“这个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9页与1999年版第1713页）

1999年版编者否定这个政权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四六四）在【人民民主专政】词条中删除它是“对帝国主义走狗、官僚买办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308页与1999年版第375页）

1999年版编者这一删除就使“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了“无对象”的专政。

（四六五）在【鲁迅】词条中，把“‘五·四’运动……鲁迅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的“反帝”二字删除。这是评价鲁迅的重要关键词，怎能删除？（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2016页与1999年版第2425页）

（四六六）在【郭沫若】词条中，删除郭沫若“积极从事反

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452页与1999年版第558页）

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6个词条的删节，是编者从总的方面认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以及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不"反帝反封"的，表明中国不存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不存在"三座大山"。编者贯串着这个观点，还删改或取消下面一系列词条：

（四六七）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词条中，1999年版编者把蒋介石在"政变"后的"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这句话删除了。（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762页与1999年版第916页）

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你们删除掉原词条中的这句话，岂不是意味着否定通过"反革命政变"建立起来的反动的"国民政府"是"三座大山"的代表吗？

（四六八）删改【中华民国】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除"仍打着'中华民国'的招牌，发展了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于1949年推翻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1页与1999年版第1702页）

再次请问1999年版编者：你们删除掉【中华民国】原词条中的这两段话，岂不是再次否定国民党反动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三座大山"的代表吗？

（四六九）在【蒋介石】词条中，删除蒋介石1948年任"总统""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代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蒋管区内，特务横行，经济破产，百业

萧条,民怨沸腾”一整段内容。

这岂不是又一次否定蒋介石政权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代表”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1999年版《辞海》编者还对“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也已开始具体地一个一个摘“帽子”、否定了。虽然由于1999年版《辞海》的删改修订还只是在走“第二步”,“四大家族”这个词条尚未取消,但在分别写他们这四个家族的词条时已删改如下:

(四七○)删改【宋子文】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掉了原词条写了的“依附美国,支持蒋介石,控制财权,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与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合称‘四大家族’。”(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007页与1999年版第1216页)

(四七一)删改【孔祥熙】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掉了原词条写了的“控制财权,大事聚敛,与蒋介石、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等被称为‘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948年赴美要求贷款,即定居美国。”(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120页与1999年版第1353页)

(四七二)删改【陈果夫】词条。

1999年版编者删掉了原词条写了的“进行反革命活动,残酷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与蒋、宋、孔同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合称‘四大家族’。”(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431页与1999年版第531页)

在【蒋介石】词条中,也未写到是“四大家族”之一。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1999年版《辞海》编者“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实例,即抽象地讲还没有否定“四大家族”,但是具体落实到这四个家族时,却一个一个都被否定了。谁知道第三步又会怎样删改呢。

（四七三）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词条中，删除、否定“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是“清除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

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以上16个词条的删改，都是否定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这已非孤证，无容置疑。但是，还有更有力的证据是对下列四个词条的删改：

（四七四）删改【中国历史博物馆】词条。

1979年版《辞海》全文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1959年建立，收藏并陈列着从约一百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的珍贵历史文物。全部陈列着按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大部分；系统地、科学地反映了中华民族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文化发展、中外友好往来和中国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悠久历史；并着重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8页与1999年版第1712页）

把“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部分”也取消掉了。这岂不是明确否定吗？

（四七五）重写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词条。

1999年版《辞海》全文是：馆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1912年7月成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26年向公众开放。建国后更名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改今名，并迁入现馆址。该馆收藏并陈列从约180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期的珍贵历史文物。基本陈列按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大部分；系统地、科学地反映了中国各地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形成、发展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悠久历史。（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418页与1999年版第1712页）

显然,1999年版《辞海》编者删除"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分为原始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大部分"改为"三大部分";把"反映了"中华民族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文化发展、中外友好往来和中国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三大斗争"和"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都删除。这是明目张胆抹杀事实,篡改历史,狂妄否定1840年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形成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四七六)删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词条。

1979年版《辞海》原词条被删除的是:"帝国主义侵入封建国家……把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解放前的社会。"这是明确地否定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四七七)改写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词条。

1999年版编者改写为:"政治上经济上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封建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因素已得到一定的发展的社会。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如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社会。"(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91页与1999年版第110页)

显然,1999年版《辞海》编者改写的词条把"帝国主义侵入封建国家……把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解放前的社会。"这段话删除,是不承认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仅仅承认"政治上经济上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对旧中国这个"国家"的定性,其内涵要比"政治上经济上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丰富得多,它包括意识形态、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等,这是不能只用"政治上经济上"受"控制"来取代的。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一系列词条的删改中,否定旧中国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实际上,编者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何以见得?这是在《辞海》的副主编王元化先生的文章中十分明确地表现了出来的。

在出版1999年版《辞海》时,《辞海》副主编王元化先生就发表文章,不承认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和社会。王元化先生明白地说道:“我们头脑中有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观念,重新清理这些东西。反封建这一提法,有人不赞成。……应该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了”。紧接着又说:“据我所知,当时毛泽东把中国社会性质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自然也就相应为反帝反封建了。那时,如果有人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那就会被怀疑为托派。”(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见1999年5月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显然,王元化认为是毛泽东把中国社会性质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他对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是有保留或异议的。

王元化的文章是不是表明,他不赞成毛泽东把旧中国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而他主张定性为“资本主义社会”呢?应该说是的,因为王元化同胡适观点一致,“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了”。王元化认为旧中国不是封建社会,“那时”是怕“被怀疑为托派”才没有敢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王文接着写道,现在已经到“重新认识这些既定观念,重新清理这些东西”、“重新估价”的时候了,并进一步写道:“‘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对‘五·四’的再认识,首先就要打破既定观念”,“如果不重新估价那些已被接受的既定观念,那就根本谈不到启蒙。”现

在,毛泽东已不在人世了,王元化就大胆否定毛泽东把旧中国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和社会了。

王元化为了“非毛化”的需要,竟把对旧中国社会的正确定性视为“谬误”并把责任推在毛泽东个人身上。历史真相又如何呢?请看 2007 年 10 月 10 日《人民日报》在《永远的丰碑》一文中所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还提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显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共“二大”根据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制定的正确纲领。这个事实同党的文献记载是一致的。王元化是真的不懂得这个历史常识吗?

在当年,胡适看到“党的二大”发表《宣言》提出这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第一个起来写了《国际的中国》的文章表示反对的。胡适说,他一生没有看到过“有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又说:“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压根儿我不知道这几十年中国的‘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因此,胡适发表文章不承认中国存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并且明确表示他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见《胡适全集》第 2 卷第 495 页,第 22 卷第 300 页,《胡适年谱》第 117 页)王元化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颂扬胡适是“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的优秀知识分子的楷模。这个颂扬恐怕亦非偶然,因为王元化很了解胡适,不会不知道胡适是最早起来否定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和社会的。王元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曾批判过“胡适思想”,大概也是怕“被怀疑为胡适信徒”,但到九十年代,搞“非毛化”,王元化写这一篇文章时宣称他“最为服膺”的人是胡适。

请问1999年版《辞海》有关编者：你们对许多有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词条的删改，是否按副主编王元化的观点来“重新清理既定观念”，把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既定观念”进行清除？笔者认为王元化可以发表文章，文责自负，也可以从批判胡适到“最为服膺”胡适，那是王元化个人的事。但是，任何人想否定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客观历史事实，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任务的正确论断，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也是绝对办不到的。王元化、《辞海》编者和“历史博物馆”不但都没有理由，也都无权来作这个否定。最有理由和发言权的应该是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人民。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建党85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又郑重地重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用老百姓家喻户晓的话来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

说什么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不存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社会不是半殖民半封建性质，人民在一百多年以来没有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实际上，这“三座大山”的存在和它的“思想影响”的存在都是否定不了的。这个“思想影响”，不仅过去、现在均存在，即使将来也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甚至局部会发展。近些年来我国就有些人，不承认帝国主义是靠“侵略”而“富”了起来，说什么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一部分人（国家）先富起来，也是合乎规律的。”一部分“国家和一部分人富了，必然会带动贫者，也有力量支持贫者。”说什么先富帮后富也是合乎规律的，起初是“唯利是图”的，但是“富”够了，就有可能从“为富不仁”“转变”到

“为富求仁”，帮助别国、别人也“富”起来。(见赵士林主编《防“左”备忘录》第28、77、78页，太原书海出版社1992年出版)“自由化精英”王若望说应该感谢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的“贡献”。北京有位教授的名言是说，中国要“富”起来“需要再当三百年殖民地”。(转引自《中流》杂志1994年第7期第43、60页)其实，1999年版《辞海》有关编者难道不也是这种观点吗？

1999年版编者对上述这20个词条的删改或取消，都是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及其代表删除、取消。其实，每个词条都有相对的独立存在的完整性，这个内容一删除，就使这许多词条都难以作为相对独立存在的完整的词条了。因为，在【中国共产党】词条中，假如删除了它推翻了“三座大山”的这个内容，这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历史；还比如，在【人民民主专政】词条中，假如删除了这个内容，就变成了无“对象”的“专改”；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词条中，假如删除了这个内容，人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政变”了……假如删除了这个内容就使以上这些词条都成为内容残缺不全有名无实的词条了。所以无论是用避免“重复”或别的什么借口，淡化、模糊、删除、抹杀和否定曾经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这“三座大山”及其残余和思想影响的存在，都是极其错误和不能允许的。

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你们为什么要在这20个重要词条中一概删除而不再在改写的词条中写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再写“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样明确的词语、概念？其实，不仅过去，直至今天，这“三座大山”之一的“帝国主义”虽被赶出了中国大陆，但它侵略和颠覆新中国的野心依旧未变；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仍在做复辟梦。我们党在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

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认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见《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841页）邓小平也说：“我们在国际阶级斗争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反帝、反霸是我们维护世界和平和对外政策的“纲领”和“总政策”，“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邓选》第2卷第191、186、127、417页，第3卷第82、289页）

可是，1999年版《辞海》编者不仅否定历史上的“三座大山”的存在，还否定其残余势力和“思想影响”的存在。这难道不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严重错误吗？

第九，这股“历史翻案风”的进一步发展趋势。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来看待这股“历史翻案风”，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阶级现象”。在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期，原先被推翻的阶级起来进行反攻倒算有其必然性。对这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联系当前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敌对势力搞“颜色革命”的阴谋，对其反动性和危险性有足够的认识和防范。绝不可掉以轻心。

我们特别应该注意这股“历史翻案风”的发展趋势，笔者在本书《前言》中已说过，《辞海》编者删改词条是计划用30年时间分三步走，逐步进行的，并且是以中美合编的辞书为蓝本来删改的。编者对众多词条的删改都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分步进行的，现在我们以编者删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词条为例来说明这个发展的趋势。

《辞海》编者删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个词条，已经进行的两步是：

第一步是在1989年出修订版，先删除两段史实，即“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大为恐慌，积极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物色

新的代理人，进行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汪寿华也于11日晚被蒋介石指使杜月笙骗去杀害。”（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762页与1989年版第857页）这是重大的铁的事实，竟被删除否定。

第二步是在1999年出修订版，又删除5段史实，即“蒋即到上海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进行反革命政变”；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4月5日，竟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硬说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接着蒋又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762页与1999年版第916页）

第三步，《辞海》预计2009年再出修订版，按计划仍会以中美合编的辞书为蓝本，那么，我们已经看到的中美合编的辞书，已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个词条改写为【“四·一二”事变】了。“反革命”和“政变”都删除、否定。请看：

“【‘四·一二’事变】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的事变……4月2日在上海的八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通过‘请查办共产党’案……4月12日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发动武装事变……蒋介石在事变后不久（4月18日）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见中美合编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7卷第499页）

第三步待出版的《辞海》2009年修订版，如按计划以这中美合编的辞书为蓝本把词条名称和内容亦作如上那样改写，不但“反革命”、“政变”会被完全否定掉，而且会把蒋介石写成是“合法”地执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的‘请查办共产党’案”的清党“总司令”了。如果经那样改写后，共产党则成了该被清除的“对象”。

如果那样改写后，为蒋介石翻案是更彻底了。但这是完全违背客观历史事实，颠倒了是非功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是无权推翻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亦即是无权通过这个“决议案”的。更何况根据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上海开会的“原始记录”档案，会议起初只有五名委员参加，后扩大到八名，仍不到全体委员的半数，但他们却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名义“通过”这个所谓“请查办共产党”的“决议案”，这是非法又非法的“决议案”。（《国共两党关系史》第270~27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

在目前这种大刮“历史翻案风”的情况下，要为蒋介石翻案找“理由”或“依据”，要伪造历史是不难的。虽然伪理由、伪历史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如不及时加以揭露，还是能起欺骗作用的。与1999年版《辞海》编者为蒋介石翻案相呼应，例如有位杨天石先生就找出了一个为蒋介石翻案的“依据和理由”，这就是“主要根据蒋介石的《日记》”来重新评价蒋介石。

杨天石写了一本书：《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所谓“秘档”，实际是指蒋介石的《日记》，这位钻研蒋介石的《日记》的先生，写的这个书名就已说明了他的倾向性。他认为要知蒋介石的“真相”，应该看蒋的《日记》。杨天石说：“鉴于日记常常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内心活动，本文将以蒋介石的日记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考察他在卢沟桥事变前的对日谋略”。（杨天石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377页，2002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杨著写到“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非卧薪尝

胆,何以复国?”“雪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杨天石分析蒋介石这些《日记》时写道:“蒋介石是浙江人,熟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终于灭亡吴国的故事。在对日关系上,他时时以这一故事自励。”对蒋的《日记》所写“雪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杨天石分析说:“显然,目前的‘与’并不是永远的舍弃,而是为了未来的‘取’;一时的让步只是为了最终的‘雪耻’。”(同上书第351、384、385页)因此杨天石认为把东三省“一时的”让给日本是蒋介石的“对日谋略”。笔者认为站在蒋介石立场上来讲,坚持对日妥协让步(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确实是他的一个“谋略”(但是,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

如果客观事实和形势真像杨天石所想所说的那样,那么,蒋介石对外妥协让步,“舍弃”东三省,对内压制人民抗日运动,“清剿”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又有什么过错呢?如杨天石所说,这都是蒋介石的“对日谋略”所要求做的。杨天石的结论如在《结语》中所说:“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照杨天石对蒋介石的这个分析和评价,蒋介石从“九·一八”到“七·七”期间的“这些”所作所为,都是“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真是不仅无过错而且有“大功”了。(同上书第403页)

可是,那时的实际情况和形势,并不像杨天石所想所说的那样。那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得寸进尺非灭亡中国不可(这是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而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是坚决要救中国并且确有能力救中国(这已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决定的,是绝不会动摇、绝不会退让的。侵略战争必败,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必胜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显然,蒋介石的所谓“谋略”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民意的倒行逆施,他不仅自己不抗日,对日妥协投降,先让出三省,后是让到四省,再后是华北特殊化……而且还疯狂镇压和屠杀抗日的爱

国人民和共产党人。这怎么能被瞎说成是什么“对日谋略”、“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呢？竟有如此奇谈怪论！

关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还是毛泽东给他作的结论正确：

>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1991年版《毛选》第4卷第1376页）

我们认为对历史人物的《日记》，当然是可以研究的，但是，重要的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观点和方法研究它。

在这里，我们还要顺便指出一点：即使是历史人物亲笔所

写，笔迹全真的《日记》，也有可能是编造的，是假的。当年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他就是要“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他就请当时的一位文人张一麟给他编造过一部《日记》，写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签订了《二十一条》条约，是欺骗日本人的，他内心是痛恨日本侵略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然后，由袁世凯本人亲笔抄写这份编造的《日记》，再放进档案箱，以供后人研究。蒋介石在八年抗战期间，还请张一麟老先生当过参政员，他难道会只知道越王勾践的故事而不知这个故事吗？

我们认为无论是1999年版《辞海》编者或任何别的人，妄想翻整个历史的案，妄想为蒋介石翻案，难道能找到站得住脚的“依据和理由”来吗？“找”来“找”去，不仅是徒劳，而且必然会进一步暴露翻案者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政治真面目。

十八、评 1999 年版《辞海》为胡适翻案

1999 年版《辞海》编者通过对【胡适】词条的删改、重写，为胡适翻案。同时改写一系列与胡适的反动思想，以及他支持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相关的词条，否定胡适是反动政治人物兼学者的双重身份，把胡适美化成为一个历史清白的纯粹学者；并且还连带为“改良主义”、他的老师及其实用主义一并翻案，同时连带为蒋介石一起翻案。为此，编者共删改和取消第四七八至第四九一等 14 个词条。

第一，为胡适翻案，重写【胡适】词条，抹杀其罪或功罪颠倒。

（四七八）删改【胡适】词条。

1979 年版第 1504 页全文是：胡适（1891~1962），现代学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上海中国公学，1910 年，赴美国，先后求学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革，为当时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1919 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大胆假

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1922 年，宣扬“好人政府”的主张。1925 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主张。1938 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1942 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 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62 年，病死。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

（四七九）重写【胡适】词条。

1999 年版第 1822 页全文是：（1891~1962）中国学者。原名洪，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 年，赴美国，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 7 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参加编辑《新青年》，发表新诗集《尝试集》，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颇大。1922 年，创立《努力周报》，宣扬“好人政府”和“省自治联邦制”的主张。1925 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1928 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反对国民党实行独裁与文化专制主义，倡导自由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主张“全盘西化”。1938 年，任驻美大使，代表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1942 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1948 年，去美国。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

对比以上两个词条，应该说原词条写的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不足之处是对胡适在学术上的贡献写得少了些。但重写的词

条把原词条写的胡适“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等罪行删除、抹杀掉了。

在重写词条所增写的内容中，把胡适所搞虚假的“人权”和“自由主义”写成“贡献”，是功罪颠倒。鉴于胡适这个人物的特殊性，我们要在本专题中结合编者对相关词条的删、改，从原则上对这个翻案给予概括的评析；并将在第十九专题中对胡适其人作全面的集中的评析，证明绝不应为胡适翻案，证明当年批判胡适思想是正确和十分必要的，还应继续深入批判。

第二，1999年版编者为胡适翻案，否定胡适“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1999年版编者在重写的【胡适】词条中把胡适“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删除、否定。这是抹杀事实；同时还删改“问题与主义论战”词条，篡改历史。

（四八〇）删改【问题与主义论战】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引起了资产阶级右翼的恐慌。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主张对中国社会作一点一滴的改良。同年8月，李大钊立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驳斥，指出：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观点、理论和方法，要解决问题必须谈主义；中国社会问题必须先求根本解决，才有解决其他问题的希望；这个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论战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878页与1999年版第1046页）

1999年版编者在上述词条中，把胡适“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主张对中国社会作一点一滴的改良”和“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主要内容都删除、否定。这是无理抹杀人们早已公认的、不容争辩的真实历史。

第三,1999 年版编者为胡适翻案连带也为“改良主义”翻案。

1999 年版编者为了给胡适的改良主义翻案,还删改“改良主义”这个词条。

(四八一)删改【改良主义】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主张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础的范围内逐渐实行微小的社会改良、反对革命的一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19 世纪中叶,流行于资本主义发达较早、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英法两国。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广泛传播于资本主义各国。改良主义者害怕革命斗争,宣扬阶级协调;把资产阶级的国家描绘为超阶级的工具,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伪装为全民的民主。由于各国历史条件不同,他们所主张采取的改良措施亦不同。在工人运动内部,由于工人贵族阶级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不断出现改良主义思想,宣扬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只要通过资产阶级议会的道路,扩大所谓民主,实行大企业部门“国有化”或“经济计划化”等,就能实现社会主义。此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些主张实行局部改革而不触动原有社会制度基础的思想,也被称为改良主义,在初期有一定进步意义。(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080 页与 1999 年版第 1305 页)

1999 年版编者把上述词条中划线的文字,即“改良主义”的重要的基本表现和实质都删除、否定。这又是为了给胡适翻案连带给“改良主义”也一并翻案。这样抹杀客观历史事实,是胡适本人也不会同意的,请看胡适自己是怎么说的:

胡适自己写道:“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1918 年,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才提出‘多研

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那时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高谈社会主义;……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胡适反对走革命道路,所以他还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见《胡适文存二集》卷3第95、96、97、15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校编1930年出版)实际上,他是要人们被他“牵着鼻子走”改良主义道路。

胡适如此坚决、明确地骂“高谈马克思主义”、“高谈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宣告”他心爱的改良主义的“死刑”。这段重要的史实,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有详实的记述。这部党史明确指出:胡适“就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在各地方出版的刊物上,有不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见该书第15、16页)1999年版《辞海》编者为给胡适翻案而抹杀这些历史事实,岂不太无理了吗?

第四,1999年版编者为胡适翻案,否定胡适支持军阀反对孙中山及其民主革命。

胡适是始终反对革命家孙中山及其民主革命的,编者把胡适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的作用和实质是“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这句话删除、否定,这又是抹杀历史事实和胡适的罪行。其实,这个“善后会议”本身就是“对抗”孙中山的,难道唯独胡适虽参加这个会议却不“对抗”孙中山?

1999年版编者为此还删改“段祺瑞”和“善后会议”两个词条,美化“对抗”孙中山的段祺瑞和抹杀“善后会议”的反动性质。

（四八二）删改【段祺瑞】词条。

1991 年版编者删改“段祺瑞”词条，抹杀其罪行：

1. 删除、否定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以国务总理把持北洋军阀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源借款’就有一亿四千多万日元，购买日本军火，编练‘参战军’（后改‘西北边防军’）”。

2. 删除、否定段祺瑞“抵制国民会议，并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和法权会议，欺骗人民，破坏反帝斗争”。

3. 删除、否定段祺瑞在“三一八”“屠杀北京爱国群众”。

4. 删除段祺瑞在“1933 年被蒋介石迎居上海”，改为“移居上海”。（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531 页与 1999 年版第 1856 页）

1999 年版编者把段祺瑞反对孙中山、勾结帝国主义、受到蒋介石欢迎和屠杀爱国群众这些史实都删除、否定掉了。经这样的删改，既美化了封建军阀段祺瑞，又把勾结段祺瑞的胡适的罪行也淡化掉了。

（四八三）删改【善后会议】词条。

1979 年全文是：1924 年，直系军阀政府被冯玉祥推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政府执政。段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于 1925 年 2 月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相对抗。参加善后会议的有各省军阀代表及政客百余人。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善后会议于同年 4 月瓦解。（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925 页与 1999 年版第 2318 页）

1999 年版编者在“善后会议”词条中删除“段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召开善后会议”。并把会议“瓦解”改写为“结束”。这又是违背客观历史事实，把这个军阀策划的反对孙中山革命的“善后会议”的反动性质抹杀掉了。

1999 年版编者为了给胡适翻案，淡化、抹杀胡适支持军阀、反对革命。还重写“现代评论”这个词条：

（四八四）取消【现代评论】原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胡适、陈西滢等所主办的周刊。1924 年 1 月创刊于北京。支持军阀政府，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1927 年自第 6 卷 138 期起迁上海，1928 年 12 月出至 205 期停刊。

（四八五）重写【现代评论】词条。

1999 年版重写的全文是：综合性刊物。1924 年 12 月，在北京创刊。陈源、王世杰等主编。周刊。撰稿者以曾在英国留学的大学教授为主。曾发表过一些维护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学生运动与群众运动的文章。1927 年 7 月，第 6 卷第 138 期起，迁上海出版。1928 年底停刊，共出 209 期。现代文学史上，把该杂志的主要撰稿者称为“现代评论派”。（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206 页与 1999 年版第 1459 页）

对比上述这两个词条，重写的词条一是抹杀事实把“胡适”的名字删除掉了，其实，胡适是这个“代表右翼资产阶级”的“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见白吉庵著《胡适传》第 226 页人民出版社 1993 年）；二是写该刊物“曾发表过一些维护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学生运动与群众运动的文章”，写“这个政治性很强的”刊物只是“曾发表过一些……文章”，这就说得太轻描淡写了；把该刊物“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篡改成“反对学生运动与群众运动”，反对“学生和群众”的什么运动？运动的领导者是谁？没头没脑，这叫读者怎么去理解？其实，这个刊物同“代表革命派的鲁迅”“笔战延续很长时间”。（见同上书第 227 页）那时斗争也是激烈的，在《鲁迅全集》中有不少文章就是这种斗争的记录。为什么要把历史模糊？

第五，为胡适翻案，连带为他的老师“杜威”及其“实用主

义”翻案。

胡适是其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的信徒和鼓吹者。1999 年版编者为胡适翻案也连带为他的老师“杜威”及其“实用主义”一并翻案。这是为了在中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胡适思想”来填补“真空”。于是，就删改下述两词条：

（四八六）删改【杜威】词条。

1979 年版全文是：（JohnDewey，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者。自称其哲学为“经验论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把自然（客观世界）归结为经验，宣称主观与客观的区别只是经验内部的区别。经验就是人和自己所创造的环境的“交涉”，因而完全是主观的。他还提出所谓工具主义。否认理论思维的意义，把一切科学理论均归结为经验，认为他们只是个人应付环境的“工具”或手段。否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凡能取得一时的“成功”或“效用”的就是真理。在社会历史问题上，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鼓吹阶级“协作”和点滴的社会“改良”。在教育理论方面，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学方法应根据“从做中学”的原理，以儿童的活动为中心，企图通过教育的手段，调和阶级矛盾。1919~1921 年间曾来中国，他的学说通过胡适等人的传播，在旧中国有一定影响。主要著作有《学校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哲学的改造》、《经验和自然》、《逻辑：探究的理论》等。（可对比《辞海》1979 年版第 1254 页与 1999 年版第 1515 页）

（四八七）删改【实用主义】词条。

1999 年版编者删除原词条的内容如下：

1.删除实用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潮。19 世纪末产生于美国。20 世纪初开始在资本主义各国广泛流行。”

2. 删除实用主义是“宣称真理不是观念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是‘有报酬’、‘有效用’、‘能满足我的需要’的就是‘真理’。实用主义最近的代表是胡克（SidneyHook，1902~），他写了许多著作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

3. 删除“旧唯物主义者在谈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时，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认为小人总是欺骗君子而得胜。因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页），他们在历史领域内背叛了唯物主义。”（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017页与1999年版第1229页）

以上这两个词条中划了线的部分文字，被1999年版编者都删除、否定。显然，这就抹杀和掩盖了杜威思想及其实用主义的主要表现、基本观点和本质，这就既为胡适、杜威、实用主义都翻了案，又为以后搞实用主义的人大开了方便之门。

第六，为胡适翻案，连带为“自由主义”翻案。

胡适是以自由主义者标榜自己的，他的信徒们也在大力鼓吹胡适的自由主义。因此，1999年版编者不仅为胡适翻案，也连带为“自由主义”恢复名誉，加以美化。于是，删改“自由主义”词条：

（四八八）删改【自由主义】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思潮。以法国的孔斯旦（BenjaminConstantdeRebecque，1767~1830）、英国的边沁和穆勒等为代表。自由主义的名词提出于19世纪初，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民主”口号按照资产阶级政权确立以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补充。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提倡个人权利，实现毫无拘束的企业主的自由竞争，拥护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资产阶级

的自由主义是“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7页）到了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自由资产阶级变成垄断资产阶级时，自由主义变本加厉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暴露其反动面貌。（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895页与1999年版第2283页）

1999年版编者不仅把“自由主义”的基本表现和反动实质都删除、否定，而且还宣扬“自由主义”。编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还特别在【胡适】词条中增写胡适“1928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反对国民党独裁与文化专制，倡导自由主义。”这又是极大的颠倒是非功罪，把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权”、“自由主义”作为“好东西”来鼓吹。

实际情况又怎样呢？胡适的“人权”和“自由”其实是虚假的，他只不过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和依附于这个阶级的人的“人权”和“自由主义”，使他们有“权”有“自由”践踏大部分人的人权和自由罢了。这有铁的事实为证：

胡适维护过李大钊、杨杏佛、鲁迅、胡也频等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人权和自由吗？恰恰相反，他是同情、支持反动统治者杀害、镇压这些人士的。

1. 从李大钊被杀害看胡适的立场和态度。胡适一点也不谴责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军阀，相反，在文章中写道：“‘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种趋势的危险……当日和我讨论的一个朋友（李大钊）被杀死了……”（《胡适全集》第4卷第660、661页）胡适竟把李大钊的死因归罪于李大钊自己不顾“谈主义的危险”才“咎由自取”“被杀死了”的。胡适是擅长遣词造句的，他不写“被杀害”而写“被杀死”，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的话？胡适曾表示他本人是“同情”蒋介石“清党”、“四·一二”大屠杀的，（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57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而李大钊正是在这个四月份的下旬，在蒋介石密电军阀张作霖“将所有被捕的人，立即处决，以免后患”的情况下被杀害的。（见《国共两党关系史》第301页中共中央党校1995年出版）再看在一年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去年他（李大钊）葬时，我不曾去送。”（《胡适全集》第32卷第261页）当年，胡适连李大钊的葬礼也不参加又说明了什么呢？

2. 从杨杏佛被暗杀看胡适的立场和态度。杨杏佛是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秘书长，是宋庆龄会长的重要助手。杨杏佛又是胡适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和留学美国时的老同学、老朋友。可是，杨杏佛在前一天与胡适坐同一辆轿车两次进出租界，第二天就在这辆轿车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当时胡适沉默得出奇，无片言只字的反应，使全国很多人感到惊讶。几十年后谜底才揭穿。原来胡适在《日记》中是详细记载了他自己幸灾乐祸的心情的，胡适完全站在反动派立场上颠倒是非，说什么杨杏佛之死是由于他搞“人权同盟的工作招摇太甚，未能救人而先招杀身之祸”，胡适说杨杏佛“吃亏在他的麻子上，养成一种‘麻子心理’，多疑而好炫，睚眦必报，以摧残别人的快意……我早就预料到他必至于遭祸……。”（见《胡适全集》第32卷第213页）胡适不但没有片言只语谴责反动派践踏人权，反而把杨杏佛被暗杀的原因和责任全部无理地加到杨杏佛的头上，还对杨进行人身攻击。人之无良，竟至于此。这是尊重杨杏佛的“人权”和“自由”吗？

3. 从怎样对待鲁迅看胡适的立场和态度。鲁迅也是胡适在“北大”共事的一个朋友。有人赞美胡适说：“胡适为人温和持重……从未攻击鲁迅……胡适是倡导西方文明和民主自由的巨匠。”（《炎黄春秋》2003年第11期第43页）其实，恰恰相反。因为鲁迅不是像胡适那样“‘同情’蒋介石‘清党’、‘四·一

二’大屠杀”，而是同情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这就被胡适视为“敌党”。

怎样对付“敌党”呢?胡适实质上是主张靠反动政府用暗杀杨杏佛的办法来对付鲁迅的。就在杨杏佛被暗杀那个时期，仇视鲁迅的女作家苏雪林致函胡适，建议应回击鲁迅，夺回“左派控制新文化”的领导权，请看，胡适在给苏雪林的回信中是怎样说的:“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思想并不足为害……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我们当注重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笔舌。”同时在这封信中，胡适称鲁迅为“狺狺攻击我们”的“敌党”、“反对政府”的“‘叛国’之徒”，胡适主张“不能全靠笔舌”而应靠“政府”来对付，以收“釜底抽薪”之效。(《胡适全集》第24卷第223、224页)说穿了，这岂不就是主张靠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特务，用暗杀杨杏佛的办法对付鲁迅吗?

4. 再从怎样对待陈独秀看胡适的立场和态度。有人说“胡适四次营救陈独秀”，这岂不是难能可贵的维护陈独秀的人权的行动吗?实际情况也恰恰相反。那是胡适配合蒋介石企图说服陈独秀归降蒋介石，这是胡适为反动政府瓦解中国共产党和搜罗人才而效力的举动而已。

这个谜底也是胡适自己揭示出来的。在最后一次保释陈独秀时，陈独秀刚出狱的第二天，胡适就对陈说:“我觉得仲甫可进国防参议会，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中正、兆铭(即汪精卫)都有此意，我现在也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你若来我们可以在一起轰轰烈烈干一场。”(见王学勤著《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第77页)这就使胡适为蒋介石、汪精卫当说客的面目毕露无遗了。

为什么不惜前后“四次”进监狱探望和保释陈独秀呢?胡适自己也交了底。这是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明白表示出来的，胡适写道:“我们两个老朋友，所以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

为我们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适全集》第23卷第477页）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胡适始终认为陈独秀本来就和他保持着“共同点”，是有可能走到一起的。而胡适认为李大钊、杨杏佛、鲁迅等人都是与他没有“共同点”，是他无法转变其思想、争取的对象，他也早已放弃争取他们的希望而视他们为“仇敌”，主张由反动政府的专政机器来对付他们以收“釜底抽薪”之效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陈独秀没有使胡适失望，最终走到胡适一起去了。这就是陈独秀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晚年写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这篇著作，公开否定民主的阶级性，主张有超阶级的民主。说什么“民主不是那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整个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道：“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独裁”，是“党的独裁”。（转引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第13页）

为了更进一步看清胡适的所谓超阶级的无条件、无限制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实质，我们还应看到胡适自己却说是有前提、有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胡适对蒋介石所说：“我是始终支持你的政府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胡适同样明确地说：“我们在国内提倡言论自由的一班朋友”有一条“戒约”，这就是即使流亡到国外后，也“决不会发表毁坏自己国家与政府的名誉的言论”。（《胡适全集》第34卷第690页和第25卷第623页）

以上史实和胡适自己表述的他的“人权”和“自由主义”“始终”是以支持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践踏人权为前提条件的，这岂不是有力地证明胡适自己也不承认有所谓绝对的、“毫无

保留”的超阶级的“人权”和“自由主义”吗?!

可是,现在有人还是在不断地造舆论:

有人说:“胡适始终没有放弃以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来抗衡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说什么“民主就是民主”,“没有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一个不能保证‘对方言论自由’的国家,就不配称为‘民国’。”(《胡适还是鲁迅》第48、49页,王毅文)

还有人说:“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人权思想的旗手……胡适在人权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观点始终如一,毫无保留……胡适人权思想的生命历程应在跨世纪之际得到复活,并将在下个世纪放出熠熠光辉”。(《胡适还是鲁迅》第350、351页,杜钢建文)

更有位先生说胡适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炎黄春秋》第6期第59、56页)

看了以上的历史事实和胡适的自白,这种种美化、吹捧胡适及其“人权”、“民主”和“自由主义”的谎言,也就都该收场了。

第七,1999年版编者为胡适翻案,也连带为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蒋介石翻案。

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起,到打全面内战,直至败逃台湾,胡适是始终竭力支持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可是,1999年版编者把原词条所写的“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删除、否定;更进一步是在蒋介石政府颁布的反动法规《戡乱条例》上做文章,为蒋、胡一并翻案。首先是通过取消《戡乱条例》原词条,达到否定它是“反动法规”的目的。

(四八九)取消【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简称《戡乱条例》)词条。

1979年版全文是：中国国民党政府为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于1947年12月25日颁布的反动法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大举反攻时，国民党为维护其即将彻底崩溃的反动政权，以“戡乱”为名，加紧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凡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革命人民，都被认为“危害国家”，受到血腥镇压。（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352页与1999年版第1634页）

1999年版编者取消这个词条是个重大的原则性错误。这是否定站在新中国和共产党立场上如实地写《戡乱条例》是一个“反动法规”。在取消后，编者又不敢公开站到国民党政府立场上去重写《戡乱条例》是一个正确的“法规”，于是，就在【胡适】词条之中增写《戡乱条例》来实现这个意图：

（四九〇）在【胡适】词条中，1999年版编者增写胡适“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504页与1999年版第1822页）

1999年版编者在取消原来站在新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立场上写的《戡乱条例》是个“反动法规”的词条后，再在“胡适”词条中增写《戡乱条例》时就不写它是“反动法规”了。就这样为蒋介石的《戡乱条例》正名，把它说成是由“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的，经大会通过的“法规”，这就为蒋介石大打“剿共”内战、加紧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制造了“合法”的“根据”。

（四九一）增写【戡乱】新词条。

1999年版全文是：【戡乱】平定叛乱。《隋书·音乐志下》：“成功戡乱，顺时经国。”亦作“龛乱”。（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352页与1999年版第1634页）

本来原《辞海》中并无【戡乱】这个词条，显然，增写这个词条的目的是为了给胡适提出的、蒋介石颁布的《戡乱条例》作解释之用。

这就是1999年版编者有计划地把【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简称《戡乱条例》)词条取消后用【戡乱】这个新词条取而代之,又在【胡适】词条中特别增写了胡适“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这是恶毒地利用古已有之的“曲笔”手法,肯定蒋介石的《戡乱条例》是正确的了。这就只能误导读者,把《戡乱条例》理解为是一个关于“平定叛乱”的《条例》,把蒋介石实行“戡乱”理解为“平定叛乱”的行动了。

这样,1999年版编者就把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置于“乱党”、“乱民”的地位,成了蒋介石应该“平叛”的对象。这样,也就把蒋介石置于“合法”执行“国民大会”的旨意和“法规”而实行“戡乱”的地位上了。这是利用为胡适翻案也连同为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蒋介石一并翻案。颠倒是非,竟至于此!

我们看了上述【胡适】以及与胡适有关的十多个词条的删改和增写的内容,足见1999年版《辞海》编者为胡适翻案是全面彻底的了。

1999年版编者把胡适这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治人物兼学者的角色加以重塑,尽量抹杀、掩盖胡适反动的一面(而且是主要的、基本的一面),无限夸大、美化和拔高胡适,这都是极其无理、极其错误的。我们在下一个专题中将更全面集中地评析胡适其人,证明为胡适翻案是荒谬绝伦的!证明批判胡适思想是完全正确十分必要的。

十九、评 1999 年版《辞海》对“胡适思想批判”的否定

关于应不应为胡适翻案、该不该批判胡适思想的问题，是一个怎样全面认识和评价胡适其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在上一个专题中概括地指出了不应给胡适翻案的问题，现在要通过全面认识评价胡适其人来证明不应为他翻案和不该否定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而是应该坚决彻底继续深入批判胡适思想。

（四九二）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词条。

这是 1999 年版《辞海》所增写的，全文是：1954 年 10 月至 1955 年春，在全国展开的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在“五·四”后的 30 多年中，胡适思想在中国学术界有很深的影响。1954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提出要通过批判俞平伯的错误思想，把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开展起来。12 月 2 日，中科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批判。与此同时，全国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讨论会。各地报刊也陆续刊载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这场批判对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有其积极意义，但对胡适思想全盘否定，将学术问题简

单地等同于政治问题，对后来思想、学术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可比照《辞海》1979年版第1506页与1999年版第1825页）

1999年版编者所增写这个词条，用意显然是否定“1954年10月至1955年春在全国展开的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编者抹杀和否定这次“胡适思想批判”的正确性、必要性和重大成效，仅仅用“对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有其积极意义”一句话一笔带过，根本没有承认胡适有任何反动的政治思想或错误，以及胡适在哲学思想、历史观、文化、学术等思想观点方面，确有应该批判之处。要害在于用一个“但”字作为转折，把这场十分正确、必要、健康和有成效的“思想批判”写成了三大错误：

1. “对胡适思想全盘否定”。

2. “将学术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问题”。

3. “对后来思想、学术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这3条是严重歪曲事实，是否定“胡适思想批判”的正确性、必要性和基本成绩的。我们认为这次“胡适思想批判”是正确、必要、健康和有成效的。当时的批判，主要涉及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哲学史观点、考据学、文学思想、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等。胡适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许多必须批判的罪行和错误。批判他的罪行和错误，分清是非功罪，是十分必要的，只嫌批判得不够，需要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深入批判，绝无否定这次批判之理。为此，我们要用铁的历史事实来论证批判胡适思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1999年版编者指责当年的批判是“对胡适思想全盘否定”，请问编者：你能指出在“全盘”的“胡适思想”中有哪一些“胡适思想”是不该否定的吗？这个不该否定的“胡适思想”在整个“胡适思想”中占有什么样的比重？

编者又说什么“将学术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问题”，这种倾向当然不能说没有，但也要作具体分析，倾向不代表主流，在

1954年8月胡适在台湾正允蒋介石之聘,出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正在政治第一线声嘶力竭喊“反攻大陆”,批他的人多讲些政治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只是批他的思想,还没有听说有什么地方抓“胡适分子”。

编者还说什么“对后来思想、学术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这就更荒唐了。请问编者:在思想和学术这两个方面,难道不是积极的作用为主,仅仅只有“消极影响”吗?

看来,我们必须再来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胡适其人,才能搞清楚应不应为胡适翻案、该不该彻底批判“胡适思想”。

我们就从200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胡适全集》并为之刊登的一份《广告》说起吧。这份《广告》的观点实质上是1999年版《辞海》编者为胡适翻案的继续和发展。恰恰有力地证明过去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

胡适是一个历史人物,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为研究和分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出版他的著作,是提供了一份有用的资料。但是,怎样全面认识胡适、评价胡适,以至宣传胡适,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从如下四个方面提出看法和意见:(1)胡适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只能根据他一生主要的思想言行来评价;(2)历史对胡适的定论是什么;(3)《光明日报》的《广告》对胡适的赞美和评介与事实正好相反;(4)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第一,胡适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只能根据他一生主要的思想言行来评价。

胡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看他一生的立场、观点、思想和言行。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我们都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抹杀其贡献,也不隐瞒其过错、罪责。胡适在历史

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作出过贡献，我们不能抹杀，而且应作出公正的评价。胡适提倡用通俗的白话文来代替古文，这在当时确实起过反封建主义的巨大革命作用。虽然胡适本人始终没有意识到甚至否认起过这个作用，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光荣’。压根儿我不知道这几十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胡适全集》第22卷第300页）胡适认为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因而不承认自己反对过封建主义。我们认为对于胡适自己意识不到和不承认的这个反封建之功，不仅应当承认而且应给予足够的评价；对于后来胡适所作过的其他学术研究，凡是确有价值的，我们也都应承认并给予应有的评价。

但是，我们需要全面地看一个历史人物和学者。因为古今中外的任何历史人物、学者也都是人，人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毛泽东说，人，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便等于没有灵魂”。胡适本人也一再讲过“学术、文化”都是离不开“政治”的。因此，我们不能不主要看胡适在政治方面（这是胡适的主要方面）思想言行：

（1）胡适始终主张对社会只能进行改良不能进行革命。

胡适青年时期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虽然“公学里革命书刊流行甚广，革命空气甚为浓厚，许多人剪掉了作为清朝顺民的标志——发辫。但胡适始终未剪，也未加入革命党。”（耿云志编著《胡适年谱》第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以下简称《年谱》）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把满清政府推翻以后，胡适对腐败的满清封建统治者包括末代皇帝的热爱、崇拜之情始终没有变。

①胡适肯定清皇朝的“革新”，反对辛亥革命。胡适认为“清朝末年……外交、军事、政治诸方面开始革新”已“为全中国所瞩目”。（《胡适全集》第20卷第553页）

显然，胡适在赞颂清王朝，对清王朝抱有希望和信心。因此，对于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胡适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日记》中写道："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何时乎！"（《胡适全集》第27卷第192页）在武昌起义一周年时，胡适在《日记》中又写他的心境："天雨朦胧，秋风萧瑟，永怀故国，百感都集"。（同上第205页）同时，胡适经常用英语对留学同学说："我赞成渐进，不赞成革命。"

在腐败的满清被推翻后的岁月里，胡适有如下的行动和言论：

1922年5月30日，胡适入宫见溥仪，并写了《宣统与胡适》一文。虽然清帝已退位十多年了，胡适却仍以"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为荣。胡适还在给宣统皇帝的顾问兼老师庄士敦的信中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地位。"（《胡适全集》第21卷第288页和《年谱》第110页）

1924年5月27日，胡适"第二次进宫见溥仪"。（《年谱》第129页）

1924年11月5日，胡适写信给外交部长王正廷，反对冯玉祥派军队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并把此信在11月9日的《晨报》上发表。（《胡适全集》第23卷第445页和《年谱》第132页）

在此必须指出：清帝溥仪被废仍住宫内，本来是有《协议》的。可是，1917年，清废帝在康有为、张勋支持之下，重登帝位，是自己破坏了《协议》。胡适不谴责清废帝之复辟，反而责备冯军破坏《协议》、破坏"国际的信义"。（见《年谱》第132页）

1924年11月底，胡适特地到醇王府去看望被逐出宫的溥仪。表示慰问，并劝他出国留学，愿意予以帮助。（见《年谱》第

133 页）

胡适这些支持清王朝、不赞成革命的言行和思想感情，能说不是胡适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的表现吗？

②胡适在 1914 年 23 岁时就萌发社会改良的思想和要求，支持和组织“社会改良会”。

1914 年 8 月 14 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许肇南远道来访，连日倾谈极欢。肇南将归国，作诗送之。”诗中写到：“我闻君言如饮酯，投袂欲起为君舞。君归且先建旗鼓，他日归来隶君部。”胡适自注：“今夜同人有‘社会改良会’之议，君倡之，和之者……杨杏佛、胡明复、胡适之也。”（《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448、449 页和《年谱》第 36 页）此时已可见胡适对改良主义的向往和狂热。后来，胡适就是一生只相信社会改良而反对社会制度的革命、反对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③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1919 年，胡适 28 岁，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胡适写道：“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直到 1919 年 6 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才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那时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并指责主张革命者是“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全集》第 2 卷第 467、468、515 页，第 4 卷第 673 页和《年谱》第 76~77 页）胡适的这些错误观点在受到蓝志先《论问题与主义》和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批评后，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仍然坚持自己的改良主义观点。

在十多年之后，胡适在为汤尔和的译作写的《序》又说：

“我在十多年前便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意见，希望引起一班爱谈大道理的人的觉悟。十多年以来，谈主义的人更多了……”胡适说“改良一种棉花或一种蚕子，胜似一万万吨谈主义的文章”。（见《年谱》第 181 页）可见，他对“主义”（实际上是指的马列主义）“大道理”之憎恶。

④胡适支持代表旧制度、旧秩序的南方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1922 年，陈炯明叛变革命。胡适写道：“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地），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到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胡适还说“陈炯明这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后来，革命军反击陈炯明，胡适又反对，他写道：“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并说“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胡适全集》第 2 卷第 526、538、559、506 页和《年谱》第 112、113 页）

⑤胡适反对中共提出的革命纲领。1922 年，中共“二大”提出和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和宣言，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胡适发表《国际的中国》文章，公开表示反对，他完全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说什么“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而非彼方的“侵略”。他主张现在应“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胡适全集》第 2 卷第 495 页和《年谱》第 117 页）他是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

⑥胡适支持北洋军阀段祺瑞。孙中山在 1924 年《北上宣言》中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胡适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

抗”，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胡适全集》第 30 卷第 189 页和《年谱》第 135 页）实际上，胡适斥“革命”为“学时髦”，他“在将近十年间……跟北洋政府维持着某种合作关系”，胡适那个“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成员皆由官方委任”。（转引自《胡适还是鲁迅》第 200 页，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⑦胡适长时期崇拜袁世凯，直到 1929 年，仍然崇拜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胡适给张謇《传记》作《序》，他写中国近代史上有八位“伟大的英雄”人物，在这八条名字中是袁世凯列首位，张謇列第四位，孙中山列末位。（《胡适全集》第 3 卷第 782 页）张謇之子张孝若在为父亲出版《传记》时，担心如此对孙中山不敬，会引起国民党“找麻烦”，才擅自把孙中山调到首位。胡适不只是贬低孙中山的问题，而是把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并列，是对孙中山的污蔑。

⑧胡适自己声称反对“种种革命”。1930 年 4 月 10 日，作为一个顽固的改良主义者的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就明白无误地宣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指反帝、反封建、反资等‘种种革命’）……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只能“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胡适全集》第 4 卷第 468 页）胡适认为“种种革命”都属“扰乱”，都是改良主义者要打倒的“五大敌人”之一。胡适在另一篇文章中明白无误地写道：“抗战以前十年之中，国内有共产党的‘扰乱’……”，（《胡适全集》第 20 卷第 627 页）胡适就是为了消灭“扰乱”而坚决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剿共”的。

胡适说“共产主义是十足的武断思想”。（《胡适全集》第 4

卷第659页）他认为讲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就等于“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足见他把他的“改良主义”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矛盾是看作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们认为革命并不绝对排斥改良，但与此不同的是胡适主张的“改良主义”是排斥革命的。

在与胡适保持“某种合作关系”的北洋政府垮台后，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适认准蒋介石集团已背叛革命，他也就投靠过去了。

（2）胡适在蒋介石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胡适在蒋统治集团中拟任和所任官职情况：

①1931年10月，胡适与丁文江去南京晋见蒋介石。从此投身蒋介石统治集团，“与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建立了直接联系”。（见《年谱》第194页）

②1931年11月，胡适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个有经济实权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蒋介石。（《胡适全集》第32卷第156、157页）

③1933年3月31日，汪精卫致信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胡未就而荐王世杰，得汪精卫同意。（见《年谱》第210、211页）

④1938年，胡适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他在致傅斯年信中说：“廿日即得蒋先生电劝……明知非群小所喜，但终不忍推辞，故廿七日决心允任。”（《胡适全集》第24卷第405页）他任大使只是尊蒋的旨意，而不谈国家和抗日的需要。

⑤1942年9月，国民党政府聘胡适任行政院高等顾问。辞未就。但致信蒋介石表示：“愿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见《年谱》第305页）

⑥1945年4月，胡适作为蒋政府代表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亦有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会议期间，胡适与董必武辩论，要求中共“放弃武力”，受到董必武反

驳。(《胡适全集》第25卷第160页)

⑦1947年2月6日,胡适致信傅斯年说,蒋先生要我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 之事,“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年谱》第343页和《胡适全集》第25卷第220页)

⑧1947年12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转达蒋介石意,希望胡适“改行”从政,且有请他参加总统竞选或出任行政院院长的意思。胡适辞而未就。(《年谱》第359页)

⑨1947年12月25日,“胡适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简称《戡乱条例》”。这是胡适为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合法化而制造出来的一个 “反动法规”。(《南京国民政府纪实》第1024页,朱汉国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辞海》1999年版第1822页)

⑩1948年3月30日,蒋介石内定胡适为总统,请王世杰劝驾,胡适终于接受了,并在当天和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承认这是(蒋公)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我接受了。”(《胡适全集》第33卷第683、684页和《年谱》第364~365页)胡适还告诉他的秘书说:“昨天夜里,蒋先生约我到他的官邸谈了很久。……蒋先生的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于是我说,‘让蒋先生决定吧’。”(《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2024页)

据当时参与其事的《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在其《回忆与忏悔录》中记载:“胡适是个城府很深的人,这时也有些得意忘形,他甚至还对他的秘书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得意之色,溢于言表。”“最后谈到对共产党的态度,我问他,你当了总统以后,是否重开谈判?想不到他的反共态度比蒋似乎还坚决,用英文说:‘绝不’。”(转引自《炎黄春秋》

2000 年第 3 期第 20 页）

看来，以上⑤、⑦、⑧的三次“辞而未就”是嫌宰相之下的官职太小了。但是，后因在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未得多数元老赞成票，胡适仍没有当上即将到手的总统。

⑪1948 年 11 月 20 日，“胡适在国民党华北‘剿总’集会上演讲，要国民党‘苦撑待变’，坚持战争到底。”（《南京国民政府纪实》第 1082 页）1948 年 12 月，中共宣布战犯名单时在广播中讲：“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应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吹者胡适”。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句话，没有否认自己是“战争鼓吹者”。（《胡适全集》第 33 卷第 710 页）

⑫1948 年 11 月 24 日，蒋介石派陶希圣北上邀胡适南下就任行政院院长。胡以心脏病辞。并请陶希圣向蒋介石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见《年谱》第 374 页）胡适在《日记》中写到“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胡适全集》第 33 卷第 700 页）这反映出了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⑬1949 年 1 月 15 日，蒋介石聘胡适为“总统府资政”。（见《年谱》第 378 页）

⑭1954 年，胡适到台湾任蒋介石操纵的第二次“国民大会”临时主席，又一次把“总统证书”交到连任“总统”蒋介石手中。（《胡适全集》第 34 卷第 331 页）随后，胡适又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蒋总统当选连任，我表示百分之一百的赞成，只有蒋先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转引自沈卫威著《胡适周围》第 25 页，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⑮1954 年 7 月 16 日，胡适允蒋介石当局所聘，出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年谱》第 395 页）

在 50 年代，蒋介石曾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意向。胡适给蒋写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长信，分析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成

功之处，劝国民党领导人应“切实研究敌人文献”，研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失败的教训”，并说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转引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第20页）这是劝蒋介石总结失败的教训，不要再同共产党谈判合作，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到底。

随后，胡适积极参加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活动。（见《胡适全集》第34卷第510、512、613、715页）在台湾国民党不少上层人士对“反攻大陆”丧失信心时，胡适发表演讲说：“反攻大陆不但是台湾一千多万人的希望的象征，也是海外几千万侨胞的希望的象征，还可以说是大陆几万万同胞的希望的象征。”（转引自《名人传记》杂志，1998年第5期第39页，河南文艺出版社主办）

这些都证明胡适允聘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很尽心尽职的。

⑯1957年9月，胡适受台湾当局委派，出席第十二届联合国大会，发表《中国大陆反共抗暴运动》演说，要求联合国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他在9月26日《日记》中写道：“我在联合国为中国代表团作大会辩论的演说，费时43分。用的是英文，总算还成功。”胡适在美国，在联合国无数次发表演讲和文章，要“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反对准许那个政府进入联合国，取得中国的席次。”叫嚣“解放被征服的亚洲”、“解放被征服的东欧、中欧”、“解放苏俄”。（见《胡适全集》第34卷第481页和《年谱》第380、396、407、387、388页）

⑰1958年，胡适在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个学术研究部门。但胡适在刚举行过就职典礼后的院士会议上说：“谈到我们的任务，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要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从学术上反共、救国……”。（见《中央日报》1958年4月11日）这在台湾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

长编初稿》第 7 册第 2665、2668 页，以及耿编《胡适年谱》第 409 页均有记载。可是《胡适全集》却未收入这篇演说。

从上述所举 17 个事例来看，国民党政权是信任胡适，借重胡适，封了胡适不少极重要的“官职”。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胡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吗？

有道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也有相反的情况，胡适是“为谋其政”而故意“不就其位”，为的更好地发挥他的所谓“独立”人士的作用。

胡适在 1931 年 3 月 18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在政治场外比在政治场内更有用。”（《胡适全集》第 32 卷第 95 页）

胡适在 1933 年 4 月 8 日给汪精卫的信中说：他“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是为了“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胡适全集》第 24 卷第 161 页和《年谱》第 210 页）

胡适在 1947 年 2 月又一次请傅斯年转告蒋介石，强调他“不参加政府……是国家和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胡适全集》第 25 卷第 220、226、237 页，第 31 卷第 67 页，第 33 卷第 620、625 页等均有此类表示）

现在，就来看一看胡适不进政府做“官”比做“官”所起的更大的作用吧：

①1927 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适以他“敬重”的“吴敬恒也是支持”的为由，胡适也表示：“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是站得住的……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后来，胡适在纪念吴敬恒的文章中赞颂吴是“1927 年首先发难，清党反共。在反共问题上最有‘远见’者”。这证明胡适正是最早响应吴敬恒这个有反共‘远见’者的人。（见《年谱》第 157、392 页）这绝非偶然，因为胡适

本来就把 1925 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的中国大革命称作“中国大动乱”。并说在这场“放火式的革命大潮流里，改良主义者……成了罪人”。（《胡适全集》第 34 卷第 735 页；第 20 卷第 607 页）

②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名为“独立”实际是紧跟、支持蒋介石专制、独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之造舆论。在其办刊方针中说：“在内政方面‘首重统一，次建设，次民治’。所谓‘统一’就是要‘剿共’。首重统一就是把‘剿共’放在第一位。他们并且提出：‘现在统一问题虽与历代不同，然中心人物及武力亦不可免。在二三十年内，一方式的专制——一人的或少数人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是事实所必须。’又说：‘短期之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目前大倡‘主权民有’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耿云志：《胡适年谱》第 199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这岂不是明确地支持蒋介石一人专制、独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然后，再由蒋介石一人、一党专政“二三十年”吗？

胡适说：“抗战以前十年之中，国内有共产党的‘扰乱’，国外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全集》第 20 卷第 627 页）胡适还说：“我们反对内战”，但不能“无条件的反对一切内战”，“我们不反对一个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乱”。（《胡适全集》第 22 卷第 507 页）

③1933 年 11 月，陈铭枢、李济琛等发动“福建事变”，要求反蒋抗日，胡适发表《福建的大变局》的文章，指责说：“无论打出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胡适全集》第 21 卷第 682、683 页）

④1936 年 6 月 9 日，“两广事变”发动者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要求反蒋抗日时，胡适致电李宗仁、白崇禧、罗文干称：“今日

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国家之大责任。”并发表《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评论说：“如果真要掮着抗外的题目来作推翻中央政府的叛乱行为，我们当然应该主张中央明令讨伐。”（《胡适全集》第24卷第301页，第22卷第507页和《年谱》第247页）

⑤在蒋介石十年“剿共”期间，胡适不断发表支持“剿共”和为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作辩护的文章。说什么“这几年之中，政府不能用全力注意到疆土的防守……因为‘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注意和很大的兵力……国内不统一……所以不容易有整个的国防计划。”（见《年谱》第199、239页）

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胡适得悉后，即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如遇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胡适并发表《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攻击张逼蒋抗日的行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污蔑“‘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同时攻击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武装叛乱失败时的策略。”骂中共已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1936年12月20日天津《大公报》第2版）这篇毒文由国民党政府大量印制向西安空投。这是胡适忠于国民党政府的又一个行动和贡献。

⑦胡适始终反对抗日爱国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抗日运动爆发后，胡适在《冀察时局的收拾》一文中说：“鼓动罢课的少数人全靠播弄一些无根据的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心理”；他还发表《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说：“荒废学业……岂但与报国救国毫无益处，简直是放弃本身的责任……”胡适还不断向蒋介石政府提出瓦解学生爱国运动

的方法。（《年谱》第 39、143、144、202、241、243 页）

⑧胡适支持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1940 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侵占陕甘宁边区五个县。其实，当年建立边区政府，是 1937 年 10 月 12 日国民党行政院第 333 次会议通过的。（见《国共两党关系史》第 647 页）虽然行政院的这个《决议》并未在报上公布，但对美国记者斯诺报道说边区政府是合法的，国民党当局也没有否认。可是，胡适不愿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他写了给国民党当局的《意见》说：“究竟边区一词有何法律依据？”“不能凭共产党之外国朋友瞎说”。（《胡适全集》第 22 卷第 636 页）这证明国民党的党外“独立”人士胡适，比国民党反“边区”、反共更坚决彻底。

⑨胡适支持蒋介石消灭新四军。1941 年，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消灭抗日有功的新四军。胡适配合蒋介石反共，到纽约作演讲说：“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要之举动。”（见《年谱》第 295 页）

陈布雷把蒋积极反共的情况电告驻美大使胡适，胡在 1941 年 3 月 7 日复陈电称：“阳电奉悉。共党事，委座苦心应付，良深钦佩。”（《胡适全集》第 24 卷第 557 页和《年谱》第 296 页）

⑩胡适配合蒋介石要中共交出军队。1945 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国内和平问题，蒋介石要中共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胡适比蒋更甚，他致电毛泽东，要中共“痛下决心，放弃武力。”（《胡适全集》第 25 卷第 160 页和《年谱》第 322 页）这又证明胡适比国民党反共更坚决彻底。

⑪1947 年，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总动员令”。胡适利用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对记者发表谈话，拥护“戡乱”，并说他的“家乡抗战八年未遭破坏，而共产党占领三日，即洗劫一空”。他把共产党说得比日本侵略者还残暴，他要求“国军”到他的家乡“戡乱”、“剿匪”。（《年谱》第 352、359 页）

⑫1949年4月21日，胡适到旧金山，次日发表谈话，拥护蒋介石集团拒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谈条件。（见《年谱》第379页）

⑬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胡适在美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胡适全集》第34卷第690页和《年谱》第379页）

⑭1949年7月7日，"蒋介石、阎锡山、胡适、于斌等102人联名发表反共救国宣言，宣称：吾人生死与共，坚持反共战斗"。（《南京国民政府纪实》第1119页）胡适排名紧靠蒋介石、阎锡山，可见反共集团对他的看重。

⑮1954年12月3日，胡适在纽约发表谈话，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表示"十分满意"。对蒋介石所谓"远东防线必需的一环现已铸成"的说法，"表示衷心同意"。（见《年谱》第397页）

⑯1959年5月26日，胡适赞颂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胡适说"杜氏之伟大"胜过美国"罗斯福总统"，因为"只有他能认识美国为自由世界无可争辩的领袖以及该一领袖地位必须甘冒之危险之下执行其任务……杜氏为一坚定不移之岩石。"（《胡适全集》第26卷第264页）胡适认为罗斯福签订《雅尔塔协定》，同意苏联占领满洲、北朝鲜是"委曲求全"。这就使共产党有了"在苏俄控制下的基地"，这就"决定了满韩的命运，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年谱》第382页）

⑰1960年11月18日，胡适晋见蒋介石。对蒋推心置腹地说："十一年前我就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胡适全集》第34卷第690页和《年谱》第431页）这既是对蒋表忠心，为蒋鼓气，又说明胡适是与蒋介石相依为命

的。胡适所爱之“国”是蒋介石的“政府”，这个“政府”才是他安身立命之基。

以上又举了17个事例，胡适这些言行果然比在国民党政府中“当官”起的作用“更大”，都是在重要关头上以“独立”人士的身份来帮国民党政府的忙。可惜历史无情，这仍然未能挽救一个反动王朝的覆灭。蒋介石和胡适都是在“光复大陆”、“反共复国”的“梦想”尚未实现之时离开了人世。

（3）胡适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支持反动统治者。

①胡适支持《二十一条》卖国条约。1915年5月9日，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亡国的《二十一条》，胡适在5月10日的《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并称赞说：“（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岂亦有所悔悟乎？”因此，他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后又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运动。骂爱国学生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胡适全集》第28卷第89、129页）几年后，胡适还反对把日本强迫我国接受《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这一天作为“国耻日”来纪念，为此他作了《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说什么“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胡适全集》第29卷第240页）这是胡适不愿刺激日本，害怕得罪日本。

②胡适在言、行两方面积极配合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胡适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并说“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7、618页和《年谱》第211页）胡适还在当月，就聚集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与爱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团体完全不同的一个所谓“自觉救国会”，不宣传抗日而宣传“反对对日作

战”、“反对对日绝交”，宣称：“本会以联络各界觉悟爱国分子，组织团体，兴办实业，实行自救、救国为宗旨”。（《胡适全集》第21卷第478页和《年谱》第194页）

③胡适无理主张中国应对日本的侵略主动让步。1932年6月13日，胡适向政府提议以“承认日本提出的五项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他认为如能“恢复东三省主权”，我国“不妨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见《年谱》第200~201页和《胡适全集》第24卷第233页）

④胡适建议日本停止武力侵略，而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说：“日本决不能用暴力来征服中国（报载胡适谈话）”，（见鲁迅《伪自由书》第64页）他说：“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3页和《年谱》第210页）怎样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呢？胡适建议说：“若日本能使中国留学生中有一百个周作人，排日的趋向，自然没有了”，胡适表示可惜“像周作人先生那样的人”太少了，他说：“这是中国人排日的一个真正原因。”（《胡适全集》第29卷第238页）

⑤胡适主张等候五十年再来解决东三省问题。胡适发表《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5页和《年谱》第216页）他以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曾签约将两个省割让予德国，经四十八年后才收回为例，主张我国的东三省也可以等五十年后再说。实际上，胡适是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效劳，主张不惜让日本霸占、掠夺东三省五十年，让蒋介石一心一意反共、剿共。

⑥胡适不谴责日本侵略我华北，反而说抵抗侵略将会“糜烂华北”。1933年5月，蒋介石命黄郛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与日军“停战”。事前，何应钦先邀胡适等人商讨，然后才由蒋下令签约。这《协定》规定的“停战”实际上意味着承认日

本侵略者对东三省的占领,不准中国军民对日军抵抗。胡适在6月4日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声称抵抗就会使华北‘糜烂’。”(《年谱》第211~212页)

⑦胡适主张国际共管东三省。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后，所谓“国联调查团”的《报告》提出了十条“解决的原则及条件”,主张“东三省自治”。实际是置于“国际共管”之下。胡适表示赞成,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主张由外国教练官协助训练一种特别宪兵”来“管”东三省。(《胡适全集》第21卷第522~523页)

⑧胡适主张可以承认伪满洲国。胡适于1935年7月26日，写信给罗隆基说,他曾写信给外交部长王世杰“主张与日本交涉解决一切悬案;中国可以承认满洲国。”(《胡适全集》第24卷第233页)王世杰复胡适的信说:“如以承认伪国为某种条件之交换条件……日方也不会因此而停止其侵略……”王世杰未采纳胡适的建议。(《胡适全集》第24卷第244页和《年谱》第237、235页)

⑨胡适是汪精卫、蒋介石对日本妥协投降活动的积极参预者。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不久,汪精卫等一批汉奸投降日本,当时人们就怀疑胡适参与了投降活动,现在看胡适的多篇《日记》,可以证明胡适确实是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以及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投降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请看下面几篇《日记》:

> 《日记》之一:“1937年7月30日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程沧波等,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
> 一是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
> 二是时机很迫切，须由肯积极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

大任。”

《日记》之二:“1937年7月31日蒋先生约午饭……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

《日记》之三:“1937年8月6日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日记》之四:“1937年8月17日在汪宅开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陶希圣、傅斯年、胡适……。”

《日记》之五:“1937年9月8日十点钟到铁道部官舍,见汪精卫先生……我劝他不要太悲观……十二点钟到高宗武家,我也劝他不要太悲观……我说,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

(以上五则《日记》见《胡适全集》第32卷第668、669、670、671、672、673、677、678页)

这段时期,胡适与汪精卫同伙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程沧波等所谓“低调同志”,以及蒋介石等人,为中日“和平”活动频繁。在胡适《日记》中都有记载。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被贪心不足的日方接受。

“后来事实证明,蒋、汪都信托高宗武,要他设法与日方联系”。(《胡适评传》第1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正是由胡适向蒋、汪推荐的这个所谓“有见识”、“能负责任”的

高宗武，果然创“奇迹”、“负责”带汪精卫、陶希圣等一批胡适的好友去南京成立了汉奸政府。

关于汪精卫在从重庆出逃之前，同胡适等人搞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之事，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汪精卫出走后，原来和汪精卫一起搞‘和平运动’和‘低调俱乐部’的亲日派何应钦、胡适、熊式辉、陈济棠、何健、张发奎、陈寿农、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人，都噤若寒蝉”。（《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42页，1985年1月出版）从汪精卫往下数，胡适是名列第三的主要成员。胡适的活动不仅在重庆引起公愤，而且国民党元老“程潜在最高层会议上曾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声言应该逮捕胡适”。（见《胡适评传》第188页）只因蒋介石要继续依靠胡适保持与日方的“联系”，才未逮捕胡适。

⑩胡适从形而上学历史唯心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对外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对内支持反动统治者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基本观点、基本态度，是密切关联的，是始终没有改变的。除了以上的事实之外，再举几个突出的实例：

实例之一：胡适认为中国一切都不如外国。胡适在1926年致张慰慈信中说中国民族是个“醉生梦死的民族”。（《胡适全集》第23卷第494页）1930年，胡适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胡适全集》第4卷第666、667页）

相反，胡适却把日本这个民族捧上天，他赞美道：“她的万世一系的天皇，她的勤俭爱国的人民，她的武士道的遗风，她的爱美的风气的普遍，她的好学不厌的精神，可以说是兼有英吉利与德意志两个民族的优点，应该可以和平发展成一个东亚最可令人爱羡的国家。”（见《独立评论》第173号第12~13页）

胡适连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赞颂备至说：“切腹事，最悲壮动人……日本的武士把此事看作是一种艺术，要做的悲壮淋漓，要做的美；他们不惜死，却不愿让人笑他“技拙”，笑他死的不美。这真是日本文化的最大特色。”胡适还为日本武士题诗赞曰：“一死不足惜，技拙乃可耻。要堂堂的生，莫狼狈的死。”（《胡适全集》第4卷第651页）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被胡适大肆吹捧的日本民族中的一个无耻的侵略狂、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松岗祥石的自白吧：“大和民族是东方最优秀的民族，天照大神赋予我们的使命主宰世界；实现八纮一宇。我们的狭小的荒岛，应该让支那劣等民族到那里去自消自灭，大陆上的丰沃土地，秀丽河山，只有大和民族才配当它的主人。我们的终点线，不在黄河，不在长江，也不在喜马拉雅山，而是在世界的边沿……”（转引自《爱国主义的壮丽画卷》第10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另一个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杀人狂自称砍了中国同胞106个人头的日军少尉向井敏明说：“本来嘛，劣等民族就是上帝错误安排在地球上的荒草，大和民族为上帝锄草，正是顺应天理。”又说“劣等民族当奴隶，也是上帝的安排。支那的人头就是留给我们试刀用的。”（李尔重著：《南京大屠杀》第225、252页，2000年3月武汉出版社）

胡适肆意污蔑自己的民族和颂扬天皇、武士、大和民族同松岗祥石、向井敏明的狂言何其相似乃尔！还有谁比胡适更“崇日”、“媚日”，恶毒污蔑自己民族的吗？汪精卫赞同胡适，也说中国一切都“不如日本”。

实例之二：胡适还有个“理论”，他认为中国这个民族永远也不能为反侵略而对日本作战。他说如果对又富又强、武器精良的日本“作战”，“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胡适全集》第23卷第76页）他

还认为如果我方想靠“增兵备”来“救中国之亡”，彼方的“兵备”亦“必继长增高……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胡适全集》第27卷第585页）这就是说等不到我“国富兵强”，日本已“更富更强”，我们永远也不能对日本侵略者作战。这就是胡适的“唯武器论”和“宿命论”观点。汪精卫和胡适观点一致。因此，他们都认为降日“有理”，降日是为了避免作“无谓的牺牲”，是最好的“选择”。

实例之三：胡适和汪精卫还有一个相同的“国家观”。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实质是要求“抗日救国”，胡适却说这是“叛国祸国”。胡适还说“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也是“绝对不可能爱国的”。（见1936年12月20日天津《大公报》胡适文）因此，胡适说他“反对对日作战”，他“情愿亡国”，但“国家”不能“亡”给共产党。汪精卫也说“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汪精卫表示宁愿让中国“亡”给日本但他反对“亡”给共产党，他说“亡”给异民族日本不是真“亡”，就像历史上的“辽、金、元、清进入中原，最后还是被我们同化了”，“日本也一样”，“最后会被我们同化”。因此，汪精卫说他降日“不是卖国，而是真正的爱国”。（转引自《百年潮》2005年第3期第69页）胡适和汪精卫的国家观是一致的。

实例之四：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对汪精卫叛国当汉奸不但无只字谴责，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胡适全集》第33卷第546页）胡适认为青年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时的那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烈士”精神，是贯串汪的“终身”的。竟这样为这个大汉奸辩护。

实例之五：胡适与蒋梦麟在事前“委托”周作人降日任伪职，在事后又为周作人作“证明”，作辩护。周作人有一封“长信”说，他出任“伪职”“是受校长的委托，为保护北京大学……”。（见李霁野：《关于周作人的几件事》载《文艺报》1992年7月4日第3版）在周作人因任“伪职”而受审判时，胡适和蒋梦麟都为周作人作“证明”和辩护说，“北京大学曾委托周氏保管北大校产”，“经历沦陷时期”，“北大图书仪器及其它设备有增无减”。（《年谱》第333页）这是当汉奸“有理”、“有功”论。

事实胜于雄辩。以上共48个事例，还有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行，这些都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数十年中，胡适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是他在各个重要历史关头所扮演的角色，是他带有系统性全局性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等等的亮相。历史也必然会形成一个对他的定论。

第二，历史对胡适的定论是什么。

历史定论是根据历史事实而来的。

对胡适其人的历史定论，人们完全可以从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毛泽东著作，以及美国政府文件、胡适本人自评和国民党统治者对胡适的评价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1）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毛泽东著作对胡适的定论。

我国高中历史教科书写的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从根本上改革腐朽的社会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是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

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1991年版《毛选》第2卷第700页和711页注解)

后来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全面完整的分析,是科学的和正确的。

(2)美国政府的文件中说胡适是一个“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政治人物兼学者。

这就是蒋介石和胡适共同投靠的美国政府在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时，作为附件而公布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书面汇报材料。司徒雷登写道：

> “(1948年)12月17日我曾应约与孙科和胡适分别长谈,但仅能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的不知所从而已。和胡氏的谈话特别使人伤心，因为他力图效忠于蒋政府……胡氏的论点是共产主义是如此不共戴天与不堪忍受，在其主义方面是如此彻头彻尾的凶恶，而在其强行极权统治中国时又是如此无情残忍:使得蒋介石虽有其缺点,还是应该予以支持,因为只有蒋氏看清了这一点,并且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又因为他几乎是国民党领袖中唯一不沾染中国官场的任何贪婪与其他典型罪恶的人。他相信如果蒋氏被迫退休,则中央政府将行解体,而共产党将实际上按他们自己的条件接收过去。因此,他不知道现在能否说服美国……帮助蒋氏进行战争，而不许共产党统治中国并根据他们自己的目的来改变中国……他泪珠盈眶地请求我顾及长久的友谊而告诉他,他应该和蒋总统说些什么,和他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因为他已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我问胡氏能否出而领导另一个自由与民主问题之‘新思想运动’或‘文学革命’,一如他30余年以前所做出辉煌成就一样。他说他痛心后悔自日本投降后他便没有把他的才能

使用在这方面，而是如他所做的那样，自私地回到他和他性情较为相近的学术活动去。”（转引自徐非光著：《“赶考”、远未终结……十年来思想文化政论文选》第2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这就把胡适和蒋介石的共同本质和相互关系说得再明白透彻不过了。这也有力地证明了郭沫若说得对：“胡适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弟难兄，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3）胡适是美国培养成功的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领袖”。

上述美国官方文件对胡适的评价绝非偶然，美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一个懂得怎样才能“支配中国”的大学校长詹姆士提出：“哪一个国家做到教育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将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和商业影响上，收回最大可能的收获”，他并向美国总统建议：培养“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转引自《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7日《批判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一文）于是，美国从1909年开始，就用该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来“投资”培养中国的留学生。胡适就是被成功地培养出来企图“支配中国”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胡适毕生的表现，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一针见血地说：“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8页）毛泽东说，由美国培养、控制的这类知识分子，到后来，美国“只能控制其中的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1991年版《毛选》第4卷第1385页）

（4）胡适评价自己是“公认的反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

1950年，英国政府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之后，胡适取消了本来曾答应到英国牛津大学讲学之事。胡适在1952年9月13日复英国牛津大学杜布斯教授的信中说：“我已改变了主意

……由于我本人在‘自由中国’中被公认为是反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去英国生活，可能要经受许多心理和感情方面的痛苦……进入这个国家则是我不齿的。而且，我的看法可能与许多在英的老朋友不无偏见的观点相左，这可能使我非常痛苦……”“几经考虑”胡适取消了原来答应去英国讲学的决定。（《胡适全集》第 34 卷第 238~239 页）

胡适竟然“当仁不让”地承认自己是“公认的反共领袖”，而且是理智、感情、心理、行动高度一致的“反共领袖”。胡适认为在“反共”问题上没有“中间”立场，他说：“在目前共产与反共大斗争的激流中，不是共产就应该是彻底的反共，中间绝无余地可资徘徊犹豫。”（见《年谱》第 387 页）

胡适认为学术与文化都离不开政治，在 1922 年他就说：“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是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胡适全集》第 2 卷第 511 页，详见《努力周报》第 7 期）胡适直到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仍强调要“从学术上反共”。

胡适对于他自己所“写”所“说”的话，是这样自评的，他写道：“我自己现在回看我这十年来做的文章，觉得我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力气的文章，总算不曾说过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话。”（《胡适全集》第 2 卷《序》）

胡适一生之中只有过一次“忏悔”，他说，我曾说过“社会主义当然是将来必经之路……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胡适在“忏悔”后表示：应该说社会主义不是“必经之路”而是“通往奴役之路”。（转引自《胡适还是鲁迅》第 219 页）

这可以说是胡适写得不错的“自我鉴定”。

（5）蒋介石给胡适作的“结论”。

1962 年，胡适在台湾病死时，蒋介石“总统”和陈诚“副总统”亲往吊唁，并指示将国民党党旗盖在胡适的棺木上，表彰这

位始终忠于国民党统治的不是国民党员的国民党员。（转引自《名人传记》1998年第5期第39页）也可谓盖棺论定了。

以上5点代表了各方面包括胡适本人对胡适的评价，应该说是个历史定论了。这证明胡适主要是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人物兼学者的身份。作为学者的胡适，在文化、学术上所作出的真正有价值的贡献，我们都应承认并给予应有的评价。但是，千万不能掩盖、隐瞒他的政治面目，全盘肯定和美化胡适是荒谬之至的。

第三，《光明日报》的《广告》对胡适的赞美和评介与事实正好相反。

安徽教育出版社为出版《胡适全集》所作的《广告》，整整一版刊登于2003年12月4日《光明日报》B4版。为了使公众能将本文所述的真实的胡适与《广告》所赞美、评介、宣传的胡适作对比，现将这一份《广告》全文照录如下：

> "一代文化巨匠　传世精品工程　《胡适全集》　主编：季羡林　副主编：耿云志　严云绶　共44卷　定价：2860.00元
>
>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县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胡适曾历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教务长，哲学、文学等系主任，中国公学校长，北大文学院院长、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秘书，抗战时期一度出任中国驻美大使，1958年起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曾先后参与创办或编辑、撰稿《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著名刊物。发表和出版过《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哲学史大纲》、《红楼梦考证》、《白话文学史》、《尝试

集》、《胡适文存》等一大批戛戛独造、壁立千仞的传世名作。他在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活动领域，都曾发挥重要影响，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安徽教育出版社有感于这位乡贤一生不懈追求科学文明，孜孜探求学术的巨大勇气、可贵精神和丰硕成就，积十年之功，耗资数百万元，精心组织《胡适全集》这个宏大出版工程，以期一代宗师的特出思想要旨、学术精义、文化底蕴以及人生风范，泽被来者，传诸久远。

《胡适全集》凡44卷，2000余万字，除包含国内外曾发表、出版的胡适的论著、创作、书信、日记、译文以及用英文写作的文章外，还辑录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等地秘藏的诸多未刊稿，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全集的编纂旨在求全、求完整，同时又求精确可靠、剔伪存真。全书体例严整，编校可靠，印装讲究，达到很高的编纂出版水平。因此，这套皇皇巨著是迄今为止首次出版的最为系统、全面、权威的胡适著译作品全集，亦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名人著述规模最大的出版工程，已引起海内外的广泛瞩目，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卷目（第1卷至44卷卷目从略——引者）。

安徽教育出版社荣誉出品社长：曹露明”

显然，《广告》对胡适这样赞美、评介，是严重违背事实、颠倒是非的，是1999年版《辞海》为胡适翻案的继续和发展。

（1）《广告》严重违背历史事实、颠倒是非，为胡适无理翻案。

这份《广告》严重违背历史事实、颠倒是非，不但把胡适一生大量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都抹杀、隐瞒掉，还把他写成为从无错误、失误和缺点的圣贤，还把他无限拔高美化，说“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中国新文

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后一句连“之一”二字也不用，岂不成了“唯一”？）说什么“这位乡贤一生不懈追求科学文明，孜孜探求学术的巨大勇气、可贵精神和丰硕成就”，说什么胡适的著作是“戛戛独造、壁立千仞的传世名作”。《广告》没有片言只字提到胡适的反动政治面目和罪行。只把他说成绝对绝对的好和完美，把罪也写成功。这就无形中把胡适一生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治立场、观点和言行全部肯定了。还说什么以期他的“皇皇巨著”“泽被来者，传诸久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岂不是要人们继承胡适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事业”吗?真是荒谬绝伦！这显然是伪造历史，颠倒是非，为胡适翻案。

在我国，胡适是早有定论的一个反动历史人物。安徽教育出版社是国家的出版社，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安徽教育出版社似乎忘记了这个根本的大前提，竟在出版说明中写道：“《全集》的出版得到台湾胡适纪念馆的授权和支持。”而且在《全集》的两篇《序》中的不少说法和观点，与《广告》同样严重违背历史事实，颠倒是非。这样否定我国历次出版的权威的党史书和历史教科书关于胡适的定论，又是得到“谁”的“授权和支持”的呢?

拿这份《广告》的吹捧之辞与本文上述所列举的历史事实作对比，岂止天差地别，而是恰恰相反。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这些客观历史事实已成为历史，是绝对抹杀、隐瞒不了和推翻不了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是绝对不容许如此为胡适翻案的。

（2）1999 年版《辞海》与《广告》以及不少书刊相呼应，在制造什么舆论?

1999 年版《辞海》与《广告》以及不少书刊相呼应，都是在制造为胡适翻案的舆论，这都是我们必须加以揭露和批驳的！

有人在《胡适全集》的一篇《序》中，讲“五·四”运动的意

义时，说胡适是个“行动思想家或思想行动家。他毕生都在行动”，说胡适“在中国学术史上，中国文学史上，甚至中国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不能不说是胡适。这是他在既定的思想基础上行动的结果。一个纯粹的思想家是难以做到的。”不错，胡适是有思想，有行动，是执“大旗”的领袖。可是，作者为什么不把胡适执的是什么“大旗”亮出来？试问：作者如此狂热地颂扬这个在“中国政治史上”以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为其“特出的思想要旨”，执反共“大旗”的反共领袖胡适，意欲何为？造这种舆论为的什么？

有人公开主张开历史倒车，说：“退回去，回到‘五·四’，重新起步。”“百年回首，走胡适代表的方向……这是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胡适还是鲁迅》第31、33页）照这个逻辑，岂不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方向错了？岂不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也错了？这是多么荒谬！

邓小平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奋斗了二十八年，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蒋家王朝。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但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现在三十八年，这中间我们确实有不少失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又说“在三十年间我们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选》第3卷第227页和第2卷第167页）谁敢站出来否定这个事实吗？

有人说胡适是个“爱国者”，理由是胡适“不愿意老死异乡的美国，晚年回到了台湾，死在台湾。”可是，胡适爱的是什么“国”？胡适自己说是蒋介石的“政府”，胡适说：“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其实，不是没有去处，共产党曾多次请胡适回国仍任北大校长，却每次都遭到拒绝。邓小平曾明确地说“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你还爱什么“国”呢？（《邓选》第2卷第392页）

还有人提出并有人赞成说："胡适是中国最早也是中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人权运动人士"，"21 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见《炎黄春秋》2003 年第 6 期第 59~60 页）那岂不是 21 世纪要高举"胡适思想"旗帜了？

更有人说："只有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荡荡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甚至还说："整个的西方社会，大致生活在胡适思想中。胡适思想是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你要反，如何反得了？"（《胡适还是鲁迅》第 7~8 页）这岂不是妄想树立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胡适思想"、梦想以"胡适思想"来统治中国？

这些言论的荒谬性是多么明显！它完全违背事实，违背我国的宪法，违背我们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

如果 1999 年版《辞海》和这份《广告》以及某些书刊这样肯定和美化胡适能成立的话，这岂不意味着一系列的重大历史是非都要颠倒过来？

如果全盘肯定代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反共领袖胡适及其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是"新"文化，岂不要把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定性为"旧"文化，加以推倒？

如果肯定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岂不要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推倒、重写？岂不要把真正的中国新文化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重新定位，甚至进一步打成反面人物？

如果肯定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岂不要把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科学论证和全面论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本重要著作推倒？岂不要把我们的党史书、历史教科书都要推倒重写？

如果这样全盘肯定胡适，岂不要把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胡适思想的正确批判全盘否定？

当年《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说：“对胡适等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学术批判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应当允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实践的结果，党史书中有结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是必要的……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方面”，但也“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312 页）可是这个“倾向”并不能代表主流。

50 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正确性是无可辩驳的。那时胡适身在台湾，并任流亡政府的“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完全有为自己申辩和“反批评”的自由，他也确实收集了大陆上批他的文章，贴在《日记》本里，并一再发誓要进行反驳。可是，在近十年时间中直到他死，却没有写得出一篇为自己辩护或“反批评”的文章来，就像他对鲁迅也写不出一篇“反批评”的文章来一样。这证明他虽有生花妙“笔”，如簧巧“舌”，无奈理屈词穷，无话可说，无言可写。（参见《年谱》第 401 页和多处《日记》所记）

特别是目前这股为胡适翻案思潮的泛滥，恰恰有力地证明了 50 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必要和意义的重大。难道胡适思想的核心不就是反共、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吗？现在为胡适翻案的事实恰恰证明过去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不是错了，而是批判得还很不够、很不彻底。这才使得一些人至今还没有认清胡适的真面目。

显然，1999 年版《辞海》和这份《广告》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书刊所造的全盘肯定胡适，为之翻案和加以美化的舆论，都是在违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颠倒是非。但是，由于过去对胡适批判

揭露得还很不够，这仍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在思想、文化、政治、道德、学术领域中造成的后果和危害是无法用金钱或其他任何物质的东西来衡量的。因为那样全盘美化和肯定胡适，就等于肯定胡适一生在政治上反共的罪行和学术研究中的错误都是正确的，都是后人应该继承和发展的了。我们如果不立即起来拆穿这种谎言，等到这种谎言达到迷惑广大群众的时候，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同志岂不要被当作“历史罪人”来追究！这绝非危言耸听！

第四，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如上所述，1999 年版《辞海》和这份《广告》这样无理为胡适翻案，不是简单、孤立地为个别人物翻案的问题，而是为许多反动历史人物翻案有代表性的一个实例。这是违背客观历史事实，用历史唯心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以篡改历史人物的历史为特点，妄图改写历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再次猖獗；这是直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今天的领导地位的严重问题。这是我们有些地方多少年来没有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没有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教育的恶果。现在，我们已到了必须重视和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1）我们不能低估这股翻案思潮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胡适以“自由世界”、“自由中国”所“公认的反共领袖”自居，是有代表性的反共反人民的政治人物。他是赞颂和崇拜秦桧、“满清伟大的君主”、窃国大盗袁世凯、蒋介石、日本的天皇和美国的杜勒斯这一类人物的，他对外屈从帝国主义对内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历史之长久、思想之顽固都不亚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现在，1999 年版《辞海》和这份《广告》，这样明目张胆地为胡适翻案，对其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历史全盘肯定和无限美化，岂不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人民及其革命历史的全盘否定

吗?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所缔造和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懂得“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办法就是为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对立面——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历史人物翻案，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光荣革命历史以及今天的领导地位。这确实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今天，我们不能忘记邓小平曾一再告诫我们的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邓选》第2卷第391页)

现在,摆在十三亿人民面前的是:还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难道我们还能低估这股翻案思潮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吗?

(2)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们不应忘记历史教训。改革开放至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多次泛滥,给我们带来的惨痛教训是够多的了。且不说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所受之欺骗和毒害,我们的高层领导干部也有受了害的。邓小平说:“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两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跟头”,“过去两个总书记……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邓选》第3卷第324、380、324页)这是我国所有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和人民都应牢记的教训。

难道上述邓小平的这些话过时了吗?没有。邓小平在1987

年还重申和强调："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年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同上第208页）"七十年"这个话，至今还只过了十多年，怎么可能"失效"或"过时"呢？何况现实更加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已变换进攻策略，攻势正在一浪高过一浪扑向我们，已严重地威胁着党和国家的生存！难道我们还能掉以轻心吗？

我们还必须重温邓小平的名言："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至今不少地方还没有纠正这个失误。一方面是许多人不关心思想政治、不学习历史、不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教育，更不批评和抵制唯心主义；另一方面，有些人鼓吹唯心主义，对历史和为反动的历史人物大搞翻案，也得不到批评和制止。这已造成人们思想、理论上的严重混乱。我们必须改变这个局面，否则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将会后悔莫及。

胡锦涛总书记在一次政治局学习会上强调说："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要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6日）显然，总书记这个《讲话》是代表党中央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重要指示，这是非常及时、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我们应该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和党的号召，维护党的领导，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坚持学习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在整个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应该旗帜鲜明地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二十、毛泽东的伟大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四九三）删改【毛泽东】这个关键性词条。

删除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这是分两步删改的。在 1989 年《辞海》修订版中作第一步删改，先否定毛泽东的伟大，把 1979 年版原词条写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的“伟大的”这个词删除，同时把“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这句话中的“伟大”这个词删除”；（1989 年版第 1641 页）然后是 1999 年修订版编者再走第二步，便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再删除。还在数以百计的词条中，删除、否定毛泽东的伟大业绩和贡献。这是明目张胆地否定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这是一个既违背客观历史事实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又违反党的《决议》的重大原则性错误。本文将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评析：（1）从客观历史事实来看，毛泽东的伟大是人们公认的；（2）从毛泽东逝世至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来看，证明毛泽东确实英明伟大；（3）从 1999

年版《辞海》否定毛泽东的“理由”来看，是自相矛盾完全站不住脚的。

第一，从客观历史事实来看，毛泽东的伟大是人们公认的。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这里首先要明确一个大前提，在人类社会历史和当今社会中到底有没有起过伟大作用的伟大的人物？根据毛泽东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1700 多年前的《三国志》中就有关于伟大的人物的记载了。这在 1999 年版《辞海》中也仍然有【伟人】词条，释文是：“伟人，伟大的人物。《三国志·魏志·钟繇传》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三公’指钟繇、华歆、王朗。”在近代史上，《辞海》在【孙中山】这个词条中，也写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在现代史上，【鲁迅】词条中，也写“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以上三个词条见《辞海》1999 年版第 257 页、1355 页、2425 页，均系缩印本页码，下同）这表明，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确有起过伟大作用的伟大人物。某些辞书编者认为“伟大”是不反映“客观性”的纯粹“颂扬性”形容词，这种认定是与客观历史事实不符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承认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能起伟大作用，普列汉诺夫说：“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具备的特性使他自己最能致力于当时在一般和特殊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担负起了满足伟大的社会需要的发起责任”，起了“创始人”的作用，“‘伟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它反映个人作用之大小是根据客观事实而来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2 卷第 373 页）

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起过很多“满足社会伟大需要的发起”者、“创始人”的作用。众所周知的如：开创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以游击战“十六字诀”、“诱敌深入”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屡屡挫败兵力大于自身数十倍的强敌；带领红军“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取得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在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中既运用“三大法宝”、“人民战争”、“十大军事原则”战胜强敌，又运用“三大作风”、延安整风为思想武器战胜党自身的弊病；倡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直至胜利建立新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用和平改造方式推动民族资产阶级拥护公私合营，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起的“发起”者、“创始人”的作用是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国内外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怎样评价毛泽东的伟大的。

（1）先看国内有身份、有资格、有代表性的人士是怎样根据客观历史事实，根据毛泽东所起的历史作用来评价毛泽东的：

①朱德是从井冈山时代起，就同毛泽东始终战斗在一起时间最长的杰出的革命领导人之一。他对毛泽东也是知之最深者之一。朱敏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的父亲是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他常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见《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第 18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②周恩来是又一个与毛泽东共事时间最长最了解毛泽东的人。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向中国青年介绍说：“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并列举事实具体地介绍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指出了毛泽东的伟大是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的。（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31~341 页）

③宋庆龄是国内外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她在《追念毛主席》的文章中写道："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宋庆龄选集》下册第541页人民出版社）

应该指出：宋庆龄写此文的时间是在她经历和目睹十年"文革"和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78年12月。那时，社会上已出现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宋庆龄能在文章中这样旗帜鲜明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及其两个"得力助手"，这是多么意义重大和难能可贵。

④瞿秋白慧眼识真金，他看到毛泽东早期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激动之余，立即决定在党刊上刊出，并向全党推荐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还说"人人应该读几次"，"必须读"。（见《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第11页）在中国，正是毛泽东最先看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

⑤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也再三肯定毛泽东的"伟大"，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与我们不同"。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要"维护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邓选》第2卷第148、46、165页）

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一次肯定"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⑦胡锦涛同志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会上说："毛泽东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名字、他的思想、

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有些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冤枉、不公正对待的同志，仍然尊敬和肯定毛泽东的伟大。

⑧如黄克诚，他在我国出现一股贬低、否定毛泽东的思潮之时，就坚决地站出来列举大量的历史事实指出：“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见1981年4月11日全国各报）

⑨又如杨尚昆写道：“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被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全面地估价毛主席。”（见《不尽的思念——名人忆毛泽东》第35~36页，地震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⑩郭沫若经过“文革”风暴，“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儿子”，但他不仅对党无半句怨言，并在“文革”后的1977年毛泽东生日时，又再次吟诗缅怀毛泽东云：“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冠千秋。素笺画出新天地，赤县翻成极乐洲。”直到1978年郭沫若临终之际，他“最后叮嘱全家人说：‘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我死后把骨灰撒到大寨，肥田。”（《毛泽东与郭沫若》季国平著，北京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既表达了郭沫若对毛泽东及其贡献的无限钦佩，又表明了毛泽东思想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伟大！

⑪著名作家丁玲在受了二十几年的冤枉和苦难后回到北京时，有记者问她：“对毛主席的看法，与过去三十年的看法相比有无变化？”丁玲明确回答道：“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

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第197页）

⑫著名的爱国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后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同上书第130页）

⑬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去延安访问毛泽东之后，盛赞说：“想不到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同上第136页）

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实例是举不胜举的。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才能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列宁全集》第29卷第69、71页）毛泽东正是人们公认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所造就出来的一个伟大的人物。

（2）再看国外的革命家和各国领袖人物、专家、学者等对毛泽东的评价：

①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评价。他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就非常激动、赞不绝口地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愿你健康！”斯大林还说毛泽东“是一位天才的统帅”，“是世界革命的领袖”。（见《毛泽东人际关系实录》第142页和《中流》2000年第12期第2页）

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第290页，昆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③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反共专著中，也不得不承认：“事实证明，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毛泽东”，是“本世纪中国革命的杰出领导人物”。（见布热津斯基著《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第182、180页）

④尼克松的女儿（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媳）朱莉·尼克

松·艾森豪威尔说:“毛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转引自《中流》2000年第12期第3页)

⑤日本前总理大臣大平正芳说毛泽东“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说起话来气势磅礴。”(同上)

⑥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说:“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同上)

⑦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说:“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同上第5页)

⑧墨西哥前总统埃米略·希尔说:“毛泽东通过他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全世界留下了十分重要的遗产。”(同上第3页)

⑨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说毛泽东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同上)

⑩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说:“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是革命的精髓”,“毛泽东没有死,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毛泽东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他的名字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词,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同上第4、5页)

⑪世界著名人士斯诺对毛泽东说:“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总之,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5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⑫白求恩大夫说毛泽东:“是一位盖世英才。他一定能改变这个世界。”(《中流》2000年第12期第2页)

⑬著名的英籍华裔作家韩素英说:“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同上)

⑭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同上第 3 页)

⑮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R·特里尔说:“毛是二十世纪的魅力超群的政治家。”(同上)

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毛泽东是一个“巨人”,在“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魅力。”(《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第 203 页,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⑰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说:“毛泽东组织和改造了人民,改变了山河——历史上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同上,第 114 页)

⑱苏联著名的汉学家费德林说:“也许我们还要经历更多的坎坷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获得了西方乃至世界的尊敬。”(香港《镜报》2007 年第 6 期第 88 页《西方学者笔下的毛泽东》作者南文瑛)

⑲印度学者奇林·福康说:“马克思这个理论经过列宁斯大林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又“给予这个理论新的强调并拓展了这份遗产。”(同上,第 203 页)

……

上述全世界各方面人士、专家和具有判断分析能力者,他们都依据客观事实和自己的深入观察研究,不约而同地得出了高度一致的结论:毛泽东是当代世界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特别令人惊奇的是不同阶级的领袖人物,甚至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人物也有承

认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人物的。这又应怎样理解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从整体上放弃他们各自的阶级立场,但是,他们当中一部分头脑清醒一些的政治家,尽管在其他方面都反对和敌视毛泽东,然而对于全世界所公认的毛泽东确实伟大这一事实也无法不承认。正如尼克松这位有代表性的美国前总统所说:“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改变了整个世界”。邓力群同志说得很对:“毛泽东是一个划时代的世界性的伟大人物,这一点连许多有政治头脑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第31页)

以上是国内和国外对毛泽东的评价。这许多精辟论断,确实值得我们反复诵读、深思和体会。在此还应该指出:毛泽东的伟大也反映在毛泽东本人的谦逊上。1948年,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曾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复电说:“这很不妥当”,同时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转引自《毛泽东与郭沫若》第188页)在1954年宪法草案中原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元首”,也被毛泽东抹掉。傅作义在讨论宪法草案发言时说得好:这句话虽“被抹去了,但是抹不掉亿万人民的爱戴。愈谦逊,愈伟大,愈伟大,愈谦逊。”(《毛泽东传》第32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对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西方也作了很多可贵的评价。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数以百计的西方记者都随之来华采访,回去后写了大量报道文章,赞扬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是一个“田园诗画的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是美、英两家大报的文章:

美国《纽约时报》1972年11月刊登一位主要编辑写的文章,题为《亿万快乐的人民》,他写道:“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虽

然比较贫穷，但是，自尊、正直、并且愉快。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没有或者很少有人犯罪；没有人酗酒；没有人吸毒；没有性病；没有乞丐；没有环境污染……”

英国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72年11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没有失业现象；二十年来物价没有上涨；没有所得税；没有赌博；没有色情文学。人们充满信心，工作努力，更重要的是人们有共同的目的感和为共同事业的献身精神。全心全意重视精神鼓励，而不是物质刺激；他们重视协作精神，而不是竞争。多么地美妙啊！”（见《对外出版工作》杂志1986年第2期（附册）第2页）

虽然，1972年的中国，还处在“文革”期间，中国社会上也不是没有某些消极和错误的东西存在，然而，像以上这类赞扬新中国的文章数以千百计，是真实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一时成了西方舆论的热点。

第二，从毛泽东逝世至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来看，证明毛泽东确实英明伟大。

毛泽东逝世已经30多年了，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来看。毛泽东是不是真正的英明伟大呢?以下三方面的事实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1）在这30多年中，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这样有全球影响的特等大事。

这说明和证明了什么呢？这恰恰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英明和远见卓识是谁也比不上的。毛泽东早就科学地预见到，并明确地指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极端重要性，他早就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如不反修、防修和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必然不能制止党和国家的“和平演变”、投降帝国主义，最终导致亡党亡国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苏联和东欧的事实已作出了证明。

这一点，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指"文革"），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又说"三中全会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就是"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在南方谈话中针对苏东欧剧变又指出："某种暂时的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选》第2卷第149、278页，第3卷383页）

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如果按照毛泽东思想进行反修防修和采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措施，制止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路线，那就不但不会亡党亡国，相反，必能使社会主义得到健康的发展。

可是，有些国家的党不懂得毛泽东关于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个道理，没有反修防修和采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措施，他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打着"改革"的旗号上了台，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改变国家的经济基础、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与名称，甚至把共产党解散。

现在，有些国家的人民在重吃二遍苦之后，都在深深怀念社会主义了。

例如《苏维埃俄罗斯报》（1999年11月25日）在《回来吧！齐奥塞斯库》一文中报道说：罗马尼亚工人在党和国家剧变十年后游行示威，打出这样的标语："我们热爱您，齐奥塞斯库同志！我们愿意与您在一起，不想再受苦了"。

又如英国《泰晤士报》（1999年12月23日）在《罗马尼亚人为齐奥塞斯库流泪》的标题下报道"齐奥塞斯库墓前堆满了鲜花"。

又如：波兰的瓦文萨搞了个独立的团结工会，也是在美国的导演下搞"改革"，在推翻了共产党之后自己当上了总统。可是，

曾几何时，他也垮了台。他说：“在改革中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是幼稚了，相信（西方）这些口号，上了当。现在呢，我们大家都得付出代价。”（转引自《当代思潮》1991 年第 5 期第 42 页）

人们在“五·一”节、“十月革命”节的电视报道中经常看到，前苏联人民上街游行示威，表达对列宁、斯大林的怀念；原苏联的不少知识分子，目睹了亡党亡国的现实，不少人也醒悟了过来。

例如：原来坚决反对斯大林的著名作家、社会学家季莫维耶夫，曾被苏联取消国籍，流亡国外 20 多年。当他回国目睹苏联解体后的所谓“改革”的结果，他认识到自己错了，他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说：“我写了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他说他要写一部回忆录：《一个背叛者的自白》。1989 年 6 月，他在德国科隆举行的主题为“今天的苏联”的研讨会上说：“共产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坚不可摧，即使在共产党自行解散或者所有党员交出党证的情况下，也仍将是这样。”（见张捷著《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第 20、27、44 页，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出版）

又如：另一位苏联著名作家马克西莫夫，也是持不同政见者，流亡国外多年，原以坚决反共著称。但是他也为自己过去的反共言行后悔了。他在去世前，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记者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的痛心。戈沃鲁欣说得对，好像眼睁睁地看着你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同上书第 46 页）

这些惨痛教训的实例是举不胜举的。这一切又从一个侧面、一种角度证明：不懂得或者否定毛泽东的英明伟大的反修防修思想和采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措施，就会带来不堪

设想的恶果,以至后悔莫及了。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看一看一位美国教授是怎么哭毛泽东的。汤姆·路奇是美国魏斯里安大学教授,在 1991 年毛主席逝世 15 周年的时候,他到北京来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一走进纪念堂,他就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里面拍摄,摄相机的镜头自然而然地对准这位正在哭泣的外国人。路奇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还有谁比他更伟大?没想到他才去世 15 年，世界仿佛变了个样，社会主义运动乱成一团……现在才懂得，为什么毛主席的逝世是世界革命人民难以弥补的损失。一想起这些,从心底里感到难受。”(《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第 190~191 页)这又使我们想起尼克松说的“主席改变了整个世界”这句话,路奇说主席一死,想不到“世界仿佛(又)变了个样”。在这里,一位美国的总统,另一位美国的教授,在毛泽东对世界的巨大影响方面,不约而同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证明了毛泽东确实是世界性伟人。

(2)在毛泽东逝世后的 30 年多年以来,反毛、贬毛、反毛势力反复掀起全球性“非毛化”的狂潮恶浪。

毛泽东受尽了种种诬蔑和攻击。但是这恰恰暴露出这些“非毛”、“反毛”者是站在革命和人民的对立面,这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代表了革命和人民的利益。

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国出现了批毛、贬毛、“非毛化”思潮。北京的“西单墙”出现了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大字报,上海的“民主讨论会”也出现了许多全盘否定毛泽东的言论。有些人在批评、否定“文革”或在“解放思想”的名义下,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走到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极端上去了。有一些人是认识问题,但别有用心者也确实是有的。

有些人在文艺方面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鼓吹大写阴暗面,

夸大以至无中生有地写所谓阴暗面，把我们的党和国家及其光荣历史写成一团漆黑，一无是处。有一段时期，有些人攻击和污蔑毛泽东，从生活、思想、工作作风到政治路线、政策等各方面，有多种奇谈怪论、流言蜚语，在全国流传甚至在某些报刊上出现。

针对这股反动思潮，邓小平曾严肃批评说："上海有个'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邓小平责问道："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邓选》第 2 卷第 74 页）

国外的反共反华势力也大肆活动，西方记者和一些所谓的学者、专家，也都纷纷涌进中国来搜集"资料"，写文章、写书。大写、大揭中国的所谓阴暗面。有代表性的如美国的《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福，1979 年到北京，住了两年，回去写了一本厚厚的书，书名是《苦海余生》，污蔑毛泽东，污蔑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是社会不平等，是"等级无边"，说中国社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中国妇女受压，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把新中国描写得黑暗、落后，一塌糊涂。他的这本书很有欺骗性，在美国和世界一时广为流传。

在美国反共反华势力支持下，逃亡在美国的李志绥还以所谓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名义，写了一本厚厚的书，造谣、污蔑、攻击毛泽东，用中、英两种文字同时发表。但随即受到国内外正直人士的严正批驳，它只能欺骗一些抱有偏见和极端无知的人。

国内外呼应，"非毛化"思潮是一浪高过一浪，难免也使一些人受到影响。在 1980 年初，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中，有的同志竟主张取消《决议》草稿中集中论述毛泽东思想的一段话。这个主张遭到邓小平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决反对。《决议》肯定毛泽东，肯定毛泽东思想永

远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直至1988年5月16日，香港的《百姓》半月刊发表文章说，中国一位著名学者在美国的三场演讲中，仍主张彻底否定毛泽东说："一定要重新估价中国的历史，一定要彻底否定毛泽东，重新清算毛泽东的错误，完全摆脱毛泽东的阴魂"。（转引自《寻找毛泽东》第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国内外一切反共反华势力为什么始终念念不忘彻底否定毛泽东呢？这个"非毛化"思潮反映了谁的利益，其实质又何在？

"非毛化"急先锋们的自白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看他们的自白：

一看王若望，他以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老干部的身份来非毛、反毛，在参加1989年动乱后逃亡到美国。《美国之音》记者问王若望："你是一个很忠贞的共产党员了。你来到美国，你还是心爱这个共产党，还是很恨这个共产党？……"王若望答道："我年轻的时候，几乎到40岁以前，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自那以后，我开始反省，……我开始怀疑毛泽东，怀疑共产党的政策，走上了背叛共产主义、背叛这个党的道路。这个背叛，我认为是光荣的，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转引自《中流》1993年第4期第36页）王若望原来是以当叛徒为"光荣"的人，他之反毛也就不奇怪了。

二看苏绍智，他也是"非毛化"的"精英"，虽然挂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的招牌，但他"研究"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经济向私有化转变……现在要回到马克思主义上去是不行了"。（见《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12月5日）1989年动乱失败后，他也流亡到美国过资本主义的生活去了。

三看刘晓波，他不但大骂毛泽东，还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且以此为荣。"（见《刘晓波其人》一书第15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刘晓波是一

个以叛国“为荣”的人，他自然要反对爱国的毛泽东了。

四看王若水，他是一个所谓哲学家、理论家，曾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多年，后任副总编辑，在1989年动乱失败后，也流亡到美国去了。他在美国出版了他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写道：“毛泽东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了产”，“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了产”，“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见王若水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2页、第11页）王若水之反对毛泽东，岂不是正因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

更能彻底暴露“非毛化”精英的真面目的是流亡在美国的李泽厚、刘再复表达的观点，他们1995年在香港合作出版了《告别革命》一书，宣称他们历来对“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等等一直有怀疑”，他们认为古今中外的“任何革命”都是只起“破坏作用”而无任何积极作用。他们认为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不是任何一种“革命”，而是“努力发展经济的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和资本家”，于是他们宣称：“决心告别革命”。（见《告别革命》序言第4页，第11、177页）

在这里应该指出：这种“告别一切革命”的观点，同1999年版《辞海》编者为之翻案的胡适的观点完全一致，胡适早就说：“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胡适全集》第4卷第468页）

这岂不是最明白不过地道出了“非毛化”的实质吗？因为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如布托说过的：毛泽东是“革命的精髓”，“毛泽东的名字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词，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这就成了一切反对革命、背叛革命、背叛党、背叛共产主义、背叛祖国并一心为私的人竭力污蔑、攻击的总目标。可是这也恰恰又从

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

这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说："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毛泽东的情况也一样。

（3）中国出现了"毛泽东热"。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接着新的"毛泽东热"又不断出现，至今人们更加怀念毛泽东了。这是人们经过实际的比较和思考而产生的。虽然经历了"非毛化"思想的泛滥，但是毛泽东的伟大业绩和贡献及其光辉形象，毕竟是谁也无法加以抹杀、否定的。"毛泽东热"一定会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人的道德素质好，党风好，民风好，虽然那时物质生活尚不富裕，但社会公平稳定，人与人平等，精神是愉快的，人们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和信仰，人们信服毛主席的著作和讲话具有惊人的预见性和魅力，人们怀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一心一意为党为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

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我们从1990年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的一条报道中可见一斑。这则报道说："从1989年8月开始，湘西怀化部分地区出现一股购买领袖画像的热潮，据新华书店对该地区十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4个月里销售掉马、列、毛、刘、周、朱、邓、陈的画像8万多张。其中有6万多张是毛主席画像"。这股购买毛泽东画像的热潮，同时在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有一个时期，全国的大小汽车内，司机们不约而同地挂起了毛主席像，据说能去邪保平安。广东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的私企老板，也是白天挂邓小平像，晚上挂毛泽东像。据说白天要靠邓小平保他们先富起来，晚上要靠毛泽东保他们平安。这也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心态。

再如，到毛泽东故居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青年人占大多数。在毛泽东受严重攻击、污蔑时期到韶山参观的人曾下降

到 1966 年来的最低点——全年 21 万人次。但 1989 年又上升到 65 万多人次，增加达两倍以上了。后又逐年增长，据有关材料介绍，1991 年到韶山参观的人每天不下几千人，最多的达一万三千多人（见王继忠著《杞忧录》第 3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出版）。到井冈山、延安参观毛主席故居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大、中、小学都把这些故居定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经常去瞻仰受教育。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参观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许多歌颂毛泽东的影视、戏剧、歌曲和各类文章也愈来愈多，并受到广大工、农、兵、劳动群众的热烈欢迎。对这类影视是一看再看，许多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人们也是百听不厌。

我们还要看一看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思想政治运动的考验，又经历了“非毛化”思潮泛滥考验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著名人物是怎样怀念和评价毛泽东的：

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人民日报》在 1993 年 9 月 8 日发表了他写的文章——《毛主席指引社会主义道路》，他写道：“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毛主席……回顾自己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进步的经历……毛主席的话是激励我改造思想、脱胎换骨的有力鞭策。毛主席的讲话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心，消除我存在的思想顾虑，鼓舞着我和所有的民族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改造，不断前进……抚今追昔，重温毛主席的讲话，深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再看国内外著名的女作家冰心，她在 1993 年也发表了一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缅怀毛泽东的文章——《我永远感谢毛主席》，她联系自己亲身经历写道：“1949 年……远在异国的我，是空虚寂寞，苦闷消沉，像一个在深山中迷路的孩子……我读到《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有了引导我的救星，新生命投入我憔悴的躯体，我成了一个强健的人！……我辗转迂回地回

到在毛主席治理下的我挚爱的祖国，快乐安全直到现在。不是毛主席那几句使我安身立命的话，我哪有今天？”（见《文艺报》1993 年 12 月 25 日，此文已收入《冰心全集》第 8 卷）

这样的例子，也确实是不胜枚举。

这些又证明在毛泽东逝世 30 多年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任凭“非毛化”思潮如何泛滥，毛泽东的伟大是谁也否定不了的。相反，革命的敌人愈是仇恨、攻击毛泽东，愈证明毛泽东确实伟大才遭到他们这样的仇恨和攻击。

列宁说得有道理：“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活动家，我们离开那个时代越远，就越清楚地感到他们的伟大”。（《列宁全集》第 17 卷 109 页）毛泽东离开我们 30 多年了，我们不也是更加强烈地感到了他的伟大吗?！现在，新的“毛泽东热”更是方兴未艾，必将持续热下去，启发、推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人民走向胜利！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也有不足之处，也有失误或错误。但是人们不能对历史人物苛求，更不能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从而否定他的伟大英明。

第三，从 1999 年版《辞海》否定毛泽东的“理由”来看，是自相矛盾完全站不住脚的。

《辞海》编者在【毛泽东】词条中，第一步删除“伟大的”，第二步又删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对毛泽东的否定和诋毁。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严重事件。

从《辞海》负责人为自己辩护所提出的“理由”来看，是自相矛盾完全站不住脚的。

《辞海》编者在【毛泽东】词条中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删除、否定。起初拒绝读者的善意批评，不承认是个错误；后来又表示接受读者批评，承认对有些人物词条“概括不够完整”、“有所缺漏”，表示要“一一改正”。后来在重印的 5 万册缩印本中对【毛泽东】等人的词条重新补上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者”，但“伟大的”这个词仍未补上；后又反悔，不承认《辞海》有错误，说他们是根据胡乔木致中央的一封信的“意见”删改【毛泽东】等人的词条的。

现在，我们就来评析《辞海》这种矛盾的说法和做法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

（1）这说明那时有人在欺骗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胡乔木致中央的信说，根据中美关于合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协议》，“依据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也没有写“伟大的”这个词，我方同意“美方的修改意见”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一概不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类词语”（“等类”还包括“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引者注），“亦不用最有威望、杰出、卓越一类形容词”，这个“处理原则同样适用于古今各方面人物的条目”。《胡信》还说只有【周恩来】这条词目例外，仍然写他是“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9卷第509页）因为美方“对周较有好感”才同意使用“杰出的”这个形容词来评价周恩来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评价以美方“较有好感”为“标准”，这也是“奇闻”，暂且不论。

《辞海》主编于2000年2月22日发表《致〈中流〉杂志编辑部》的公开信，就是以上述《胡信》的“意见”为根据说：“此后，《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等辞书均按此意见办理。”

《辞海》这封再次拒绝读者批评的“公开信”，遭《中流》拒登，就给了《百年潮》杂志社，《百年潮》在2000年第6期上全文刊登了出来，同时还全文刊登了胡乔木致中央的“意见”信。这是否能说服人呢？否！

笔者仔细看了“公开信”和《胡信》，同时一一查核了众多被编进这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的中共领导人物的词条，却发现对众多领导人物的评价语仍然使用了“最有威

望、杰出、卓越一类形容词”。

例如仍然用“杰出的”这个形容词评价为“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的有：

①【朱德】（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9卷第517页）

②【陈毅】（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2卷第264页）

③【彭德怀】（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6卷第449页）

④【李先念】（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5卷第212页）

⑤【刘少奇】（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5卷第346页）

还有不少人也用了“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这个形容词来评价的。

仍然用“卓越的”这个形容词来评价的，例如：

⑥【瞿秋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6卷第710页）

仍然用“最有威望的”这个形容词来评价的，例如：

⑦【邓小平】……中国共产党最有威望的领导人……（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2卷第538页）目前也只发现仅此一例。

以上7例已足以证明除了周恩来之外 “一概不用”“伟大的”“最有威望、杰出、卓越一类形容词”是个谎言。这是中美合编的辞书的编者只是为了取消毛泽东 “伟大的”、“最有威望、杰出、卓越一类形容词”而设置的一个骗局。他们对毛泽东是不仅取消 “伟大的” 这个形容词，后来还进一步连带把被形容者——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份一并取消。这表明

在如此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有人在公然欺骗党中央，实在令人震惊、愤慨！证明这是个骗局的铁证俱在，即《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和《百年潮》，现在正保存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内。这是所有读者都可以去查对的。

是谁如此胆大包天欺骗党中央，笔者不想妄加判断，但几种可能性是明摆着的：

第一种可能性是胡乔木受了某些编者的欺骗。他已年迈，精力不足，只听有关编者汇报，未去核实这部中美合编的辞书，他不知真情就向中央汇报而写了这封信。

第二种可能性是胡乔木与有关编者明知故犯地欺骗中央。

第三种可能性是有关刊物在公布胡乔木这封信时做了手脚。

对此笔者无权去核查，只能由有关部门去核查了。

但是必须指出：即使在中美合编的辞书中，根据《协议》对人物词条不用形容词，这个《协议》也只对合编的辞书有效，不能约束中国国内的辞书也不用形容词，何况《协议》所谓的不使用形容词本身就是个谎言，实际是只在毛泽东的词条中取消"伟大的"这个所谓形容词，在其他人的词条中仍用"杰出"、"卓越"等形容词。《辞海》以撒谎的中美《协议》为"依据"搬到国内来贯彻，实际上取消"伟大的"这个形容词也主要是针对毛泽东，在孙中山的词条中未取消"伟大的"这个形容词。反毛、"非毛化"的先生们真是用心良苦矣！

（2）这说明有人利用编写《辞海》人物词条篡改历史。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对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了全党认同的正确完整的评价，而且还明确指出："在党的许多杰出的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见《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 793 页）

可是，中美合编辞书的有关中国部分的编者做得真是太过分了。不仅取消、否定了党的《决议》所肯定的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把党的《决议》所写的“在党的许多杰出的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也否定掉了。这样，党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就被《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写成了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的领袖中”没有位置的普通的革命家。1999 年版《辞海》竟然把这种荒谬的写法照搬到我国国内的《辞海》中来。这就更荒谬了。

尤其显得荒唐可笑的，是中美合编辞书的有关编者竟然把“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斗”的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写成“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3 卷第 833 页第 9 卷第 385 页）这就真正应了黄克诚在“非毛化”思潮泛滥时说过的名言：“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人比毛泽东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见 1981 年 4 月 11 日全国各报）中美合编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否定毛泽东是“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同时，把胡耀邦、赵紫阳都写成“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这岂不意味着胡、赵是比毛泽东“杰出”、“比毛泽东更高明、功劳更大”的人了吗？

“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这句话，顾名思义是指的“共产主义革命”，不是指“改革开放”。关于“中国革命”，周恩来曾列举事实后总结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井冈山阶段、长征阶段、八年抗日战争阶段、解放战争阶段，都是方向路线最正确的代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1956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家也公认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然而胡耀邦在建国后才开始升任四川省的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赵紫阳建国前任地委书记，怎么会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所有各个革命阶段中，胡、赵都是比毛泽东更高明、功劳更大的革命家？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吗？而且把当时都健在的胡、赵两人写进辞书，稿子是都要先经本人审阅的，难道胡、赵二人看了也都心安理得地同意把对他们各自的评价规格放在毛泽东之上吗？这又是人间奇闻。

（3）这说明《辞海》出版社负责人的言行严重自相矛盾。

1999年，在广大读者对《辞海》的错误提出批评后，有关领导方面也指出：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重要的百科全书和辞书选收或修订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条目释文，正式出版前必须按重大选题备案制度规定的程序报新闻出版署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辞海》对【毛泽东】条目的释文作了不恰当的修改，在出版前，出版社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送审，在社会上造成不好的影响。有关方面对《辞海》的错误做法作了严肃的批评。

面对读者和有关方面的批评，《辞海》负责人又是怎么说和怎么做的呢？

①2000年2月，《辞海》出版社负责人说："听取了各界广泛的批评意见，深受教育"，并且承认"在少数重要人物条目中，存在着概括不够完整，对经历和思想的叙述有所缺漏"等等问题。同时，明确地承诺要"一一改正"，"决心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去改"。（见《解放日报》2000年2月8日第2版）

这个"自我批评"是缺乏严格精神的，所谓的"重要人物"主要是毛泽东，其实，《辞海》对【毛泽东】这条词目并非"概括不够完整"，亦非"有所缺漏"，事实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两个关键词本来是众所周知，人所共认的，而且在旧版《辞海》中也是有的，只是在修订版中被编者别有用心地删除、否定掉了。但《辞海》负责人毕竟表示要"一一改正"，这还是值得欢迎的。

②2000年7月，《辞海》（缩印本）增印5万多册，改正之处是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陈云七位

领导人的词条释文各加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关键词。

这个“改正”极为重要。因为1999年版《辞海》已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份、评价都取消，对任弼时、邓小平、陈云更没有写到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就把有八十年历史和六千几百万党员的中共写成了没有一个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就表明这个党的性质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这次“改正”不仅是对毛泽东等人的身份和评价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肯定了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党。

但是，还有两个重大问题：

1）国家出版署不仅批评《辞海》“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而且要《辞海》“对修改后的《辞海》进行说明，消除影响”。（转引自《中流》2000年第8期第28页）这个重印版既然已作了重要的改正，为什么不作只字说明？相反，在封底印的声明是：“本《辞海》……除个别图文因版面需要作调动外，均无改动。”明明是把原来删除许多中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身份这个重大错误作了改正，怎么却说“均无改动”呢？你们无视国家出版署的批评和意见，无视已造成的不良影响。掩盖错误，美化自己，愚弄读者，真是莫此为甚！

2）对1999年修订版已印制出售的几十万册《辞海》，应改正还没有改正的怎么办？还有数量更多的包括1989年版在内的几十万册都把【毛泽东】、【周恩来】等词条释文中“伟大的”这个关键词删掉了，这也是应改正而并未“一一改正”的怎么办？不作任何交代怎么行呢？

③2001年1月，《辞海》出版社负责人又出来讲话了。非常遗憾的是只对《辞海》作冠冕堂皇的正面宣传，而对发生的错误及改正的情况讳莫如深，只字未提。特别是还一再公开地宣称：“《辞海》是代表国家的出版物。”（这是在中央电视台2001年

1月17日和18日的《焦点访谈》中讲的）

这岂不是天大的怪事：在出版之前没有按党和国家的规定"送审"，对严重的政治错误说要"改正"也没有认真地"一一改正"，却还要大言不惭地向读者和亿万电视观众强调"《辞海》是代表国家的出版物"，这岂不是要误导广大读者和亿万电视观众，把《辞海》的政治性、原则性错误和谎言，都当作"代表国家的"正确观点来接受吗？这将会酿成多大的恶果！

《辞海》出版社负责人公诸报端和电视台的言行如此互相矛盾和自相矛盾，这表明"说假话"、"搞欺骗"的歪风邪气已严重地侵蚀到学术界和出版领域了。

综上所述，全党、全国人民所公认，党的《决议》所肯定：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这些年来，国内外那些搞"非毛化"，诋毁、否定毛泽东的先生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走向他们自己愿望的反面，使人们认清了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和罪恶意图，并进一步认识和体会到毛泽东确实伟大！

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邓小平一再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邓选》第2卷第299、279页）请问《辞海》有关编者：你们把对毛泽东的评价中的"伟大的"这个词删除、否定，后来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删除、否定，这岂不是明目张胆地否定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而给国内外一切反共反华势力提供污

蔑、攻击毛泽东的口实？这在党内外、国内外又造成何等恶劣的影响？你们这种行为不是正在损害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吗？

邓小平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大错误"。（见《邓选》第2卷第39、172、300页）

显然，1999年版《辞海》负责人应该向党和人民有所交代，澄清事实真相，认真改正错误，消除已造成的不良影响。

后　语

持续多年写以上这20个专题的全过程，也是笔者对1999年版《辞海》所犯错误的认识和对写本书的必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和提高的过程。这期间先后看过许多文章，有三篇文章，对笔者也可能对读者是大有启发、甚至能起到“画龙点睛”的启示作用的。这三篇文章，好就好在是1999年版《辞海》副主编以及支持和赞颂《辞海》观点的先生们所写，而非批判《辞海》观点者所写，人们大概不会怀疑这三位作者会冤枉《辞海》编者的所作所为和真实意图吧！

一是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主办的《中国合作新报》1999年10月28日第6版上发表的文章：《99〈辞海〉重新评价毛泽东》，文中有个小标题是《为毛泽东摘掉马列帽》。稍加思索，这真是一语破的，为《辞海》修订版的错误删改点明主题的文章。而且是在1999年《辞海》修订版刚刚出版的同一个月发表。这是偶然的巧合吗？这难道是作者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已对《辞海》千百个词条的删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吗？怎么如此之快就能得出了“新《辞海》大胆”“重新评价毛泽东”的结论？并作出这是“表达了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认识”这个结论。这个所谓“重新评价毛泽东”，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者。显然,这个所谓“重新评价毛泽东”是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已有评价而来的。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怎么不由中共中央来“重新评价毛泽东”,修改或重作《决议》?怎么能由《辞海》的编者们来推翻中共中央《决议》的已有评价而“重新评价”?这岂不乱了套?果然,这当即引起了广大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的党员和公民的愤慨和谴责!

二是王元化先生发表的《关于“五·四”再认识答客问》的文章。(见1999年5月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王元化的身份是1999年版《辞海》副主编,在1999年版《辞海》出版前夕发表此文,明确地说:“据我所知,当时毛泽东把中国社会性质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自然也就相应为反帝反封建了……有人不赞成”。王元化也是“不赞成”、不承认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的,王元化说“‘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对‘五·四’的再认识,首先就要打破既定观念”。果然,在《辞海》中一系列涉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所谓“既定观念”,例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五·四”新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的论述,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区分,“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分,以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等,就都被作为“要打破的既定观念”,都被当作“谬误”而取消或删除掉了。笔者核对了数以百计的有关此类词条的取消、删改,就是如此。

三是谢泳先生发表的文章。(见《东方文化》2002年第4期)谢泳大谈“时代的变迁”总要先做两件事:一是修改历史教科书,二是修改辞典。他写道:“1949年以后,时代变了”,“中国社会的突然转型”,“一是新时代政治上的压力过于强大;二是知识分子对于新时代还有自觉认同的要求……对于多数知识分

子来说，对于新时代的政治要求，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显然，他认为那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未能起来“抵抗新时代的政治要求”而在“过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接受了“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因而酿成了后来的“悲剧命运”。接着他说《王云五大辞典》被修改，就是“强加给学生（读者）某种意识形态”。他举例说，比如【妓】词条，原写“妓女，卖淫的妇女”，这解释是对的；但在1949年后被改写为“妓女，旧社会中被迫卖淫的妇女”，这解释就不对了，因为已被“强加”进了“意识形态”内容。然而，他认为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八十年代”，“时代”又“变”了：辞典“在政治和历史名词的解释方面，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回到王云五时代的态度。”（这是指《辞海》八十年代即开始删除“意识形态”的内容）谢泳继续说，只要看一看辞典解释词条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而这一加一减，又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变迁”。

显然，谢泳说的又一次“时代的变迁”、“回到王云五时代”去，就是指的在辞典中清除1949年以后新中国“强加给学生（读者）某种意识形态”。这种清除是很彻底的，连卖淫是妇女在“旧社会中”、“被迫”的这两个字眼，也在清除“意识形态”范围之内而遭到清除，更不用说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压迫了。经笔者核实，果然，【妓】这个词条，在1979年版第1099页上的【妓】：“妓女，旧社会中被迫卖淫的妇女”；但在1999年版《辞海》第1329页上又改了，是恢复1949年以前即“回到王云五时代”的写法，【妓】：“妓女，卖淫的妇女”。显然，《辞海》编者不允许站在新中国、新社会立场上如实地写出在“旧社会”中妇女卖淫是“被迫”的这一事实。

谢泳说的修改辞典通过对词条内容的增加和减少“体现时代的变迁”，这确实有助于人们理解1999年版《辞海》编者的

良苦用心。本书已列举近500个词条的取消和删节主要是属于“减少”，按谢泳所说是“减少”“强加给学生的某种意识形态”内容;笔者也注意到了“增加”,比如编者仅仅在一页之中就有“增加”【宗教信仰自由】等10个宗教词条的实例。(可对比《辞海》1979年版第1011页与1999年版第1221页)这“增加”的难道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吗?

上述三篇文章的实质是一致的,正如谢泳这篇文章所解释,辞典用词条内容的“一加,一减”来否定和取消新社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恢复和维护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再来一次“改朝换代”,回到1949年以前“王云五时代”的旧社会去。

然而,“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只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为改革开放建立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直至今天,我们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的整个历史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怎能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回到1949年以前“王云五时代”的旧社会去呢?

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已胜利闭幕，“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和经过修改的新的党章已公布于世。“十七大”开得很成功。学习和贯彻“十七大”精神的热潮已在全国掀起。笔者认为现在我们理应结合学习和贯彻“十七大”精神,来纠正1999年版《辞海》修订中的严重错误,并消除其恶劣影响。

一、1999版《辞海》编者在一系列词条的取消和修改中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极其错误的

“十七大”政治报告明确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十七大”党章总纲再次明确肯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二、1999 版《辞海》编者在一系列词条的取消和修改中否定、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肯定新老修正主义是极其错误的

“十七大”党章总纲再次明确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三、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一系列词条中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是极其错误的

“十七大”党章总纲再次明确肯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四、1999 年版《辞海》编者在一系列词条的取消和修改中否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是极其错误的

“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明确重申:“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五、中央党报《人民日报》近年来不断发表《永远的丰碑》,这是要求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中国共产党人和党外的革命先烈浴血奋斗牺牲生命为新中国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可是,人们只要对比一下,就可看出数以百计的《永远的丰碑》本来已载入 1979 年版《辞海》,却被 1999 年版《辞海》编者错误地取消或作了错误的删改。这不仅是对先烈们的亵渎,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光辉革命历史的蔑视和否定。

上述“十七大”政治报告、党章和党报所表述的,不仅完全正确,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是我们党所一贯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以此对照 1999 年版《辞海》对一系列词条的修改,可见其错误极为严重。已到彻底纠正的时候了!

总而言之,中国是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辞海》竟想搞什么“与国际接轨”,想在《辞海》中不反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反映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怎么可

以和可能呢?《辞海》编者身为中国公民(有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却妄想在《辞海》中清除和消灭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多么的不现实和荒唐啊!

国有企业可分为大中小,被有些人用各种借口一个一个地“变卖”流失,可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不同,它是不能分大中小一个一个地“变卖”流失的。《辞海》想用30年时间分三步走“清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是不行的。因为正如列宁的名言所说:“马克思主义”是犹如“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4页)比如《辞海》即使仅仅在一个词条中否定“国家政权”和“政党”具有阶级性,只要这一条真被否定了,那么,虽然在其他不少词条中仍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语和概念尚未删除,还能算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吗?否!因为你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否定了,谁还能相信你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呢?(虽然《辞海》清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走了两步,第三步是准备到2009年再走的。)

《辞海》按例是10年修订一次,2009年又要出新的修订版了。笔者建议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来关注:结合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彻底纠正1999年版(包括1989年版)《辞海》的严重错误,并消除其影响。因为它的危害已够严重了,这些年来社会上一再出现的扰乱人心的所有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历史翻案风,几乎都源于《辞海》,都在《辞海》中可找到源头。当前对纠正《辞海》的错误,应该作为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最紧迫的任务来对待。

2007年12月

附：

《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书目

《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编委会成立于1999年，到现已出版10本专著，受到中央媒体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原来书目的排列不够规范，现重新排列如下：

《毛泽东颂》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续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们永远崇敬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与中国当代杰出革命家》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当代著名文艺家》	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心中的毛泽东》	中国展望出版社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	中国展望出版社
《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争》	中国展望出版社
《革命历史与领袖不容歪曲和否定》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革命历史与领袖不容歪曲和否定 / 陈守礼　著.—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2008.4
ISBN-10:988-98584-7-9
ISBN-13:978-988-98584-7-6

革命历史与领袖不容歪曲和否定

作　　者	陈守礼
责任编辑	曹国福
出　　版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地　　址	香港旺角亚皆老街94号利丰大厦1楼B座
策划 / 发行	北京中联社图书中心
购书热线	010-60248016/60248028-806
印　　刷	北京潮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8
字　数	432千字
版　次	2008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